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戈林



## 出版说明

现已出版的《二战将帅》丛书，包括：

桀骜不驯——麦克阿瑟

热血豪胆——巴顿

稳扎稳打——蒙哥马利

胜利象征——朱可夫

骁勇善战——崔可夫

乱世枭雄——戈林

沙场斗兽——隆美尔

战争赌徒——山本五十六

坦克怪杰——古德里安

闪电凶神——曼施坦因

海上骑士——尼米兹

大智若愚——布莱德雷

英伦之豹——蒙巴顿

智勇双全——华西列夫斯基

刚烈将军——史迪威

侵华恶魔——冈村宁次

以上前 8 种（原《二战八大将帅》）由程广中主编，后 8 种由李德福主编。为改印珍藏本套装方便，将上述 16 种按顺序每 4 种为一套，分别称为：

《二战将帅》（一）

《二战将帅》（二）

《二战将帅》（三）

《二战将帅》（四）

## 作者前言

岁月匆匆，世事茫茫，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已近半个世纪了。在这半个世纪里，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那场前所未有的人类劫难，却是后人所难以忘怀的。战争恶魔之一——纳粹德国的帝国元帅赫尔曼·戈林，在历史上留下了罪恶的痕迹，同时也留下了值得研究的东西。通过这个臭名昭著的人物，我们可以了解战争的来龙去脉，了解第三帝国的内幕，了解法西斯分子的本性和丑行。

在 20 世纪的文明世界中，曾经发生过两次世界大战，而这两次世界大战都是由德国挑起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不过 20 年之后，德国又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策源地。为什么千百万德国人还没有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的伤痛中完全恢复过来，就会在纳粹党的卐字旗的召唤下，走出家门，越过国境，充当一小撮战争狂人屠杀他国人民的工具？这实在是一个引人深思的历史问题。德国人民是无辜的，他们同那些饱受纳粹铁蹄蹂躏的国家的人民一样，在这场战争中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有罪的是那些把德国人民驱入战争深渊的法西斯分子，是以希特勒、戈林为首的纳粹德国的领导者们。正是他们打着复兴德国的幌子，以拯救德国的名义，拼命向德国人民灌输国家社会主义的毒汁，愚弄德国人民。

本世纪 20 年代，战败的德国可以说是汇集了当时资本主义世界所有的矛盾。政局混乱，经济衰退，社会动荡不安。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给后来的世界带来灾难性影响的纳粹主义产生了。

纳粹主义即国家社会主义，在其出笼之初，迷惑了德国一大批陷于失业、破产的困境中的中下层人民。在极具欺骗性的“德国国家社会主人工人党”（即纳粹党，“纳粹”为该党德文名称“Nazi”的译音）的 25 条纲领中，有几条完全是为迎合中下层人民的愿望而提出的。正因为如此，纳粹党才能在派别林立的德国政坛上脱颖而出，引起一大批对德国现状不满的工人、复员军人、中小资产阶级人士的关注。而戈林就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结识希特勒，并加入纳粹党的。

戈林是在不正常的家庭环境中长大的，从小便有出人头地的想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戈林是德国空军战斗机部队的王牌飞行员，曾任著名的里希特霍芬航空队的最后一任队长。由于作战英勇，他成为德国空军中赫赫有名的空战英雄，受过德皇嘉奖。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戈林同千百万德国复员军人一样，理想破灭，生活窘困，以至流落他乡，衣食无着。不甘寂寞的戈林加入纳粹党之后，以其出众的才干，很快便得到希特勒的赏识和重用，成为纳粹党的重要成员。在纳粹党以夺取巴伐利亚政权为目的的著名的“啤酒馆政变”失败后，他一度流亡国外。

1925 年戈林重返德国，被希特勒委以重任，在纳粹夺取德国全国政权的过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在纳粹党夺取政权后，戈林青云直上，曾任纳粹德国国会议长、掌管德国经济的四年计划机构的总负责人及德国空军总司令等多项要职，希特勒还把纳粹德国最高的军衔——帝国元帅授予戈林，使他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显赫地位。苏德战争爆发后，希特勒又以遗嘱的形式确定戈林为他的接班人。

作为希特勒最重要的助手、纳粹德国的第二号人物，戈林策划或参与了纳粹党在整个 30 年代所有的重大行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戈林亲自指

挥他所组建的德国空军协同地面部队作战，对被侵略国家的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可谓血债累累，恶贯满盈。正如杰克逊法官在纽伦堡军事法庭所概括的那样：“……他利用他的冲锋队夺取了政权。为了巩固政权，他又阴谋策划了纵火烧毁国会大厦事件。在于掉对手或制造丑闻方面，戈林是相当有办法的。他创建了盖世太保和集中营。他一手组建的纳粹德国空军，专门用以对付不设防的邻国。在迫害犹太人问题上，戈林出谋划策，非常积极。他不遗余力地将德国经济推入战争轨道，为战争服务。戈林是这场战争的策划者之一，是仅次于希特勒的人物，他集所有被告的罪恶活动于一身……”

戈林被称为乱世枭雄，是因为在他身上能够找到一切战争狂人的共同特点。他阴险狡诈，寡廉鲜耻，权欲熏心，凶残暴戾，为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背信弃义，这些仅从30年代初期发生的国会纵火案和镇压罗姆冲锋队等事件就可得到证明。但是，他对希特勒一直忠心耿耿，几乎从没生过二心。即便是在他失宠之后，受到希特勒的冷落及宿敌新贵们的打击时仍然如此。大概就是因为这一点，尽管在战争后期，希特勒已对他厌恶至极，却没有像对陆军将领那样随意处置他。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戈林的心态比较复杂，如果要用两个字来概括，那就是“投机”。一方面，他对发动世界大战疑虑重重，害怕战争毁掉德国，特别是毁掉他个人已经得到的一切；另一方面，他又害怕他的退缩引起希特勒的不满，一旦德国赢得这场战争，他不能以功臣自居。因此，他忽而深居简出，忽而抛头露面；忽而消极厌倦，忽而干劲十足；忽而劝说希特勒以外交手段解决问题，忽而狂热支持希特勒的战争政策。有一个时期，他甚至极度消沉，常常想逃避战争。但他也明白，他已同希特勒绑到一起了，除了讨取希特勒的欢心，别无选择。于是，更多的时候他是在按照希特勒的旨意挥舞屠刀，极力使他和他的空军不让希特勒失望，尽管他未能做到这一点。

本书除了写出戈林作为战争狂人的所作所为和性格特点之外，也用一定的笔墨，反映了戈林作为一个“人”或者说一名“军人”的生活和脾性。比如，写了戈林的儿女情长，他对第一个妻子卡琳的一往情深，对第二个妻子埃米和女儿埃达的无限爱意都跃于纸间。他曾有过的为维护正统军人的形象而禁止滥杀无辜和爱护士兵的举动，在书中也有记述。另外，本书还描述了戈林作为吸毒者的心理变态行为。他涂脂抹粉、讲究穿戴、把玩宝石的种种怪癖，他的极度专横跋扈、刚愎自用，他那在第三帝国要人中出了名的挥霍无度和奢侈腐化，他那超出常人的权力欲和虚荣心，都同他长期吸食吗啡不无关系，当然这些最根本的还出于他的法西斯本性。戈林所作出的一些绝顶荒唐的事情，已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可确为史料所记载。总之，笔者力图不仅仅把戈林当作一个抽象、空洞的战争恶魔的“符号”来写，而是着力刻画一个有血有肉、独具特色的反面的历史人物形象。在注重历史感、真实性的前提下，也对可读性有所考虑。

近年来，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各类传记作品和史学著作多有问世，我国读者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元凶阿道夫·希特勒等人已不陌生。但对戈林，迄今为止，除了个别译著和少量一般介绍性著述外，国内还没有出现一本专门记述其生平的作品。笔者不揣浅陋，在参考有关史料的基础上，撰写了这部比较全面、客观、历史地记录和评述戈林一生经历的传记著作，以人物在二战前后的经历为重点，从更广阔的时间和空间角度来发掘其行为背后的原因。由于作者水平有限，加之时间仓促，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史学界同

行及各界读者指正。

王建吉  
1994年4月

## 序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场战争。在这场以法西斯轴心为一方，以反法西斯同盟为另一方的大战中，双方投入的兵力兵器之多、战场波及范围之广、作战样式之新、造成的损失之大、产生的影响之深远都是前所未有的。尽管大战结束近50年来，物换星移，事过境迁，但它仍以其恢宏的气势、深刻的内涵、丰富的底蕴，磁铁般吸引着中外众多的军事家、历史学家去探究和著述。由军内外一批学有专长的中青年军事史学工作者撰写的这套《二战八大将帅》丛书就是这方面的又一新作。

战争可谓人类所能参加的最惊险、最激烈、最残酷的较量，而将帅则堪称战争的灵魂。古人曾说，充敌之要在乎将得其人。观古今中外历史，王朝之擅变，国家之兴亡，莫不与将帅之忧劣有关。当然，决定战争胜败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战争的性质，战争双方的力量对比，这些都是至关重要的因素。然而，将帅作为战争（或战役）的组织者和指挥者，其作用也是决不容忽视的。可以说，无卓越之将帅，即不能创彪炳之功业，无优秀之指挥，则不能获辉煌之胜果。所以中国古代著名的军事家孙子说：“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法国的拿破仑亦说：“攻略高卢者，非罗马之军队，而系凯撒，震动罗马者，非迦太基之士兵，而系汉尼拔，侵入印度者，非马其顿之军队，而系亚历山大。”将帅之于战争，永远是人们研究和了解战争的重要内容。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法西斯侵略者制造的巨大悲剧。在这场正义与邪恶，进步与反动的空前激烈的大厮杀、大搏斗中，站在前列披坚执锐、角力斗智的是同盟国异彩纷呈的众多将帅。他们或横刀立马、驰骋疆场，或羽扇轻摇、运筹帷幄，导演了一幕幕激越高昂、波澜曲折的活剧，使残酷的战争闪烁出人类智慧与勇气的火花。《二战八大将帅》丛书从中重点选收了苏联的朱可夫和崔可夫、美国的麦克阿瑟和巴顿、英国的蒙哥马利，他们都是二战中的风云人物，是同盟国所依赖的柱石，个个功名显赫。苏联元帅、苏军著名统帅朱可夫多谋善断、胆略过人，具有钢铁般的意志和不屈不挠的精神，具有组织实施庞大的坦克机械化兵团进攻和防御作战的杰出才能。正如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所说：“朱可夫确实是率领大批军队进行战争的统帅的统帅。”美国五星上将麦克阿瑟战时荣任太平洋西南战区总司令，指挥美国陆海空三军力量，实行“蛙跳”战术，直取日军防线纵深地带的主要目标，从澳大利亚经菲律宾一直打到日本国土。受命于危难之际的蒙哥马利制订作战计划十分细致彻底，善于稳扎稳打，是一位阵地战大师。巴顿作为坦克进攻作战的行家里手，则是一名“热血豪胆”的沙场老将。这几位将领不仅具有良好的战略战术素养，而且对国家的政治目标也有比较透彻的了解，二者的均衡发展，使他们在夺取一个个战役胜利的同时，能够在战略上高敌一筹、立于不败之地，从而在军事领域达到了光辉的顶点。

当然，这些将帅并不是天生的神灵，从初上战场的新兵到登上军事“金字塔”顶端的著名将帅，他们无不经过了艰苦的磨练和刻苦的学习。朱可夫在列宁格勒高级骑兵学校时就把事业、职责置于一切之上，房间里地图铺满地板，上面勾画得密密麻麻。他们普遍重视从历史知识中吮吸营养。麦克阿瑟说：“军事比其他大多数职业更需要依靠前人明智的决断作为制定未来方案的参考。”

巴顿则高声宣布：“你要想成为一个成功的军人，就必须了解历史。”他们对新事物有着敏锐的观察力和预见力，能够及时发现和研究武器装备的变化及其对作战方式的影响。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武器装备的迅猛发展呼唤着作战模式的划时代变革，在各国军事学术界守旧与变革的激烈争执中，这些著名将帅几乎全是敢走新路的勇者。朱可夫反对把坦克作为步兵支援武器的作法，积极主张建立苏军的坦克机械化部队。巴顿则是美军坦克部队的创始人之一，二战初期，他带着强烈的兴趣注视着欧洲战争的发展，如饥似渴地阅读代表当时先进思想的有关人物的军事理论和作战指导原则。此外，这些将帅均懂得任何灵巧的现代化武器系统都不能代替受过严格训练、富有经验和作战勇敢的士兵，只有平时严格训练、严格要求才能带出一支纪律严明、指挥统一、战斗力强的精锐之师。朱可夫、崔可夫、蒙哥马利、巴顿都以治军严明著称于世。

丛书还收入了三位分属于德、日法西斯国家的将领，他们是山本五十六、戈林、隆美尔。这三位将领都是疯狂发动法西斯侵略战争的罪犯，但是他们在战术领域的创造，仍是值得后人研究借鉴的。日本武士山本五十六是日本海军航空兵的缔造者，在偷袭珍珠港时首次把航空母舰编队投入实战，一举开创了世界海战史上的航空打击时代。开战之初，由他率领的日本联合舰队横扫了东南亚和整个西太平洋地区。希特勒的心腹爱将隆美尔，在入侵法国、进军北非和抗登陆子诺曼底中出尽风头，尤其在指挥德军精锐坦克部队鏖兵北非时，他狡诈多变、以少胜多，一度进抵阿拉曼、兵临开罗城，撼动了英国北非防线的中枢神经，成为闻名遐迩的“沙漠之狐”。纳粹德国军衔最高的“帝国元帅”戈林，也在组建德国空军并使其密切协同地面部队进行“闪击战”中为希特勒立下汗马功劳。但是，这些将领远不能同上述五位同盟国将领相比，他们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可说是一名出色的战术家，却不是什么战略家。他们缺乏通观全局、深谋远虑的战略才能，一旦在一个战略方向独当一面时便显得力不从心。尤其重要的是，他们都死心塌地地为法西斯、为非正义的侵略战争卖命。他们在战术领域的创造，只是将法西斯的侵略推向顶点。他们的才干不仅没有造福人类，反而阻碍和延缓了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他们因此也就成了千古罪人，而且终于不能逃脱失败的命运。

所谓“二战八大将帅”，当然不是说二战将帅仅此八位，或说他们是最显赫的八位。一些同样或更加著名的将帅，如艾森豪威尔、马歇尔等，只是因为已有传记出版，这套书中未再收入。对已收入的八位，不论是反法西斯的英雄，还是发动侵略战争的战犯，这套书的作者们都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力求从各个方面、各个角度全面展示传主的生平事迹。不仅写他们的军事生涯、重要战绩，而且注意写他们的家庭背景、生活经历和恋爱婚姻，揭示出他们成为将帅的人生轨迹；不仅一般地写他们的治军、作战，而且注意从政治上、战略上评价其成败得失，以使读者得到有益的启示。丛书力图融学术性与知识性、哲理性分析与生动的描述为一体，使之读来朗朗上口，引人入胜。

当前的世界正处于大变动时期。冷战结束，两极格局瓦解，在一个较长时期内有可能避免新的世界大战。然而，世界还远非伊甸园，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存在仍然是解决和平与发展问题的主要障碍。一切为祖国的安宁、人民的幸福立志从戎的热血青年，一切即将成为将帅或立志成为将帅的指战员都应该读读这套书。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希望这套将帅传记能够为有志

者和广大的读者提供有益的参考。

任修桥  
九三年十一月



《二战将帅》丛书（一）（二）编委会

主 编 程广中  
副主编 接培柱 李一奇  
编 委 （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建吉 刘文涛 李一奇  
杜正艾 柯春桥 接培柱  
程广中 傅雁南 蔡志强  
樊高月

乱世梟雄 戈林

## 引子

1945年11月20日，德国纽伦堡。

这个几乎在炮火中化为废墟的城市，一夜之间，成了全世界所瞩目的地方，大批记者和各国观察员云集于此。原来，它是国际军事法庭的所在地，审判纳粹战犯的国际军事法庭将在这里首次开庭。

当国际军事法庭庭长、英国法官劳伦斯宣布开庭，并命令把被告带到被告席上时，大厅内照相机的镁光灯不断闪烁，按动快门的声音响成一片，人们的目光都紧紧盯在鱼贯而入的纳粹战犯们身上。走在最前面的是前纳粹德国的第二号人物、纳粹德国帝国元帅赫尔曼·戈林，他是这次审判的头号战犯。他脸上刻意作出一副桀骜不驯、不屑一顾的神情，但两眼却明显流露出不安。

在战犯就坐后，美国首席起诉人杰克逊检察长宣读了对此次审判所涉及的所有犯人的共同起诉书。然后，杰克逊让每个战犯就起诉书的内容回答自己是否有罪，这时，戈林站了起来，傲慢地对杰克逊法官说，他要宣读一份宣言，并拿着一页纸径直走到麦克风前。杰克逊法官拒绝了他的要求，戈林却没有听从，迅速念道，“作为大日尔曼帝国的帝国元帅……，”刚念完开头一句话，庭长劳伦斯厉声责令戈林遵守秩序，戈林挣扎着在麦克风前说了一句话：“我声明，根据起诉书，我是无罪的。”

纽伦堡审讯共持续了218天。在对戈林的单独起诉中，检察官历数完戈林所犯下的罪行后，出示了大量的证据，其中包括戈林亲笔签署的文件、电话录音及反映纳粹暴行的电影资料等等，同时有证人到场作证。从1946年3月8日起，戈林的律师为戈林作了长达13天的辩护，3月13日是纽伦堡审判的一个高潮，戈林打破了长达5个月的沉默，出庭为自己辩护。这一天，戈林恢复了以往的机敏、沉着和自信，他或慷慨陈辞，妙语连珠，把自己装扮成一名无辜的爱国者，以引起人们的同情；或避重就轻，狡猾抵赖，逐条反驳起诉书的内容。戈林的表现使得四座皆惊，在场的记者甚至不知道怎样写当天的新闻稿。在后面的审讯中，戈林继续装腔作势，强词夺理。8月31日，戈林最后一次获准公开在法庭发言。他声称自己从来没有下令杀害过任何一个人，从来没有想通过战争压迫、奴役、掠夺以至残害他国人民，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对自己的民族的挚爱，是为了民族的幸福和自由”。

然而，谎言永远变不成真理，事实终究是事实。在确凿的证据面前，戈林的罪行最终得到确认，他将受到应得的惩罚。

10月1日，赫尔曼·戈林作为罪大恶极的战争元凶被国际军事法庭判以绞刑，并被告知，他在4天之内可向德国管制委员会提出上诉，请求减刑，绞刑将于15天后执行。退庭后，戈林告诉他的律师，他不要求减刑，只求能将绞刑改为枪决。

10月7日，一位衣饰普通，面容憔悴，看上去疲惫不堪，无比哀痛的女人走进了纽伦堡监狱的会见室，她就是戈林的妻子埃米·戈林。卫兵让她在一张椅子上坐下，她一言不发，双眼发直，痴痴地看着会见室与监舍相连的门。不一会儿，3名荷枪实弹的美国士兵押着戈林走了进来。她突然站起，发疯似地向门口奔去，眼里流着泪，嘴里喊着：“赫尔曼，赫尔曼……。”“埃米，看到你真高兴，埃达好吗？……”戈林说着，就想快步迎上，但他看了看自己的手，停下了脚步。他的手和押解他的美国士兵的手铐在一起，

他只好同这名士兵并肩慢慢走到玻璃夹壁前，坐了下来。

这是狱方允许戈林同他的妻子所见的最后一面。埃米深情地凝视着他的丈夫，把悲伤咽了下去，缓缓说道：“你已经为你的国家尽了最后的力量，你可以问心无愧地走了，就像战死沙场的将军一样。”戈林深受感动，颤声说：“埃米，我从来没想到你会这么坚强。”接着，他安慰埃米：“他们不会绞死我的，对付我的只有子弹，他们别想绞死赫尔曼·戈林，”

在回监舍的路上，戈林的耳边响起劳伦斯法官的声音：“戈林是德国发动侵略战争的主要罪魁祸首，对这场战争他一贯推波助澜，秉承希特勒的旨意行事，因此不存在减刑的可能。戈林既是德国的政治首脑，也是军事首脑。他是奴役劳工计划的负责人，也是纳粹德国制定针对犹太人和其他种族的迫害计划的元凶。上述罪行，他本人供认不讳，其证词也足以证实他的罪行……被告赫尔曼·戈林，国际军事法庭根据起诉书所确定的罪行，判处你绞刑。”劳伦斯法官的声音渐渐远去，戈林的嘴边掠过一丝冷笑，他暗暗对自己说：“我决不能死在绞刑架上，帝国元帅应该有自己的死法。”

10月15日，纽伦堡的秋夜十分静谧，满天的繁星闪着清冷的光。街上早已戒严，整个城市阒无声息。纽伦堡监狱内外，灯火通明，戒备森严。监狱四周的各个主要路口都由重型坦克把守，高炮部队也奉命进入一级战备状态。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夜晚，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将于16日零点对戈林等纳粹战犯处以绞刑。

15日这一天，戈林异常安然，一副听天由命，心如死灰的样子，他似乎早已作好了赴刑的准备。晚7点，牧师格雷克来到戈林的监舍。当牧师问到戈林的心是否已经归顺了主，戈林答道，他虽然是一个基督徒，却不能接受基督教的教义。然后，他又对牧师说，“我的内心很平静，只想休息一下。”牧师走后，戈林平躺在床上，翻看着一本书。大约21点30分左右，狱医普夫卢克在值班军官的陪同下走了进来，对戈林作例行的身体检查。普夫卢克临走时，同戈林握了握手，戈林向他道了一声晚安。狱医走后，戈林躺同床上，好像在平心静气地等待着生命最后时刻的到来。透过监舍门上的窥视孔，值班的看守本海姆每隔几分钟便察看一下戈林的动静，始终没有发现他有什么异样。大约22点30分，戈林的监舍又换了一位看守——上士哈罗德·约翰逊，他是戈林死亡的目击者。约翰逊后来回忆道：“他一动不动地躺到10点40分。我在窥视窗里看到戈林双手交叉，举起胳膊，又把双手放到胸前，把头转向了墙。大约两三分钟之后，我听见一声窒息般的嘶鸣。我急忙一看，发现这声音是戈林发出的，便大声喊：快，戈林出事了！我看了一下手表，核对了时间，当时是10点44分。”

狱医普夫卢克博士和监狱长安德鲁斯上校等有关人员闻讯赶来。普夫卢克博士抬起戈林的胳膊，摸了一下他的脉搏，接着，语调低沉地对安德鲁斯说：“他已经死了。”第二天，安德鲁斯代表狱方向记者发布消息：“战犯赫尔曼·戈林未受绞刑，昨夜22点45分，他在自己的监舍服用氰化钾自杀……需要查明的是，他是如何弄到毒药的。”

戈林服毒自杀留下了一个迷案。在管理严格的监狱中，戈林竟能拿到毒药，实在不能不让人生疑。戈林死后，有关当局下令对此事进行深入调查，但始终未能取得令人信服的结果，在战后几十年中，各种传说不断出现，更为戈林之死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1967年，安德鲁斯把戈林的遗书公诸于世。戈林在这封于1946年10月

11 日写给监狱长安德鲁斯的信中，写道：监狱长：

自从入狱以来，我身上一直带着毒药胶囊。进蒙尔多夫时，我身上有 3 粒胶囊。我把第一粒放在衣服里，在接受检查时它很容易被发现；我把第二粒放在衣架下面，穿衣服时就重新收藏起来。在蒙尔多夫和这里的监禁室我藏得很巧妙，虽然经过彻底检查，但都没有被发现。在法庭审讯期间，我把它藏在高筒马靴里。第三粒胶囊埋在我的小圆盒的护肤霜中。……那些受命检查的人无可指责，因为几乎不存在发现这粒胶囊的可能。

看到戈林的供认，起初人们以为悬案真的大白于天下了，可是，推敲一番之后，有人发现戈林说的不是真话，其中至少有两点值得怀疑。一是在检查制度极严的纽伦堡监狱里，特别是在时刻处于监视之下的死囚室里，根本不可能像戈林所说的那样长时间隐藏什么东西而不被搜出；二是即便戈林做到了，他也不会临刑四五天前写下的信中，详细说明藏药的地点和方式。假如这封信被发现，毒药胶囊自然就会被找到，戈林照理不会冒那么大的风险。如此看来，戈林好像在掩盖什么。后来，人们的看法同戈林死后狱方的秘密调查的结论逐渐趋于一致，基本断定戈林绝对无法把毒药藏在自己身边，而是藏在另外的地方，这个地方很有可能是犯人存放私人物品的储藏室。

即便知道了这些，在戈林自杀事件中，仍有许多疑点。戈林是如何躲过严密的监视，在适当的时机把藏在别处的毒药拿到手的，成了迷案的焦点。有人暗中帮助了戈林，这已确定无疑。问题是帮助戈林的人到底是谁？最值得怀疑的是一名叫维利斯的美国中尉军官。他不知出于何种动机，对在押的戈林表示过同情，并在职权范围内为戈林提供了一些方便，比如，他曾替戈林给埃米送过信。戈林入狱时的物品登记清单上记有一枝刻有戈林名字的钢笔和一块瑞士手表，但后来在埃米签收遗物的清单上，这两件东西却不见了。

1954 年维利斯死后，他的遗孀承认，戈林把它们送给了维利斯，东西仍收藏在她的家里。种种迹象表明，戈林同维利斯之间确实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两人很可能作过一笔不为人知的交易。

就在最近，美国的一位研究者宣布，他通过大量的资料查明，帮助戈林拿到毒药的人确为维利斯。维利斯曾负责保管戈林存放在储藏室的物品，他同戈林达成默契，在监视戈林进储藏室取东西时，他故意把目光转向别处，使戈林有机会把毒药拿到手。

戈林终于按照他自己选择的方式离开了这个世界，他用自己的双手为其罪恶的一生划上了一个黑色的句号。在他的身后留下了迷案，也留下了千古恶名。

## 第一章 空中英雄

自幼梦想建功业，适逢一战成英雄；

战败远走遇卡琳，重返故乡受困穷。

1885年5月的一天，英国伦敦的一所宽敞气派的宅邸里，一场豪华的婚礼正在进行着。新郎是已满56岁的德国官员——海因里希·厄恩斯特·戈林博士，新娘是比他小20岁的普通农家女范妮（弗兰齐斯卡）·蒂芬布鲁恩。这是戈林博士的第二次婚姻，前妻给他留下了5个孩子。

此时正值铁血宰相俾斯麦统治时期，德国对外大举扩张，在非洲、南太平洋和中国的北方都建立了殖民地。

1884年前后，戈林博士放弃了法官的职位，受俾斯麦的委派，赴西南非洲（今纳米比亚）担任总督。后来，他又被派往海地任总督。

1893年1月12日，在德国巴伐利亚州罗森海姆的马林巴德温泉别墅，戈林夫人范妮产下一子，这是她的第四个孩子，取名赫尔曼·戈林（又名赫尔曼·威廉·戈林），范妮共有五个孩子，在戈林出生之前，她已生有两女一男了，即大儿子卡尔·厄恩斯特、女儿奥尔加和保拉。戈林还有一个比他小两岁的弟弟，名叫阿尔伯特。此刻这位天真率直、出身农家、笃信天主教的母亲怎么也不会想到，她刚刚生下的儿子几十年后会成为举世知名的混世魔王，会同盗世奸雄希特勒一起，将德国拖入战争的苦海。又有哪个德国人知道，就在这个普普通通的日子，就在那个静谧宜人，鸟语花香的地方，日尔曼人的一颗灾星降临了人世。

产后不久，范妮就将戈林托付给一位朋友格劳芙夫人照料，回到了海地。

1896年，戈林博士辞去总督职务，举家迁居柏林，当时赫尔曼·戈林刚满3岁。

小戈林聪明伶俐，长相可爱，故深得父母和兄姐的宠爱。他对经常被小伙伴们误认作他的祖父的年迈的父亲，总是敬而远之，他们之间的年龄差距实在太大了，整整有60多岁。戈林从小同许多同龄的男孩一样，喜欢舞枪弄棒，脑海中时不时便产生自己手挥战刀，纵马驰骋疆场的幻想。每当父亲在军界的朋友来家中作客，他便兴奋异常，偷偷地去玩他们的军帽和长剑。

对小戈林影响最大的人物是他的教父赫尔曼·冯·埃普施泰医生。埃普施泰是老戈林在非洲时结交的朋友，后来成为他的几个孩子的教父。这是一个轻视道德、崇尚金钱的人，他的言行在年幼的戈林的心中留下了终生难以磨灭的印迹。早在小戈林一家居留非洲期间，他的健壮并且喜欢调情的母亲就与埃普施泰私通。但老戈林装聋作哑，对这件事不闻不问，这使埃普施泰感激涕零，心里总觉得欠下他一份情。在戈林一家回到德国后，埃普施泰主动将其在纽伦堡郊外的费尔登施泰因城堡借给他们一家长期居住。戈林的父亲、母亲与埃普施泰三人之间这种奇特的关系维持了15年之久。直到戈林长大成人，他的父亲仍独居一室。

戈林的童年教育同当时德国有钱人家的孩子一样，以家庭教育为主。直到1905年戈林12岁时，他才被送到安斯巴赫的一所寄宿学校读书。普鲁士学校的那种刻板传统的教育方式，使戈林无法忍受。3年后，他逃学回到了费尔登施泰因城堡。这一段学校生活戈林日后一想起来就感到厌烦，由此在他的心中也栽下了仇视文化的种子。以至戈林在进入军界后说：“我一听到

文化这个字眼，就忍不住要伸手摸我的勃朗宁手枪。”回家之后，戈林表示再也不回学校学什么知识了。在家里呆了一段日子，老戈林将他送到卡尔斯鲁厄的一所士官学校。戈林发现这里才是适合他去的地方。

在士官学校学习期间，戈林勤奋好学，成绩突出。

1910年，他以优良的成绩升入号称“德国的西点军校”的利希菲尔德军事学院，在这里，戈林心甘情愿地接受着普鲁士军校极其严格的训练，他日夜梦想有朝一日能够胸挂勋章，身披绶带，成为一名显赫的大人物——能够操纵别人命运的大人物。

1911年3月，戈林通过了一系列科目的考试，并取得了该学院军事训练科目的最高分数232分，高出规定分数100分。毕业后，他获少尉军衔。

考试结束后，戈林很想放松一下，他和伙伴们一起去了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故乡的艺术珍品，强烈地震撼了戈林的心，令他流连忘返，他边看边记，心中萌发了收藏艺术品的念头。这次观光旅行使戈林永世难忘，也可以说是他毕生钟爱并狂热地收藏艺术品的一个发端。

1912年3月，踌躇满志的赫尔曼·戈林应召入伍。他先是留在利希菲尔德军事学院继续进修，1913年12月通过了军官考核。这时，正当第一次世界大战迫在眉睫，德国上上下下正在加紧备战，飞机作为一种新式装备已出现在军队中，戈林对之十分迷恋，以至他在履历表上填写“业余时间喜欢到阿布塞姆观看飞机验收飞行”，“我一直对飞行非常感兴趣”。

1914年1月20日，已升为中尉的戈林向姐姐们保证，“你们放心，我一定会为我们的姓氏争光的。”这个时候的戈林心高气盛，满脑子都是建功立业的想法。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戈林被派往一线作战部队，在驻法国边界附近的米尔豪森的112巴登团任排长，由于他所在的防区战事不多，所以他只在孚日、塞海姆和洛林参加过几次规模不大的战斗。后来，他作为营副官参加了纳尼—埃普诺尔和弗里雷战斗，获得二级铁十字勋章。不幸的是，5周之后他便患上了严重的关节炎，无法继续留在原部队作战。9月23日，戈林从蒂亚库尔撤到梅斯，接着又被送往后方，在德国南部接受进一步治疗。

刚上战场便退下，对于一名军人来说终归有些难堪，可没想到这件事却对戈林的一生产生了影响。在弗赖堡休养时，戈林同勇敢威猛的年轻陆军中尉布鲁诺·勒歇泽相识，勒歇泽正在接受飞行训练。触景生情，戈林对飞机的兴趣又被重新唤起。病情好转后，在他的要求下，经上级批准，他同勒歇泽一起来到达姆施塔特。先是接受侦察飞行训练，10月14日他又被派到第3空军预备队接受观测员训练。从1915年2月中旬起，戈林和勒歇泽一直同飞一架编号为B990的阿尔巴特罗斯飞机。为了提高自己的技艺，戈林还专门参加了无线电和摩尔斯电码速成班。

戈林的胆略和才华不久便引起了军界上层人物的注意，同时也为他创造了同高级官员接触的机会。他的相册里有霍亨索伦王子和他在武齐那机场的合影、冯·克诺贝尔斯多夫将军同他和勒歇泽的合影，以及他同其他显贵的合影照片。2月的最后两天，戈林中尉分别把侦察报告直接送到旅、军指挥部。3月的一天，戈林和勒歇泽在科特德塔的法国装甲炮群上空成功地进行了一次侦察飞行，这次侦察的结果为德军后来的进攻提供了重要帮助。为此，3月25日，德皇亲自召见了他们，任第5军统帅的王储为他们颁发了一级铁

十字勋章。

此后，戈林成了皇家社交圈中的活跃人物。这位仪表堂堂、目光锐利的年轻军人非常引人注目，戈林本人很是得意。

在后来的日子里，戈林逐渐成为德国空军中较负盛名的侦察机飞行员之一。他交给德军统帅部的侦察照片，如敌人的机库、绵延不断的战壕迷阵、坑道雷爆炸后留下的巨大弹坑等照片，都很有价值。特别值得一提的是6月3日，当敌机轰炸德军指挥部时，戈林和勒歇泽做出了一件大胆得近乎神奇的事情，他们驾驶着没有任何武器装备的150马力的阿尔巴特罗斯侦察机，设法迫降了一架法国轰炸机。这一壮举使他们两人声名大震。

1915年10月3日，戈林作为战斗机飞行员首次完成了140分钟的作战飞行，他在报告中声称“先后击落了7架法国飞机”。实际上，1915年11月16日，戈林才第一次真正“歼灭”了敌人，那就是在塔干尔击落了1架法尔芒飞机，3个月后，德军大规模进攻凡尔登，戈林驾驶着一架300马力的G499号大型战斗机随第5军出击。这架战斗机速度快、载弹量大、升高快，是当时比较先进的机型，1916年3月14日，戈林驾驶着这架飞机同3架法国大型军用飞机在空中展开了一场格斗。开战15分钟后，他击落了一架敌机。

1916年6月20日，戈林又得到一架新的哈尔贝施塔特战斗机，他也被调往新的防区，开始在新的机场起落。据当时的一份作战报告所载，戈林在7月份曾执行过4次作战任务。在科特克莱尔上空的一次混战当中，他向一架敌机接连射出5发子弹，打死了观测员，敌机钻进了云层，再也没有出来。他的战绩堪称辉煌，他的名声也可谓显赫，年轻的戈林大有平步青云的势头。

为了更好地发挥这位杰出的飞行员的作用，在此后的3个月里，上级又对戈林作了一连串的调动。从25空军野战分队，到梅斯的战斗机中队，再到第7战斗机中队，无论在哪里，一心想出人头地的戈林总是一接到战斗任务，便情绪高昂，而一到战事沉寂时，便显得无精打采，好像他天生就是为战争而来到这个世界的。二战前后的戈林同这个时候的戈林就大不一样了，尽管他爱出风头和好大喜功的禀性没变，但他为保住自己的权势再也不愿冒任何风险了，他甚至常被其同僚视为自私自利的胆小鬼。这是后话。

调到第7战斗机中队后，他直接向指挥空军的王储打报告，要求调到第5战斗机中队，王储同意了。

10月20日，戈林同好朋友勒歇泽一起调走。在第5战斗机中队，他的任务主要是为轰炸机护航。

1916年11月2日，戈林驾机同一架英国汉德利-佩奇轰炸机交战，在激战中，他被对方的护航战斗机击中。他在臀部挨了一颗机关枪子弹的情况下，咬紧牙关，千方百计把伤残的飞机开回自己的防区，结果飞机降落在一片墓地里。

这次负伤使戈林先后在瓦朗谢那、波鸿和慕尼黑等三个医院住院治疗了3个月。1917年2月，戈林伤愈归队，被分配到第26中队，中队长就是他的好友勒歇泽。

1917年3月至1918年大战结束之前，戈林已成为德国空军的王牌飞行员之一。他在空战中果敢勇猛，经常孤军作战，每次却又都能奇迹般地获胜。现存的一战期间的德军空军作战报告曾对戈林这一时期的战斗情况，有过较为详细的记载，其中有些就是戈林亲笔撰写的。这些报告尽管文笔枯涩，人



们从中还是可以清楚地了解戈林的作战特点和战绩的。

1917年4月23日，戈林单机同英军4架战斗机周旋，竟击落了其中的一架飞机。他在座机里，面带微笑地看着那架英军飞机冒着黑烟坠毁。几天后，他又同6架英军战斗机展开了一场空中混战，他令人难以置信地发射出370发子弹，击落了一架敌机。

29日，他在击落一架英军的尼厄波尔战斗机后，与另一架英机厮杀时，突然受到旁边的一架英机的攻击，飞机的方向舵被打掉，他却安全地飞回了防区。事后，戈林得意洋洋地说：“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没有方向舵，我照样飞得很好。”

1917年5月17日，戈林被调入第27飞行中队担任指挥官。那时，德军战败已露端倪，由于美军参战，协约国的胜利只是时间问题了。为了挽回败局，德军加强了在两线的争夺，交战双方的空战日趋激烈，戈林参战的次数越来越多，表现得越来越出色，有时凶猛得几乎到了疯狂的地步。

6月8日，他在同一架英军尼厄波尔飞机交战时，竟发射了500发子弹，直至使敌机迫降才停手。7月26日，他单机攻击一支协约国空军巡逻中队，击落了其中的一架飞机后，他又驾机扑向了另一架，终因寡不敌众，受到多处攻击，引擎中弹，最后他只好将千疮百孔的飞机迫降在德军防线之后。在8月5日的空战中，戈林驾机冲向敌人，在距敌机仅150英尺处开火，然后直追受伤的敌机至云层下，亲眼看到它起火爆炸后才离去。

在当时的德国空军中，名气最大的飞行员是被称为“红男爵”的曼弗雷德·冯·里希特霍芬，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飞行中队，是德国空军中战斗力最强的飞行中队。戈林尽管在德国空军中的名气也不小，但同里希特霍芬还不能并驾齐驱。到1917年11月，里希特霍芬已击落61架敌机，而戈林才击落了15架。他一直梦想得到的普鲁士军队的蓝色珐琅十字奖章，即人们所说的“蓝色马克斯”，好像离他总是那样地遥远。为了使自己的虚荣心得到满足，戈林竟假报战功，谎称他早在加入空军之初就已立过战功。前面说过，他在第一次参加空战时，就在战后飞行报告中大言不惭地称自己击落了“7架敌机”，戈林的上司难以对事实作进一步的核实，戈林的大话并没有多少人理会，此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在1917年7月7日的空战中，戈林声称他击落了一架英国的斯巴德战斗机。只因热油溅在了脸上，他没有盯住目标，但他坚信那架敌机坠毁了。德军空军指挥部事后没有承认他的这一战绩。30年后，已成为将军的勒歇泽在提起往事时，承认他的伙伴戈林确实谎报过战绩，同时戈林还劝他也这样做，并且强调他们一定要这样做，“不然，我们永远不能领先”。可见，戈林的虚荣心、好胜心以及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处世方式是由来已久的。

1918年初，德国空军为了配合将于3月份开始的对西线的大规模进攻，在建制方面作了变动，即将4个战斗机中队合并成一个联合飞行中队。里希特霍芬任第一联合飞行中队队长，勒歇泽任第二联队的队长。自我感觉良好的戈林妒火中烧，却也无可奈何。

4月21日，里希特霍芬在空战中丧生，戈林认为自己是接任里希特霍芬职位的第一人选，不料，空军指挥部却任命了另外一个人担任指挥官。戈林终于明白了，他在空军上层人物心目中的分量还不够，要想接过被视为德国空军军魂和象征的里希特霍芬中队的权杖，还需要再立战功。从4月到6月，戈林又击落了3架敌机，这样，他击落的敌机累计已达21架。

6月下旬，里希特霍芬的继任者战死。7月14日，戈林终于得到了他朝思暮想的里希特霍芬中队的指挥权。可他并没来得及充分享受这份荣耀和细细品尝权力的滋味，因为德国军队在西线节节败退，整个大战已接近尾声。7月16日，戈林又击落了一架敌机，这是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击落的最后一架敌机。

7月18日，协约国军队在马恩河发起猛攻，俘获德军3万余人，8月，德军的16个师又在亚眠被歼灭。9月底，德军兴登堡元帅在德国枢密院宣布，德军已不能继续抵抗下去。

10月初，协约国军队突破了兴登堡防线，在北起伊普尔，南迄凡尔登的战线上全线出击，德军兵败如山倒，眼看着大势已去。

11月3日，德国基尔港的水兵起义，“十一月革命”爆发，德皇威廉二世逃往荷兰，德国彻底战败。

在此期间，戈林和他的战友们接二连三听到德军遭遇厄运的坏消息，他们终日惊恐不安，沉浸在战败的哀痛之中。战争结束了，作为战败国的军人，即使是被誉为天之骄子的空军飞行员又会有什么出路？前途一片灰暗，每当想起这些，戈林就不免心悸。

1918年11月11日清晨，巴黎北郊的康边森林晨雾弥漫，布满了荷枪实弹的协约国士兵。此时，在协约国前线总司令，法国元帅福煦的专列车厢中，德国统帅部的两名代表正在《停战协定》上签字。德国人觉得，这个初冬的日子被一片肃杀之气所笼罩。

德国战败的消息如一阵风一样，迅速传遍了德国的城市和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尽管自1917年以来，战败的预感就萦绕在德国人的心头，但这一旦成为现实，还是让人接受不了。皇帝跑了，接管政权的是以艾伯特为首的一些社会民主党党棍组成的临时政府，首都一片混乱，工厂停工，商店关门，大街小巷到处都是怒火中烧的市民。他们不知道现在该做什么，不知道明天该去哪里找工作，不知道贮藏室里最后一面包吃完后该怎么办。

德国共产党为了夺取政权，在十一月革命后采取了一连串的政治行动。

1919年元月15日，共产党领导市民武装起义。柏林市区枪声不断，共产党临时组织起来的工人武装控制了火车站、电报局、煤气厂、自来水厂和一些重要的建筑物。临时政府惊慌失措，他们动员起首都的一些陆军军官，并从外省调进军队，对德共发动的起义进行镇压。与此同时，在德国中部，汉堡、不来梅、慕尼黑都爆发了德共领导的工人武装与政府军之间的战斗。

在危急关头，艾伯特政府与德军统帅部结成了联盟。德军总参谋长格林纳后来在马格德堡的审讯中供认：“我们结成联盟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者的威胁和苏维埃制度，每晚11点至1点之间，我们在司令部通过一根秘密电话线同德国首相协商一切。首先商定的是要夺取柏林工人士兵苏维埃的权力，以及调10个师团开进柏林。”1917年11月至第二年4月的几个月里，可以说，德国人是在血与火中度日。

言归正传，前面说到戈林正思量一展宏图时，却听到了德国战败的消息，他感到自己的前程就此被断送了。停火协议很快传到戈林所在的部队，按照这份协议，德国需交出5000架飞机。戈林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伙同下属，飞到达姆施塔特，将飞机藏了起来。他又同阿沙芬堡的造纸厂联系，把手下的大部分伙伴安置到了那里。戈林本人是不会甘心作一名造纸工人的，他心中那团权势的欲火，是不会熄灭的。他要到首都去，到那里去寻找他的天地。

临行前，戈林的部下在阿沙芬堡的一个啤酒馆里为他饯行。他一面大口地喝着啤酒，一面大谈德国的境遇。在他看来，德国绝对不应该战败，战败的原因不在他们这些军人身上，他泪流满面地宣告“我们的时代一定会到来”。在悲壮的气氛中，戈林同大家辞别。

不久，戈林与另一名王牌飞行员恩斯特·乌德特回到了柏林。混乱中的柏林并没有给戈林带来希望，没有任何人肯顾及一下他，把他安置到一个地方。说起来也是，连皇帝都跑了，一个前飞行员的命运又算得了什么呢？到了这个时候，谁还管你是不是曾击落 22 架敌机的王牌飞行员。戈林见在首都实在没有任何发展的余地，便跑到慕尼黑，同寡居的母亲住在一起。而慕尼黑做为巴伐利亚的首府，此时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空气中充满了火药味。共产党人建立的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已成为柏林临时政府的眼中钉，他们发誓要将其置于死地，为此正在四处调集军队准备围打慕尼黑，戈林见势不妙，便匆匆离开了这块是非之地。

在柏林和慕尼黑接连受挫的戈林仔细地分析了一下形势和自己的处境，认为目前在德国找不到什么出路。因此，他决定离开饱受战争摧残的西欧，打道北上，到北欧去谋求发展。

1918 年的北欧，比起疮痍满目、哀鸿遍野的西欧来说，无疑是一块福地。戈林先是到了丹麦的哥本哈根，以他那德国空军中赫赫有名的里希特霍芬飞行中队指挥官的身份，很快便立住了脚跟。丹麦的福克公司首先邀请他做试飞员，请他试飞一种新型飞机。戈林知道这下子机会来了，便同意接受这项工作，但条件是对方要将这架飞机送给他作为报酬。在当时的丹麦，技艺高超的飞行员实在难找，福克公司只好忍痛同意了戈林提出的苛刻的条件。试飞成功，戈林不但拥有了一架自己的飞机，而且在当地声名鹊起。1919 年春，丹麦政府筹建空军，请他推荐最好的机型，这使他过了一把当权威的瘾。可风头还是没有出够，戈林将他过去手下的 4 名飞行员请来，同他一道作特技试飞。戈林自然要大肆炫耀一番，他们的飞行技术也确实使丹麦人膛目结舌。此后的几个月，戈林财源茂盛，比如，他在欧登塞作了两天特技表演，丹麦人便送给他 2500 克朗。这种没有什么目标却有着丰厚收入的生活，使戈林的浪荡公子的劣根性又露了出来。就在完成欧登塞试飞的当夜，戈林便喝得酩酊大醉，恶作剧地将他所住饭店客人放在房间外面的鞋倒来换去，找不到鞋的客人还以为发生了什么事。夜深人静之时，他还用手推车推着几个姑娘在街上大声唱歌，直到被送进了警察局。

清醒后的戈林觉得这种生活毕竟不是长久之计，他不想再在丹麦呆下去了。这年的夏天，他驾驶着他的福克飞机来到了瑞典。在瑞典的马尔姆斯莱特，戈林卖掉了飞机，加入刚刚建立的瑞典航空公司，成为一名飞行员。

很快，戈林又陷入了苦恼之中。他发现在社交场合，每当介绍起他，一说到他是中尉，对方脸上便现出不屑一顾的神情，这总令他有一种如芒在背的感觉。他了解到，他的军衔在瑞典社交界实在太微不足道了，他最起码应该有一个上尉军衔。为此，他在斯德哥尔摩给他过去的部队写了一封信，要求准许他以上尉的身份转业，强调这将“对我的平民生涯至关重要”，还说如果军方同意他的要求，他愿意放弃自己的抚恤金和伤残津贴。两个月后，戈林如愿以偿。

于是，在斯德哥尔摩社交界，有了一位赫尔曼·戈林上尉，对这位年轻潇洒、谈吐得体的前德国军队王牌飞行员，很多人产生了好感。戈林还在报

纸上就一些飞行问题发表评论，著名的《瑞典日报》对他作了专访。戈林重新活跃起来，他觉得这里可能适合他发展，他差不多决定要在瑞典定居了。

1920年2月的一天，一位年轻的瑞典人走进了航空公司，他指名包租戈林的飞机，他要乘机到他的城堡罗克尔斯塔特去，这个人就是瑞典社交界名人埃里克·冯·罗森伯爵。戈林答应了他的要求，设想到这件偶然的事情却使戈林改变了长住瑞典的打算。

2月20日，在暴风雪中，戈林将飞机平稳地降落在罗森伯爵的城堡附近的一个冰湖上，戈林因无法马上返回，便在城堡中住下。罗森伯爵邀请戈林参观他的城堡，他们端着酒杯，边走边谈，城堡中几处雕刻着万乐形图案的地方引起了戈林的注意。他问罗森伯爵这是什么图案，伯爵解释说，这是在哥德兰岛发现的一种图案，是北欧人的祖先创造的神秘的符号，大约象征着太阳在所有地方升起的意思。戈林在这种图案前长久地伫立着，思索着这种奇特的图形的寓意。奇怪的是，以前从未见过这种图形的戈林，不知为什么一下子就被它吸引住了。

戈林正在凝神静思的时候，从楼梯上传来一阵细碎的脚步声，他抬头一看，只见一位漂亮女郎正拾级而下，她的美色使戈林目瞪口呆，半天回不过神来。罗森伯爵见状急忙介绍说，这是他的妻妹卡琳·冯·福克女伯爵。卡琳早就听说过戈林，两周前《瑞典日报》的专访也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天夜里，戈林、罗森伯爵、卡琳三人在一起谈到很晚。戈林发现，待在这位温和、娴静的女人身边，就如同置身于一种美妙的氛围之中，忘却了烦恼，感到一种少有的平静、愉快。

随后，戈林和卡琳便开始了单独交往，戈林深深地爱上了这位女伯爵，卡琳对他也有相见恨晚之意，两人的关系发展得极快，不久他们就同居了。

卡琳比戈林大5岁，当时已有31岁。她的丈夫是一名瑞典军官，他们的儿子托玛斯已经5岁了，卡琳对枯燥的婚姻生活早已厌倦，她渴望带有浪漫情调的生活，向往新的天地，戈林的出现正好满足了她的愿望。戈林与女伯爵的风流韵事很快就传开了，在那个年代，在斯德哥尔摩这座当时还很保守的城市中，这无疑是一桩丑闻，是一件伤风败俗的事情。面对人们的指指点点，戈林我行我素，丝毫没有悔意，也不觉得有什么难堪，同他对卡琳的爱相比，这些大概根本就不值得放在心上。他太爱卡琳了，对她唯一的不满就是她迟迟不肯离婚。而卡琳不肯离婚的理由是，她不愿意失去孩子。卡琳的父母和姐姐对她的行为非常气愤，她的丈夫尼尔斯·冯·坎楚则以剥夺她的财产分割权和子女监护权相要挟，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使卡琳有些心烦意乱，但不管怎样，她对戈林的感情都是不可动摇的。

1920年夏，戈林带着卡琳到德国旅行，两人在巴伐利亚山中的拜里施采尔过了一段无忧无虑的清静日子。回到瑞典后，他们在斯德哥尔摩租了一所小房子公开同居了，这更惹怒了卡琳的家人。也许戈林的心中还残留着儿时母亲与冯·埃普施泰私通的阴影，他不愿同卡琳就这样长久地生活下去，他要得到正常的婚姻生活。戈林苦苦劝他的情人离婚，可卡琳还是强调她不能离婚的理由。

戈林看到他既无法改变现状，又舍不得同卡琳分开，便决定同卡琳离开多事的瑞典。戈林同卡琳回到了德国，在慕尼黑附近的一个叫上克罗伊特的小村子住了下来。戈林想上大学，并在一所学校里报名学习经济。然而，他们身无分文，完成学业谈何容易。卡琳靠画画和作手工制品赚一点儿钱，维

持两人的生活。不久卡琳得了一场病，戈林无钱交医疗费，就把卡琳的皮毛大衣当掉了。卡琳的丈夫尼尔斯得知他们的情况后，表现得异常大度，他给卡琳寄来了钱，让她赎回大衣，同时还寄来一张回斯德哥尔摩的机票，他仍然希望她回心转意。卡琳的父母也来信说，如果她肯回瑞典，他们就把在德洛特宁霍尔姆的别墅送给她。卡琳毫不犹豫地回信拒绝了他们。面对这一切，戈林百感交集，想想当年他是多么风光，即便流落北欧，也不曾如此落魄，今天到了这步田地，真不知应该怨谁。再想想卡琳放着荣华富贵的生活不要，甘愿跟着他远走他乡，现在竟沦落到衣食无着的境地，他不禁难过得要落泪。又想到不知哪天才是出头之日，他更是黯然神伤。

正是：人生风云多变幻，“英雄”落难谁人怜。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 第二章 冲锋队长

饥寒交迫叹时运，参加纳粹得重用；

沉滓泛起难成势，政变失败逃樊笼。

话说戈林与卡琳回到慕尼黑后，依旧过着清贫的生活，这对于不甘居于人下的戈林来说，实在无法忍受。但此时在德国的任何一个城市里，想找一个好一点的工作都极为困难，更别说寻找戈林所希望的那种出人头地的机会了。戈林对那个使他四处碰壁的魏玛政府已经不抱任何期望，剩下的只有敌视与仇恨。每日无事时，戈林便在慕尼黑街头闲逛。这时的慕尼黑，到处充斥着像戈林这样的旧军人，他们找不到工作，生活没有保障，时刻都在梦想重过战前的那种安稳的生活，但严酷的现实总使他们失望。这些人自恃曾为德国流过血，却得不到现政府的关心，因此每一个人都是怨气冲天。迫于生计，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加入了由国防军秘密支持的武装自由团，参加同东部边境的波兰人和波罗的海沿岸的居民的争斗，或者为一些政客争权夺利充当打手。更多的人则流落街头，成为无业游民。他们每天的生活内容，便是在慕尼黑的广场上，或在啤酒馆里高谈阔论，话题无非是时人所关心的有关《凡尔赛和约》对德国的束缚，战败赔款使德国人承受的压力，左派和右派的争端，君主制还是共和制等一些政治问题。戈林不想去当雇佣兵，对街头巷尾的政治清谈也不感兴趣。他每天想的最多的问题就是，他的出路到底在哪里。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的战败引发了其国内的一系列政治问题，局势一直动荡不安。从1918年11月革命起，慕尼黑的政权就曾几次易手，而每次政权的更替都伴随着血雨腥风。1917年11月柏林起义后，在慕尼黑，以库特·艾斯纳为首的社会党人带领着数百人占领了议会和政府，宣布成立巴伐利亚共和国。3个月后，库特·艾斯纳被暗杀。共产党在大批工人的支持下，于4月初夺取了政权。但仅到4月末，社会民主党政府便派来近10万正规军和一些自由团，攻陷了慕尼黑，推翻了共产党建立的巴伐利亚苏维埃政权。政权重又回到社会民主党人的手中。

柏林也是一片混乱。

1920年3月，极右派团体“埃尔哈特旅”发动了一场政变，右派政客沃尔夫冈·卡普被推上总理的座椅，这就是德国现代史上所谓的“卡普暴动”。对此，柏林的军队置之不理、按兵不动。社会民主党政府逃往西德。共产党领导工会举行大罢工，才恢复了共和政府。几乎与卡普暴动同时，慕尼黑也发生了一场政变，发动政变的国防军推翻了巴伐利亚的社会党政府，建立了以古斯塔夫·冯·卡尔为首的右翼政权。此后，慕尼黑成为对现实不满的保皇派分子、反共产主义的极右派分子以及形形色色的政治野心家、投机分子的“圣地”。

无所事事的戈林每日同卡琳在慕尼黑的大街小巷游荡，逐渐对政治活动产生了兴趣，每天都要去参加一些集会或者讨论会之类的活动，甚至有一天他对卡琳说：“如果有必要，我也将建立一个政党。”卡琳不愿意扫他的兴，只好附和着他的话说：“亲爱的，如果你要是建立一个政党的话，我想在巴伐利亚的复员军人都会参加。”戈林一听卡琳的话，忽然来了灵感。他兴奋地对卡琳说：“你的想法太对了，我就是要成立一个以军人为成员的党，而且要多吸收军官参加。”卡琳微笑着对戈林说：“我相信你会成功的。”

说归说，卡琳其实并没把戈林的话放在心上。

1922年11月的一天，戈林参加了在慕尼黑的柯尼希施普拉茨举行的一次示威集会，抗议《凡尔赛和约》制裁德国的条款。集会中不断有人高喊“请希特勒先生演讲”，过了一会儿，戈林果然见一个瘦小单薄、留着一簇小胡子的男人走上了讲台。戈林身边的一个人告诉他，此人就是希特勒，现在是一个叫作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政党的领袖，这个党又简称纳粹党。希特勒演讲的题目是“《凡尔赛和约》与引渡德国军事指挥官”，他的演讲深深地吸引了戈林。他发现希特勒的每一句话，都表达了他这段时间里一直在思考但又无法将其理清的内容。当希特勒演讲完毕时，一个人走上讲台，站在希特勒的身旁，展开了一面大旗，并向众人呼喊：“同胞们，来参加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吧，他将带领德国重新崛起！”这时，戈林的心猛地一下抽紧了，他紧紧地抓住了自己的衣领，轻轻地叫了一声：“上帝，怎么会是这个图案！这太不可思议了。”旁边的人看见戈林激动得脸色潮红，不能自持，还不解地看着他，以为他一定是一个神经不太正常的人。原来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标志竟然是他第一次在罗森伯爵那里所见到的那个神秘的“卐”形图案，只不过这个图案现在嵌在红旗的白圆心中，这使它又增添了一种令人恐怖的神秘感。戈林心想，这是我第二次见到这个图案，第一次使我认识了卡琳，第二次也必将会为我带来好运。在回家的路上，戈林满脑子都是那个同他似乎有着某种关系的图案，他想这也许是冥冥之中一种力量在向他暗示和呼唤。回到家中，戈林叫醒了已经睡着了的卡琳，将这件事告诉了她，并对卡琳说，他要加入希特勒的那个党。

第二天，戈林便找到了希特勒，要求参加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希特勒很高兴，立即表示同意。在简单地履行了一下手续之后，戈林就拿到了一个党员证。希特勒对戈林说，他早就知道戈林的大名，他的党就需要像戈林这样“曾经为德意志而战，并且能力超群、功绩卓著的人”。好久没有人这样恭维戈林了，希特勒的这几句话说得戈林心里直发热。事后，戈林对卡琳说，“希特勒真是一个天才。他虽然貌不惊人，但是身上却透着一种超人的力量，使你不得不向他的身边走去。”

戈林自从加入纳粹党之后，每天都要到希特勒那里去参加活动。戈林的狂热的工作精神与不凡的工作能力，使希特勒对他极为赏识。确实，希特勒非常希望戈林这样的人加入他的政党，因为他的野心不仅限于政治方面，也不仅仅在于夺取德国政权，他要建立继神圣罗马帝国之后的另一个帝国——日尔曼帝国，要向英、法报一箭之仇！希特勒需要军事方面的人才，他认为戈林肯定是他日后用得着的人。因此，在戈林参加纳粹党后不久，希特勒便任命他为纳粹党的冲锋队队长。后来希特勒回忆道：“他到我办的那些晚间演讲会去了多次，我发现我喜欢他，所以我让他担任了我的冲锋队长。”

纳粹的冲锋队是由纳粹党的另一个党魁恩斯特·罗姆建立起来的。罗姆是一名现役陆军上尉，先于希特勒加入纳粹党。加入纳粹党之后，罗姆纠集了一批复员军人为纳粹党充当打手。此后，希特勒成为纳粹党的领袖，又成立了一个名为“纠察队”的组织，由一个曾坐过牢的钟表匠艾米尔·莫里斯担任队长，由罗姆直接控制。这个组织名义上是为维持该党集会的秩序设置的，但实际上是纳粹党用来对付其他党派的武装。有一个时期，希特勒为了防止当局干预，将之伪装成该党的体育部。

1921年10月5日，希特勒与罗姆将它正式定名为“冲锋队”。这个组

织最初的宗旨，用希特勒的话说就是：“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将来要毫不客气地防止如果有必要的话，用武力来防止——一切可能涣散我国同胞的思想的集会和演讲。”希特勒在当时就曾亲自率领冲锋队，袭击过一个名叫巴勒施塔特的巴伐利亚联邦主义者将要发表演讲的集会，毒打了巴勒施塔特，希特勒因此被判刑3个月。出狱后，希特勒在党内的威信反而提高了，在他之前，纳粹党的领导人还没有一个敢去用武力搅乱其他党派的活动。纳粹的冲锋队就是这样一个组织，不过，在戈林接任冲锋队长的时候，这个组织已经逐渐得到巴伐利亚右翼军人政府的半公开的承认。

也许是在希特勒的劝说之下，卡琳终于与前夫离了婚，19年2月，她与戈林正式结婚。婚后，他们的经济状况有所好转。属于卡琳的一部分财产，她前夫还给了她。这样，戈林夫妇又过上了较为优裕的生活，他们搬入了雷金瓦尔德街的一所别墅，还买了一辆梅塞德斯—奔驰16型汽车。这时，希特勒已经成为戈林家中的常客，他经常在这里同纳粹党的主要成员们彻夜讨论有关柏林的。“犹太人政府”、《凡尔赛和约》对德国的侵害以及党和冲锋队的发展等问题。

这一时期，德国国内的形势更加恶化，魏玛共和国政权摇摇欲坠。反对共和国的各种力量在军队和司法当局的支持下，肆无忌惮地攻击那些敢于揭露军队违反《凡尔赛和约》的人，司法机关则对那些共和国的支持者动辄以判国罪逮捕，并判以重刑。在德国境内甚嚣尘上的民族主义的反民主反共和的浪潮中，希特勒成为那些政治弄潮儿中最出色的一个。希特勒清醒地意识到，在巴伐利亚，甚至在整个德国，只要属于右派，哪怕他犯了杀人罪，也能得到法院的宽大处理，特别是被杀的是共产党或者民主派人士。即使被拘押，右翼极端分子也会想方设法帮助他逃出监狱，这种情况希特勒本人就亲身经历过。在这种形势下，纳粹党的势力得到了迅速发展。

1923年，德国的经济状况急转直下。1月份，德国马克同美元的比价已跌到7000比1。德国政府向协约国提出暂缓偿还赔款，但是法国政府断然拒绝了德国人的请求。随即，法国和比利时派部队占领了德国工业的心脏——鲁尔地区，这一行动对本已濒危的德国经济是一个致命的打击。鲁尔地区的工人举行了大罢工，全国各地群情激愤，纷纷发起声援活动。这一事件，为纳粹冲锋队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

在当时巴伐利亚的各种半合法的武装力量中，冲锋队的实力当属第一。鲁尔地区被占领之后，军队和政府中的一些人大肆叫嚷要对法国进行反击，但受《凡尔赛和约》的限制，德国军队公开出动可能会受国际社会惩罚，许多军政要员寄希望于遍布全国各地的私人武装。鲁尔事件发生半个月之后，新任巴伐利亚武装部队司令的奥托·冯·洛索夫中将将会见了希特勒。1月28日，戈林带着卡琳参加了第一次以冲锋队名义举办的大型集会。

为了密切同希特勒领导的纳粹党的关系，洛索夫将军同意了希特勒提出的秘密训练冲锋队的要求。其实，希特勒并不愿意将自己刚刚建立起来的武装投入到对外国军队的抗击之中，他认为攘外必先安内，在同洛索夫中将的一次谈话中，他说过：“在国内政治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之前，进攻外敌没有任何意义。”希特勒主张，应该先推翻共和政府，再去考虑对法国开战的问题，而反过来做，在次序上是有错误的，弄不好又要遭到一次“来自背后的暗算”。洛索夫将军根本没有兴趣听希特勒争辩，这使希特勒十分恼火。但不管怎样，看到经过军队的正规训练，曾经是一群乌合之众的冲锋队已成为



一支像样的队伍，他还是抑制不住心中的喜悦之情。

戈林成了大忙人。自打荣任冲锋队队长，他就开始整日整夜地为冲锋队的扩充、训练、装备以及其他事务而奔忙。同时，他还要经常带领冲锋队去出击，采取阻挠其他政党集会的行动，他骨子里的冒险家的气质在这时得到了充分的展露。他往往亲自上阵，大打出手。多年后，他在向美国的一位历史学家乔治·舒斯特回忆起他1924年3月1日在慕尼黑同共产党进行的一次殴斗时，还眉飞色舞他说：“好家伙，那些啤酒杯横飞！有一个差点要了我的命。”

4月的一天，柏林政府通知洛索夫将军，5月份德军将对鲁尔区的法比联军开战。4月15日，希特勒检阅了他的冲锋队。那一次，检阅的场面极为盛大，冲锋队队员一律身着灰色制服，外披带有卐字形臂章的风衣，手持陆军方面拨给的武器，最为醒目的是队伍中那面迎风招展的锦旗。这种锦旗模仿古代罗马军团的战旗式样，上面有个黑色金属制成的卐字，有一只鹰踩在一个银色的花环上，下面是个长方形的金属框，里面刻着纳粹党名称的缩写字母，字母下方写着“觉醒吧，德意志”几个字。希特勒站在戈林新购置的汽车上，旁边就是得意洋洋的戈林。仅仅半年的时间，戈林已使冲锋队旧貌换新颜，希特勒对此赞不绝口。卡琳在给她的儿子的信中写道：

“今天，赫尔曼与元首检阅了由真正的德国年轻人组成的部队，我看到部队经过时他面带微笑。赫尔曼勤奋工作，给冲锋队注入了他那种无畏和英勇的精神，往日的乌合之众——我必须承认，有时它几乎是个野蛮甚至恐怖的团体——变成了一支真正有希望的军队，一支准备随时听从元首的命令而前进、使这个国家再次免遭不幸的十字军……检阅结束后，元首紧紧地拥抱了赫尔曼，并笑着对我说，他不想说更多的赞扬话，否则赫尔曼会得意忘形的。我对元首说，我自己已经自豪得飘飘然起来了，元首吻了一下我的手说：‘像你这样好的头脑不会变得飘飘然起来的’。”

这次检阅后，戈林在希特勒心中的分量越来越重，希特勒同戈林单独商谈党内事务的次数也越来越多。8月24日，希特勒向党内发布了一个命令，宣布戈林拥有以元首的名义行动的权力。此后，戈林完全沉迷于纳粹党和冲锋队的事务中，几乎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戈林后来在与一位意大利记者谈到这段经历时说：“我常工作到凌晨4点钟，然后7点钟又回到办公室，整整一天，我一分钟的空闲都没有。来访者一个接一个……你知道我们德国人工作既勤奋又认真。一天24个小时，我们工作23个小时。相信我，我经常夜里11点筋疲力尽地回到家里，用15分钟的时间和妻子狼吞虎咽地吃顿饭或喝杯茶，然后不是上床睡觉，而是用两三个小时的时间检查白天的工作；第二天早晨7点，第一位助手就来报告了。”

温暖的5月来到了，可是，柏林的共和国政府似乎忘记了将在这时对法国开战的诺言，洛索夫大将军更不愿单独去冒这个险。他见冲锋队已没什么用处了，对希特勒和纳粹党的态度便骤然冷淡起来。5月1日，纳粹党在慕尼黑举行了一次大型的游行集会，洛索夫中将突然下令不许冲锋队员携带武器参加游行，这可把希特勒和戈林气得七窍生烟，他们大骂洛索夫中将是一个翻脸不认人的势利小人。

鲁尔事件之后，德国的经济坠入了无底深渊。马克对美元比价下跌的速度已到了惊人的地步，就在法比联军侵入鲁尔的那一天，比价一下子跌到了

1.8 万比 1，到 7 月 1 日变为 16 万比 1，8 月份跌至 3100 万比 1，而到了 11 月，居然是 40 亿比 1。此后，比率只能以兆来计算了。哪怕是接到一份小小的帐单，德国人都得提着皮箱去付款。德国的货币几乎变成了无用的废纸，工人、公务员等一切依靠工薪生活的人们，其购买力已接近于零。绝大多数市民一生的积蓄，顷刻之间便等于荡然无存。

德国经济崩溃和货币贬值的原因，除了法国军队占领鲁尔而造成这一地区经济停滞之外，更重要的是魏玛共和国政府对日趋恶化的经济形势采取了听之任之，甚至推波助澜的政策。对付通货膨胀，一般要靠平衡预算，而平衡预算可以通过适当增税来实现，魏玛共和国政府为了保护大资产阶级、大地主阶级的利益，不但没有增税，反而削减了税额。在恶性通货膨胀面前，在大资产阶级的纵容下，当局是故意让马克崩溃，这样政府无形中免付了 1640 亿马克的公债，并逃避了战争赔款。为了掩人耳目而伪装成政府“军队办公室”的德军参谋总部也欣喜地发现，马克的大幅度贬值使德国的战争债务一扫而光。政府在财政上变得毫无牵累，重整德国军备已成为指日可待的事情。

倒霉的却是德国老百姓，他们并不知道由于通货膨胀，国家、军队和大资产阶级都捞到了好处，他们只知道，自己在银行里的大笔存款，一夜之间变成了只能买几个马铃薯、几两糖、几磅面粉的小钱。他们破产了！他们将共和国看成造成这一灾难的罪魁祸首，这又为希特勒、戈林之流及其他的党带来了施展抱负的大好时机。尽管纳粹党党员人数日益增多，但它还没有成为在巴伐利亚占绝对优势的政治力量，而在巴伐利亚之外，它几乎还是默默无闻。为了扩大纳粹党的影响，为了给最后夺取政权开辟道路，也可能是受到 1922 年意大利法西斯党魁墨索里尼进军罗马的启发，希特勒居然也想向柏林进军。他计划先将巴伐利亚所有反共和政府的民族主义势力统一在纳粹的旗帜之下，然后在巴伐利亚右翼政府、各类右翼武装团体以及洛索夫将军的部队的支持下，一举推翻柏林政权。

戈林开始为实施希特勒的计划而奔忙了。在这期间，卡琳先是因肺炎回到了斯德哥尔摩，随后又得了心脏病，不得不住进了一家疗养院，戈林却抽不出时间去陪伴她，这在以前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戈林在给卡琳母亲的信中，请求她照顾好卡琳，并说，他实在太忙了，因为“生活就像一座正在爆发的火山，它炽热的岩浆随时都可能蔓延至全国”，“我们都在拼命地工作，已为实现我们解放和振兴德国的目标处于待命状态”。在另一封信中，他又口出狂言：这个国家充满“互相倾轧，你争我夺，把国家搞得乱七八糟，我们为国家和民族前途负起责任的时间不远了”。

1923 年秋，柏林政府与巴伐利亚右翼政府之间的矛盾空前尖锐。9 月 26 日，柏林政府的古斯塔夫·施特莱斯曼总理宣布德国将放弃在鲁尔区的抵抗，恢复战争赔款的支付。因为他和他的政府已经意识到，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德国是没有力量能够真正给法国以致命的打击的。德国需要的是时间，是一段稳定国内局势，恢复经济的喘息时间。柏林政府的决定，在国内又一次引起混乱。对于那些民族主义情绪严重的德国人来说，这一行为无疑使他们的感情再次受到了伤害。“打倒祖国的叛徒”、“打倒十一月罪人”的叫喊声，在巴伐利亚更是一浪高过一浪。早在这一年的 2 月 1 日，经罗姆和戈林的斡旋，巴伐利亚的另外 4 个右翼武装团体就与纳粹党组成了一个临时组织，名为“祖国战斗团体工作联盟”，推举希特勒为领袖。几乎在柏林发布不抵抗

命令的同时，南德的大部分右翼团体又组成了一个庞大的组织，号称“德国人战斗联盟”，希特勒又被选为主要领导人。9月2日，在“德国人战斗联盟”成立大会上，希特勒发表了反对柏林政府的讲话。他公然叫嚣，他们的这个联盟的目标就是推翻共和国，撕毁《凡尔赛和约》。希特勒将定居在慕尼黑郊外，曾在一战期间任德国东线和西线指挥官的鲁登道夫将军也被请来参加这次大会。因为鲁登道夫将军是一名狂热的民族主义分子，他对《凡尔赛和约》恨之入骨，并在德国陆军中有着极高的威望。在会议结束后举行的检阅仪式上，鲁登道夫始终站在希特勒的身边。

此时，执掌巴伐利亚大权的是柏林政府新近任命的州长官古斯塔夫·冯·卡尔，警察局长汉斯·冯·赛塞尔中校和冯·洛索夫中将。希特勒在心里不得不承认施特莱斯曼总理确有多高明过人之处，他的命令同自己攘外必先安内的想法几乎如出一辙，只不过一个是想推翻中央政府，一个是想平定国内的备派动乱势力罢了。希特勒认为，一旦施特莱斯曼成功地恢复了国内的秩序，纳粹党就永远失去了机会。因此，他必须尽快行动。但他也明白，仅靠纳粹党和临时组成的“战斗联盟”是难成大事的，他必须让执掌巴伐利亚州大权的二巨头同他一起行动，只有这样，向柏林进军的行动才有可能成功。

三巨头最初对希特勒的主张完全赞同。卡尔一上台，就与洛索夫将军联系，希望他恢复和加强同纳粹党及其他右翼团体的联系。洛索夫不久便将名为“春季训练”的对法国作战的计划，改名为“秋季训练”，但进攻的目标却变了，不再是法国人，而是柏林政府。与此同时，戈林秉承希特勒的旨意，在冲锋队中不断强调要与军队保持一致。投桃报李，洛索夫让军队的军械所为冲锋队修复了700支生锈了的步枪。戈林又设法将当地的博物馆腾了出来，以便储藏大炮的零部件。戈林还在希特勒与警察局长赛塞尔之间穿针引线，并向希特勒保证，“相信警察将与我们站在一起”。

10月25日，希特勒与赛塞尔见面。希特勒对赛塞尔诱以高官厚禄，说在未来的新政府中，他有希望接管德国的警察部队。赛塞尔却对希特勒的计划有异议，他认为希特勒提出的让鲁登道夫在新政府中担任首脑的建议是不合适的，因为“外国人都认为鲁登道夫是一个好斗的民族主义分子”，希特勒自然不能泄露他拉大旗做虎皮的用意。希特勒之所以拼命地拉上鲁登道夫一起干，只不过是想利用他在陆军中的影响力，获得军队的支持。希特勒向赛塞尔解释说：“我们需要他争取德国军队，没有一个德国士兵会向他开枪。”最后，赛塞尔同意他的警察部队将“召之即来”。在希特勒会见赛塞尔时，戈林又一次拜见了洛索夫中将。回来后，他兴冲冲地对希特勒说：“洛索夫和我们是一条心的，我们将顺利地达到目的。”

正当希特勒和戈林自以为得计时，不料柏林的一道命令，犹如五雷轰顶，使得他们手足无措。

10月24日，柏林政府突然下达命令，撤换冯·洛索夫的职位，由冯·克莱森施但因将军接任。柏林政府的国防部长、陆军的实权派人物西立克将军亲自签署了这一命令，这说明柏林政府已经察觉到了来自巴伐利亚州的威胁。显然，军方此时站到了柏林政府一边。希特勒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召开了紧急会议，商讨对策。希特勒和戈林等人怎么也不明白，一贯对柏林政府阳奉阴违的德国陆军，怎么会突然倒向了柏林政府。

其实，军方此举也是出于无奈。德国军队何尝不想借助国内右翼势力，

将共和政府推翻。可是，军方实在担心这些胆大妄为的右翼团体，在推翻共和政府之后再作出什么事情来，尤其害怕他们挑起一场对法国的战争。德国军队现在需要的是休养生息，而不是一场战争，而保存现政权，也就等于消除了不利于德国军队的战争因素和其他方面的困扰，来自巴伐利亚的战争狂器，是他们所不愿听到的。在此之前的9月26日，艾伯特总统已经宣布德国处于紧急状态，根据紧急状态法，西立克将军和他的军队实际上已成为德国的独裁者，这就是说，军方控制了全国。深谋远虑的西立克将军采取了一系列稳定国内秩序的对策，他先是无情地粉碎了同他直接有关的“黑色国防军”的叛乱，又镇压了共产党在汉堡发动的起义，清除了萨克森。图林吉亚地方政府中的共产党人势力。西立克认为，这样一来，巴伐利亚的右翼势力就不会以“从共产主义手中拯救祖国”为借口，进行反对中央政府的活动了。然而，这一切并没有使巴伐利亚平静下来，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和军方只能采取强硬的手段了。

起初，巴伐利亚州长官在接到西立克将军签署的撤换洛索夫中将军的命令后，马上表示，不接受柏林方面的这一命令，洛索夫中将继续担任巴伐利亚州的国防军司令，并且让军队向巴伐利亚政府宣誓效忠。这一举动不啻在向柏林政府和西立克示威。西立克并没有让步，他向巴伐利亚的三巨头发出警告，告诉他们，任何同柏林方面作对立的行为都将受到军队的干预。在西立克的重压之下，三巨头退却了。对这些情况，希特勒一无所知。

不久，希特勒发现了三巨头态度的变化，原定于10月30日召开的群众大会，洛索夫没加任何解释就予以取消了。希特勒当晚在克朗马戏场对纳粹党的大群支持者说，“在我看来，德国的问题只有在我们的卐字旗在柏林飘扬时，才会得到解决”。

11月6日，三巨头告诫以希特勒为首的战斗同盟的首脑们，不许轻举妄动，究竟在什么时间、以什么形式行动，须经他们三个人同意。卡尔在与希特勒等人谈话时说：“我也希望建立一个新的民族主义的政府，但我们必须联合一致，要有一个经过深思熟虑、有充分准备、步调一致的计划。”洛索夫则说，“我也想向柏林进军，但如果又是一次卡普暴动和屈斯特林的暴动（指黑色国防军的未遂政变），你们别想让我参加。……在没有百分之九十胜利的希望之前，我是不会采取行动的”。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希特勒不能再等了，他手下的人也都急不可耐了。戈林不断催促希特勒采取行动，他告诉希特勒，威廉·布鲁克纳中尉对他说，“时候到了，我已约束不住弟兄们了。”

如果现在再不采取行动，他们就要离开我们了”。

希特勒决心单独动手。经过一番谋划，希特勒决定以武力制服三巨头，使他们不得不听命于他。他向戈林和罗姆面授机宜，让他们分头寻找机会劫持三巨头，并以他们的名义行动。

11月6日晚，戈林、罗姆等人被希特勒召集到一起，希特勒告诉他们，最后行动的时间定在11日。在那一天，他们的“部队”将占领巴伐利亚的主要城镇、火车站和市政大楼，然后宣布“全国革命”开始，强迫三巨头承认既成事实。第二天，戈林被派去同高地联盟领导人韦伯联系。

机会终于来了。戈林手下的人打探到11月8日晚，州长官卡尔将在毕尔格勃劳的大啤酒馆举行集会，冯·洛索夫、赛塞尔及其他政要都将出席，希特勒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将三巨头一举擒获。

1923年11月8日清晨，慕尼黑阴霾满天。在刺骨的寒风中，一队队头戴滑雪帽的纳粹冲锋队队员，手持各种武器急促地在街头走过。在各主要路口、建筑物前，三三两两停留着衣着怪异的武装人员。街道上还不时急速驶过一辆辆满载纳粹冲锋队员的汽车，火车站则被一队队来自上阿尔卑斯山区的高地联盟的士兵挤占着。

一清早，戈林头戴钢盔，身穿闪闪发亮的黑皮上衣，开车进了城。临走前，他向卧病在床的卡琳吻别，说他将晚些回来。

上午10点钟，戈林向各支队队长下达了命令。由冲锋队支队长布鲁克纳带领两个支队的冲锋队员，让他们下午5时到毕尔格勃劳的大啤酒馆待命，其余队员则在阿茨贝格和霍夫布劳啤酒馆集合，戈林亲率冲锋队的精锐“阿道夫·希特勒突击队”守候在图尔布劳。高地联盟和战斗联盟则以毕尔格勃劳啤酒馆附近的一些小啤酒馆为集结点。

街上的情况，三巨头并非一无所知，但他们谁都不相信希特勒敢有什么大的举动，当晚他们都如约参加了集会。卡尔看到集会的啤酒馆里人满为患，许多听众都站在人行过道上，而且有数百名穿警服的人夹杂其中，心里不安起来。他见到了一些朋友，发现他们同样迷惑不解，后来他才听说，希特勒私下邀请巴伐利亚所有的政界和军界名流参加了这次集会。

在三巨头到达之后，希特勒与“战斗联盟”的另外一个头子里希特也赶到了啤酒馆。希特勒打扮得不伦不类，身穿一件黑色的大衣，胸前挂着两枚铁十字勋章。他们见啤酒馆内挤满了人，就在外面等候戈林带领的“阿道夫·希特勒突击队”到来。大约在晚上8点钟，戈林带着人匆匆赶到，希特勒命令立即开始行动。

此时，卡尔正在台上讲话。突然他结巴起来，脸上现出了惊恐的表情，两眼直直地看着大门。听众们也不约而同地向后望去，只见门外挤进来一群头戴钢盔、荷枪实弹的人。几个人还将一挺机关枪架在了门口，黑洞洞的枪口对着啤酒馆内的人。希特勒提着手枪，在众人的簇拥下走向卡尔正在讲话的讲台。一名警察少校企图拦住他们，但希特勒将手枪指向了他，逼得他只好步步后退。卡尔终于醒过神来，他面如土色地从看台上走了下来，希特勒却跳了上去。

希特勒见台下一片混乱，就对着天花板开了一枪，人群立刻静了下来。希特勒用他那已有些失声的尖厉的嗓音喊道：“全国革命已经开始了！”他清了清嗓子接着说：“这个地方已经由600名武装人员占领。任何人都不许离开大厅。大家必须保持安静，否则我就在楼厅上架起机关枪。巴伐利亚政府和全国政府已经被推翻，临时全国政府已经成立。国防军营房和警察营房已被占领。军队和警察已在卐字旗下向市内挺进”。

尽管很多人怀疑希特勒在虚张声势，但谁也不能断定外边究竟发生了什么事。面对着纳粹冲锋队员黑洞洞的枪口，更没有人敢提出什么疑问，希特勒命令卡尔、洛索夫、赛塞尔跟他到台后的一个房间里去，在冲锋队员的押解下，巴伐利亚的这三名最高级别的官员只好乖乖地随他去了。

经过短暂的平静后，大厅里骚动起来，有人向警察高喊，“别像一九一八年那样胆小，快开枪！”有人大声嚷嚷“丑闻”，“南美洲”（意指该地经常发生未遂政变）。但是，警察看到自己的局长都那么驯服，而且冲锋队员已占领了整个大厅，因此一动都不敢动。希特勒早在警察局安插了一个纳粹党的坐探，要他打电话告诉在啤酒馆值勤的警察不要插手此事，只须随时

报告情况就可以了。戈林走上了讲台，气势汹汹地命令台下的人安静一点。台下的观众几乎没有人认识这个年轻的纳粹党徒，骚动依旧。戈林拔出手枪，也像希特勒那样向天花板开了一枪。待人群静下来之后，他大声叫道，“没有什么可怕的，我们没有恶意。我们要消灭的是讨厌的犹太人。陆军和警察部队正在举着旗帜来同我们会合。因此，你们没有不满的理由，喝你们的啤酒吧！”戈林的话起了作用。人们逐渐平静下来。

又有许多警察赶到现场，当一位警官央求戈林放了啤酒馆里的人时，戈林只轻轻地敲了一下手表，咧嘴笑着说：“等到8点40分，弗里克赶到再说。”威廉·弗里克是慕尼黑的政治警察人目，一段时间以来，他一直是希特勒的支持者。此时，纳粹的联络员已用暗语通知了正在警察总部听信的弗里克和在另外一个啤酒馆待命的罗姆。在接到“安全交付”这一暗语时，罗姆怪叫一声，跳上了啤酒馆的一个桌子，向手下的人宣布，“政府已被推翻，新的政府正在组建。”他命令所有的人立刻到外面列队，准备穿过市区游行，然后与在毕尔格勃劳啤酒馆的希特勒会合。

在毕尔格勃劳的啤酒馆，希特勒正口沫横飞地劝说被这突如其来的事件气得发昏的三巨头同他一起干，戈林则站在一旁帮腔。他见三巨头都不说话，便有些发急，指着洛索夫将军以戏谑的口气对希特勒说：“这种老将军还能做什么呢？不就是签几条命令吗，他能做的我也能做。我也能当师长——咱们就在此时此地解除他的职务得了。”希特勒向戈林摆了摆手，不让他信口开河。希特勒又尽力地压低声音说：“你们三个人在未来还将得到鲁登道夫将军的支持，他将和你们一起组成新政府。”“但是，”希特勒脸色一变，对三巨头挥了一下手枪恶狠狠地说，“如果你们不干，谁也别想活！我手枪里有4颗子弹，如果你们不肯合作，三颗子弹送给你们，一颗留给我自己！”

希特勒见三巨头不肯就范，便让戈林留下看住他们，自己回到了大厅，重新登上讲台。希特勒向在场的人宣布，巴伐利亚政府已被解散，德国总统艾伯特和总理施特莱斯曼已被解职，三巨头已经决定参加这场革命。他建议由冯·鲁登道夫将军任同家军队的“改组者”，洛索夫和赛塞尔指挥帝国的陆军和警察。他最后说：“为此，我建议由我接管国家临时政府的政治领导权。”希特勒从从容容地说完这些，便带头鼓起掌来。当人们听到三巨头已与希特勒合作时，发出了一片欢呼声。随后希特勒派人把那三位领导人带了回来，他们一出现在啤酒馆中，人群中又是一阵疯狂的欢呼声，像是一场杂耍节目到了精彩之处一样。希特勒转过身对三巨头说：“你们看看人民都在为我们的合作欢呼，还是不要违背人民的意愿吧。”事已至此，三巨头只好一一违心地说了一些支持希特勒“革命”的后。

这时，鲁登道夫在几个冲锋队员的陪同下，走了进来。希特勒急忙迎上前去，与鲁登道夫紧紧握手。但鲁登道夫面色不悦，没有同希特勒说话。希特勒立刻明白了，鲁登道夫在进来之前，一定是在门外听到了他的讲话，因为希特勒曾向鲁登道夫许愿，将来由他担任德国元首。希特勒并不在乎鲁登道夫的态度，他要的只是鲁登道夫亲临现场。

不一会儿，外边又传来一阵军乐队的吹打声，大约有1000多名士官生高举着卐字旗从步兵营赶来这里，鲁登道夫和希特勒走出去迎接。有人向希特勒报告，火车站和电信局已落在高地联盟部队手中，洛索夫的军区司令部已牢牢地掌握在“德国战旗”的手中。希特勒神采飞扬，他日思夜想的“革命”，居然在一夜之间成功了！戈林也急忙派人给卡琳带去了“胜利”的消息。

希特勒又一次对着人群发表了讲话，宣称，“我现在要履行我5年前在军事医院里一时成了瞎子时所立下的誓言：要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直到十一月罪人被推翻，直到在今天德国的悲惨废墟上建立一个强大的自由的繁荣的德国”。

希特勒的话音刚落，一名冲锋队员跑来向他报告，高地联盟的人在陆军工兵队营房同正规军发生了冲突。希特勒脸色大变，他怕的就是与正规军发生冲突。希特勒急忙让戈林驾车同他一道去看一下情况。临行前，他委托鲁登道夫处理一下啤酒馆里的事情。当希特勒平息了事端，高高兴兴地回到酒馆时，他作梦也没有想到的事竟发生了，鲁登道夫将三巨头给放了，他不禁目瞪口呆。希特勒满以为他的“部长们”正在忙于新的国家重建的任务，三巨头也拟定好了进军柏林的计划，但结果却让他极度失望，外面的消息也让希特勒恼火。早些时候传来的那些消息都不详不实，除了“德国战旗”占领了洛索夫的军区司令部外，任何战略要地都没有被控制。更让他担心的是，他的人还没有占领电报局，政变的消息传到了柏林，国防部长西立克要巴伐利亚驻军镇压政变的命令也由电报局接收过来，送到了驻军的手中。

不一会儿，又有消息传来，罗姆带领的一部分冲锋队员被军队包围在军区司令部里。而三巨头已通过电台向全国发表了一个“新闻公报”，声称“巴伐利亚州长官冯·卡尔、冯·洛索夫将军和冯·赛塞尔上校谴责希特勒暴动，”并解释说，“他们在毕尔格勃劳啤酒馆集会上发表的意见是在枪口的威逼下讲的，故而无效。请注意不要滥用上述讲话的内容”。

10分钟后，慕尼黑电台又发布了一则消息：“所有重要的机关，都控制在部队和州警察手里。增援部队还在途中，市内平安如常。”

看到冲锋队队员和士官生惶惶不安、六神无主的样子，希特勒和鲁登道夫都万分沮丧。戈林建议，希特勒先将队伍撤往慕尼黑南部的罗森海姆，在那里重整队伍，以求东山再起。鲁登道夫马上反对，他对希特勒和戈林说：“绝不能就此罢手，现在正是显示我们是什么样的人的时候，让他们看看，我们是能够领导民族主义运动的！”他还自信地说：“我相信，德国士兵，包括警察在内，是不会对我，一个曾经领导过德国军队取得一次次胜利的将军开枪的。现在你们跟我一起去，去占领任何一个需要占领的地方，我相信，我们会成功的。”

希特勒对鲁登道夫的话将信将疑，但此时也只好死马当作活马医了，便同意了鲁登道夫的意见。同鲁登道夫商议完之后，希特勒让冲锋队员和步兵士官生在啤酒馆门前列队，希特勒即兴发表了演讲，企图说服他们不要气馁，再次强调“民族革命胜利的时刻终于来到了”。戈林提出应该绑架一些人质，希特勒马上表示赞同。上午11点，戈林带着突击队员冲进市政委员会会议室，将市长和九名惊恐万状的社会党议员，像押解犯人似地推到了外面。将近午时，冲锋队员和士官生们在啤酒馆外面排成了行进纵队，希特勒站在队伍的前面，他的两旁是戈林和鲁登道夫。临出发时，戈林指着人质对看守他们的冲锋队员叫道：“如果军队向我们开枪，你们就用刺刀捅死他们，或用枪托砸碎他们的脑袋！”接着，韦伯率领的高地联盟纵队在右，戈林和希特勒率领的冲锋队及突击纵队在左，两名手持战刀、头戴钢盔的冲锋队员护卫着纳粹党旗，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地出发了。希特勒想以这种方式镇住警方，解救被包围在军区司令部里的罗姆及其他的人马。

武装游行队伍刚刚走到离啤酒馆仅几百米的路德维希大桥前，就发现十

几名身穿绿色制服的警察已在大桥上组成了一道警戒线。走在前面的冲锋队员高唱起帝国时代的国歌，其余的人则大喊：“别开枪！鲁登道夫和我们一起！”趁着这些警察还没有反应过来，行进的队伍冲过了警戒线。

这时，慕尼黑市民纷纷涌上街头，观看这令人心悸的壮观场面。一些支持纳粹的市民纷纷加入进去，使希特勒的游行队伍不断扩大。当游行队伍走到一条狭窄的街道上时，又有100多名警察拦住了人群。希特勒的卫士乌里希·洛拉夫跳上前去，大声向带队的警官叫嚷：“投降吧！投降吧！鲁登道夫将军与我们在一起。”那个警官却不为之所动，反而命令警察准备射击，看来鲁登道夫的名字对他没起任何作用。突然有人开了一枪，瞬间便枪声大作。里希特第一个倒了下去，子弹射中他致命的部位。戈林的大腿上挨了一枪，伤势甚重，也趴在了大街上。枪声很快便停了下来，游行的人或四处逃散，或跑到街道两旁卧倒，街道中央则横七竖八地躺着一些死伤的纳粹党人。只有一个人既没有卧倒，也没有逃走，他就是鲁登道夫。枪声响起时，他竟一直保持着检阅队伍的姿态，枪声停后，他在副官的陪伴下，冲着警察的枪口，慢慢地神色庄严地走了过去，警察们好像在看一个疯了，谁也没有理会他。

枪响之后，第一个飞奔逃命的就是刚刚还视死如归般地走在队伍前列的希特勒。他跳上一辆跟在身后的汽车，让司机将他送往一个纳粹党徒在乌芬的乡间别墅。至于那些倒在血泊中的同党的死活，那些逃命的人们，在希特勒的心中已无足轻重了。

第一阵枪声响过，戈林觉得有一股灼热的气流钻进了他的大腿，随后他便倒在了地上，尽管他动不了了，但神智还是清醒的。他大声呼喊着希特勒的名字，刺耳的枪声、愤怒的咒骂声、凄惨的呻吟和呼救声盖过了他的声音。他似乎觉得生命正离他而去，他想起了在家里等着他的卡琳，随后眼前一片黑暗，他昏了过去。

戈林醒来之后，急忙问现在他是在什么地方，有人告诉他，他在一个诊所里。有一个人对戈林说，在他们抬他进来时，一楼的主人要赶他们走，是一楼的巴林夫妇收留了他，他们是犹太人。戈林苦笑了一下，想想自己天天喊着反对犹太人，到头来救他的却是犹太人，真好像是命运在捉弄他。几天后，巴林夫妇又将他送到他们的朋友开设的一家诊所继续治疗。

戈林的伤势严重，一颗子弹穿透了他的腹股沟，离动脉仅几毫米，流了许多血。几天后，戈林手下的人将消息通知了焦灼不安的卡琳，卡琳立刻赶到了诊所。随后，她将戈林藏在了一个纳粹的同情者、荷兰人克里肯少校在慕尼黑郊外的别墅里。这里离慕尼黑太近了，还是不宜久留。卡琳与克里肯商量了一下，决定将戈林偷渡出境。此时，慕尼黑已开始对纳粹党人进行搜捕。尽管在纳粹开列的阵亡者名单中，戈林的大名赫然排在第一位，但警察根本就不相信，因为他们谁也没有看到戈林的尸体。

11月10日，赛塞尔亲自签发了逮捕戈林的命令，并封锁了离慕尼黑最近的米腾瓦尔德边境检查站，严防戈林出逃。

卡琳并不知边境已被封锁。几天后，卡琳同正在因伤口发炎发着高烧的戈林，乘坐一辆由一名冲锋队员驾驶的汽车来到了这里。结果戈林夫妇被扣留，他们的车在警察的监视之下开到了维格斯疗养院。到那里不久，在奥地利联盟队员的帮助下，戈林成功地逃脱了监视，拿着假护照逃到了奥地利。在此后的4年里，戈林虽然逃脱了德国法律的制裁，却饱尝伤痛和流亡之苦。



正是：偷鸡不成反蚀米，时乖命蹇枉张狂。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 第三章 亡 命

流亡异国求援助，百般钻营终无路；

受尽冷落心凄苦，无可奈何踏归途。

话说戈林夫妇在纳粹党徒们的帮助之下，逃到了奥地利，自此开始了长达4年的流亡生活。虽然暂时逃脱了牢狱之灾，但是枪伤带来的肉体之苦却使他身体和精神日益衰弱。在因斯布鲁克，卡琳将戈林送到了一家医院。但是戈林的伤情始终不好，为了减轻痛苦，医生每天为戈林注射两针吗啡。纳粹在奥地利的同情者也很多，每天都有许多人来探望戈林，其中不乏一些名人。如纳粹的理论家斯图尔特·张伯伦，作曲家瓦格纳的儿子西格弗里德·瓦格纳等人。纳粹的地下组织也不时给戈林夫妇送来一些衣物。

病榻之上的戈林每当在注射吗啡之后，便让卡琳找来各种报纸，想从报上了解已经被逮捕的希特勒和其他纳粹同党的命运。他对这种整日心惊胆战的逃亡生活越来越感到厌倦。当他从报上知道鲁登道夫被释放在家中候审的消息之后，马上给鲁登道夫写了一封信，询问“为了党的利益，我在哪里向卡尔的警察自首好”？鲁登道夫立刻回信给戈林，告诉戈林千万不要回到慕尼黑，因为他未被逮捕“将给党的利益带来好处”。但是戈林现在看不到“好处”在哪里，更不知道今后他将如何生活。在这段时间里，戈林显得格外消沉。卡琳在给其父的信中写道：“我几乎不认识他了……他整个人都变了，连一句话都不愿说，整天沉浸在被出卖和无望的痛苦之中……我从来没有想到赫尔曼会如此的消沉。”

1923年的圣诞节，戈林从医院搬到了一个饭店。由于节日，饭店中显得格外的冷清。因为行动不便，戈林只好呆在房间里。卡琳不时地安慰着他，不断地变换话题想让戈林高兴一点，但这反而使他更加心烦意乱。他架着双拐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就像一头被困在宠子里的狼。圣诞之夜，几个当地的纳粹分子来探望他，其中的一个告诉他希特勒将不会被起诉，因为慕尼黑的纳粹党的支持者们，正在想方设法使希特勒无罪释放。客人走后，戈林对卡琳说，他不相信希特勒能够无罪释放。卡琳劝他在伤好之后，如果回不了德国，那么就同她一起回瑞典。戈林也表示同意。他对卡琳说：“我只想回到一个具有强烈民族主义精神的德国去，而不是一个由犹太人把持的共和国去。”

在1924年的年初，戈林与希特勒的律师接上了关系。这样，关于希特勒的情况戈林能够及时地了解。这一段时间里，戈林焦急地关注着对希特勒的审判情况。2月26日是对希特勒开庭审判的日子。一整天，戈林的精神几乎紧张得到了崩溃的边缘。他一会儿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一会儿又漫无目的地翻看随便抓到手中的任何一本书，一会儿又拿起笔来信手写几行字，或不时地盯着座钟，仰头看看天花板，长叹一声。忽而他又哈哈大笑，然后又呆呆地坐在那里一声不吭，忽而又对卡琳莫名其妙地微笑。卡琳后来在给她的双亲的信中写道：“……我感觉到他内心的惶恐与不安，他的心在为希特勒而抽紧。”如果按照德国的法律，希特勒将被判无期徒刑，真要是那样，戈林将一辈子注定要作为一个流亡者生活在国外，作为一个时刻可能被引渡的逃犯，在无尽的惊恐和逃亡中度过余生。此时此刻，戈林为他加入了纳粹党而懊悔不已。但是戈林又不能将这种心情表露出来。他的周围都是纳粹分子及

其支持者。没有这些人，戈林与卡琳恐怕只能流落街头，而他现在住的这个饭店，上至经理，下至普通的侍者，几乎都是奥 0041 地利纳粹党的冲锋队员。这些人对这个来自纳粹运动发源地的冲锋队的长官，崇敬备至。戈林在这个饭店里的一切费用均给予 30% 的折扣，并允许以支票的形式结算，尽管戈林夫妇在慕尼黑银行的帐户已经被查封。他只有在最后知道对希特勒的审判结果之后才能对今后的行动有所定夺。

在心惊肉跳中，戈林终于度过了希特勒被审的这段时间。4 月 1 日，希特勒的姐姐保拉来到饭店，将对希特勒的最后判决结果告诉了戈林夫妇，戈林夫妇如释重负，并与保拉一起共进了一顿丰盛的午餐。在保拉走后，戈林夫妇都很兴奋。卡琳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我们越想对希特勒的判决越感到高兴。在希特勒被释放之后，又可以从事他中断的事业。由于这个人身上具有一种超人的品格与才智，在审判期间居然又获得了如此众多的支持者……赫尔曼一天都兴奋异常，他又感到生活有了意义。”

戈林很快便与狱中的希特勒联系上了。在狱中的希特勒给了戈林一个重要的任务，让他以纳粹党全权代表的身份，到罗马去面见意大利的独裁者墨索里尼，恳求他给纳粹党一笔贷款，供纳粹党东山再起之用。同时希特勒还让他的律师给戈林带来了由希特勒亲笔签名的委托书和给墨索里尼的亲笔信。戈林对这一新的使命感到十分的高兴，很快便办理好签证。临行之前，饭店的经理，一个忠实的纳粹分子，收回了戈林夫妇的全部帐单，声称是“对党的工作作贡献”。

5 月初，戈林夫妇来到了风景宜人的威尼斯城。在这里住了一个星期之后，于 5 月 11 日到达罗马。戈林对此行满怀信心，认为墨索里尼会很快地接见他。在他到达罗马之后，马上与曾经结识过的意大利外交官朱塞佩·帕格它尼和曾经当过《意大利信使报》驻慕尼黑记者，现为墨索里尼顾问的莱奥·内格雷利博士取得了联系，他们答应将戈林引见给墨索里尼。

但是，墨索里尼根本就不想见戈林。虽然戈林也参加了几次意大利官方的宴会，却都没有机会与墨索里尼说上话。戈林聊以自慰的是总算还认识了几个法西斯党内的要员。

对此，戈林十分懊恼，但他又不愿将这种情况告诉卡琳。因为在这段流亡生活中，卡琳为他付出的太多了。每当卡琳问起这件事的时候，他就装作希望十足的样子说，他已经见到了墨索里尼，事情马上就要成功了。卡琳不知实情，对戈林的话信以为真。于是，她在给其父的信中写道：

“我很难相信我们什么时候能有一点的闲暇，因为赫尔曼正和墨索里尼等法西斯党的要员商谈关于与希特勒之间的各种协议和谈判事宜……这是赫尔曼的重大职责，我相信赫尔曼做的比希特勒想象的要好得多。”

在另一封信中她又写道：

“墨索里尼是一个很有势力的人，但是他是一个装腔作势的人，他的周围是一片奉承之声。他说的每一句话，哪怕是一句无足轻重的话，也要被奉为圣旨。依我看，希特勒更为真诚一些，他是一个热爱真理、对自己的信念有着执著追求的天才……这里非常支持和同情希特勒的事业，你很难想象这里的法西斯党是如何热情地接待了赫尔曼——因为他是希特勒的代表。”

在几周后给其父的信中，卡琳又写道：

“ 赫尔曼告诉我，墨索里尼对他说，他克服的困难比起希特勒还要多得多，这里的法西斯主义者是在付出了成千上万的人死亡的代价之后才取得胜利的，墨索里尼对赫尔曼说，在德国，他只相信希特勒一个人，他不会与其他任何一个人签订条约，不会与除希特勒领导的政府外任何一个政府来往…… ”

很显然，卡琳根本不知道戈林在对她撒谎。

事实是墨索里尼在当时的情况之下，根本就不可能与一个似乎已完全失败的政治运动的代表，而且这个代表还是一个正在被追捕的逃犯进行什么“谈判”。戈林与意大利官方的联系至今仍只限于同朱塞佩·帕格尼尼的接触。在与帕格尼尼的接触中，戈林还犯了一个错误，这一错误也是导致戈林一直无法与墨索里尼会面的重要原因之一。

戈林夫妇下榻的不列颠饭店的主要股东之一，是一个名叫鲁道夫·瓦尔特的德国侨民。他在得知戈林正在与意大利政府进行谈判的消息后，便与戈林见面，要求戈林在与意大利政府会谈时，提出归还他按照《凡尔赛和约》被意大利政府没收的股份。吃人家的嘴短，戈林答应帮忙，在与帕格尼尼会面的时候，戈林居然真的将这一问题提了出来。这件事使意大利政府大为恼火。因为如果归还了瓦尔特的股份，实际上就等于破坏了《凡尔赛和约》。墨索里尼岂肯为这等微不足道的小事去冒风险。愚蠢的戈林似乎不知利害，一次次地就此事与帕格尼尼纠缠不休。整个夏天，戈林竟一直将瓦尔特的问题同墨索里尼给予德国纳粹党贷款的问题联在一起，同帕格尼尼和内格雷利进行商谈。

10月份，戈林与内格雷利一起草拟了两份秘密协议。这两个协议一个是关于如何解决南蒂罗尔归属问题的，一个是关于墨索里尼向德国纳粹党提供贷款问题的。

南蒂罗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为德国的领土，其居民大部分为德国人，但也有一部分意大利人。一战后，根据《凡尔赛和约》的规定，南蒂罗尔划归意大利，并改名为“上阿迪尔杰”。德国国内一些人对此一直耿耿于怀，要求收回这一地区。按照希特勒的授意，戈林在第一份秘密协议中提出：

“ 纳粹党认为不存在任何上阿迪尔杰的问题，毫无条件地承认现状，即意大利对上阿迪尔杰的合法管理权。

从现在起，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将不遗余力地消除德国人民对上阿迪尔杰的领土要求。

“ 纳粹党认为《凡尔赛和约》中关于德国向意大利的赔款是合理的，德国必须全部完成。

“ 在纳粹党掌握的报纸上，立即掀起一个宣传恢复德、意友好关系的运动。 ”

作为回报的条件，墨索里尼应对希特勒及其纳粹党，承担一定的许诺，以“帮助希特勒解决困难”，其条件是：

“ 一旦纳粹党在德国执掌政权，意大利政府将不对这一新的德国政府施加任何压力，也不参加由第三国发起的此上种运动。

“ 意大利法西斯党将采取一切手段向德国纳粹党提供援助，包括新闻报

道、国会议员发表谈话和秘密贷款。”

为了彻底消除墨索里尼的疑虑，戈林还在给墨索里尼的信中写道：“此事将作为我党的最高机密处理，知情人只限于我党的元首、由元首委派的知情人和签字人。”“如有可能，意大利政府给予我党的贷款最好是 200 万里拉，可分期讨款，我党在今后的 5 年里，将以所有的动产和不动产作为抵押……这笔贷款将被用作与富裕的民主制度和受到莫斯科支持的，在德国日益泛滥的共产主义运动浪潮作殊死的斗争。”

戈林将草拟的文件誊好后，用挂号件寄给了内格雷利，请他亲自交给墨索里尼。在此之后，他便与卡琳回到了威尼斯，继续住在不列颠饭店。瓦尔特在这几个月中，一直静候着戈林的“佳音”。戈林告诉他，事情正在解决之中，但需要耐心。瓦尔特感激涕零，告诉戈林夫妇说，他们可以在这里长久地住下去。“随便几个月都行”。尽管如此，戈林内心还是十分忐忑不安，他实在无法知道那位意大利的独裁者在哪一天才能与他会面，即使会面，能不能接受他提出的建议还是个未知数。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罗马方面仍然没有任何消息。戈林又一次给内格雷利写信，催促安排自己与墨索里尼见面的时间。在信中，戈林竟然再一次不明智地提到了瓦尔特的问題，并颇为滑稽地提出，对瓦尔特问题的处理是检验意大利现政府对“纳粹事业的诚意”的一个尺度。甚至夸夸其谈：“我们党需要瓦尔特，如果瓦尔特的问题得到解决，我党将把这看成是一种特殊的优待，并视为我们之间的谈判得到重视的证明。”

在无望的等候中，戈林夫妇的钱也逐渐用光。希特勒的信使曾给戈林带来消息说，希特勒将给他们寄钱来。可信使走后，便再也没有音信了。9 月初，戈林已经感到绝望，准备离开意大利。但恰在这时，意大利出现了重大的政治危机，这又促使戈林重下决心，留在了这里。

1924 年 6 月 10 日，意大利的反法西斯党——社会党的领袖、议员马泰奥尼被法西斯党徒暗杀。这一事件在意大利社会引起了强烈的震动，并引发了一场严重的政治危机。许多人对政府的信心动摇，大批的工人和中产阶级退出了法西斯党，约 150 名国会议员辞去了职位，他们仿效古罗马的平民运动的方式，聚集在阿芬丁山，组成了“阿芬丁同盟”，与墨索里尼及其党派对抗，留在议会中的一些议员也激烈地抨击墨索里尼的这种卑鄙的行为。一些激进的社会党成员，采取了以牙还牙的作法，又将一名臭名昭著的法西斯党徒卡萨里尼杀死在罗马街头。一时间，意大利的政局出现了自墨索里尼上台之后所未曾有过的混乱。墨索里尼在强大的社会压力之下，表示他可能要辞职。戈林见有机可乘，遂又给墨索里尼上书一封，言明在这场共产主义者所掀起的政治动乱中，他可以成为一名随时听候调遣的“普通的法西斯分子”。在这封信发出之后，戈林又迫不及待地发出一封信。但过了许多天，仍然未见回音。戈林根本没有想到，在这种时候，墨索里尼又怎么会顾得上给他这样一个在当时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回信呢？

戈林已经完全失去了耐心。9 月 19 日，他给内格雷利发了一

0046 封短信，恳求内格雷利在尽快的时间里，给他一个明确答复。罗马仍旧没有任何音信。9 月 23 日，戈林又给内格雷利写了一封措词激烈的信，指责他与帕格尼尼故意拖延时间，并断言关于瓦尔特的股份问题，一定是有人受到了犹太人的影响，才会出现目前的情况。

10 月 15 日，戈林给内格雷利寄去了一封措词更为严厉的信。在信中，

戈林尽情地发泄着他的不满，抱怨他“被别人牵着鼻子走”，威胁内格雷利等人不要轻视一个拥有“400万选民和800万支持者的政党和他的代表”。并暗示，在希特勒获释后，他将与希特勒一起访问罗马，进行有关纳粹党与意大利法西斯党之间具体事务的谈判，但前提是要有把握见到墨索里尼。在信中，戈林又一次大谈各国的民族主义运动必须与反犹运动结合的重要性，暗示要消除在内格雷利身边的犹太人的影响。

在焦虑和失望之中，戈林还有一层不安。这便是他在草拟了准备与意大利签订的秘密文件后，马上就通知了希特勒。在信中，他吹牛说，墨索里尼已答应马上给纳粹党贷款，请希特勒马上利用纳粹的宣传机器进行放弃南蒂罗尔的宣传。狱中的希特勒马上指示他的党徒听从戈林的建议，采取相应的行动。这使得纳粹党受到新闻界和其他的民族主义团体的猛烈攻击。所有逃到南蒂罗尔的纳粹党徒都被驱逐出境。如果墨索里尼真的能够给纳粹党以援助的话，这些代价的付出会被认为是值得的，戈林也可以说是完成了希特勒交给他的任务。但转眼之间，半年已经快过去了，戈林却一无所获，这使他在党内的地位大受影响。

戈林夫妇的生活日渐拮据。万般无奈之中，戈林亲自给卡琳的母亲写了一封信，将他们的窘况如实地告诉了她，请她给他们寄一些钱来，说是要回到瑞典去生活。不久，钱寄来了，但戈林夫妇却没有离开意大利。原因是一直没有露面的内格雷利终于与戈林在威尼斯见了面。他表示将尽快办理有关纳粹党与墨索里尼的会面事宜，并对戈林所谈的他将参加在11月份举行的国会大选，作为纳粹党人的代表竞选国会议员的想法大加赞赏。然而此后一直到12月初，内格雷利犹如黄鹤一去，再也没有音信了。

希望、失望，再希望、又失望的痛楚煎熬着戈林。正在戈林一筹莫展、进退两难的时候，他听到了希特勒获释出狱的消息。他马上让卡琳赶到慕尼黑与希特勒会面，以求拿到一点救急的钱。但希特勒仅仅表示了对戈林处境的同情，其实他自己也没有什么钱，至今仍在等待一个同情者的捐款。至于党内其他要员，没有一个肯为戈林解囊，有的甚至还对他颇有微辞。卡琳写信将她在慕尼黑的情况告诉了戈林，并向他建议，千万不要将他在意大利的境况如实地告诉希特勒，因为那样，希特勒肯定会认为他是一个笨蛋。卡琳在信中又说：“我在希特勒这里之所以提谈判的事，只是让他明白，你是多么的卖力，是为了让他不认为你无能。”

戈林在给希特勒的信中说，向墨索里尼要求贷款一事是可行的，但是最近纳粹党在大选中失败，可能会影响到贷款一事的进展。这样，戈林就将贷款不成的原因归结为墨索里尼的不合作和纳粹党的竞选战绩不佳。但是他也明白，希特勒是不会轻信他所说的这一切的，他还必须为同墨索里尼会面做最后的努力。

1925年2月12日，戈林在给内格雷利的信中写道：“我刚收到希特勒的一封信，他告诉我，我如果无法见到墨索里尼，就应该如实地告诉他……给我最后一次机会……否则，我怕希特勒会再派一个人来与墨索里尼进行谈判，那样，就显得我太无能了。”这次，内格雷利及时地回了信，并告诉戈林说，他已经把信给墨索里尼看过了。这使戈林又一次看到了希望。他在给内格雷利的信中写道：“如果能安排我与墨索里尼一谈，我就可能对一切作出安排……务请安排一次接见。你可以说我就要走了。与墨索里尼的谈判非常重要，因为我真的在写一本关于他和意大利法西斯的书，准备在德国宣传，

如果我在走之前，见不到墨索里尼，那就显得我太笨了。”内格雷利及时地给戈林回了电报，告诉他正在安排会见。

这一时期，希特勒和纳粹党重新在德国得势（1925年纳粹党又获得合法地位）。此时的希特勒已经不需要死乞白赖地从墨索里尼那里得到一笔微不足道的贷款了，德国的许多大财团和大资本家又开始向纳粹党捐款。不久，戈林接到希特勒的指示，让他通知意大利当局，纳粹党暂不考虑与秘密协议有关的事情。这时，一直与戈林避而不见的帕格尼尼却感到，如果就这样草率地打发了戈林，“把这件事丢在一边不管的话，会给意大利和法西斯的忠诚信誉造成极不好的影响”。于是，帕格尼尼又告诉墨索里尼，戈林为了得到他的接见，已经整整在意大利等待6个月了，无论如何应该象征性地接见他一次。但是，不知为什么，墨索里尼仍然不想与戈林会面。自然，瓦尔特的股份问题也没有得到解决。

1925年春天的威尼斯，依然是那样地明丽迷人，使游人留连忘返，可戈林夫妇的心境却如布满阴云的冬日，凄凉无奈。戈林终于决定离开给他带来无数烦恼，同时也使他永远无法忘却的意大利。意大利给他带来了耻辱，他发誓再也不愿踏上这片土地。卡琳卖掉了他们在慕尼黑的别墅，凑足了去瑞典的路费。4月份，戈林回到了在斯德哥尔摩的小小的寓所。尽管他非常想回德国，可是冲锋队在德国仍然属于非法组织，对戈林的通缉还没有解除，他仍然是一个流亡者。

正是：屋漏偏逢连阴雨，船漏又遇顶头风。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 第四章 沉沦与浮起

走投无路心迷离，绝处逢生返政坛；  
平步青云得意时，却闻亲人噩耗传。

1925年春天，戈林夫妇带着意大利人留给他们的耻辱，回到了卡琳的故乡。在走下火车的一刹那，戈林的呼吸似乎都要停止了。斯德哥尔摩——这个给戈林的生命之旅增添了最浪漫的一章的城市，今天仿佛在告诉戈林，这是他人生的最后归宿所在。但戈林内心的一个念头却在顽强地挣扎，一个声音在不断地响起——“不，我决不向命运低头，我绝不承认失败，这不是我的归宿，我的归宿在德国。”

卡琳却没有想那么多，她兴奋异常，因为自己就要见到慈爱的父母和日思夜想的儿子——小托玛斯了。戈林夫妇搬到了一个比当年的居所要大一些的公寓里，紧挨着当年卡琳与尼尔斯住过的房子。卡琳见到父母之后，十分激动，自然免不了唏嘘一番。当看到她的小托玛斯已经长得与她差不多一般高的时候，不禁又是一阵惊喜。

卡琳家人最初因团聚而带来的喜悦，很快为惊讶所替代。他们发现卡琳当年狂热地爱着的那个来自莱茵河畔的英俊潇洒的“白马王子”，已同当年判若两人。他已经变得肥胖臃肿，而且目光有些呆滞，神情时常恍惚。过了一些天，他们又领教了他的变得暴躁的脾气。卡琳的家人哪里知道，戈林现在已经是一个每天都要注射吗啡的瘾君子了。

戈林在1923年11月的啤酒馆政变中负伤后，为了减轻他的痛苦，医生曾在治疗过程中，给他注射了大量的吗啡。尽管在当时，这给戈林带来了暂时的轻松，但也给他的后半生带来了无尽的痛苦，其后果大概也是使用这种药物的医生所始料不及的。作为一种止痛的药物，吗啡的作用是很明显的。但是如果长期注射这种药物，就将成瘾，并无法停止使用它。而这时使用的目的已绝不是为了治疗疾病，完全是为了满足一种病态的需要，这种人也就成为吸毒者。注射吗啡，会使中毒者在当时产生幻觉，感到精神亢奋，想象力受到激发，变得思维敏捷、口齿伶俐。但是，吗啡的作用消失之后，在注射者身上便会出现四肢无力、疲乏嗜睡，甚至意识模糊等现象。更有甚者，吗啡中毒者会由于在注射药物时受到的巨大的刺激，产生一种在医学上被称为“奇特虚荣”的思维模式，往往表现得自负、狂妄和贪婪，做出一些常人感到可笑和难以置信的事情。如果知道了吗啡中毒者的症状，人们大概就不会对戈林在日后的生活中表现出的种种病态的行为，感到困惑不解了。

在回到斯德哥尔摩的最初的几个月中，戈林一直沉浸在痛苦之中。在意大利的失败的遭遇固然是对戈林病态的虚荣心的一个沉重的打击，但最令他难以释怀的还是在德国的那些过去的“战友”和“同志”好像把他给忘了，德国此时似乎已不是他曾经为之战斗并流血的祖国，而是一个与他毫不相干的国家。戈林在回到斯德哥尔摩后，曾给希特勒写过一封信，请求希特勒同意他在冲锋队解禁后，仍然担任冲锋队的队长。但希特勒在回信中不无轻蔑地告诉他，关于冲锋队未来队长的人选问题，是元首的事，请地不必费心挂怀。接到希特勒的信后，戈林怒火中烧，又给希特勒写了一封信，追述了他为党所立下的汗马功劳，并提请希特勒注意，“党对我还负有债务”。所谓的“负有债务”，是指戈林刚刚加入纳粹党时，由于卡琳与戈林正式结婚，



卡琳的前夫将一些财产归还给她，戈林便将其中的一笔数目较大的现金借给了当时资金紧张的纳粹党。当时，希特勒答应在党的财务状况好转时，应当将这笔钱归还给他。事隔多年，也许希特勒早已忘记了这桩事情，或者是干脆装聋作哑，故意不想再提这件事，但戈林却没有忘记。不久，戈林在给买下他在慕尼黑奥伯门青别墅的纳粹党徒拉尔上尉的信中愤愤不平地写道：“纳粹党以十足的残忍和无情”把他给毁了。他还说，在他最困难的时候，“它竟没有表现出一点的同情和同志的情谊”。他劝拉尔说，不要对纳粹党中虚伪的“民族主义圈子”和“元首周围那些唯命是从的工作人员”抱有太多的幻想，他现在“对元首的崇拜已不复存在……尽管我给元首写了信，但我从那里得到的只是空洞的安抚之辞，我连一个芬尼都没有从鲁登道夫和希特勒那里得到”。

由于注射吗啡需要花费大量的金钱，戈林夫妇的钱很快就要用光。戈林知道不能坐吃山空，便开始寻找工作。最后戈林在斯德哥尔摩的北方航空公司找到了一份飞行员的工作。但是仅仅干了几个星期，他就又回到了家里。这主要是因为他在飞行时，他的毒瘾时常发作，实在太危险了。在公司尚未发现之前，戈林自己就辞了职。而这时卡琳又因肺结核和心脏病住进了医院。万般无奈之中，戈林只好将家中的一些家具卖掉。为了帮助卡琳治病，卡琳的姐姐把自己的钢琴也卖掉了。此时的戈林真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在穷困潦倒中，戈林的身体状况变坏，精神状态也越来越不好。有几次，他不仅对卡琳破口大骂，而且还动手打了她。还有一次，戈林推开窗户，对卡琳威胁说，他要自杀。卡琳吓得浑身发抖，小托玛斯哭喊着：“妈妈，就让他跳下去吧。”事后，戈林尽管十分懊悔，但他也深知，在毒瘾发作的时候，他的行为是难以用理智控制的。家庭医生弗勒德斯特伦劝告戈林说，他必须去医院进行治疗，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1925年8月6日，戈林来到挪威的阿斯普顿的私人疗养院，接受戒毒治疗。

在一段时间里，戈林的病情得到了控制。他甚至给在挪威度假的卡琳的一个女友写信，表示要去攀登阿尔卑斯山，以期“恢复以前的健康和体型”，“焕发从前的精力和热情”。但就在写过这封信后不久，戈林旧病复发，而且病情日趋恶化。实在没有办法，卡琳只好将他送进了一家精神病院，并在一份文件上签了字。在瑞典的隆布尔精神病院中，至今还保存着戈林的病历。病历中记载：

病人姓名：赫尔曼·戈林。

职业：德国空军上尉。

病因：注射吗啡和优可达（一种鸦片的提炼物）。

病人自述：在德国希特勒党内身居要职，因参加暴动，腹股沟受伤。逃至奥地利后，在治疗伤病的过程中，被大量注射吗啡，成为吗啡中毒者。

病状：在阿斯普顿疗养过程中，病人表现出狂暴的停药症状，已无法继续治疗；病人自称要自杀，要像一个男子汉那样地死去，要切腹自杀，以及其他精神病症状。经其妻子同意，将他强行关押。自9月11日晚入院后，在服用天仙子碱后，可以正常睡眠。但药力过后，病人极为狂暴，并要求给他服用优可达解除痛苦。清醒时，神智言语正常。言称要找其律师，认为受到了严重的虐待。

在后来的岁月里，戈林每当想起在精神病院中的日子，就不寒而栗。他清楚地记得，在当时他被强行送进精神病院，看到卡琳绝望的表情时，似乎觉得自己已经走入了一个永远也无法走出的深渊之中。当他被送进一个单人病室中时，那几个送他进来的医生和护士的眼神，分明是在无声地提醒他：你的一生已经完结。他大声地向医生叫喊着：“我不是疯子，我没疯！”他努力使神智保持清醒，拼死拒绝用于建立精神病档案的拍照。

这一痛苦的经历大约历时有一个月之久。经过检查，排除了戈林患有精神病的怀疑。

10月7日，戈林终于通过了医生的全面检查，出院了。临走时，他要求主治医生乌洛尔·金伯格教授写下如下一份证明：

兹证明赫尔曼·冯·戈林上尉在自己的要求下入隆布尔医院治疗，入院时和入院后均无精神病症状；出院时一切正常，亦无任何精神病的症状。特此证明。

隆布尔医院

1925年10月7日

乌洛尔·金伯格教授（签名）

戈林在得到这份证明时，欣喜若狂，简直就像当年他得到那枚“蓝色马克斯”一样。他不再感到绝望，生活重新向他招手，命运又仿佛露出了一丝微笑。他向卡琳说，他要站起来，要获得他努力争取的一切。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戈林出院后，托玛斯经常到他妈妈的小公寓里来，“戈林叔叔又变得有趣了”，他对他的父亲尼尔斯说。但尼尔斯仍告诫小托玛斯，不经他的同意不许往卡琳那里跑。托玛斯为了避开父亲的监视，开始逃学。学校将托玛斯学习成绩日渐下降的情况通知了尼尔斯，为此尼尔斯向卡琳提出了警告。卡琳大为恼火，认为尼尔斯吹毛求疵，企图剥夺小托玛斯与她见面的权力，遂向法院起诉，要求获得小托玛斯的监护权。尼尔斯也不肯善罢甘休，他委托了一个私人侦探，找到了戈林吸毒的证据。经过几个月的调查，法院终于判定戈林与患有癫痫病的卡琳不适宜管教托玛斯，驳回了卡琳的上诉。卡琳不服法院的判决，准备继续上诉。

在再次上诉之前，卡琳请求戈林进行彻底的治疗。无奈，戈林只好又一次走进了隆布尔精神病医院。医院在他入院的病志中记载：“病人病情减缓，但情绪波动大，以自我为中心，敏感，后背痛。”经过了几个月的治疗，戈林又获得了这样一份证明：

应住斯德哥尔摩市厄登加坦23号的赫尔曼·戈林上尉本人的要求，本院为他进行了停用优可达的戒毒治疗。病人于1925年5月4日入院，6月5日出院。出院时，病人已完全停用了上述药物，也没有用任何鸦片衍生物的情况。以名誉和良心证明。

8月末，卡琳就孩子的监护权问题上诉，戈林也给法院写了一封信，言及他以前的地位和战时的“英雄壮举”，并声称愿意接受任何医疗和精神病的检查。但是，法院仍驳回了卡琳的上诉。

此后的一段时间里，戈林在斯德哥尔摩的社交界销声匿迹。他在德国的

同情者为他找了一个为拜尔发动机厂在斯堪的纳维亚推销飞机发动机的工作。在无聊和失意中，戈林又度过了一段时光。但无论如何，戈林对德国的事情也不能忘怀，可惜这只是他的一厢情愿。他在德国的“同志们”早已将他忘记，他的党员资格也被取消。一些曾经与他共过患难的党内上层人物，对他在政变失败后的行为不肯原谅——只有他一个人在国外寻欢做乐，而别人，包括元首在内却在坐牢！戈林有苦难诉，他知道他在这些年的流亡生涯里，由于纳粹的缘故所遭受的一切，只有在他回到德国，见到希特勒才有可能当面分辩得清。1927年1月，戈林在瑞典的托恩布拉德自动降落伞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不久他又获得了在德国销售的特许权。这样，戈林就要回到阔别3年多，令他魂绕梦牵的德国了。

戈林感到遗憾的是这次卡琳无法与他同行，因为日益严重的心脏病，卡琳被医生告诫，只能静养，不适于远行。当戈林乘坐的火车徐徐离开斯德哥尔摩车站时，卡琳倒在了她姐姐范妮的怀里，尔后被送到一家医院抢救。戈林和卡琳都以为这次是他们的永诀。

在一个寒风萧瑟的冬日，落拓潦倒、囊空如洗的戈林回到了柏林，没有人迎接，没有人问候。狼狈不堪的戈林思忖再三，决定去罗姆那里。尽管卡琳对戈林这位粗鲁并具有同性恋癖好的伙伴一直极为反感，但他实在无处可去，只能去投奔昔日的伙伴们。里希特霍芬中队的老兵们居然在戈林没有在场的情况下，借口戈林的战绩并没有得到证实，将他排除在老兵协会之外。罗姆将戈林安排到音乐家施特雷克那里。施特雷克让戈林睡在客厅的沙发上，每天早晨在女佣打扫房间之前起床。在施特雷克那里小住了几天之后，戈林才下决心动身与希特勒见面。

戈林第一次与希特勒见面，希特勒对他这位昔日的助手并没有表现出多少热情，只是劝他先在柏林的社交界站庄脚，其他问题以后再说。戈林在希特勒处仅仅呆了一会儿，希特勒就借口还有事情，将他给打发走了。戈林回到施特雷克那里，向主人表示了谢意，就在柏林的库菲斯腾大街的一家饭店租了一个房间住下。

在这一时间里，戈林与一位名叫保罗·克尔纳的年轻人交上了朋友。这是一个头脑简单的人，戈林只甲三言两语便赢得了他的好感和崇拜。此后，这位富有的花花公子便成了戈林的司机和秘书，他每天用自己的汽车将戈林送到各处去推销降落伞。纳粹党那里对戈林的到来仍然保持沉默，戈林似乎对回到纳粹党中已不像在瑞典时那样急不可耐。他在给卡琳的几封信中，都流露出要在平凡中了此一世的念头。卡琳透过戈林来信的只言片语敏感地意识到，她的这位郎君肯定又犯了毒瘾，否则不会这样自暴自弃。卡琳心急如焚，但又不能到德国去，因为她的心脏病越来越严重，医生告诉她，她的病情几乎已经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尽管在这种病魔缠身的情况下，卡琳对远在德国的戈林仍然关怀备至，并尽了最大的努力给他以帮助。她几乎每周都要给戈林写一封信，让他将情况如实地告诉她。戈林确实如卡琳所想的那样，他的毒痛又一次复发。虽然，戈林也曾为战胜毒魔做出过努力，但是他失败了。在他离开瑞典还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他又一次陷入可怕的深渊之中。9月，戈林回到了瑞典，再次因“滥用吗啡，每日剂量40~50毫克”住进隆布尔精神病院，接受戒毒治疗。

圣诞节前夕，戈林出院了。卡琳对戈林又是一番耳提面命，告诫他不能就这样认输，他必须与希特勒摊牌，让希特勒对他的事情真正重视起来。

1928年的1月，戈林又回到了柏林。尽管戈林此时仍以推销降落伞为职业，但他早已不把这项工作当回事。他密切地关注着即将开始的德国国会选举。

戈林在纳粹党即将提出候选人的前夕，突然来到希特勒的办公室，要求与希特勒谈话。希特勒似乎对戈林这个自己当年的追随者怀有一定的内疚之感，因此答应了他的请求。戈林开门见山地告诉希特勒，他要作为纳粹党的候选人参加竞选。希特勒先是不肯，对戈林推说，由于他离党的时间太长，恐怕党内其他的人不会同意。戈林说，他对纳粹党的忠诚始终没变，将他从党内除名是一些妒忌他的才干的小人摇唇鼓舌的结果。他不承认将他除名这一事实，因为他比现在一些身居高位的纳粹党人对这个党的贡献要大得多。他为这个党流过血，曾经为这个党花完了手中的最后一个芬尼。在纳粹党创业之初，是他戈林将大量的钱借给了党，党现在不但不还他的钱，反而将他排除在党外，这太不公平了！如果党对他真的如此不仁不义，那么，他从此以后将不再来找希特勒了，但是，党必须偿还自1922年以来所欠下他的每一个芬尼，否则，他就要上法庭，起诉纳粹党。希特勒见戈林怒目圆睁，口沫横飞，要跟他抗争到底，不禁也有些发憷。这并不是说他怕戈林对他怎么样，要知道他希特勒也不是一个省油的灯。但是真与戈林彻底闹翻，毕竟对他和纳粹党绝无任何好处。他也知道，戈林这个人的确是个什么都能干得出来的人。将他惹翻，真要是闹到法庭也是非同小可的。谁都知道，戈林曾经是他的冲锋队长，为他和纳粹党立下过汗马功劳，如果对他太不仁不义了，将使那些支持他和党内的一些与戈林有交往的人感到寒心。况且，现在戈林这人也不能说一点用处也没有，比起那个粗俗残暴、头脑简单的罗姆来说，戈林还算是一个有用的“人才”。希特勒又一想，此时如将戈林收服，在他最困难的时刻拉他一把，戈林这一辈子必将对自己忠心耿耿。况且早在与戈林相识之初，他就对此人颇有好感，否则又怎能在共事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对他委以重任。戈林见希特勒缄默不语，以为希特勒被他激怒了，不由得有些后悔，暗暗埋怨自己不该把话说得这么绝。不料，希特勒和言悦色地对他说，自己对戈林一向是很信任的，只不过这些年来，他没在国内，在有些事情上就不可能对他照顾得很好，希望他不要介意。至于党籍的问题，希特勒不承认已将他除名，希望他别自寻烦恼。至于他要当纳粹党的候选人这件事，也是可以办到的，但前提是纳粹党在国会中得有七个席位，如果真的有七个席位，戈林就能得到一个。戈林听罢，反而惊呆了，他没有想到，事情会这么容易。他马上为刚才的冲动、失礼向希特勒道歉。希特勒却拍着他的肩膀说：“你知道，赫尔曼，我是一直信任你的，你能回到党内，为我们的事业工作，我很高兴。”戈林此时对希特勒感激涕零，并对希特勒表示，他将永远忠于党和元首。希特勒笑了，他知道，他这次为戈林所做的一切，不久就会得到加倍的回报。

戈林欣喜若狂。他怎能不高兴呢？昨天他还是一个被那些势力小人踩在脚下的小人物，一夜之间，就成了一个深受器重的即将名利双收的大人物。戈林多少年来所孜孜以求的不正是这个目标吗？

回到寓所，戈林先给卡琳发去一封电报，告诉她这个好消息，希望在大选的时候，她能在他的身边。然后，他又昏头昏脑地四处打听，想找一个“符合身份的”公寓。卡琳接到戈林的电报后，立即启程赶赴柏林。5月17日，身患重病的卡琳来到了戈林的身边。卡琳一到，戈林就把她带到了他新租的

一个大公寓里，不无炫耀地将他与希特勒交锋的情况告诉了卡琳，在诉说中他又不由自主地流露出对希特勒的知遇之恩的感激之情。傍晚，戈林带卡琳到一家中国餐馆用餐。卡琳为她与戈林的团聚欣喜若狂。但她在欣喜之余，也不无担忧，她非常清楚自己的这位郎君的毛病，一旦有一点成功，就会得意忘形，所以又是一阵规劝。戈林对此不以为然，他固执地认为他的成功是个人的才干与魅力出众的必然结果。卡琳也知道，在这种时候，戈林是不会听进去任何劝告的。

自从 1924 年底希特勒出狱后，纳粹党的势力又有所恢复。尽管巴伐利亚当局禁止希特勒两年内在公开场合发表讲话，但希特勒却利用他的组织才能，在此期间大力扩充纳粹党的势力。与此同时，希特勒又向掌管巴伐利亚大权的总理赫尔德表示，他与他的纳粹党今后将循规蹈矩，不再以暴力为主要活动手段，纳粹党的一切活动都将按照宪法条文的规定进行。赫尔德信以为真，在希特勒获假释不久，就对纳粹党及其报纸解禁。赫尔德对他的下属说：“这头野兽已经被制服了，我们现在不怕放松铁链了。”却不知，他与当时的许多政治家一样，都被希特勒制造的假象欺骗了。希特勒在出狱后，首先整顿了党的内务，将一直对他的地位构成极大威胁的鲁登道夫开除出党。然后，制定了纳粹党今后的方针策略。在一次会议上，希特勒宣称：“我恢复活动以后，必须采取新的方针。我们将不再企图通过政变来取得政权，而是要捏着鼻子进国会，与天主教议员和马克思主义者议员打交道。哪怕在选票上超过他们要比在武力上压倒他们所花的时间更长，至少结果能够得到他们自己的宪法的保证。任何合法的事情的过程总是缓慢的……迟早有一天，我们会得到多数票——下一步就是得到德国了。”

在希特勒出狱后的 3 年里，纳粹党的成员人数每年都有大幅度的增长。到 1928 年，纳粹党的人数已达到 10.8 万人，到 1929 年，一下子就增至 17 万人。在当时的德国，纳粹党尽管仍然是一个小党，但是它的力量却在不断加强。许多大工业家和银行家对纳粹党也越来越感兴趣，大量的赠款源源不断地进入纳粹党的财务部门。而且，纳粹党纲领中的一些内容对于许多下层工人和农民还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得到了这些人的拥护。

戈林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重新开始他的政治生涯的。

1928 年，月 20 日，德国大选开始。在全部的 3100 万张选票中，纳粹党仅得到了其中的 81 万张选票。但这个结果于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来说，已经算是一个不小的胜利了。纳粹党提出的 12 个候选人全部当选。从此，纳粹党开始走上了通过合法途径夺取国家政权的道路。对于戈林来说，这更是天大的胜利！他再也不是一个无业的流浪汉、一个政治上的失败者，他现在是一个堂堂的德国国会议员了。再也不用为衣食无着而忧虑，再也不用对别人俯首帖耳，再也不必空怀政治抱负了。他又可以在铺着红地毯的豪华的饭店里就餐，更重要的是又可以尽情地施展自己的才能了，可谓“英雄”有了用武之地。面对着突然降临的一切，戈林如同走进了梦境一般，只有身边的卡琳的忠告才能让他发热的头脑稍微降一下温。

戈林迅即尝到了实际的好处。作为纳粹党的议员，他自然备受实业界的青睐。拜尔发动机厂的老板和亨克尔财团的董事长请他担任了“顾问”，每月戈林都可以从他们那里得到一大笔酬金。钢铁大王弗里茨·克尔纳在他担任国会议员不久，便命人送来了新公寓的装潢用品和新式的家具。但戈林并未满足，他向受雇的汉莎航空公司要求，在柏林专为他设一个办事处，同时

支付一直对他忠心耿耿的保罗·克尔纳的工资。同时，他还雇佣了一个一流的秘书。开设办事处不到一年，汉莎公司的财务部门就发现戈林议员用去了公司的5万马克。汉莎公司的老板米尔希此时已成为戈林的密友，他经常带着钱来找戈林，在戈林的地下车库将钱交给他。以上这些已很丰厚的收入，还不包括国会每月发给他的500马克的薪水和作为党的讲演者由纳粹党支付的800马克的酬金。

戈林实在太忙了。卡琳在一封给她母亲的信中抱怨说：“我很少见到赫尔曼，每天一大早他就到办公室上班。我很少与他在一起吃午饭。他大多数是与许多邀请来的人或一些不速之客在一起用午餐。后来，他又开始组织一些展览会和各种委员会，更没有时间与我在一起了……每天后半夜的2、3点钟他才回到家中。噢，忘了告诉您，德国国会还没有开会呢……”

戈林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他是纳粹党的议员。在捞到钱财的同时，他到处演说，发展新党员。卡琳在日记中写道：“今晚他在柏林大学向各党派发表讲话，其中半数以上的听众是纳粹党员。我希望他有办法能把剩下的人全部拉过来。明天他还要到纽伦堡讲演。然后他去东普鲁士作为期10天的演说。今天家中挤满了政客。”

希特勒很快便发现了重新起用戈林的好处。他的经历、口才和风度，他的有着伯爵身份的妻子，对于完成希特勒所交给他的扩大纳粹党的影响和招收新党员的工作来说，真是再合适不过了。对于戈林的那种不要命的工作劲头，希特勒更是欣赏。由于在国会中戈林与共产党议员的斗争，在德国的大资产阶级的圈子里，他的影响明显扩大。其他纳粹党的议员对戈林的口才和“战斗精神”都很佩服，自愧弗如。鲁尔的煤炭大王威廉·腾格和钢铁大王蒂森与戈林的交往更是非同一般。见到这种情况，为了进一步拉拢戈林，汉莎公司的老板米尔希居然一次性付给戈林10万马克，作为本届国会结束前该公司的“顾问费”，以帮助戈林“登上更显赫的社会地位”。

戈林尽管是纳粹党的议员，但他从来也没有担任过纳粹党的党内职务。然而，凡是党内最重要的会议和决策，希特勒都要戈林参加。戈林对希特勒的赏识和重用感激不尽，更加卖命地为纳粹的壮大而工作。他白天在下层平民区中进行蛊惑人心的演讲，晚上又带着卡琳周旋于上流社会之中。戈林的工作收效极大。许多名门贵族的成员，在戈林的劝说下，都成了纳粹党的成员或是纳粹的同情者。戈林又凭借其战时的关系，在军队中也发展了许多新党员。就连霍亨斯陶芬王朝的奥威王子和艾特尔·弗里德里希也成了纳粹党的成员。奥威王子与戈林的关系极为密切，这位王子居然穿着冲锋队上校的服装，陪着戈林，到处进行下一届的国会竞选演说。

戈林的演说很有市场，有时候听众竟达到二三万人。他的富有煽动性，但缺乏条理和理性的演说，对于那些文化层次较低的听众来说，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他们对戈林的演讲风格似乎非常欣赏，对他所谈的道理，似乎更容易接受。戈林的演说每每以“我们将击败我们的对手”结束，听众对他这句牛吼般的结语，通常都报以热烈的掌声。在演讲时，戈林喜欢穿纳粹党人的流行装——褐色的衬衫，并将他钟爱的勋章“蓝色马克斯”挂在皮领带上。他好像不知疲倦，马不停蹄地奔走于法兰克福、普劳恩、曼海姆、马格德堡等地进行演说。在大选日益临近的日子里，戈林的演说充满了火药味，以至引起了警察的注意。8月8日，一位警察向其上司报告，戈林在慕尼黑科罗内马戏团剧场的演讲中，恶语中伤魏玛宪法和政府。这个警察在报告中写道：

“他把外交部长叫做库丘斯那家伙，将内政部长称作是一匹跑得最慢的马。至于国防部长馥勒将军，他则讽刺说，迄今为止，格勒将军的战斗经验，只不过是从小桌子走到另一张桌子。”

由于劳累过度，卡琳又病倒了。戈林将她送到泰根湖畔的巴特克罗伊特的医院治疗，自己则带着来德国探望母亲的小托马斯，到处奔忙。

1929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给纳粹党又一次带来了发展的绝好机会。自1924年以来，由于美英对法国的对德政策日益不满，各战胜国之间的矛盾加深。为了缓和矛盾，美英提出了关于德国赔款的“道威斯计划”。这一计划的主要内容是由各主要战胜国帮助德国实行货币改革，平衡预算，恢复德国马克的信用；规定德国每年偿付赔款的数目；法国和比利时从鲁尔撤军，由美国和英国向德国提供8亿马克的国际信用贷款，用以帮助德国恢复经济，以保证战争赔款的偿付。在国际贷款之外，各战胜国在1924年至1929年，给德国的各种形式的贷款和投资已达326亿美元。正是在美英的帮助之下，德国的经济很快恢复和发展起来。到1928年，德国的重工业生产已经超过了一战前的水平。到1929年，其工业生产能力已经超过了英、法两国。德国的经济一时出现了“繁荣”的景象，广大工人的生活也相对稳定起来。但是，德国的这种经济繁荣毕竟是建立在依靠外国资本的基础之上，因而也极容易为世界市场和国际经济所左右。与此同时，德国的垄断资本迅速发展起来。到1929年底，拥有500万马克的大企业占全德企业资本总额的40.4%，一些规模巨大的托拉斯和康采恩形成。受《凡尔赛和约》和“道威斯计划”的束缚，这些大企业在不同程度上都要受到外国资本的压制。大资产阶级越来越渴望能摆脱《凡尔赛和约》的束缚，扔掉赔款的包袱，同时也对魏玛共和国政权在对战胜国的赔款问题上的软弱态度越来越不满。尤其是鲁尔的大资产阶级，他们对在法、比入侵鲁尔地区时，魏玛共和国所持的妥协立场，更是耿耿于怀。他们对国内日渐高涨的由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更是怕得要命，却又无能为力，他们将这一切的出现都归于共和国政府的无能。

1929年10月24日，美国纽约股票市场的股价暴跌，旋即引起了信用恐慌和金融危机。由美国的市场崩溃开始，一场波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爆发。德国的战后经济由于完全是在依靠外国资本贷款和投资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在这场经济危机中首当其冲。德国的工农业生产一蹶不振，整个国民经济完全崩溃。成百万的工人失业，成千上万的中小企业破产。到1929年末，德国的失业人数已达到了600万。当希特勒望着办公室窗外由于恐慌而茫无目的奔走的人群时，当看到街上为等候购买几片面包竟要排上几千米长的队伍时，竟然笑了起来。尽管他不知道这一次经济危机是如何发生的，因为他从来都不是一个经济学家。但他的确是懂得利用任何一次机会的政治家。希特勒在极端恶劣的经济形势中，看到了自己政治前程上的光点。他激动不已，简直可以称得上狂喜了。在给《人民评论》报撰写的文章中，他居然这样写道：“我一生之中从没有像这些天这样的舒坦过，内心从没有像现在这样满意过。因为残酷的现实打开了千百双德国人的眼帘，使他们看清楚了欺骗人民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史无前例的欺骗和背叛行为。”他要利用这个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将德国人民对现实的不满和怨恨变成他能够利用的力量。

为了抓住经济危机所造成的机会，纳粹党大大小小的头面人物都出动了。为在即将开始的大选中从其他党手中夺得选票，纳粹在全国各地举行了

无数次集会和演讲大会。成千上万的失业工人和破产的中产阶级，此时对纳粹的宣传感到十分悦耳，表现出从未有过的狂热。于是，戈林更忙了。他到处宣讲纳粹动听的诺言——如果纳粹上台，希特勒就将使德国摆脱贫困，恢复强大和繁荣；将拒付该死的战争赔款，撕毁《凡尔赛和约》；肃清贪污，迫使金融巨头们（特别是犹太人）就范，让他们吐出一定数量的财富，帮助那些穷人；纳粹上台就意味着每一个德国人都有工作和面包。在当时德国经济一片混乱，人民生活异常艰难的情况下，纳粹的许诺无疑是很有蛊惑力的。希特勒也亲自上阵，他的演说充满魔鬼般的煽动性，对于那些刚刚达到选举年龄的年轻人来说，更是有着极大的诱惑力。

希特勒仍没有忘记那位远在意大利的法西斯运动的先哲墨索里尼。在关键时刻，他派戈林又一次出使意大利。戈林尽管对那位意大利法西斯头子仍耿耿于怀，但他不能在希特勒面前表现出对墨索里尼的反感，因为有关他第一次出使意大利失败的真相，希特勒还一无所知，一直被蒙在鼓里。

戈林这次出使意大利的境况已今非昔比。意大利国王将戈林夫妇捧若上宾，每天晚上都请他们坐在墨索里尼或国王的包厢中观看歌剧，出入则由意大利政府提供专车。墨索里尼对戈林的态度也与上次截然不同，他对戈林表示热诚的欢迎，并几次与他进行了会谈。卡琳在日记中称，戈林在意大利“见到了教皇和几乎所有的梵蒂冈要人”。但实际上，罗马教皇根本就没有见戈林，只是派了一个低级官员朱塞佩·皮扎罗与他见了面。戈林在意大利逗留了3个星期，回来后给希特勒带回了墨索里尼的问候和亲笔签名的照片。这次意大利之行，终于使戈林山了一口积在胸中几年的闷气，同时也使他对意大利人的势利、对世态的炎凉，有了更深切的体会。

戈林和他的同伙们四处摇唇鼓舌，紧锣密鼓地为取得大选的胜利作准备，而且形势也对他们越来越有利。

1930年9月14日，大选结果揭晓，纳粹党大获全胜。纳粹党的头目们都目瞪口呆了。就连希特勒也没有想到会出现这样的结果。纳粹党在两年前仅得到81万张选票，在国会中得到了12个席位。但这次选举，纳粹党居然得到了649万多张选票，这样纳粹党就可以在国会中取得107个席位。在大选开始的时候，希特勒预计纳粹党得到的选票可能会增加3倍，在国会中可以得到50个席位。可结果却是不敢企求的奇迹发生了，纳粹党由在国会中排名第九的最小的党，一跃成为排名第二的大党，这样的结果怎能不令纳粹党徒喜出望外！

希特勒在惊喜之余，也有不开心的事，那就是共产党的势力也在增长，它的选票也由326万张增至459万张，在国会的席位增至77个。他意识到尽管在纳粹党夺取政权的道路上障碍重重，但对纳粹党来说，那些软弱无能的中产阶级的政党，此时已对他构不成真正的威胁，只有共产党才是纳粹的最有力的竞争对手，击败共产党仍是纳粹的头等重要的任务。

通往政权的道路已经开通。但希特勒深知，最后要在德国的政治舞台上站住脚，还得靠枪杆子——军队。而德国陆军对纳粹的态度一直让希特勒忧心忡忡。直到1927年，德国陆军还在军内颁布了一个禁止征召纳粹党人参加军队的命令。此后，又下达了一个禁止纳粹分子在军火库和兵站从事文职工作的指示。但是到了1929年，经过多年的努力，纳粹在军队中的影响已经有所扩大，尤其是一些年轻军官，他们对纳粹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它宣称的恢复德国军队往日的强大和荣誉尤为感兴趣。因为受《凡尔赛和约》的限制，



德国的军队只能保持在区区 10 万人的数目之内,对于那些日夜渴望荣誉和提升的年轻军官来说,前途只是一句空话。希特勒早已注意到这一事实,并决心将纳粹的影响扩大到军队的上层。1929 年 3 月 15 日,希特勒曾经就德国军队对德国纳粹党的态度发表过一个讲话,他在这个讲话中,极尽拉拢之能事。他说:“从事破坏的政党是没有前途的,拥有人民的力量、准备和愿意同陆军联合起来,以便有朝一日协助陆军保卫人民的利益的政党才有前途。而在另一方面,我们至今仍看到我国陆军的军官还在煞费苦心考虑能与社会民主主义合作到什么程度。可是亲爱的先生们,难道你们真的相信,你们同那个以促使陆军赖以存在的一切基础归于解体为宗旨的哲学有任何共同之处吗?”

他还别有用心地说,军队现在所支持的共和国,就是导致德国军队在战场上失败的主要责任者,就是它在背后戳了陆军一刀,使德国军队沦落到如此地步,使德国军人在世界面前丢了脸。他还警告说,如果纳粹党被马克思主义党战胜了,那么,“对于德国陆军,你们就可以与下:‘德国陆军的末日’。因为到了那一天,先生们,你们就必须成为政治的工具……你们到了那时就可能成为那个政权和政治委员的刽子手,如果你们不听话,你们的妻儿将被囚禁。如果你们不听话,你们就会被一脚踢开,也许站在墙前就刑……”

针对纳粹党在军队中的影响日益扩大的情况,担任国防部长的格罗纳将军于 1930 年在军队中,又发布了一个类似于 1924 年西立克将军的警告的谈话。他说,纳粹党一心想夺取政权,“因此而讨好国防军,他们只是为了利用国防军来实现他们夺取政权的政治目标,他们企图让我们相信,只有纳粹党才是代表真正的民族力量的政党”。他还要求,德国军队必须超脱于政治之外来为国家服务。

但是,许多下级军官对格罗纳的禁令置若罔闻,依然参与政治活动,并与纳粹分子打得火热。

1930 年春,乌尔姆的三名年轻军官由于在军营内宣传纳粹的理论,并劝说其他军官在纳粹起事时,不要向纳粹党人开枪,被军事法庭起诉。但是三名军官中的施林格中尉却将他们的事情写成文章投到《人民观察家报》,从而使格罗纳将军不将这件事传到军队外的打算落了空。同年 9 月,莱比锡的最高法院对这三名年轻军官以叛同罪公审。两位著名的纳粹律师汉斯·弗朗克和卡尔·沙克博士为这三名军官进行辩护。这件事引起了社会各阶层的广泛注意。在法庭上,最引人注目的不是三名被告,也不是律师,而是作为证人出庭的希特勒。证人席成了希特勒向全国宣讲的论坛。希特勒在发言中,充分施展了他的巧舌如簧的演讲才能。他向军队和法庭保证,纳粹党从来就不反对德国的军队。他说:“我一直就抱有这样的看法,任何要想取代陆军的尝试都是发神经病,我们没有一个人想取代陆军……”

我们将努力做到,在我们执政之后,以目前的国防军为基础,一支伟大的德国人民的军队将会兴起。”他还再三向法庭解释,纳粹并不想进行什么武装叛乱,只想通过合法的手段来取得政权。这三位军官如果期望纳粹进行什么武装叛乱的话,这是他们自己理解上的错误。言外之意,这起事件与希特勒及纳粹党没有任何关系。在被告席上的三名军官闻听此言,几乎惊呆了,就连参加旁听的一些纳粹的中坚分子也糊涂了。这番话与“元首”平时所说的话完全不一样,简直就像另外一个人在讲话。而戈林却对希特勒的话佩服

得五体投地，因为这正是戈林多少年来心中一直想说的话。然而，没人知道，希特勒的话并不是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只不过是一个精彩的谎言。他的这番话虽然是对在场的人说的，可他心中的听众却是大多没有出场的德国军队中那些一直对他和纳粹党抱有敌意和戒备心理的上层军官。为了达到目的，出卖几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又有什么可惜的呢？

同时，希特勒也明白，弄不好，上面那番话也会使他失去一大批党内要求采取暴力行动的党徒的支持。因此，他趁法庭庭长询问他在 1924 年啤酒馆政变时所说的“让人头落地”的话，与今天的话是不是有些矛盾时，希特勒向法庭庭长说：“我可以向您保证，当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取得胜利的时候，届时将会有一个国家社会主义的法庭。那时 1918 年 11 月革命的罪人将会受到报复，人头将会落地！”在场的纳粹分子们对希特勒的这番话报以长时间的热烈的掌声，以至庭长不得不对希特勒发出警告。但是包括庭长在内的法官们却没有一个人对希特勒的话提出异议。在庭长问到他所说的民族革命是什么意思时，希特勒说：“这仅仅指的是，拯救我们今天被奴役的德意志民族。德国的手足受到和约（指《凡尔赛和约》）的束缚……纳粹党并不认为和约就是法律，而是用强制的办法加在德国身上的东西。如果我们尽一切力量反对这些条约，我们就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希特勒的话使在场的一些陆军军官感到十分满意，因为这是自《凡尔赛和约》签订以来，一直深藏于他们内心的想法。许多军官甚至在想，原来我们误会了纳粹党人，他们竟是我们的同路人。这次法庭审判，由于希特勒的证词，三名青年军官被以叛国罪判处了一年半的徒刑。希特勒却大获全胜。自此，德国军官们对纳粹党的态度大大转变。正如后来担任纳粹德国最高统帅部作战局长的约德尔将军。在纽伦堡审讯中谈到这件事时说：“在此以前，高级军官都认为希特勒企图破坏陆军，而在此以后，我们就放心了。”那位在啤酒馆政变时主张全力镇压，并将之付诸行动的西立克将军，在 1930 年当上国会议员后，开始公开与希特勒合作，在 1932 年，他还让其姐姐在总统选举投票时，不要投他的老上司兴登堡的票，而投希特勒的票。

在希特勒用巧妙的手法将军队的上层人物安抚往之后，他的下一个目标就是要使德国大资产阶级完全成为他的支持者。这个任务早在两年前他就已经布置给戈林了，并且收到了满意的结果。现在，他要亲自出马，当然，也要借助戈林夫妇建立起来的广泛的社会关系网。他在莱比锡审讯案结束后，立即把戈林找来，两人就广泛争取实业界的支持的问题谋划了一番。此后，戈林穿针引线，先后为希特勒介绍了一批各个行业的巨头，其中有德国的煤炭业大王寇道夫，钢铁大王、戈林的密友蒂森，德国联合钢铁公司的董事长伏格勒以及一些大公司的主要股东和银行家。一些开始对纳粹党并不感兴趣的工业巨头，在此后不长的一段时间里，在戈林和希特勒的努力争取下，也投入了纳粹的怀中，如德国的大电气公司西门子公司和通用电气公司的老板和军火大王克虏伯等人。尤其是克虏伯，他在最初是激烈反对纳粹党的人，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用钢铁大王蒂森的话说，他就变成了一位“超级纳粹”。这些人手中的金钱开始源源不断地流入纳粹的金库中，成为纳粹夺取德国政权的主要经济支柱。

这就是 1929 ~ 1930 年德国纳粹党为夺取德国政权所采取的主要策略和作法。在这一系列事件中，戈林始终跟在希特勒的后面，以其所有的能量和手段，推波助澜，不时地掀起一阵阵浊浪。

话说戈林在 1930 年 9 月的大选中，为希特勒和纳粹党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大选结束后，纳粹党作为第二大党，需要推选一个在国会中的发言人，希特勒为了酬谢和报答戈林，将这一美差给了戈林。这对戈林来说，虚荣心可谓得到了极大的满足。10 月 31 日，德国国会开会，戈林作为纳粹党的首席议员，走在 107 名一律身穿褐色衬衫的纳粹党议员的前面，然后在副发言人的座位上就坐。当天晚上，纳粹党的头面人物在戈林的寓所举行了庆祝活动。在酒席上，戈林踌躇满志，志得意满，仿佛整个世界都伏在了他的脚下。

这时的戈林唯一感到美中不足的是卡琳每况愈下的身体状况。在戈林的政治生涯中，卡琳是他不可缺少的助手。戈林同上层社会的每一个关系，几乎都是卡琳帮助他建立的。在戈林家中的每一次晚宴中，卡琳都强支病体，扮演着一个出色的主妇的角色。但在每次晚宴过后，卡琳几乎都像要死去一样。终于在圣诞之夜，卡琳在打开戈林送给她的礼物时，突然晕倒。在此后的几天里，她一直昏睡不起。

纳粹党的命运又处在重要的关口上，戈林只好硬着心肠不管卡琳的身体。纳粹党与共和国领导和共产党以及其他中产阶级党派的斗争日趋激烈，戈林在此时不能有丝毫的懈怠。虽说陆军和实业界已经对纳粹表示了一定程度的支持，但谁又能保证他们不会像 1923 年那样冷酷无情，那样说翻脸便翻脸呢？纳粹已成为各政党中的第二大党了，希特勒要趁热打铁，以实现在下届国会选举中击败所有的政党，使纳粹成为第一大党，并夺取国家政权的目标。到那时，谁对纳粹党都无可奈何了。

这时，在国会中，各政党为了维护自己所代表的那一社会阶层的利益，或互相攻讦，或讨价还价。为了尽快结束这种局面，陆军中的实权人物、具有极大政治野心的施莱彻尔将军，不顾德国军队一贯奉行的超然于政治之外的原则，利用兴登堡总统对陆军的信任，说服他任命海因德里希·布鲁宁担任总理。而布鲁宁在政治上是一个十足的庸才。他上台之后，竟然企图废除 1932 年的大选，争取议会的多数票使年迈的兴登堡总统连任，在总统百年之后，让霍亨索伦王朝复辟。他自认为这一“妙招”将使企图利用合法手段夺取政权的纳粹党一筹莫展，也可结束日益混乱的政治局面。但他的如意算盘刚一打，就遭到总统兴登堡的激烈反对，兴登堡甚至不听布鲁宁讲完，就立即下令逐客，声称再也不愿见到他。他们虽然互相不满，但对希特勒却一致抱有敌意。布鲁宁上台后不久，曾约见希特勒，戈林陪同希特勒前往会面。布鲁宁请纳粹党支持兴登堡连任，希特勒旁顾左右而言它，使布鲁宁认定希特勒将不会支持他的计划。随后，希特勒在戈林的陪问下与兴登堡总统会谈。希特勒这时刚从他的恋人吉利·拉包尔（希特勒的外甥女）自杀事件的打击中恢复过来，在与这位年迈总统的会谈中，心不在焉、言不及意，对老总统大谈纳粹党的目标以及德国的崛起之类的空论，给兴登堡留下了很坏的印象。会谈结束后，兴登堡对施莱彻尔说，“这个‘波希米亚上士’也许可以当一个邮政部长，但决不能当总理。”希特勒后来的所作所为使这位自命不凡的老总统不得不承认自己的确将希特勒看低了，也不得不收回自己说过的话。这是后话。

希特勒会见布鲁宁之后，马上就命戈林带着卡琳去荷兰拜访流亡的皇帝和皇后。尽管旧王朝复辟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尽管希特勒也不希望出现这种情况，可为了预防万一，希特勒还是留了一手，让戈林夫妇在布鲁宁之前，抢先拜访皇帝，以为在日后可能出现的局面中占据主动，埋下一个伏笔。

皇帝对戈林的拜访似乎很高兴，但是也对纳粹党的行为进行了激烈的抨击，戈林不得不费了大量的口舌为纳粹党辩解。卡琳在一封信中回忆说：两人后来“似乎争吵起来。双方都很容易激动，在很多方面都很相象。皇帝除了他自己的意见之外，可能没有听过别人的意见，赫尔曼要想说服他，恐怕有点太难了”。临走时，皇后将一个装有一大笔现金的信封交给了卡琳，让她到西里西亚的阿尔特海德疗养院去休养。卡琳对皇后的举动万分感激，戈林却不以为然。

回到德国后，卡琳在家中又一次昏倒。戈林急忙命人将她送到医院抢救。病中的卡琳看起来好像已经死去了。医生既找不到脉搏，也听不到心脏的声音。戈林在医院中向医生苦苦哀求、请他们救活卡琳。医生在给卡琳注射强心剂的时候，告诉戈林，他们对救活卡琳已没有什么信心。戈林听完后，绝望地跪倒在地上。但是卡琳却奇迹般地又活了过来。戈林在卡琳病情稍见好转之后，将她送到阿尔特海德疗养院去疗养。

戈林知道卡琳要想完全康复已经不可能了。他抓紧时间，用希特勒送给他的新梅塞德斯轿车，拉着卡琳周游了德国和奥地利的许多地方。9月25日，卡琳的母亲病逝。卡琳在参加完母亲的葬礼的第二天，终于倒下了。戈林接到电报后立即赶到了斯德哥尔摩，每日守候在卡琳的病榻前。可他很快又接到了希特勒让他马上赶回柏林的电报，戈林进退两难。5天后，他只得忍痛离去。10月17日清晨，戈林回到家中，马上给斯德哥尔摩的医院打电话，询问卡琳的病情，接电话的护士告诉他，卡琳已经在当日凌晨4时10分去世。

戈林悲痛欲绝，也悔恨不已，在卡琳最需要他的时候他却不在她的身边。当天，他在他的哥哥的陪同下，踏上去斯德哥尔摩的旅途，去同卡琳诀别。托玛斯看到他的继父跪在他母亲的棺材旁哭泣。将卡琳安葬后，戈林回到柏林，封掉了他们在巴登舍大街的公寓，搬进了希特勒在凯撒霍夫饭店租用的办公室。

正是：否极泰来逢转机，乐极悲生遇不测。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 第五章 国会议长

旧情未断新缘续，一波未平一波起；  
政治风云多变幻，推波助澜设诡计。

安葬了卡琳之后，戈林将他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之中，以准备在即将到来的新的政治风暴中一显身手。这时，柏林的政治局势更加恶化，希特勒与布鲁宁政府的冲突更加激烈。布鲁宁本来想拉拢纳粹党，但不料希特勒根本就不买他的帐，更不同意他提出的让兴登堡连任的想法。

1932年1月7日，施莱彻尔与布鲁宁约请希特勒会谈。布鲁宁再次提出让兴登堡连任的要求，但同时也放出了一个诱饵，表示愿意向兴登堡提请由希特勒出任总理。希特勒没有立即作出答复。希特勒在与戈林磋商之后，决定破坏布鲁宁的计划，然后参加总统竞选。希特勒略施小计，便使兴登堡如想继续担任总统，除了参加竞选外，别无他路。

1932年2月15日，兴登堡总统宣布将再次参加竞选。2月22日，希特勒宣布，他将作为纳粹党的总统候选人参加竞选。

在大选开始之前，戈林向希特勒请了假，要求去地中海的卡普里岛疗养一段时间。希特勒也知道戈林伉俪情深，卡琳死后，戈林一直郁郁不乐，无法排解忧伤之情，因此准了他的假。在卡普里岛，戈林百无聊赖，突然想起过去在魏玛认识的女演员埃米·宗内曼。戈林对她一开始就颇有好感，听说现在她已与丈夫分居，两颗孤寂之心正好可以互相慰藉。于是，戈林旧情复萌，迫不及待地同埃米见了面。埃米是一位典型的金发碧眼式的美人，她头脑简单，不谙政治，在与戈林第一次见面时，竟将戈林与戈培尔弄混。见到她不久，戈林又设法在魏玛安排了他们的第二次见面。

不久，埃米便成为戈林的情人。

在与戈林共同生活的日子里，埃米极大度地容忍了戈林对卡琳的一片深情。戈林送给埃米的第一件礼物居然是卡琳的一张照片。在戈林新租的公寓里，埃米发现戈林将一间屋子辟作卡琳的纪念堂，将卡琳曾经用过的白色小风琴和卡琳的一些绘画放在里面。家中的管家仍然是卡琳的老管家瓦霍维亚克。在埃米住进戈林的新公寓的第一天晚上，戈林举行了一个盛大的晚宴。在晚宴上，埃米见到了许多纳粹党的要人以及其他显贵，其中还包括皇帝的侄儿、黑森的菲利普亲王和他的兄弟克里斯托夫亲王。性情温和的埃米对晚宴的盛况非常满意，也不由得对戈林多了几分敬佩。

休假回来后，戈林又重新加入了帮助他的元首竞选总统的阵线，投身到一场政治混战之中。开始的形势对纳粹党并不是很有利，支持兴登堡的一派势力强大。但希特勒自有手下的一大批干将为他效力，局面很快便有了变化。希特勒利用兴登堡和陆军实力人物施莱彻尔与总理布鲁宁的矛盾，先是迫使主张解散纳粹冲锋队的国防部长格罗纳辞职，尔后，又使布鲁宁下台。在布鲁宁下台后，一位在政治上毫无建树且声名狼藉的政客弗朗茨·巴本被兴登堡任命为总理。巴本组织的内阁，被时人戏称为“男爵内阁”，其中有5个部长是贵族，2个是大公司的董事长。巴本上台后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履行与施莱彻尔及希特勒达成的协议，废除解散冲锋队的禁令并解散国会。此后，竞选几乎变成了一场内战。被解禁的冲锋队员到处不择手段地破坏其他党派，尤其是共产党的集会和竞选活动，并不惜大打出手。他们的挑衅受到了

激烈的回击。从6月份开始，仅在普鲁士一邦，就发生各种形式的流血事件461起，死伤480多人，仅7月份，在冲突中死亡的人数就达82人，其中38人是纳粹党徒，30人是共产党人。

7月31日举行的国会选举是近5个月以来的第三次选举。在前两次选举中，没有一个政党能获得绝对多数的选票。纳粹党在这次竞选中投入了更多的力量，千方百计地争取选民的支持，经过全力拼搏，其支持者的人数确有大幅度的提高，这次大选的结果证明，纳粹党取得了自从参加大选以来的最大的一次胜利，总共获得了1374.5万张选票，在国会中占有230个席位，一跃成为国会中的第一大党。共产党的选票也有所增加，他们在国会中的席位增加了12个，共有89个席位，成为第三大党。希特勒发自内心地高兴，为纳粹党空前的胜利高兴，但高兴之余，又不无遗憾。在所有政党中，纳粹党尽管得到的票数最多，但也只不过得到占全部票数的37%的选票，这离要夺取政权所必须拥有的绝对多数的选票还有一定的距离。兴登堡只打算让希特勒担任副总理，而不是总理，同时打算让戈林担任普鲁士内政部长。戈林倾向于接受兴登堡的建议，但希特勒一口回绝了。

13日，戈林陪着希特勒再次去见兴登堡，兴登堡仍不肯让步，还教训了希特勒一番。

戈林同希特勒一样，虽然有些遗憾，但并不感到绝望。果然，机会很快又来了。8月30日，中央党和纳粹党一同推举戈林为国会议长。

戈林作为第一个纳粹党议长，在9月12日复会的国会上主持了会议。这次，戈林充分利用了自己手中的权力。

此时，总理巴本与纳粹党的冲突更加明朗化了，希特勒在得知共产党将在议会上提出对巴本及其政府进行弹劾的动议时，马上指使戈林和其他纳粹党议员在12日的会议上投共产党的票。虽然与共产党合作，希特勒感到有些不舒服，但他明白现在还不是与共产党摊牌的时候，纳粹党的首要目标是取得政权。巴本也得知了将被弹劾的消息，他加紧活动，从兴登堡总统那里得到了解散国会的命令。针对这种情况，希特勒与戈林策划后，决定让戈林利用其议长的职权，在程序上玩点花样，即在巴本没来得及宣布解散议会之前就将他推翻。戈林果然不负使命。在会议召开的那天，共产党议员首先对内阁提出不信任案，对巴本提出弹劾。这时，巴本急忙站起来，准备宣读总统解散国会的命令。对其后的情景，戈林后来回忆道：“我当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所以我赶紧宣布进行分组表决。巴本发狂地想引起我的注意，但我故意装作没有看见，对代表们说：先生们，现在开始表决。巴本将解散国会的命令扔到我的面前，我看到了上面总统和巴本两人的签字，但我把文件扣了过来，告诉巴本说，总理先生，没有办法，你得等一等，投票结束了再说。”在随后的不信任投票中，巴本仅得信任票42张，而不信任票却有513张。宣布完投票结果，戈林才拿起兴登堡签署的文件宣读起来，并说：这是一个被合乎宪法的多数表决否定的文件，因而没有任何效力，这番话引起在场的代表哄堂大笑。兴登堡对戈林在国会中玩弄权术和近乎恶作剧的行为极为不满，他越过戈林，发布总统令解散了国会，巴本仍然担任总理。戈林由于其所作所为，在纳粹党和上流社会中声名大振。他不断地应邀出席一个又一个的宴会和狩猎聚会，成为备受青睐的客人。

戈林春风得意，希特勒的日子却不好过。由于国会被解散，新的国会的选举定于11月6日举行。纳粹党由于上次在国会会议中与共产党一起参与了

对巴本的倒阁，在新的一轮国会选举中，许多原来支持纳粹党的大资本家和金融家转而支持巴本。戈培尔在他 10 月 15 日的日记中提到此事说：“钱越来越难弄。‘有财产和有教养’的先生们转而开始支持政府。”他在 11 月 1 日的日记中写道：“经费短缺成了我们的长期病痛。我们没有足够的经费来进行一次真正大规模的竞选活动。许多资产阶级人士被我们所参加的罢工（指 10 月末纳粹党与共产党一起举行了一次反对巴本内阁的运输工人的罢工）所吓退。甚至我们党内的许多同志也产生了怀疑情绪。”果不其然，在 11 月 6 日的选举中，纳粹党失去了 200 万张选票。尽管它还是国会中最大的党，但席位却减少了 34 个。共产党反而增加了 11 个席位。这对纳粹党不能不说是一个打击。

0074 巴本趁此机会，又给希特勒写了一封信，约他一起讨论当前形势。希特勒在给他的复信中，又一次提出了许多他不能接受的条件，巴本只好再次放弃了与希特勒合作的打算。

纳粹党的经费越来越紧张。在此关键时刻，希特勒又派出了他最得力的干将戈林，去意大利筹措经费。意大利的独裁者这次满口答应提供经费，帮助德国纳粹渡过难关。

巴本的无能使一直对他寄予期望的施莱彻尔感到十分失望，他在巴本正在为纳粹党最近的失败和自己重新担任总理而得意的时候，突然向兴登堡提出，巴本必须下台，因为他不可能自由灵活地与议会中的各个党派，特别是最大的政党纳粹党打交道。施莱彻尔还提出，巴本下台后，需要组织一个依靠总统紧急法令维持运转的总统内阁。

11 月 7 日，巴本内阁全体辞职。尔后，希特勒急忙将正在罗马筹措经费的戈林召回，派他作为自己的私人代表去与兴登堡讨价还价。

不久，兴登堡和施莱彻尔将希特勒和戈林请去，又一次进行谈判。兴登堡向希特勒提出了两个解决问题的方案，一是由希特勒担任总理，但他必须拿出一个具体的政纲，并在国会中得到多数票的支持。第二个办法是由巴本继续担任总理，由希特勒担任副总理。第一个方案希特勒根本无法办到，因为民族党和共产党都不会支持他，这就使纳粹党的任何政纲都不可能在国会中通过。第二个方案更是希特勒所无法接受的。接着，希特勒也提出了他的条件，那就是在总统内阁中担任总理。而这一条件，正是兴登堡所不愿接受的，兴登堡认为，与其这样，还不如由他的朋友巴本担任总理更让他放心。巴本得知兴登堡的意思后，十分高兴，并颇有信心地认为，自己将会再次被任命为总理。然而，他不知道施莱彻尔心中打的是什么算盘。在 12 月 1 日与施莱彻尔一起去晋见兴登堡时，巴本给老总统滔滔不绝地讲了一番他的计划——由他继续担任总理，不去理睬国会，等修改了宪法以后再说。巴本正说到兴头上，话被施莱彻尔打断。施莱彻尔说，这样做是违反宪法的。巴本反唇相讥说，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在前朝，俾斯麦就曾这样做过。应该把全国人民的利益放在维护宪法之上。施莱彻尔则说，既不要使全国混乱，又可以不违反宪法的办法是可以找到的，他本人就可以做到，但前提是他必须担任总理。施莱彻尔的话使兴登堡与巴本都大吃一惊，因为他们从没想到施莱彻尔有要担任总理的念头。施莱彻尔又说，由他组阁，他可以得到国会中的多数票的支持，他可以使以施特拉塞为首的 60 名纳粹党的议员脱离希特勒。除了这批纳粹党分子之外，他还可以得到中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的支持。兴登堡在听完施莱彻尔的话后，几乎呆住了。但他很快便反应过来，立即对

巴本说，你去准备组织政府吧。现在轮到施莱彻尔吃惊了，他站起来一言不发地走了。在门口，他对巴本说了一句马丁·路德在前往沃姆斯帝国议会时说的话：“小僧侣，你选择了一条困难的路。”这条路究竟有多么困难，第二天巴本就领教了。

第二天，巴本举行内阁会议。在会议上，施莱彻尔站起来说，他无法执行总统下达给他的指示，任何一种无视宪法的行为都将使国家陷入混乱。如果发生罢工，警察和军队将不能保证交通和供应；一旦发生内战，军队也不能确保治安。巴本明白施莱彻尔的意思。会议结束后，巴本带着施莱彻尔的意见去见兴登堡，希望老总统能够撤换国防部长施莱彻尔，以挽救他的内阁。可是，老迈的总统居然对他说：“我亲爱的巴本，我改变主意你会看不起我的。但我的年纪太大了，经历的事情也太多了，我不能承担内战的责任。我们唯一的希望就是让施莱彻尔试一试运气。”说完，兴登堡流下了泪。第二天，他派人给巴本送去了一张有他亲笔签名的照片，并附有一封信，信中说：免除巴本的职务，他的心情很难过，他对巴本的信任“丝毫没有改变”。

12月2日，施莱彻尔接替巴本成为总理。他知道，他奋力取得的这一职位已经变成了一个热山芋。他失去了兴登堡的信任，失去了巴本集团的支持，他向兴登堡所保证的其他政党对他的支持，只不过是一句空话。他又一次向希特勒提出由希特勒担任副总理的请求，希特勒拒绝了，他不能接受这半块面包。戈林非常赞同希特勒的作法。但是，希特勒和戈林不曾想到，施莱彻尔将这半块面包抛给了当时的纳粹党的二号人物施特拉塞。施特拉塞认为，希特勒已经使国家社会主义运动走上了绝路，党的经费拮据已经成为无法克服的困难。如果希特勒再不放弃现行的作法，那么，纳粹党要想依靠选票取得政权，只能是幻想。12月5日，以施特拉塞为首的一批纳粹党人，终于在施莱彻尔抛来的那半块面包的诱使下，脱离了纳粹党。戈林与戈培尔站在希特勒一边，坚决反对党内的任何人去施莱彻尔的政府中担任职务。戈林称施莱彻尔政府是德国历史上最卑劣的政权。但施特拉塞却不这样看，他认为党现在已经面临绝境，此时能捞点什么就捞点什么。12月7日，希特勒与施特拉塞在凯撒霍夫饭店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希特勒指责施特拉塞分裂了纳粹运动，分裂了纳粹党。施特拉塞矢口否认，反而说纳粹党的困境是由于希特勒执行僵硬的政策造成的。在争吵结束后，施特拉塞回到寓所，给希特勒写了一封信，要求辞去党的一切职务。然后，他又把这一决定透露给新闻界。第二天，柏林的各大报社均登出这一消息。希特勒和戈林几乎要被这一消息气晕了。希特勒对戈林等人说，如果党一旦垮台，他马上自杀。此时此刻，施特拉塞却离开了柏林，去阳光明媚的意大利海滨度假了。希特勒马上反守为攻，向对手施以打击。他派人接管了施特拉塞在党内主管的人事和政治部门，清洗施特拉塞的亲信。然后，让党内的各级头目都聚到柏林，在一份向希特勒效忠的宣言上签了字。这样，这位狡猾的“波希米亚上士”又一次摆脱了困境。

在施莱彻尔阴谋为希特勒设置陷阱的时候，他一直没放在眼中的巴本也在策划一个阴谋，而且，这个阴谋正是针对他的。年底，巴本向他的老对头希特勒发出了和解的信号，并要求希特勒与他举行一次秘密会谈。希特勒同意与巴本会谈。1月4日，两个多年的对头聚首。尽管希特勒在会谈开始时还悻悻地抱怨巴本在任总理时对纳粹党的“不公正”，但很快两人便在维护共同的政治利益的基础上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巴本提议建立一个与希特勒共



同组成的政府，由希特勒担任总理，两人的地位是平等的，此外，巴本还向希特勒保证，他可以解决纳粹党面临的财政问题。希特勒还从巴本那里得知，兴登堡无意解散国会。后一个消息使希特勒大喜过望，他知道，这样一来，就可以随时筹划在国会中推翻施莱彻尔。这次会谈后不久，巴本又安排希特勒与兴登堡的儿子奥斯卡会见。戈林一同参加了会见。

施莱彻尔此时感到危机四伏，如坐针毡。他面对着的几乎是所有社会阶层的反对，在他的四周布满了一个又一个的政治陷阱。正如他自己后来所说的：“我执政只有 57 天，而且每一天都被人背叛了 57 次，以后别跟我说什么‘德国式的忠诚了’。”在内阁会议上，为了争取支持者，他提出了一系列他称之为“既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的政策。并与工会代表进行谈判，以期获得工会的支持。他的施政纲领遭到了大资产阶级和容克地主的强烈反对。兴登堡作为一个容克地主，也将由于实行取消对容克地主的保护政策，而蒙受巨大损失，他自然心怀不满。大资产阶级则对施特拉塞与工会的接触感到不安。但实际上，工会方面对这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阴谋大师也一直保持着警惕，对他所发出的合作的暗示不予理睬。

在国会中，绝大部分政党都成了他的对立面。可以说，施莱彻尔已陷入窘困之中。万般无奈之下，他又跑去向兴登堡要求给予他独裁的权力，因为他已不能组建一个由国会中多数票支持的政府。但兴登堡提醒他，当初施莱彻尔推翻巴本的理由与他现在所提出的问题是一样的。由此看来，施莱彻尔垮台的命运已经注定，他的政治命运必将完结。与此同时，巴本却向老总统说，他可以拉拢纳粹党组成一个在国会中获得多数票的政府！这与几个月前施莱彻尔说过的话几乎如出一辙。其实巴本内心又一次想把希特勒抛到一边。在关键时刻，施莱彻尔对老总统说，他认为希特勒是代替他的最好人选。但兴登堡却对施莱彻尔说，他无意任用那个“奥地利上士”。施莱彻尔转而又去找希特勒，再次提醒希特勒，巴本有可能将他抛齐，他最好与他及其陆军结盟。希特勒根本就没把施莱彻尔的话当成一回事，他不想在唾手可得的胜利果实到手之前，与施莱彻尔再有什么瓜葛。施莱彻尔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让他的私人代表阿尔文·斯勒本向希特勒提供了一个假消息，说施莱彻尔与陆军参谋长哈麦施坦因已命波茨坦卫戍部队进入了戒备状态，准备将兴登堡劫持到纽台克去。他本想以此来恐吓希特勒，迫使希特勒就范。没想到希特勒真的吓坏了，他急忙让戈林去向兴登堡和巴本报警，然后又命令柏林的全体冲锋队员进入战备状态，此外，他又求助柏林警察局的纳粹分子韦克少校，让他派出 6 个营的警察封锁了威廉大街。兴登堡和巴本听到这一消息后也惊恐万状，急忙将正在日内瓦参加裁军会议的冯·勃洛姆堡将军召回，准备让他在希特勒—巴本的内阁中出任国防部长。勃洛姆堡是一个著名的纳粹同情者，希特勒与他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样一来，即便施莱彻尔真有什么阴谋，也难以得逞了。勃洛姆堡在接任国防部长职务的几个小时后，陆军向总统表示，将支持新的内阁。

1932 年 1 月 30 日，柏林又迎来一个严寒的日子。就在这一天，希特勒成为德国的总理。经过十余年的奋斗，他已经看到了他梦寐以求的权力的顶峰。纳粹党徒们弹冠相庆，德国的命运似乎已经开始由他们来掌握了。不过，希特勒知道，要达到最后的目的，他还要拿出全部的力气去继续拼搏，因为他不能仅仅满足于埋葬魏玛共和国，他的最终目的是要建立一个由纳粹党实行独裁统治的绝对的集权国家。

新的内阁是按照典型的政党分赃制组成的。纳粹党在内阁中只获得了三个席位。戈林只担任了不管部长，因为实在没有其他的部门分给他管。但是，内阁成员也达成了默契，一旦德国有了空军，将由戈林担任空军部长。另一个纳粹阁员弗立克担任了内政部长，这也是一个有名无实的职位，由于当时德国的警察并不由中央政府统管，而由各邦自己控制，狡猾的希特勒又埋下了一个伏笔，那就是让戈林担任普鲁士的内政部长，这样，德国最大邦的警察部队就将由戈林来控制了。其他政党的内阁成员居然没有一个意识到这是一个花招，这个花招将带来无穷的后患，当然这是后话。各主要部的部长都是由社会民主党和天主教民族党人担任的，巴本本人则担任了副总理，兼任普鲁士邦的总理。德国的保守势力代表人物在这一天也兴奋异常，他们都以为，希特勒这个德国政坛上的怪胎，从此以后就会变得驯服起来，他们最后的敌人只有共产党了，他们哪里知道希特勒与戈林心中的打算，假如他们知道这一天就是他们在德国政坛上走向末日的开始的话，肯定会悲伤不已的。

内阁会议结束了。希特勒和戈林回到了在凯撒霍夫饭店的办公室。午夜，纳粹党徒们在凯撒霍夫饭店外举行了火炬游行。希特勒和戈林站在窗口，望着如一条喧嚣的火龙一般的游行队伍，万分得意，同时野心也更加膨胀。两人的心里都在盘算着纳粹党下一步的行动，当天夜里，戈林给了埃米一支手枪，让她做防身之用。他告诉埃米，斗争已经到了你死我活的阶段，谁知道纳粹的敌人将会采取什么行动。戈林在临睡之前，又告诉埃米说，明天早晨买一些鲜花给元首送去，“他会喜欢的”。

兴登堡让希特勒领导的是一个依靠国会多数票支持的内阁，一旦失去了多数票的支持，内阁的命运自然也就同它的前几届一样，希特勒深知这一点，最感到紧张的也是这一点。他明白，那些暂时与纳粹党联合的民族党随时都有可能倒戈，至于共产党，那就更不用说了，希特勒一直就把它看成死敌。戈林与中央党的头面人物进行了谈判，想说服他们与纳粹党保持一故，但没有成功。戈林回来后，向希特勒建议，解散国会重新举行选举。希特勒当即表示同意。两人决定之后，便开始做社会党和天主党的工作。希特勒在内阁会议上说，中央党的要求令人无法接受，已没有达成协议的可能。因此，为了保持内阁的多数票的支持，只有让总统下令，解散国会进行新的选举。事实上，中央党所提的要求只不过是内阁中给他们留有一席之地。巴本与社会党的领导人就轻而易举地落入了希特勒的圈套，同意了希特勒的建议。兴登堡也批准了内阁的提案。新的选举定于3月5日举行。

在新的选举即将到来之前，希特勒与他的纳粹党要员们一起制定了竞选的方针，那就是千方百计地破坏共产党的竞选活动，如果能逼得共产党发动革命就更好，纳粹就可以借助陆军的力量将共产党取缔。那样，共产党的100多个席位就会在议会中被取消，纳粹党就可以在议会中顺利地得到多数票。同时，对其他政党的竞选活动也要尽可能进行破坏，对一切反对纳粹的民主派人士予以无情打击。一时间，柏林大街上到处是穿着褐色衣衫的纳粹冲锋队员。2月初，希特勒以总理的名义，宣布取消共产党的集会。封闭共产党的报纸。与此同时，社会党和中央党的一些集会和报纸也遭遇到了同样的命运。在竞选前夕。约有51名反纳粹人士被杀害。纳粹党方面也声称，有18人在街头的斗殴中死亡。

作为普鲁士州内政部长的戈林，此时更是忙得不亦乐乎。内阁的成员们如梦初醒，刚刚懂得了戈林的职位的重要，也有点明白希特勒当初的老谋深

算了。戈林不顾他的上司、普鲁士总理巴本的约束，大胆妄为。上任伊始，他就下命令强迫在普鲁士各行政部门工作的共产党员辞职。另外，他还解除了几百名共和派官员的职务，后来戈林吹嘘说，普鲁士邦的 32 个城市警察局长中，被他解除职务的有 22 名。此外他还解雇了大批他认为不能在未来斗争中支持纳粹的巡官和成千上万的巡警。这一切职位的空缺，戈林都安排了纳粹分子填补。他还命令警察要不惜一切代价避免与纳粹党的任何组织发生冲突。对非纳粹党的各种集会，戈林则命令警察“使用武器”予以冲击。2 月 22 日，戈林组织了一支由 5 万人组成的警察辅助部队，其中的 4 万余人来自冲锋队。尽管这样，希特勒与戈林等待的“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始终没有爆发。一计不成，戈林又献一计，要搜查共产党在柏林的办事处李卜克内西大厦。早在戈林对共产党开始进行大规模迫害的时候，共产党就放弃了这个地方。但戈林在地下室中还是搜查到了大批的文件和宣传品。根据这些东西，戈林亲自撰写了一份文件。在文件中，戈林声称在李卜克内西大厦中发现的共产党文件，足以证明共产党要发动一场革命。公众，甚至包括巴本在内的一些人，对戈林所说的“事实”一直持怀疑态度。戈林决心制造一个让每一个人都不得不服的证据。

对戈林的果断与无情，希特勒是非常了解的。他十年后在提起当时的经历时还说戈林是一个“在危急时刻冷酷无情的人”，“我一直说，每当关键时刻，他总是铁石心肠的人——不顾一切”。的确，在纳粹党的生死存亡的关头，戈林就像希特勒放出的一条疯狗，为他的主子尽心尽力，四下出击，立下了头功。对于对手和反对派来说，在 1933 年大选的前夕，戈林的名字就是恶魔的同义语。当时的外交部长诺伊拉特在与英国大使谈到戈林时说，这是一个“可怕的人物，是纳粹党内真正的法西斯分子”。戈林的顶头上司，普鲁士州的总理巴本对他更是无可奈何，只求他不要搞到自己的头上，不对自己下毒手，就万事大吉了。

戈林在 2 月 4 日悍然解散了普鲁士州的议会。他为了安抚兴登堡，决定由兴登堡在政界的一些亲信和政界的一些亲纳粹的元老组成州的顾问委员会代替议会。他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对他手下的一批警官讲话说：“我的行动不必考虑法律上的影响。你们必须适应这样一个观点，我从政的目的不是为了执法，恰恰相反，我是要摧毁和根除它！”“先开枪，然后再提问题。”他在多特蒙德的一次警官大会上声称：“大胆地干，你们犯的错误，就是我的错误，你们射出的子弹，就是我射出的子弹。”

此时的戈林志得意满，头发梳得又光又亮，好像要流油一般，他身穿黑色的制服，坐在部长的办公室里，俨然一付世界的主宰者的模样，他除了安排对共产党和其他党派进行攻击和迫害的事务外，就是周旋于各个大企业和公司的老板之间，企图在大选的最后关头为纳粹党筹到一大笔经费。2 月 20 日，在戈林的议长官邸，德国的 25 个最有实力的大企业家和银行家应戈林的邀请，参加了由戈林主持召开的为纳粹党筹款的会议。在会上，希特勒又一次向德国的大资产阶级保证，新政府的关于维护大资产阶级利益、制止一切工人运动的方针是不会改变的，新政府对共产党的镇压政策也是不会改变的。他把即将开始的大选说成是对共产党的第二次进攻。并称：“即使选举没有确定的结果，我们也不会向后转，如果没有达到预定的目标，那么我们就将再换一种方式，用其他的武器进行新的较量。”希特勒又向这些人表示，德国将进入一个新的经济繁荣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德国的武装力量将会

重新崛起，德国的经济将会随之而重新复苏。希特勒在最后声嘶力竭地叫道：“是否要增加武装部队的问题不是在日内瓦决定，而是在德国。但在做到这一点之前，我们首先要有国内的和平，没有国内的和平就不会有国家的强盛，不消灭马克思主义，就不会有国内的和平。”戈林在希特勒讲完这番话之后，又就具体的问题作了解释。最后，他强调说：“如果企业界认识到，3月5日的选举是今后10年中最后一次选举，甚至也可能是今后100年中的最后一次选举的话，那么，要他们承担一定的义务，作出一些牺牲就会容易得多了。”以军火大王克虏伯为首的大资本家对希特勒和戈林所说的结束无休止的选举、废除民主制和重建德国武装力量的诺言，反应异常热烈。曾经一度对希特勒感到失望，因而要求兴登堡不要任命希特勒担任总理的克虏伯站起来对希特勒说，希特勒让“我们看到了这样一幅清楚的图景”，他代表企业界向总理表示“感谢”。会议是在25双戴着戒指的手签署支票当中结束的。会后，主管纳粹财务工作的沙赫特兴奋地对希特勒和戈林说，捐款的数目已经达到了预先希望得到的300万马克。

纳粹下一步所要采取的行动就是彻底将共产党赶出国会了，戈林对此胸有成竹。1933年2月27日晚9点半左右，德国国会大厦突然起火。得知这一消息后，希特勒、戈培尔、巴本等人赶到了现场。他们到达国会大厦时，只见身穿驼毛大衣的戈林正在现场发疯似地叫喊：“一定要救出那些挂毡！”并见他奋不顾身地向前冲去，企图冲进国会大厦连接议长官邸的通道。但他终因火势实在太猛，只好又退了出来。他气喘吁吁、气急败坏地对新上任的纳粹秘密警察头子鲁道夫·狄尔斯大喊道：“共产党的革命开始了！我们一分钟也不能等待了。我们要毫不留情地对付他们。共产党的干部一经查获，当场格杀勿论。今晚就把共产党的议员统统绞死！”经过一场大火，戈林的办公室居然奇迹般地安然无恙，这也不能不令人生疑。在戈林的办公室里，希特勒、戈培尔、巴本与戈林见了面。不一会儿，一位保安人员进来报告说，他看到最后一个离开大厦的人是共产党议员恩斯特·托格勒。戈林马上向在场的人说，他也看见托格勒在国会大厦里，手里还拿着一个公文包。戈林与在场的人都认定，这一纵火事件一定是共产党策划的。这时，几个冲锋队员将一个人押了进来。这是一个荷兰人，名叫马里纳斯·范·德·卢伯。他声称，他是荷兰共产党党员，由于对德国新政府迫害工人的行为感到愤怒，所以要烧毁几座大厦，以此表示他个人的抗议。希特勒、戈林及戈培尔暗自高兴，他们一致认为这一事件将为纳粹的竞选宣传带来意想不到的好处。希特勒让戈林将前些天列好的，但已被兴登堡否决的逮捕名单重新找出来，他们认为这一名单又可以派上用场了。然后，戈林口授了一份公告，宣布国会大厦的纵火案是共产党所为。第二天，戈林在内阁会议上，向所有的部长又一次重复了上述说法。他说：“尽管被捕者坚持说是他独自犯下了这一罪行。但是这种说法实在不可信。我认为，至少有六七个人是犯罪者。确实有人看见在起火前，共产党议员托格勒与罪犯在一起。”戈林又补充说，他已获得了确实的情报，共产党正在组织一个恐怖组织，其任务便是纵火放毒。绑架人质——主要是各位部长的家人。戈林随后建议，关闭所有的城堡和博物馆，取缔所有的共产党报纸，逮捕所有的共产党官员、当有的部长对戈林的“证据”提出疑问的时候，戈林又说，他已经得到一些证据，证明莫斯科与这件事有极大的牵连。并说：“莫斯科给柏林共产党的最后期限是3月中旬，如果过了这个期限再不发动暴动的话，就将取消资助的资金。”接着，戈林又

出示了一张据说是在共产党的总部搜缴来的、标有将被破坏的目标的“地图”。但奇怪的是，在后来的国会纵火案的审理中，戈林竟始终没有出示这一“有力的证据”。

国会纵火案的真相也许永远也不会大白于天下了，因为凡是知道这一事件真相的人，都被希特勒和戈林在事件后的几个月里以各种罪名杀害了。然而，种种迹象表明，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从纵火的策划到实施，纳粹党都参与其间，其罪魁祸首就是在事后大喊共产党是纵火犯的戈林。只不过他们假手于一个神经有问题的共产党员卢伯罢了。

事实真相究竟是怎样的呢？在纽伦堡审讯中，曾在当时纳粹的普鲁士内政部供职的吉尔维乌斯作证说：“最初想放火烧国会的是戈培尔。”纳粹秘密警察头子鲁道夫·狄尔斯在供词中说：“戈林事先完全知道国会大厦要起火，事前就让我准备好在起火后马上逮捕的一批人的名单。”在二战初期担任德军总参谋长的哈尔德曾回忆道：“在一次元首生日的午宴上，当谈话的话题转到国会大厦的建筑和艺术价值时，我亲耳听到戈林大声打断大家的话说：真正了解国会大厦的是我，因为是我放火把它烧了。说完他用手拍着大腿哈哈大笑。”

事实上，卢伯确实是被纳粹党利用了，只不过他本人一直被蒙在鼓里。在出事前的几天，卢伯在酒馆中说，他曾在几处政府的大厦中放过火，下一个目标就是国会大厦。这一消息传到了戈林和戈培尔那里，他们两人都认为嫁祸于共产党的天赐良机到了。2月27日晚，冲锋队的中队长卡尔·恩斯特带着一批人通过议长官邸的地下供暖的通道，进入了国会大厦，在几个重要的地方洒下了汽油和化学燃烧品，然后又从原路返回。不一会儿，卢伯就潜进国会大厦，放起火来。前后不到3分钟，大火就在国会大厦的中央大厅四处燃起。其实，在后来的莱比锡审讯中，已有人断定；卢伯以其衬衫为点火物，是不可能将这样一座钢筋混凝土的建筑物在2分钟之内点燃的。据专家在审讯时提供的证据，中央大厅的几处大火都是由化学燃烧品和汽油引起的。很显然，如此数量的燃烧品不可能由一个人带进来，也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由一个人分放到那么多地方，使多处大火燃起。

不管怎么说，国会纵火案确实为纳粹中伤和迫害共产党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使纳粹有借口在大选之前关押了3000名政敌，其中包括德国共产党的领袖台尔曼、侨居德国的保加利亚共产党领袖季米特洛夫等人，后者还被戈林指控为国会纵火案的主使者。

过了几个月后，1933年9月末，在莱比锡进行了国会大厦纵火案的审判。在审判中，戈林企图将这一事件说成是季米特洛夫等人为了帮助德国共产党而策划的。在这一天，戈林身穿紧身的短上衣，脚蹬光可鉴人的马靴，亲自出庭作证。本来，戈林想通过这次审判为纳粹在最近一个阶段的反共行动作一次宣传，谁知，这次审判却让他丢尽了脸，让他丢脸的是被告季米特洛夫。戈林的证词在季米特洛夫的诘问下，显得是那樣的空洞无力、不堪一击，以至戈林后来恼羞成怒，不顾脸面地咆哮公堂，辱骂被告。比如，戈林在提到苏联对德国共产党的支持是受一种“犯罪的意识形态”的支使时，季米特洛夫马上进行了反击。莱比锡法庭上那精彩的一幕永远令人难忘：

季米特洛夫：“我的看法不同。”

戈林：“合乎逻辑，但我的看法才算数。”

季米特洛夫：“戈林先生，你所说的犯罪的意识形态是一个统治地球六

分之一土地的政党，或者说，就是苏联吧？”

戈林：“他们在苏联做什么对我来说无关紧要。我只关心德国共产党，关心到这里向我们的国会放火的这个外国共产党的恶棍。”旁听席上纳粹的党徒们发出一片叫好声。季米特洛夫模仿着下面的叫好声说：“好——好，当然，叫好吧。发动对德国共产党的战争是你们的权力，但德国共产党也有生存下来的权力，同你们的政权斗争，一直斗争下去。”

法官看了一眼已经气得脸色发白的戈林，对季米特洛夫厉声说：“季米特洛夫，不许你在这里进行共产党的宣传！”

季米特洛夫向法官高声说道：“他在作纳粹宣传！”

在季米特洛夫继续为自己辩护的时候，戈林在没有得到法官的允许的情况下，又站了起来，歇斯底里地喊道：“听着，我现在告诉你德国人民意识到的——”他顿了一下，声音像一个女人似的尖细：“他们意识到你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无赖。你急急忙忙地跑到这里来，烧了我们的国会大厦，还居然有脸对德国人民高谈阔论。我来这里不是让你来指责我！我看你是一个无赖，早该把你送上绞架绞死。”戈林还想说下去，法官实在看不过去了，就低声制止他。但戈林不管不顾地继续大声喊道：“滚出去，你这个混蛋！”法官见状，对法警说：“将季米特洛夫带下去。”季米特洛夫在走出法庭时转身对戈林说：“你害怕我的问题，对吗？戈林先生。”戈林对走出法庭的季米特洛夫挥着拳头大喊：“等我们在法庭外边抓到你，再给你点颜色看看，你这个混蛋！”

莱比锡的审讯变成了一场闹剧，戈林及其同党们狼狈不堪，只好匆匆收场。季米特洛夫等4名共产党人被无罪释放。卢伯被判处死刑，在1934年1月10日被处死。直到临刑前，卢伯都没有任何忏悔的表示。倒是戈林，对自己参加这次审判颇感后悔，此次审判使他在公众面前出尽了洋相。

正是：机关算尽反被误，黔驴技穷窘态现。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 第六章 爬上殿堂的毒蜘蛛

篡权窃国立头功，贪名逐利成要人；  
内攻外联忙周旋，登堂入室得殊荣。

话说戈林通过国会纵火案，为实现希特勒彻底清除共产党的计划立下了头功。虽然在后来的莱比锡审判中，“那个保加利亚的混蛋”——事后戈林这样愤愤地称呼季米特洛夫，让他闹得灰头灰脸，但这并不妨碍戈林对此事一直沾沾自喜。他在纳粹党中的地位日益提高，在上流社会中更成了不可缺少的重要人物。戈林的官邸每一个夜晚都是高朋满座，灯红酒绿。

希特勒并没有像戈林那样得意。尽管由于国会纵火案，共产党在国会中对纳粹党已经构不成威胁，但它毕竟还有 600 万支持者。除了社会影响极大的共产党之外，其他的资产阶级党派也不肯就范，这在未来的大选中，势必都要成为纳粹党获取选票的障碍。

在纵火案发生的第二天，希特勒与戈林就去拜见了兴登堡。他俩大谈共产党及其拥护者的危害，一番花言巧语使老迈昏愤的总统又一次落入纳粹的圈套。在希特勒和戈林的劝说下，兴登堡签署了一份名为“保护人民和国家的法令”的文件。这一法令规定，暂时废止宪法中有关保障公民自由的条款，“将采取一系列措施防止共产党危害国家的暴力行为”，包括限制个人的自由及出版、结社、集会的自由；对公民的邮件、通讯实行检查；对有嫌疑的人可以检查其住宅，对那些“对国家和人民构成威胁的人”的财产可以予以没收。此外，这一法令还授权内阁，可以在认为必要的时候接管各邦的政权，将那些持有武器、有“严重扰乱治安的行为”的人处以死刑。

这样一来，希特勒与戈林就等于得到了合法实行纳粹的恐怖政策的尚方宝剑。霎时间，纳粹恐怖的阴云布满德国的上空。在各个城市中，冲锋队员如狼似虎，将大批他们认为“对国家和人民的安全将构成威胁”的人投到监狱之中。在柏林，纳粹共逮捕了 4000 多名共产党干部，此外，许多的社会民主党领袖也遭到了逮捕。与此同时，戈林把持的普鲁士政府发表了一份所谓共产党将要进行一场武装暴动和全面内战的声明，借此威吓对国会纵火案一无所知的老百姓，唤起老百姓对共产党的恐惧和憎恶的心理。

纳粹党如今终于体会到了掌握政权的种种好处。它的背后有德国政府和普鲁士政府的力量，有充裕的财政保障，有可供使用的电台和报纸。德国的国家电台第一次将希特勒、戈林、戈培尔的声音传到了德国的每一个角落，大街小巷到处都是纳粹的卐字旗和写有醒目的纳粹口号的招贴画，冲锋队员的皮靴声不绝于耳。到了夜晚，纳粹党徒的火炬游行更是令人触目惊心。但这一切，还都没有戈林在国会纵火案发生后的几天，也就是 3 月 3 日在法兰克福的讲话更让德国人感到恐怖。戈林在讲话中赤裸裸地说：

“德国同胞们，任何法律上的考虑，都不会妨碍我的行动……我不必担心法律，我的任务就是斩草除根，别无其他！……当然，我要充分利用国家和警察的力量，因此，亲爱的共产党朋友们，不要得出任何错误结论。而且要明白，我要同台下的这些人——褐衫队员——一起领导这场殊死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我要掐住你们的脖子！”

与此同时，德国的资产阶级政党也在进行竞选。但是，同凶狠的纳粹相

比，他们就显得太软弱无力了。中央党领袖、前总理布鲁宁3月5日在一个拥护他的群众集会上讲了话。在讲话中，他只能对纳粹党的暴行表示自己的抗议，并向兴登堡总统呼吁，要求“保护被压迫者，抵制压迫者”。除此之外，他就无能为力了。

尽管纳粹分子活动猖獗，而且仿佛已胜券在握，但在1933年3月5日的大选中他们的党并没有得到预期的绝对多数选票。3月5日午夜时分，纳粹党的头面人物大都聚集在戈林的官邸中等候大选的结果。同时，诸如蒂森这样的实业家、王子奥古斯特·威廉姆这样的显贵，还有里希特霍芬中队的队员们——现在，他们又承认他们的最后一任指挥官了——都聚在了这里，这些人与身穿褐衫的纳粹党徒们称兄道弟，你来我往，也在企盼着纳粹大获全胜的消息。不一会儿，有人送来了大选的结果，让这些在戈林官邸准备进行欢庆的人们就像喷了一头的凉水。纳粹党在这次大选中，尽管得到了1727万多张选票，在国会中可占有288个席位，再加上纳粹党盟友胡林贝格领导的天主教人民党的55个席位，纳粹党实际上在国会中得到了多数席位。虽然这些席位已使纳粹有足够的资格主持国会的日常工作了，但是离取得全部立法权所需要的三分之二的多数席位，还有一定的距离。

大选后的几天里，戈林和希特勒一直在冥思苦想，如何才能弥补选票不足这个缺口。在3月15日的内阁会议上，问题一提出，戈林便提议，一要设法使共产党议员“缺席”，二要“不让一些可能捣乱的社会党的议员入场”，通过这两个办法，可以轻而易举地解决选票不足的问题。在关于多数票的问题解决之后，希特勒就开始着手实行所谓的国家一体化的计划了。这个计划的主要内容是：先要求国会通过一个“授权法”，即在四年中授予希特勒内阁全部立法权。换言之，就是在希特勒执政的四年期间，国会休会，宪法规定的国会的所有权力统统归于希特勒个人。这项法案的施行由于要涉及宪法的修改，所以有一个能否得到国会多数票通过的问题，但现在这个问题已经不存在了。

3月23日，在柏林的克罗尔歌剧院，德国国会正式讨论“授权法”。经过长时期处心积虑的准备，纳粹党这次终于如愿以偿，国会以441票对84票通过了这一法案。希特勒终于攀上了权力的顶峰。议会制度也终于在德国寿终正寝。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一法律竟然规定，“总统的权力依然不变”。

从1933年3月23日开始，德国进入了法西斯专政时期。

自“授权法”通过之日起，德国的各个权力机构和政党相继消失。早在“授权法”通过的前两个星期，在冯·埃普将军的带领下，一些冲锋队员就已将巴伐利亚政府的各部部长赶走，成立了一个纳粹政权。不久，希特勒又派出所谓的“国家专员”，接管了除普鲁士邦之外的所有邦政权。在“授权法”公布后不到一个星期，希特勒就下令解散了除普鲁士之外所有各邦的议会，命令各邦依照国会的席位的比例，重新组成新的议会。4月7日，希特勒又任命了新的邦长官。新的邦长官清一色都是纳粹党徒。按照希特勒的命令，新的邦长官有权解散议会，撤换和任命邦的各级官员和法官，邦长官必须执行“国家总理制定的总政策”。这样，在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里，纳粹就在德国历史上第一次改变了德意志的联邦性质，第一次真正地统一了德国。此后，纳粹开始向各个仍保持台法地位的政党开刀。共产党早已被镇压，在“授权法”公布后第一个遭到被解散命运的是社会党。在投票表决“授权法”时，社会党是唯一的反对党。虽然表决后不久，该党的一些议员便开始



向纳粹妥协，但是，希特勒并不想宽恕他们。6月19日，内政部长弗立克宣布，由于社会党“颠覆和敌视国家”，因此予以解散。一些仍留在德国的社会党议员统统被投到监狱中。即使作为纳粹党的同盟者的天主教中央党，也没有摆脱被解散的命运。其他诸如人民党、民族党等，早在此之前就已经自行解散了。

对一向同纳粹作对的工会组织，希特勒和戈林略施小计，就很轻松地将其击垮了。在5月1日的劳动节到来之前，纳粹为了防止在这一天工会以全国总罢工的形式来对其政权进行反击，就放出风来说，1933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将成为全国性的纪念日，届时将举行全国性的盛大的庆祝活动。各地的劳工领袖大部被纳粹制造的假象所迷惑，许多工会领袖们居然与纳粹合作，筹办这次庆祝活动。在那些日子里，柏林的街头到处都是写着“纳粹党将与工人团结一致”口号的标语。在5月1日这一天，各地的劳工领袖们坐飞机来到了柏林。在柏林郊外的坦贝尔霍夫机场，希特勒在有10万工人参加的庆祝大会上口沫横飞，宣称“尊重劳动，尊重工人”，并保证将在每年的5月1日举行庆祝活动，以此来表达对工人阶级的“敬意”。

但是，就在第二天，即5月2日，各地的工会几乎都遭到了纳粹党的袭击，工会的办公处被占领，大批工会领袖被逮捕，送进了集中营，即使是那些公开表示愿与纳粹合作的人也未能幸免。从此，纳粹党就成为德国唯一的合法的政党了。

希特勒没有忘记在夺权斗争中为纳粹党立下了汗马功劳的戈林。在纳粹夺取全国政权后不久，希特勒就向戈林许诺，在兴登堡死后，希特勒将成为国家元首，就由戈林出任国家总理一职。4月10日，希特勒又任命戈林接任被迫辞职的巴本的普鲁士总理的职位。此时的戈林，并没有因为已攫取的高位而罢手，他不能满足于把自己的权力只局限于某一个方面。除了希特勒，戈林没把任何人放在眼里。他就像一只巨大的蜘蛛，嘴里喷溅着毒汁，在一个个角落编织着权力的网络。

在纳粹党夺权前后的一段时间里，戈林着重处理内政事务。在大选之前，他组织了一支由5万多人组成的“辅助警察部队”，戈林为这支部队规定的任务，就是尽量“引导”选民投纳粹党的票，并拘捕那些最危险的纳粹的反对者，把他们投到设立在奥拉宁堡和彭本堡的集中营中去。在此期间，戈林还干了一件大事，那就是建立国家的秘密警察组织——盖世太保。

说起来很奇特，盖世太保本来是柏林市警察局长冯·勒韦楚组建的，其中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制止纳粹冲锋队的无法无天的行为。希特勒与罗姆发现了勒韦楚的企图后，立即让戈林解除勒韦楚的职务。戈林发现勒韦楚的这个组织非常合乎他的需要，因为他一直想建立一个直接听命于他的组织，勒韦楚的秘密组织正好提供了一个可以为他所用的机构框架。因此，他把勒韦楚的组织划到他直接掌管的普鲁士内政部，将当时纳粹的政治警察局局长迪尔斯调来作他的副手，直接负责盖世太保的工作。当时的盖世太保主要是由律师和其他的知识分子组成的，专事刺探民情和政敌的言行。而在后来的岁月里，盖世太保已成为无孔不入的特务恐怖组织，成为纳粹暴政的象征。尽管后来的盖世太保并不是由戈林控制，但戈林确实是这个对德国人民和欧洲人民犯下滔天罪行的罪恶组织的始作俑者。

由于戈林有过出使意大利的经历，希特勒上台后，又让戈林担任了代理外交部长，派他去罗马与墨索里尼会面，试图与意大利建立一种长久的伙伴

关系，并向意大利表示德国无意兼并奥地利，因为这一直是意大利独裁者所担心的事情。可是，戈林的出使与当初一样，并没有收到什么效果。墨索里尼对戈林极为轻视，称他为“那位前精神病患者”。戈林在他担任代理外长的这段时间里，曾经三次出使意大利，却都没有什么收获。在11月6日至7日，戈林带着希特勒的亲笔信去见墨索里尼。希特勒在信中向墨索里尼保证，德国将不会插手奥地利的事务，更不想兼并奥地利。但墨索里尼在戈林到达之前，就与奥地利及其盟国匈牙利签订了一个协议，即《罗马议定书》。在协议中，墨索里尼向奥地利许愿，意大利将保证奥地利的独立。这正是纳粹德国最不希望看到的事情。希特勒和戈林之所以要向意大利保证纳粹德国不会觊觎奥地利，实际上他们的本意就是阻止意大利与奥地利签订任何条约，从而在未来吞并奥地利的行动中，避免与意大利发生冲突。不料，戈林几次出使却换来了这样的结果，他十分恼火。好在可以交待的是，罗马教皇终于召见了。在会面时，戈林居然还向教皇古里古怪地行了一个纳粹的举手礼。戈林此次出访意大利回来后，希特勒任命赫斯负责有关奥地利的事务，不再让戈林插手此事。戈林自己也知道他无论如何也再无法同意大利统治者周旋了，故没找任何托辞，就乖乖地从奥地利事务中脱出身来。

又一次出使意大利失败后，戈林将他的外交目标转到了波兰和巴尔干。他首先凭借狩猎这一共同爱好，同波兰驻德国大使科普斯基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并得到了波兰人的邀请，到波兰比亚沃维扎的国家猎场狩猎，在这里，戈林与一批波兰贵族打得火热。1934年4月，一名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杀死了波兰的内政部长后，逃到了德国。戈林利用手中的权力，将谋杀者引渡给了波兰政府。这一举动换取了波兰政府的好感。从1934年开始，一直到1933年，波兰政府每年都邀请戈林以私人名义到比亚沃维扎访问一次，戈林将这种被时人称为“戈林式的外交”的方式用到东南欧的一些国家中，并都收到了预期的效果。戈林的举动使那位在亚得里亚海滨的意大利独裁者恼羞成怒，因为他从来都把那里看成是意大利的领地。但戈林根本就不管墨索里尼是怎么想的，继续我行我素。5月10日，他带着米尔希、克尔纳、黑森的菲利普亲王到东南欧作了一次“度假旅行”。在出发之前，戈林宣布旅行将从罗马开始。此时，墨索里尼已经看到了这位在纳粹德国实际上已成为二号人物的戈林的影响，他再也不能对戈林视而不见，或有任何不礼貌的举动了，于是准备为戈林举行一次盛大的欢迎仪式，以弥补前几次戈林出访意大利所受的冷遇。可没有想到，不知戈林是有意还是无意，在启程前，他突然宣布不去罗马了，使墨索里尼精心安排的欢迎队伍在机场空等了几个小时。这件事把墨索里尼气得七窍生烟。相反，戈林先是因“技术原因”在布达佩斯停留一天，后又因“技术原因”在贝尔格莱德停留一天，并表示想拜会南斯拉夫国王，后因国王出外旅行而作罢。戈林这次“度假”旅行，使纳粹德国在他们所到之处影响扩大，从而有力地抵制了意大利在这一地区的控制与扩张。

戈林从东南欧归来后，便着手准备希特勒对意大利的第一次国事访问。意大利方面表示，十分欢迎希特勒的访问，但如果戈林先生陪同前往，他将不受欢迎。戈林对那位意大利独裁者的怨恨更深了。

戈林最感自豪的是他建立的研究所。这个以电子研究为伪装的研究所，实际上是一个当时世界上装备最优良、技术最先进的特务组织。后来，戈林的这个研究所成为纳粹最得力的情报机构。这个研究所可以窃听德国境内的

所有的电话，可以破译从梵蒂冈到瑞典的所有的密码。直到 1942 年，美国驻波恩大使馆的每一封密码电报，都被他们在 24 小时之内送到戈林或希特勒的手中。只是由于该研究所的一名工作人员叛逃美国，才使美国人堵上了这一漏洞。最初，这个研究所只有 4 名密码破译人员，到 1933 年 7 月，研究所扩至 12 个人。此后，戈林利用他的权力，每年都给这个机构拨去大量资金，使其扩充人员和配置装备。到纳粹倒台之前，这一机构的成员已达到 3500 人以上，并且分布在德国的各个要害机关和被占领国家。这一机构的成员都是严守纪律的死硬纳粹分子，在该机构存在的 12 年中，只发生过一起泄密事件，该机构创立不久，戈林就把这一机构的管理大权交给了对他像儿子一样俯首帖耳、无限忠诚的保罗·克尔纳。在戈林落魄时，他曾对戈林倾力相助，堪称戈林的患难知己。这个头脑简单的花花公子，此时凭着同戈林的亲密关系，一步登天，成为柏林城内有名的小太保。

希特勒给了戈林在德国境内任意窃听电话的权力，戈林也竭尽全力保住这一特权。即使是在后来盖世太保不可一世的时候，对这个特殊而神秘的机构多次想打主意的希姆莱、海德里希之流，也没能从戈林手中夺走这一特权。尽管希姆莱、海德里希曾经多次向希特勒要求接管这个机构，但每次希特勒都告诉他们，戈林完全可以胜任这个机构的领导工作，请他们不必费心。在希特勒的心目中，戈林始终是他最信任的人，1935 年 4 月，这个机构的第一任主任欣普夫由于桃色事件自杀后，戈林就将直接管理这一机构的重任委派给了他的密友、黑森的克里斯托夫亲王。

在 1935 年之后，戈林又将研究所搬进了柏林市中心的一座豪华的大楼里。大楼的内部装修采用宾馆标准，气派舒适。每天，数百名技术人员和语言专家在这里紧张地从事着各种窃密和破译工作。戈林亲自制定了严格的保密制度，所有人每天进出楼内，都要接受严格的检查。楼内的任何东西，每天都要进行登记，即使是监听人员写过的草纸，也要同标有“研究成果”的棕色卷宗一同编号，载入日志。“研究成果”的接送都有专人负责，接送人员都必须通过审查，还要举行宣誓仪式，如有违犯规定者，格杀勿论。每一个“研究成果”都要装在一个经过特殊处理的信封里，然后装入一个加锁的邮袋中，接收者要签署一式三份的收条。

到 1937 年，戈林的研究所的情报工作已经成为纳粹德国对外间谍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仅柏林一个地区，研究所每天昼夜 24 小时就要窃听 500 多个电话，主要的窃听对象是各国的公使馆、大使馆、驻柏林的记者，以及所有被认为对纳粹政权有威胁的敌对分子。

据曾在戈林研究所工作过的一个名叫格哈德·诺伊恩霍的纳粹分子在自述中回忆，他曾经是一个语言学家。1936 年 9 月，他被分派到戈林的研究所工作。他本来很为自己的语言才能自豪。但到这里后，他发现自己只不过是机构中上千名专家中的一名普通的工作人员罢了。他在自述中说，研究所占据的大楼，被划分成若干个区，即英、美、苏、意、葡、比、荷、波等语言区。他被分配在法、比区工作，每天负责监听法国大使馆、比利时大使馆以及这两个国家驻柏林记者的 40 多个电话。所有通过德国陆地的通讯线路、附近海域的海底电缆无一不是戈林研究所的“研究”对象；甚至英国与印度之间的通讯电缆、法国与爱沙尼亚之间经过波罗的海的电缆，也被戈林研究所的蛙人搭上窃听的线路。研究所大楼地下室中的 50 多台同步电传打字电报机，每天都为戈林提供从政治动态到一公斤鸡蛋的价格这样巨细无遗的情

报。这些情报使戈培尔的宣传部可以及时对国外报纸就德国事务的评论作出反应，也使纳粹德国的经济部在对外贸易中能够占据主动。戈林为了确保自己对研究所的控制，对下属人员规定，所有的情报都必须首先由他过目，然后再由他决定向哪一个部门递送。此外，如果发现他的电话被窃听，必须立即向他汇报，以便及时检查他的电话的保密措施。研究所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和源源不断的“研究”成果，更使得戈林受益匪浅，他在希特勒心目中的地位远远超过其他权力竞争对手。

除了上述工作之外，戈林还亲自布置手下的人监听一些纳粹要人及其亲信的谈话。如弗兰克尼亚地方长官施特莱歇尔，由于被戈林认为是一个“讨厌的家伙”，因此其电话被监听。就连戈培尔的情妇、捷克女演员丽达·巴洛娃和希特勒的副官等人也是戈林监听的对象。

随着权力的不断增长，戈林的那种病态的虚荣心日益膨胀。他对那座建于俾斯麦时代的普鲁士总理官邸越来越不满意，终以普鲁士内政部的名义选了一个巨大的别墅，并让财政部为他拨出一笔72万马克的装修经费。当财政部的国务秘书兰德拒绝提供这一笔巨款时，戈林愤愤地说：“我不想由于财政部对我的指手划脚就实行独裁，但我也不能由于他们就放弃我的计划。”戈林根本就没有理睬财政部。几个月后，一座富丽堂皇、内外装修一新的总理官邸，示威般地矗立在人们面前了。戈林没有忘记为他的克尔纳刻意装修了一间大房子。

在这一时期，戈林最感兴趣的事情还是德国空军的兴起。早在1932年2月，戈林在参加“杰出飞行员俱乐部”的一个舞会时，就含着眼泪对在场的人说：“我相信，德国空军一定会重新东山再起的。在未来重建的德国空军中建立的第一个中队，将被命名为‘里希特霍芬中队’。”的确，戈林即使是在力争权夺利激烈拼杀的关头，也没有忘记有朝一日如何由他亲手建立德国的空军。在纳粹夺取政权后，戈林觉得重建德国空军的时机已经到来。然而他也明白，在当时的德国，重建空军的工作是异常困难的。依照《凡尔赛和约》的有关条款，绝对禁止德国重建空军，各国政府始终密切注视着德国在军备方面的一举一动。早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政府就已经为德国军队的重建打下了一定的基础。根据一个秘密的条约，德国在苏联设立下一系列的飞机、大炮、毒气甚至潜艇的试验场。在苏联南部的利佩茨克，一个名叫库特·施图登特的德国军官还修建了一个简陋的机场，作为新型飞机的试验基地。同时，还有一些德国军官在进行坦克训练，在二战中以坦克闪击战而闻名的古德里安，就在利佩茨克附近的一个坦克训练学校学习坦克战术。在莫斯科附近的亚吉，德国还设立了一个秘密的航空研究所，1932年9月，当时仍为汉莎航空公司总经理的米尔希，就曾视察过这里。

戈林的计划是先借用业余航空俱乐部和民用航空的招牌，建立一支小规模空军，然后在1935年至1938年，迅速将其扩展为大规模的空军部队。戈林的计划得到了希特勒的赞同，并且从希特勒那里得到了全权处理有关建立德国空军的一切事务的权力。戈林正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开始大把大把地投入资金，以至每当戈林出现在财政部的时候，财政部长都感到头痛。国防部长布隆贝格由于空军方面的花费太大，而向戈林抱怨，戈林却很强硬地对他说：“没花你的钱，是吧？”1933年3月，在戈林的力主下，秘密空军部队成立，戈林推荐他的密友米尔希担任了这一机构的负责人。4月，戈林与米尔希一起向德国国防部提出，德国空军应独立于陆军和海军之外，国防部长

布隆贝格将军同意了他们的要求。5月，米尔希与德国国防部签订了生产1000架军用飞机的合同。戈林在合同签订后，与米尔希商谈时说：“我现在不要求飞机的质量有多高，最关键的问题是要训练出一大批熟练的飞机制造工人。”这番话，戈林是针对与英法相比还很落后的德国航空工业基础而言的，此时德国只有3500名飞机制造工人，最大的容克飞机制造厂，年产量仅为18架容克18型运输机。为了牢牢地控制未来的空军，戈林任命他在一战时的战友勒歇泽为空军飞行专员，在业余飞行俱乐部专事飞行员的训练工作。另外，戈林还从陆军调来几名精明强干的军官，瓦尔特·韦弗上校担任事实上的空军参谋长，阿尔伯特·凯塞林上校负责秘密空军的行政管理工作，汉斯·施通普夫上校为负责秘密空军的人事工作的参谋长。这一切都在极为秘密也极为迅速地进行着。

施通普夫上任后，立即从陆军和海军航空兵中调入了一批飞行员，专门对他们进行训练。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训练出1000名飞行员，当他把这一成绩报告给戈林时，戈林兴奋异常，对施通普夫大声说：“那你就再训练1000名。”

戈林在组建空军的过程中，也遇到过一件头痛的事，那就是航空界实力派人物米尔希与他的关系越来越不好。这倒不是戈林想把米尔希怎样，而是米尔希对戈林越来越大的名气感到莫名其妙的气愤和嫉妒，常常与戈林过不去。米尔希与戈林一样，也是一个野心勃勃、心狠手辣的人。早年，他在戈林落魄之时，曾对戈林有过帮助。在纳粹党刚刚兴起之时，米尔希就感到纳粹党奇货可居，与戈林过从甚密，并向他表示要加入纳粹党。当时，希特勒考虑到米尔希在航空界有很大的影响，所以让他暂时留在纳粹党外，以党外人士的身份为纳粹效力，而将秘密申请书交给了戈林。直到纳粹党上台后，米尔希才正式加入纳粹党。

如果公正地说，纳粹德国空军的真正的设计者应该是米尔希。在接受了戈林分派的任务后，他为纳粹空军的建设绞尽了脑汁。与戈林的浮夸自大和粗枝大叶的作风不同，他是一个讲求实际效果，同时也非常严谨的人。在纳粹空军的组建中，他运用自己丰富的企业管理经验，将每一个环节的工作都有条不紊地安排好，尽量做得尽善尽美。比如，对建立航空实验室、气象站、飞行学校等工作，他都脚踏实地地进行了规划。可是，米尔希的想法常常与戈林的要求有极大的冲突，尤其是在花费时间的长短方面。当米尔希将他费尽心血制订出的计划交给戈林看时，戈林却每每捧腹大笑，说：“你想在5年里才将这一切准备停当？老兄，告诉你，你只有半年的时间。”米尔希对戈林的颐指气使极为不满，他认为，戈林对于空军的建设，除了指手划脚，说一些外行话之外，根本就没有真正做过一件实事。在几次内阁会议上，担任国务秘书的米尔希嘟嘟囔囔地说，真正的空军部长应该就是他。特别使戈林不能忍受的是，米尔希又怀疑他在注射吗啡，并向他发出了警告。戈林对此很恼火，但他深知米尔希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材，又是自己多年的好友，所以还下意识地不愿意一下子撕破脸。米尔希对戈林的一番苦心却没有任何表示，更不想领他的情。有几次戈林与米尔希通电话，都被米尔希挂断了。

一件意外的事情让米尔希在戈林面前低下了头。米尔希的政敌——巴伐利亚冲锋队的头目克罗奈斯，偶然发现米尔希的父亲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犹太人。为了搞垮米尔希，他逢人便讲，很快使这件事不胫而走，在纳粹党内风传开来。戈林得知这件事后，立即觉得逼米尔希就范的一个绝好的机会来了。

一天，戈林约米尔希去上萨尔斯堡参观他选定的别墅的地点。在路上，戈林装作漫不经心地对米尔希说，有人揭发他的父亲是一个犹太人。米尔希大吃一惊，当场就语无伦次地对戈林说，他将对自己的血统做一次调查。戈林则安慰他说，自己会帮助他的。两个月后，米尔希给戈林带来了一封米尔希母亲的信，信中说，他不是他父亲的亲生儿子，他的生身父亲是米尔希父亲的叔叔，米尔希是一桩家庭乱伦事件的产物。尽管将这种丑恶的家庭关系告诉别人，米尔希很感尴尬，但这总归可以说明米尔希只有一半犹太血统，一半总比全部要好。失宠事大，面子事小，孰轻孰重，米尔希看得很清楚，事到如今，他实在顾不了那么多了。戈林乘机拉拢米尔希说，不要为此事担忧，他要亲自妥善地处理这件事。不久，克罗奈斯就被戈林撤职，直到被法庭以诽谤罪起诉，克罗奈斯这个十足的可怜虫不明白自己已成为戈林的政治阴谋的牺牲品。事过之后，米尔希果然对戈林感激涕零。戈林着实为米尔希的降眼高兴了一阵子。米尔希再也不为他是否是“真正的空军部长”而计较了，再也不对居于戈林之下而耿耿于怀了，从此他便心甘情愿地为戈林卖力，为他人作嫁衣。

在米尔希的主持下，纳粹德国的空中力量很快便发展起来。8月25日，第一架新型轰炸机的样机生产出来，米尔希将它伪装成容克型客机。德国各地的飞机制造工厂陆续投入生产，其规模也有明显的扩大，仅容克飞机制造厂的工人人数就已达13500名。在德国各地，大约还有200万人在为未来的空军兴建机场、营房等各种设施。8月31日，为了表彰戈林在建设德国空军中的“卓越贡献”，兴登堡任命他为德国空军上将。作为回报，戈林将东普鲁士的一个庄园送给了老总统。

10月，按照戈林的指示，容克飞机制造公司被收归国有，作为轰炸机和战斗机的主要生产基地，科彭贝格受委任管理这些工厂。戈林深感天地确实变了，如果他一直在空军中的话，从上尉到上将，在正常的情况下，即使一帆风顺，也得付出一生的精力。

戈林如今真应该满足了，他几乎什么都有了。头上顶着一大堆头衔，什么德国国会议长、德国内阁成员、普鲁士总理、德国空军上将等等以及一些莫名其妙的职务，都加在了他的身上。但是，戈林并没有感到满足，一有机会，他就想再捞取一点权力，哪怕是与他没有任何关系的职位，他也会趋之若鹜。当他得知文化部长鲁斯特没同他商量，就任命了“帝国主教”时，马上表现出极大的不满。在给鲁斯特的信中，戈林除了发泄自己的不满之外，居然厚颜无耻地提出，帝国主教应该由他来担任。在信中，戈林写道：

我很惊讶地发现，任命已经成为事实。但是，我仍然认为，在没有帝国教会只有地区性教会的情况下，不应该任命帝国主教。革命以前（指1918年的11月革命），普鲁士国王是普鲁士教会的大主教。我认为，现在这种权力应该移交给普鲁士政府，即普鲁士总理……

戈林对这件事并没有就此罢休。不久，由于德国各教会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希特勒试图予以调节，却未能成功。为此，希特勒决定建立一个新的教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一新的教派被命名为“日尔曼基督教”。全德29个教会以民主的办法推举柯尼希斯贝格的路德维希·穆勒担任帝国主教。戈林听说这一消息后，心里很不是滋味。不过，他也知道，他不便直接

向希特勒要求担任这一职务，虽然心有不甘，却又一时拿不出太好的计策。与此同时，一位叫马丁·尼莫勒的教士组织了一个名为“教区紧急牧师联盟”的组织，用以同穆勒相对抗。戈林起初对此事抱着隔岸观火的态度，漠然地注视着这场同他已无太大利害关系的争端。但是不久，戈林便发现自己即使当不上帝国的主教，也可以利用这一矛盾达到控制教会的目的。他首先找到穆勒，说他可以帮助穆勒击败尼莫勒组织的反对活动。穆勒见戈林居然肯为他出头，感激万分，因为他知道这位总理此时在德国几乎没有办不成的事。戈林如果出面帮助他，他就可以高枕无忧了。戈林没有对帝国主教提出任何条件。对于他来说，帝国主教的诚惶诚恐之态和阿谀奉承之词，甚至要比当上帝国的主教还要令人快慰。以后就是戈林想通过教会为他做点事情，穆勒能不鞍前马后地为他效力吗？

与穆勒见面后，戈林开始让他的研究所日夜监听尼莫勒的电话，同时，让手下的人搜集尼莫勒的“教区紧急牧师联盟”的各种档案。

功夫不负有心人，机会终于有了。1934年1月25日，在希特勒将接见尼莫勒等反对派牧师代表时，戈林的研究所终于窃听到尼莫勒对希特勒不利的谈话。当接见正在进行的时候，戈林手持一个红色的卷宗急火火地走了进来，他向希特勒扬了扬手中的卷宗说：“我的元首，作为普鲁士的总理，我请求您允许我向您读一份刚刚收到的——”他故意地停了一下，指着尼莫勒说：“这位紧急牧师联盟主席的一份电话记录。”瘦小精悍的尼莫勒不解地看着戈林，不知道戈林要说些什么。希特勒知道，这位无孔不入的普鲁士总理肯定得到了什么值得注意的东西，“读吧。”希特勒说。在场的人也都怔怔地望着戈林。戈林慢条斯理地从红色卷宗中抽出几份棕色文件，拿出其中的一份念道：“我们已经装好了‘炸药’，我们已经将备忘录呈交给总统，我们已经使他下定了决心。今天的教会事务会议召开之前，总统要拘捕总理，让他得到应有的惩罚。”尼莫勒这时才恍然大悟，他的电话被戈林派人窃听了。他听着这似是而非的“电话记录”，脑中一片空白，记不清自己在电话中究竟都说了些什么。他看到希特勒的眼中射出阴冷的光，狠狠地盯着他说：“你真以为用这种见不得人的伎俩就能在我和总统之间埋下你的‘炸药’吗？就能威胁到帝国生存的基础吗？”尼莫勒明白，他现在就是浑身是嘴也说不清了。他张口结舌，半天才嗫嚅着说：“总理先生，我的动机只是为了教会，为了耶稣基督，为了第三帝国，为了您的日尔曼人民着想。”希特勒厉声打断了他的话，对他说：“请把为第二帝国着想的事留给我吧！”尼莫勒沮丧地低下了头。戈林见状，知道尼莫勒大势已去，现在只剩下趁热打铁，再施以最后致命的一击了。戈林对着尼莫勒继续念道：“我们给他（指兴登堡）浇灌了许多的圣油，他决定把这个混蛋赶出去。”念到这里，尼莫勒站起来，大声地分辩说：“这不是我的话。”

希特勒一句话都不说，只是冷冷地看着他。戈林暗暗高兴：尼莫勒这下子彻底完蛋了。他见目的已达到，就不再说话，坐在沙发上幸灾乐祸地看着痛苦的尼莫勒走出门外。当天，戈林派警察搜查了尼莫勒的住所，但没有找到任何尼莫勒将要谋反的证据。两天后，尼莫勒被解除了一切职务。

纳粹德国倒台后，人们在戈林的总理府的档案室中找到了尼莫勒电话的真实记录。原文是这样的：

尼莫勒与一位没有透露姓名的人通话。尼莫勒告诉他说：总统在中午 12 时在更衣室召见了希特勒。这是最后的一个步骤！总统会见他时，手中拿的是我们的报告。在内政部交涉的结果也很好（没解释如何交涉的）。

“我太高兴了，我已经很好地控制了迈塞纳（注：兴登堡的国务秘书）。如果出现意外——这是我不希望的。我们已经为自由教会带来了一个好的开端。下午晚些时候再给我一个电话。那时我想会有更多的消息的。”

监听时间：1934 年 1 月 25 日上午 10 时 15 分

这就是戈林研究所监听到的尼莫勒的电话的真实记录。通过这件事可以看出，戈林瞒天过海的本领有多么高超。这也是戈林利用他的研究所为其击败对手服务的一个小小的例子。

戈林在这段时间早，又开始注射吗啡。许多人都已经注意到这一事实，只是没有胆量说出来。在吗啡的刺激下，戈林无限膨胀的虚荣心促使他做出了一系列不顾廉耻的事情。他对巨额财富的追求和对令人肉麻的奉承的渴求，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整个德国，几乎所有的城市都要定期向他进贡，社会各阶层的各色人等投其所好，将各种各样的礼物源源不断地送进戈林府邸。索取贿赂、接受礼物，成为戈林总理府的一项重要的工作，他手下的工作人员很快便使这项工作系统化和制度化了。

戈林在金碧辉煌的总理府住腻了，他计划建造一座庄园式的别墅，并将庄园命名为“卡琳庄园”。巴伐利亚邦政府以“赔偿在 1923 年戈林先生所遭受的损失”为名，送给他一块上萨尔斯山区最好的地皮。这里位于四周环绕着森林与湖泊的山顶平原，既可以欣赏到一望无际的茫茫林海和美不胜收的湖光山色，又可以随时到森林中猎取各种野兽。戈林让建筑师将他第一次与卡琳相遇的地方——他一直无法忘怀的罗克尔斯塔特城堡中的一个木制猎屋绘成图样，作为卡琳庄园的第一期工程。不久，这个木质的小猎屋建成了。戈林带着随从来到这里，他忽发奇想，让他的随从罗伯特给他套上带着金马刺的俄罗斯式长统马靴，披上一件拿破仑式拖地披风，外套一件丝织的宽松罩衫，手持长矛，耀武扬威地穿行于丛林之中，小丑一般滑稽可笑，大概他是想扮成中世纪的条顿骑士的模样。兴奋之余，他又万分伤感地想起了卡琳，想到如果她能活到今天，看到如今的戈林的一切，一定会赞赏不已、甚觉欣慰的。回到柏林不久，戈林就派人通知卡琳山庄的工人，让他们在山庄下面的湖畔为卡琳建造一座陵墓。他准备日后将卡琳迁葬此处。

戈林雇用两名普鲁士的宫廷建筑师为他设计卡琳庄园的图纸，他不断地对每一个细节吹毛求疵，连门把手的式样都要由他最后敲定。建筑师只好按照戈林的意见反复修改图纸，直到戈林满意。

10 个月后，一座宫殿式的建筑落成。这座建筑的外表百般雕琢，极尽浮华之能事，内部装修则足以同普鲁士王宫相媲美，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屋顶装有枝形水晶吊灯，墙上挂着佛兰德尔的挂毯、文艺复兴时代画家的名作，以及其他难以计数的从各地搜罗来的珍贵的装饰品。与戈林的卡琳山庄相比，希特勒距此不远的别墅就显得寒酸了一些。建造这座建筑花费的 1500 万马克巨资，全部划归空军部和普鲁士政府的经费预算，由这两个机构支付。

戈林为了显示他作为纳粹德国二号人物的显赫地位，在希特勒访问意大利回国后，便邀请希特勒参加卡琳的迁葬仪式，希特勒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來。希特勒之所以这样做，大概除了不能不给戈林面子外，还因为他对这位



瑞典女伯爵一直抱有好感。在希特勒入狱期间，是卡琳一次次地出入德国与意大利，为戈林带去他的指示。同时，这位女伯爵也是纳粹运动的狂热支持者，戈林参加纳粹运动，并能历尽坎坷，坚持下来，没有卡琳的帮助是不能想象的。1934年6月20日，卡琳的迁葬仪式举行。这个隆重的仪式不仅轰动一时，其规模就是在现代德国的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一辆专列将卡琳的石棺从斯德哥尔摩经北普鲁士运至距卡琳庄园最近的上萨尔斯火车站，在专列经过的所有的城镇，人们都要遵照戈林的命令佩戴黑纱；在沿途车站，希特勒青年团的团员们列队肃立，迎接专列进站；少女联合会的会员则在列车经过的大桥旁撒满鲜花；铁路两侧，成千上万的妇女向早已作古的总理夫人致哀。戈林与希特勒两人在车站脱帽肃立，等待专列的到来。

在卡琳山庄，戈林邀请了数百名来宾参加隆重的迁葬仪式，其中有各国的外交官和政治家，以及卡琳的一些亲属。在苍凉的猎号声中，十几名虎背熊腰的大汉吃力地抬着沉重的石棺走了过来，然后缓缓地将石棺放入花岗岩陵墓中。

戈林终于了却了一桩心事，通过此举，他既寄托了自己对亡妻的深情厚意和无尽哀思，也向世人表明，他戈林是个有情有义的人，以换取人们对他的好感，树立他在人们心目中的良好形象。

正是：弹精竭虑握权柄，贪荣慕利欺世人。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 第七章 屠龙之夜

争权夺利结同党，血腥清洗除异己；

穷奢极欲现怪癖，大肆铺张办婚礼。

在 30 年代初期的德国政坛上，戈林被右翼势力人士称为“雄狮”。可实际上，在同政治无关的日常生活中，戈林是一个十足的胆小鬼。曾经给他治过牙病的布拉施克医生后来回忆说，戈林对疼痛的惧怕程度在他所治疗过的病人中是少见的。“有一次，我发现在我将要给他治牙时，他竟然怕得发抖。”但是，在政坛上的拼杀中，戈林却是一个冷血的杀手，对政敌，他没有任何恻隐之心，必将其置于死地而后快，绝不手软。1934 年纳粹党对罗姆及其同党的大规模清洗，使戈林的凶残本性得到了一次大暴露，足以证明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杀人魔王。

希特勒在夺取了德国政权之后，面临着一系列急待解决的问题，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消除罗姆的冲锋队与德国国防军之间的矛盾。冲锋队在纳粹党的早期历史中，曾经为纳粹党的存在和发展，以至后来的上台奋力拼杀，立下了汗马功劳。戈林也是靠冲锋队起家的，他是冲锋队最早的队长之一。尽管冲锋队一直控制在罗姆手中，但戈林却能让罗姆充分信任他，使他能借助冲锋队的势力在纳粹党中站稳脚跟。在戈林流亡的日子里，与党内其他一些人相比，罗姆还算是能对得起戈林的。

罗姆生性粗鲁，且为同性恋者。在德国的上流社会中提起罗姆，几乎没有人不嗤之以鼻。同时，他又是希特勒的得力干将，手中掌握着数以百万计的纳粹冲锋队员的指挥大权，似乎没有人敢公开对罗姆有任何微词。罗姆依仗其手下的冲锋队的势力——此时冲锋队员已达 200 万人，几乎是陆军的 20 倍——在希特勒出任总理后，提出“第二次革命”的口号，他的所谓第二次革命的对象就是那些没有加入纳粹党的大企业家、金融家、容克地主及控制陆军的德国军队的上层人物。罗姆的第二次革命的口号的拥护者在纳粹党中有人在，戈培尔最初也是第二次革命的积极倡导者。罗姆认为，第二次革命的对象将对纳粹的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形成威胁，不把他们彻底消灭，纳粹党就不能真正控制德国。

然而，希特勒却不这样认为。在他看来，纳粹党所提出的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只不过是一个宣传口号和夺取政权的手段而已。在他已经牢牢地掌握了德国政权之后，他在纳粹党中制定的对所有社会上层人士进行彻底革命的纲领，已经失去了意义，他的政权必须得到这些人在政治和经济等各个方面的支持，至少在现在是这样。这些人的力量并没有因为纳粹党夺取了政权而被削弱，如果将这些人统统变成了革命的对象，失去这些人的有力支持，势必将威胁到纳粹政权的生存。在纳粹取得政权后不久的 1933 年 7 月，希特勒在对纳粹党和冲锋队的领袖们讲话时说：“对于任何破坏现有秩序的企图，我将同所谓第二次革命一样加以无情的镇压，因为这只能造成混乱。”7 月 8 日，希特勒在纳粹各邦邦长的会议上又郑重地提出这一警告：

革命并不是一件永久不断的事情，绝不能允许它成为这种事情。必须把革命的激流引导到逐步发展的安全的河道里去……因此我们绝不能排斥一个好企业家，即使他还不是一个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党员，特别是如果接替他的位置的国家社会党的党员一点也不

懂得他的业务……

历史判断我们的功过时，并不是根据我们撤换和监禁了多少经济专家，而是根据我们能否造成就业……我们并不因为纲领中的一些主张就必须干出蠢事，把一切都弄得七颠八倒，而是必须明智、谨慎地实现我们的理想。从长远来说，我们的政权越是有经济上的支持，就越是稳固。因此各邦邦长必须作到，任何党组织都不得代替行使政府的职权，撤换或任命官员，这是全国政府的职权，至于企业方面，那是经济部的职责。

希特勒的这番话极为露骨他说明了纳粹党的革命决不是一场经济革命，而是一次旨在夺取政权的政治革命。这场革命的前提就是不仅不触动德国大资产阶级和容克地主的利益，反而要保护这些人的利益。在希特勒的心目中，纳粹政权的真正的社会基础，就是这些人，而不是党纲中所说的工人群众。为了证明他言之有信，在7月8日的讲话后，希特勒撤换了一批企图夺取德国雇主协会控制权的纳粹分子，恢复了军火大王克虏伯和钢铁大王蒂森等人在这类协会中的领导地位；解散了专同大百货商店店主作对的中产阶级斗争者联盟；还任命了大资本家、原德国最大的保险公司联盟保险公司总经理卡尔·施密特接替去职的休根堡，就任经济部长。

希特勒的所作所为，遭到以罗姆为首的冲锋队主要领导者的强烈反对。在对陆军的看法上，希特勒也与罗姆的看法大相径庭。罗姆认为，冲锋队不仅是纳粹运动的骨干力量，而且应该是未来德国军队的核心。这支军队对希特勒的作用，如同法国革命时期法国义务军之于拿破仑的作用一样。在纳粹夺取政权之后，希特勒不能再让那支由“老傻瓜”们（罗姆将陆军中的将军们称为“老傻瓜”）指挥的德国陆军存在下去，而应建立一支由他和他的战友们指挥的军队。与之相对，希特勒在纳粹运动开始兴起时就认为，罗姆的冲锋队是一支政治力量，而不是一支军事力量，它的最重要的任务是以必需的暴力和恐怖手段，为纳粹夺取政权扫清障碍。在取得政权后，冲锋队的使命也就完成了，这个组织也就该寿终正寝了。大概没有人比希特勒更清楚，如果没有德国陆军的支持，至少说没有得到陆军的默许，纳粹党是不可能夺得政权的。而且，希特勒心中还有考虑，在86岁的兴登堡死后，他绝对不能失去陆军对他的支持，否则可能会危及他的地位。同时，他还认为在未来实现《我的奋斗》一书中所提出的目标，最主要的还是要依靠德国陆军的力量，而不是只知道在街头巷尾寻衅闹事的冲锋队。他需要的是能够指挥战争的军事将领，换言之，也就是德国陆军中的军官团，也只有他们，才有可能使希特勒在短期内建立一支强大的德国军队的梦想成为现实。有鉴于此，希特勒认为，现在已到了采取策略使罗姆的冲锋队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此外，希特勒还有更深一层的忧虑，那就是罗姆的冲锋队的力量不断增长，已到了无法驾驭的地步，对他的地位和权威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如果有一天，罗姆真的悍然发动一场所谓的第二次革命，即便能够将其镇压下去，也会使纳粹党的元气大伤，从而给纳粹的政敌以可乘之机。

在罗姆提出进行第二次革命的最初一段时间里，希特勒与戈林对罗姆采取了忍让的态度，试图说服罗姆放弃第二次革命的主张。在罗姆提出往戈林掌握的各机关派遣特工人员时，戈林满足了罗姆的要求。罗姆非但不以此为满足，反而步步紧逼，以至这两个纳粹运动的元老之间关系十分紧张，到了箭拔弩张的地步。1933年11月5日，罗姆在冲锋队举行的一次大会上扬言：“现在有人说冲锋队已经失去了存在的价值，那么我告诉他们，事实并非如

此！”与此同时，罗姆私下里已经开始为他的第二次革命作准备。他与其亲信多次就第二次革命的具体行动步骤和革命后的安排进行磋商，并商定在革命成功后，由施莱歇将军取代希特勒担任总理，特奥·克劳奈斯取代戈林担任空军部长，他本人担任国防部长，冲锋队则完全取代整个陆军的地位。

希特勒与戈林对罗姆的阴谋都有所察觉，都显得很紧张，只是两人所要采取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完全不一样。希特勒仍然主张要以和平的方式挫败罗姆的阴谋，悄悄地消除这场危机。戈林则不然，他劝说希特勒一定要以最严厉的手段镇压罗姆及其冲锋队，严惩他们的叛乱行为。无论戈林怎样劝说，希特勒就是不肯放弃与罗姆和解的希望，反过来一再劝戈林暂时忍让。10月，冲锋队的篡权阴谋已露端倪，并开始付诸于行动。在戈林的总理府，经常出现罗姆亲自安排的由冲锋队员组成的警卫队。戈林对此深感不安，但由于没有得到希特勒的指示，只能徒然叹气。

希特勒利用一切机会安抚罗姆和他的冲锋队。12月1日，希特勒把罗姆安排进内阁。在元旦来临之际，他给罗姆写去一封热情洋溢的信：

……因此，在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结束一周年之际，我觉得必须向你，我亲爱的恩斯特·罗姆，对作为国家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和德国人民所做的不可磨灭的功绩，表示感谢，并向你保证，能够有你这样的人做我的朋友和战友，我对命运是多么的感激。

你的怀着真诚友谊和感激之情的

阿道夫·希特勒

不过，在这封信中，希特勒又一次重申陆军的责任及其对德国的重要性。同时也申明冲锋队的任务是“确保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胜利和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

这封信后来被刊登在纳粹党的主要报纸《人民观察家报》上。此举对于暂时平息冲锋队员的不满情绪，缓解希特勒、戈林等人同罗姆的矛盾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从根本上说，罗姆并没有因为希特勒任命他为内阁成员及对他和他的冲锋队表现出的友好态度，而完全放弃他的第二次革命的企图。新年过后不久，罗姆又开始了新的活动。2月，他在内阁的一次会议上提出一个建议，即以冲锋队为基础，建立一支新的国防军，将军队、冲锋队、党卫队以及一切退伍军人团体都置于一个国防部之下，由国防部统一指挥，他本人担任国防部长。他还不顾希特勒有关只有陆军才能从国外进口武器的禁令，指使手下的人继续从国外进口武器，罗姆的肆无忌惮的行为，激起了以戈林为首的反罗姆的纳粹上层人物的极大愤慨，陆军的主要将领冯·布隆贝格将军及其助手冯·赖歇瑙将军、陆军总司令维尔纳·冯·弗里奇将军，这时都向戈林表示了自己的不满，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反罗姆的同盟形成了。不久，军官团的几个主要将军，联名上书兴登堡，要求兴登堡出面，制止罗姆的危险行为，以免冲锋队毁掉了德国陆军。希特勒见状，也出来安抚陆军，表示他不赞同罗姆的主张。希特勒还向为打破裁军僵局到柏林做工作的英国人安东尼·艾登表示，将把冲锋队的人数减少一半，对其余人员，也将不再进行军事训练，不进行武装。这一消息传出后，罗姆对希特勒的不满更加强烈。在内阁中，罗姆不断发难，经常与陆军在内阁中的代表、国防部长勃洛姆堡将

军大吵。勃洛姆堡将军向希特勒抗议说，罗姆冲锋队正在装备重武器，这不仅将要威胁到陆军的生存，也很可能使希特勒秘密恢复德国武装力量的计划落空。希特勒向勃洛姆堡将军表示，他将全力维护陆军的地位。

希特勒还有一个打算，这就是在兴登堡去世后，由他继任总统的职务。这一愿望能否实现，还要看他能否得到军队的支持。4月11日，希特勒利用在东普鲁士柯尼斯堡参观军事演习的机会，在“德意志号”巡洋舰上向陪同他参观的国防部长勃洛姆堡将军、陆军总司令弗里奇将军、海军司令雷德尔将军正式提出，他要在兴登堡去世后担任总统，希望得到军方的支持。作为回报的条件，希特勒许诺坚决制止罗姆发动第二次革命的企图，大大削减冲锋队的人数，保证德国军队成为德国唯一的拥有武器的合法军事组织。海军司令雷德尔立即表示同意希特勒的意见，陆军司令弗里奇则提出，他将把希特勒的条件交由军官团讨论，然后再给希特勒以明确的答复。希特勒在5月16日得到了陆军的答复，全体军官团成员将支持希特勒在未来的日子里接任总统职务。希特勒又一次得意地笑了。这一次，他不但有了得到总统位子的把握，也使陆军从此彻底归附，为他所用。而他付出的代价则是微不足道的——仅仅牺牲他早就要抛弃的冲锋队而已。这一次秘密交易所达成的协议后来被称为“德意志号协议”。

接下来就该收拾罗姆了，希特勒必须履行他对军队的诺言。在希特勒与军方讨价还价之时，戈林也在加紧组织他的反罗姆同盟。由于戈林在前一年已经晋升为陆军上将，同时在一战期间他就是一名军官，因此自然而然就被陆军军官团视为自己的成员。这样一来，反罗姆的斗争，对戈林来说就有着双重意义。一方面，他作为纳粹党的要员和希特勒的亲信，必然要拼死维护希特勒的地位和利益。希特勒的命运同他的前途密切相关，希特勒如果被罗姆搞垮台，他戈林是绝对不会有好下场的，极有可能被罗姆清洗掉。另一方面，他作为陆军军官团的一名成员，陆军的境况又会直接对他产生影响，至少关系到他能不能将那身心爱的军装继续穿下去。戈林现在的一个首要的任务是找到一个同他一样心狠手毒的合伙人，以便联手对付罗姆。经过再三考虑，他把目光落到了海因里希·希姆莱的身上。

希姆莱在加入纳粹党之前，是巴伐利亚郊区的一个养鸡场的场主。他于30年代初期加入纳粹党，后来担任希特勒的卫队——党卫队的头目，隶属罗姆的冲锋队。希姆莱外表文雅，举止稳重，长着一副小学教师的模样。实际上，他是一个工于心计，阴险可怕，为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人，到1934年初，希姆莱已经控制了除普鲁士警察之外的全部德国的警察力量。起初，戈林对希姆莱并没有多加注意。直到此时，他才仿佛突然发现，要清除罗姆的势力，希姆莱将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得力的帮手。

戈林虽然极想拉拢希姆莱打击罗姆，但在没有摸清希姆莱的底细之前，他并不敢轻举妄动，希姆莱毕竟是罗姆手下的人，一旦弄巧成拙，将对他很不利。与此同时，戈林对他的盖世太保也越来越不放心。他不断得到消息说，盖世太保的头子迪尔斯正背着他与罗姆打得火热。早在1933年9月，戈林就曾得到情报，将有一次直接针对他的暗杀发生。戈林令迪尔斯负责破案，迪尔斯却一无所获，倒是希姆莱的副手海德里希破获了此案。戈林在得到迪尔斯与罗姆勾结的证据后，马上将迪尔斯解职，调他到科隆担任无足轻重的治安官。此后不久，戈林便与希姆莱摊了牌。其实，希姆莱早有同戈林合作的愿望，希望控制戈林手中的警察力量。同时，希姆莱认定罗姆不会有太大的

作为，追随他不会有什么好处，早晚要与他一起完蛋。当戈林向他提出合作的意愿时，两人一拍即合。戈林对希姆莱的承诺是将盖世太保交给他掌握，条件是在未来的反罗姆的斗争中，希姆莱必须坚决支持戈林。

1934年4月20日，在普鲁士总理府，戈林身穿他为未来空军设计的蓝灰色制服，腰挎军刀，主持了一个仪式，正式将盖世太保转交给希姆莱。不过戈林仍然留了一手，即保留了一支警察分队，作为他的卫队。这支小小的警察分队，后来居然发展成赫赫有名的“戈林师”和“戈林装甲军”。这次移交仪式，是戈林与希姆莱联手政坛的标志。

6月20日，戈林借力卡琳迁葬之机，将希特勒接到了卡琳山庄。在卡琳下葬的当天，在山庄的大厅里，希特勒、戈林、希姆莱、克尔纳等人举行了一次关于解决冲锋队问题的会议。戈林力主及时对罗姆下手，否则将养虎成患。而希特勒认为现在还不是动手的时候，他还想最后与罗姆摊牌。戈林认为罗姆不可能听从希特勒的劝告，对罗姆下手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第二天，戈林回到了柏林。当天，他就召开了州议会。在会上，戈林又一次声称：“国家社会主义的第一次革命是由元首开始的。如果元首想要进行第二次革命，我们随时听从元首的召唤。如果元首并不想进行第二次革命，那么，我们同样愿意为元首去同那些违背元首意愿的人作斗争。”会后，戈林立即布置他的研究所密切注意罗姆的行踪，并监听包括罗姆在内的冲锋队所有高级干部的电话。戈林还亲自制定了“清算之日”的行动计划和谋杀名单。他只等希特勒的命令一下，便开始同罗姆算帐。

6月下旬，希特勒已经开始感受到了来自军队和总统两个方面的压力。由于副总理巴本发表了一篇讲话，指责纳粹党实行恐怖统治，在德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纳粹党徒很是气恼。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下令以各种办法防止巴本讲话的影响进一步扩大，并不许报纸和电台发表这篇讲话。巴本得知这一切后，立即跑到希特勒那里，告诉希特勒，他不能容忍“一个下级部长所采取的这种措施”，并说他是“作为总统的委托者”讲这番话的。接着，他向希特勒递交了辞呈，并声称他要向总统汇报这件事，巴本走后，希特勒感到有些不安，因为他最近已听说总统对目前的局势颇为不满。希特勒知道总统最不满意的事情，就是罗姆的冲锋队的暴力活动的猖獗和第二次革命的叫嚣。他还听说总统正在考虑发布戒严令，将政权交给陆军。第二天，希特勒担忧的事情得到了证实。总统让希特勒到纽克台去见他，在总统别墅门前，一向在希特勒面前卑躬屈膝的国防部长勃洛姆堡一改过去的面孔，声色俱厉地向希特勒说，他奉总统的命令告诉他，除非德国目前的局面有所改变，否则总统将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交由陆军管理。当希特勒在勃洛姆堡的陪同下与总统会面时，老总统的态度同国防部长一样，严厉地重复了刚才的话。

回到柏林后，希特勒知道此刻已经到了十分危急的关头，他要是再不果断解决罗姆的冲锋队的问题，他本人和纳粹党的命运就实在难测了。想到这里，他站起身在办公室内踱来踱去。就他的本意而言，他实在不愿意眼看着罗姆走上绝路，因为罗姆毕竟是追随他多年的部下和战友。他仍在犹豫不决，究竟应对罗姆及其冲锋队采取什么样的行动。不久，戈林和希姆莱帮助他作出了决定。据后来纳粹德国的内政部长弗立克在纽伦堡审讯中作证说，最后使希特勒相信罗姆要发动政变的是希姆莱。弗立克在证词中又供认，希特勒命令戈林负责柏林方面的阻止政变的工作，希姆莱则负责巴伐利亚方面的工作。与此同时，陆军也在敦促希特勒尽快采取行动。6月25日，陆军总司令

弗里奇下令，陆军全体官兵处于全面戒备状态。6月28日，罗姆被开除出军官团，这无疑等于宣布了罗姆的末日的到来。6月29日，国防部长勃洛姆堡在《人民观察家报》上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言明陆军将站在希特勒的身后，支持希特勒，希特勒“始终是我们中的一员”。在这一天，希特勒正在威斯特发里亚视察一个劳动服役营。下午，他一回到戈德斯堡，戈培尔就来了。他向希特勒报告说，罗姆手下的干将卡尔·恩斯特已经命令柏林的冲锋队作好政变的准备。戈培尔曾经是第二次革命的倡导者之一，但在最后的紧急关头，他经过一番权衡，终于见风使舵，出卖了罗姆。不一会儿，希特勒又收到了戈林与希姆莱的电报。7月13日，希特勒在国会中就罗姆事件讲话说：“在夜里1点钟，我接到柏林和慕尼黑的两份紧急电报。第一封电报中报告，在柏林，（冲锋队）已下令在下午4时紧急集合，5时开始采取行动，先是进行突袭，占领政府各部……第二份电报中报告，在慕尼黑方面，冲锋队已经发出了紧急动员令，在晚9时集合……这是造反……，在这种情况下，我只能作出一种决定，那就是无情的流血镇压，只有这样，或许还有可能防止反叛的扩大……。”

在戈林等人的帮助下，希特勒此时已经下定决心进行一次无情的清洗。他觉得，他对罗姆已经仁至义尽了。今天罗姆居然不顾一切地悍然下令谋反，那他就只能大开杀戒了。希特勒给戈林和希姆莱回电，约定接到“蜂鸟”的暗语后，立即采取行动。戈林和希姆莱收到希特勒的回电后，立即着手布置人马，并将最后执行任务的人员名单敲定。戈林亲自将一份名单交给一名盖世太保的高级官员，让他立即飞往布累斯劳，将这份名单交给希姆莱的主要助手——“东南党卫军司令”乌多·冯·沃伊施奇，命他随时准备出动。然后，他又向米尔希下令，让他组织手下正在训练的秘密空军人员立刻赶到柏林，保卫三个飞机场和空军部大楼。

希特勒也开始了行动。他将党卫军中的“阿道夫·希特勒”卫队拉了出来，命令他们迅速赶到巴伐利亚，然后由陆军提供车辆将他们送到维希。希特勒在凌晨3时到达慕尼黑，有人向希特勒报告说，罗姆的冲锋队队员正在市内寻衅闹事。早晨8时，希特勒终于痛下动手的决心，向柏林的戈林发出了“蜂鸟”的暗号。

戈林和希姆莱手下的人马正枕戈待命。他们接到“蜂鸟”这一行动暗号后，马上将各自的亲信召来，命令他们开始行动。在血腥清洗即将进行的最后一刻，戈林还是动了一点恻隐之心，决定放几个过去的朋友和对他没有构成任何威胁的政敌们一条生路，其中包括后来与罗姆搞在一起的内政部长弗立克和副总理巴本。戈林事先将消息通知了弗立克，弗立克大吃一惊，急忙躲了起来。而巴本则不知道自己正面临着—场杀身之祸，当戈林派去的人到了巴本的办公室后，巴本居然还端着副总理的架子，迟迟不肯动身。8时45分左右，戈林亲自给他挂了一个电话，让他迅速赶到戈林的总理官邸。巴本在大厅里见到了戈林和希姆莱，戈林告诉巴本，慕尼黑发生了非常严重的事件，“一场革命已经爆发，元首让我全权负责柏林的事务”。巴本尚不知自己的性命已握于戈林之手，竟对戈林说：“戈林先生，我想知道事情的确切情况，我们又采取了什么对策。”戈林不耐烦地对他说：“我没时间细说，反正已经开火了。”巴本对他说：“那么将部队动员起来。”戈林告诉他说：“已经动员了。”巴本继续纠缠不休，并对戈林大声嚷嚷：“我是副总理，我有权知道事情的真相。”戈林不客气地打断了他的话，说：“你最好还是

回去休息，我的头都要爆炸了。我们还得研究一下如何平定这场暴乱。”说完，戈林与希姆莱小声商量了一下，希姆莱随即起身离开了。这时，一个警察走了进来，戈林告诉巴本。为保证他的安全起见，必须由警察将他护送回家。巴本在走廊里听到希姆莱在隔壁的房间里对着电话喊“你可以进去了！”

事后，巴本得知事情的真相，吓出了一头冷汗。他的办公室被党卫军搜查过，他的秘书包尔斯在办公室里被打死，他的合作者荣格则被逮捕，后在狱中被击毙。另一个合作者，天主教行动组织领袖克劳斯纳被杀。他的工作人员几乎全部被抓了起来，投到了集中营里。在事发的当天，他一回到别墅就被软禁起来，一队党卫军士兵在门前把守，电话线被切断，他等于失去了与外界所有的联系。当时他觉得这简直是对他的莫大侮辱，在明白了事情的严重性之后，反而对戈林饶了他一条性命感激不尽。

话说戈林和希姆莱的人按着他们的命令进入了指定地点，清洗行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全面展开。被列入戈林的黑名单的 150 多名冲锋队的骨干分子，几乎无一漏网。他们被带到利希菲尔德军事学院，在那里，戈林和希姆莱的行刑队将他们集体枪决。戈林则亲自带着队伍洗劫了柏林的冲锋队总部。大获全胜之后，他回到官邸，一整天都坐在大厅里的巨大的办公桌后，指挥各处的人马，并随时向兴登堡汇报情况。陆军总司令弗里奇及其助手赖歇瑙将军、国防部长勃洛姆堡、空军参谋长韦弗、希姆莱、克尔纳、米尔希等人先后都来找戈林，为戈林出谋划策。戈林向军方的人士保证，他将逮捕施莱歇和罗姆，以叛国罪审判他们。

戈林履行了自己的诺言，尽管他交给军方的是施莱歇的尸体。他派去的由 5 名杀手组成的暗杀小组，在中午时分闯进了施莱歇的家，将这位一直企图夺取德国最高权力，并为此策划了无数个政治阴谋的将军，击毙在他妻子的身旁。希特勒最仇恨的前纳粹党的二号人物、施莱歇内阁的副总理施特拉塞也被杀掉。事毕，戈林授意宣传机关，将施莱歇的死说成是“固拒捕而被击毙”。罗姆却不是戈林派人抓到的，他此时正在巴伐利亚的维希休假，是希特勒亲自带人赶到他休假的维希汉斯尔包尔旅馆，将他及其卫队在睡梦中抓了起来。

戈林的黑名单上的人物一个接一个被除掉，但这个黑名单却未见缩短，原因是戈林又把他心目中的那些仇人以各式各样的罪名列了上去，在这场屠杀中把他们一并解决了。比如，进入黑名单的有 1933 年 2 月被他解职的普鲁士警察局长克劳纳泽，曾经指责戈林违背誓言抛下同志逃往国外的记者格里希等人。到晚上 10 时，戈林领导的清洗才告一段落。无独有偶，希特勒在慕尼黑也将他的一些仇人和他认为“知道的大多的人”顺便解决掉了。比如，曾经帮助希特勒撰写《我的奋斗》一书的神父施丹弗尔，因后来将希特勒的情人吉利·拉包尔自杀的内幕四处乱说，在这次屠杀中，也被杀死在慕尼黑附近的森林中。像在纳粹啤酒馆暴动时出卖了希特勒和戈林的前巴伐利亚州长古斯塔夫·卡尔，在纳粹制造国会纵火案时与恩斯特一起参与其事的二名冲锋队员等，都在这次屠杀中丧生。这一夜有数百名罗姆的死党及希特勒与戈林的政敌被处死。

戈林大功告成。轮到希姆莱出来收拾残局了。希姆莱面带微笑地命令他手下的人，将在这次清洗中查获的材料统统销毁，然后他与戈林等人去机场迎接从慕尼黑返回的希特勒。

在希特勒的专机到来之前，一架从不来梅飞来的容克 52 型飞机着陆，罗



姆的最主要的亲信、国会纵火案的制造者之一、柏林冲锋队队长恩斯特，被押下了飞机。戈林命令立即将其送到利希菲尔德军事学院执行枪决。此时的恩斯特正要去蜜月旅行，不料等待他的却是这样一个仪式。

过了一会儿，希特勒的飞机着陆。希特勒面色阴沉、惨白，心事重重，甚至没同来迎接他的人说任何话，只是看到戈林的空军仪仗队后才对戈林说了一句：“你的空军仪仗队都是精选的优等种族。”戈林与希姆莱等人陪同希特勒回到了总理府。在希特勒的办公室里，希特勒对戈林说，他已下令将罗姆所有的亲信处决，念在多年共事的情分上，他想放罗姆一马，戈林一听，差点没晕过去。他想对希特勒说，决不能放过罗姆，否则就等于放虎归山，后患无穷，希特勒推说事关重大，留待明天再议吧。

第二天，戈林与希姆莱一道苦苦劝说希特勒将罗姆处死，因为这是这次清洗最合乎逻辑的结果，或者说是要达到的最主要的目的之一。希特勒仍然坚持要给罗姆的副官克劳瑟打电话，让他再与罗姆谈一下。可戈林告诉希特勒，在几个小时之前，克劳瑟已经在利希菲尔德军事学院被处死了。希特勒听后一愣，缓缓地对戈林说：“他曾经是我最好的同志。”然后又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戈林还想与希特勒讨论下去，但觉得这个时候已无法说服希特勒了，便和希姆莱走了。傍晚，传来消息说，罗姆在监狱中自杀了。

其实，希特勒之所以这样做，除了念及一丝旧情之外，更重要的是想让戈林和希姆莱知道，他不是个冷酷无情的人。他在演戏！对罗姆的结局，其实希特勒早就安排好了。希特勒带人在旅馆里将罗姆从床上拖起来之后，马上便把罗姆押回了慕尼黑，关在 1923 年啤酒馆政变后罗姆曾经服过刑的施塔德尔海姆监狱。希特勒临走时，给罗姆留下了一支手枪，罗姆明白希特勒这是想让他自杀。希特勒走后，罗姆对看守他的党卫军警卫说：“如果要杀死我，那就让希特勒亲自动手吧。”据后来在慕尼黑战后审讯中一名参与过此事的纳粹警官的目击证词说，罗姆拒绝自杀后不久，两个党卫军军官走进罗姆的牢房，让罗姆脱去上衣站好，罗姆本想说什么，这两个行刑者粗暴地命他闭嘴，然后就开了枪。显然，不干掉罗姆，不要说戈林之流不放心，就是他希特勒自己也不放心，像他这样一个诡计多端的政坛老手，难道能不明白斩草除根的道理？罗姆手下有众多的党徒和亲信，日后一旦起事，并不是好收拾的。看来戈林对希特勒的老谋深算还是了解得不够充分。

说起来，这次清洗轻易得手，并非因为希特勒如何高明，实在是因为罗姆之流尽管高叫“革命”，可实际上根本就没有动手的打算，没做任何“革命”的准备，否则，罗姆就不会去度假，恩斯特也不会去做蜜月旅行。所谓冲锋队要暴动的消息，是戈林与希姆莱一手制造的假情报，加之陆军方面对冲锋队早有不满，种种原因促成了今天的结局。虽然希特勒对清洗这件事并不十分情愿，但为了获得军方的支持，他只能牺牲罗姆和他的冲锋队了。

据后来希特勒在国会讲话时说，在这次清洗中共有 77 名与暴动有关的“罪犯”被击毙和自杀。事实上，死亡人数远远不止于此，有人估计大约有 400 多人。无论死了多少人，对于戈林来说都无关紧要，他只关心他的党内第二号人物的地位。罗姆的死，使他少了一个劲敌。戈林看着黑名单上的那些敌人一个个地被红笔划掉，也觉得应该罢手了。所以，他又去请求希特勒停止清洗，7 月 1 日下午，清洗结束了。

当晚，希特勒在他的总理府举行了一个茶会。兴登堡和一些军方要人都出席了这个茶会。在茶会上，兴登堡对希特勒“及时扑灭叛国案和拯救德国

人民免于大难的坚决行动和个人的豪侠行为”表示感谢，他还对戈林先生在清理“叛国案”中的“有力和成功的行动”表示祝贺，戈林的脸上堆满了得意的笑容。他知道，这次行动只有他自己没付出任何代价就成了大赢家，其他的人都或多或少要付出一些代价的。

希特勒和陆军方面付出的代价最大。希特勒在听到希姆莱所念的死亡者名单后，脸上的肌肉都扭曲了，痛苦得竟说不出一句话来。不知他是为这些跟随他多年的老部下的惨死而难过，还是为陆军竟迫使他付出如此重大的代价才肯给予他支持的行为而恼火，总之，在清洗过后的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希特勒都显得异常暴躁，动辄大发雷霆。不久，他就下令给在清洗中所有死去的人的亲属以抚恤，给他认为是误杀的那些人的后代以赔偿。而在陆军方面，现在则到了他们履行“德意志号协议”的时候了。在后来的岁月里，德国军队为希特勒所付出的惨重代价，则是无法用笔墨来形容的。

无论希特勒和军方怎样为自己所付出的代价而哀叹，都不能影响戈林的兴致。清洗结束后，戈林将其亲信和合作者邀至他的官邸中，举行了一次别开生面的螃蟹宴。希姆莱、米尔希、克尔纳、勃洛姆堡等献筹交错，津津有味地品尝着鲜美的蟹肉。宴会中间还出现了一段有趣的小插曲。戈林的副官给他送来一封信，戈林看后，哈哈大笑。别人问他怎么回事，他笑着说，巴本仍在别墅中被软禁着，可 he 已把这位副总理的事给忘在脑后了。说完，他站起身给巴本打一个电话。戈林对巴本说：“误会，我只是让星期六晚上给你派一个卫兵，直到没有危险为止。”巴本在这场清洗中得以活命，完全是因为戈林一时动了恻隐之心。巴本则对纳粹手下留情感激不尽。很快他便接受了希特勒让他出任奥地利公使的安排，跑到维也纳享福去了。

戈林在大宴同党的第二天，对手下的人说，“已经没有必要彻底弄清这件事情，因为他们的背叛行为如同光天化日一样清楚……无论怎么说，他们有刺杀元首的阴谋，最重要的是要迅速采取行动，威慑住他们。”

清洗过后，兴登堡的身体状况急转直下。8月之日上午9时，兴登堡去世，终年87岁。现在终于到了希特勒所企盼的那一天，轮到陆军方面履行诺言了。中午12时，内阁宣布，根据前一天内阁讨论的一致意见，从现在起德国的总理和总统的职位合二为一，希特勒接任国家元首和武装部队总司令的职务，希特勒的头衔为国家元首和总理。至此，德国完全落入纳粹党的手中，沦为希特勒。戈林之流的掌中玩物。希特勒爬上了权力的顶峰。为了防止出现意外，希特勒让全体陆军官兵向他宣誓——不是向国家而是向希特勒个人宣誓。誓词是这样的：

我在上帝面前作如此神圣的宣誓：我将无条件的服从于德国人民和人民的元首、武装部队的最高统帅阿道夫·希特勒。作为一个勇敢的军人，愿意在任何时候为实行此誓言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就这样，德国军队变成了希特勒和纳粹党的政治工具。8月15日，兴登堡的儿子奥斯卡声称他找到了兴登堡的遗嘱，兴登堡也提出让希特勒继任他的职位。后来奥斯卡还通过电台向整个德国公布遗嘱的内容。这份遗嘱肯定是伪造的，至少其中的一部分内容是被篡改过的。据巴本后来回忆，遗嘱是由他起草的，兴登堡临死前，打算将权利交还给王室。但在最后，兴登堡又告诉他，他不想使用他起草的遗嘱，而准备将关于王室复辟的建议，以个人

的名义写信告诉希特勒，这封信希特勒从来就没有提起过。倒是奥斯下找到了使希特勒接替兴登堡的权力合法化的遗嘱。希特勒没有亏待小兴登堡，他在电台里宣读遗嘱不久，就被摆升为少将。

8月3日，也就是老总统病逝的第二天，戈林召集他手下的百名军官，以向宪法宣誓的誓词，郑重宣誓要永远忠于兴登堡选定的继承人希特勒。其场面倒也很庄严。戈林的此番“精彩”表演自然得到希特勒的赞赏，再加上这一段时间里他的“出色”表演，希特勒越发对他有好感，也越发信任他了。

1934年12月7日，希特勒签署了两个命令。一个是安排戈林在他不能视事时，可全权代表他处理一切事务，第二个是明确戈林作为他的接班人。

戈林下一步就要尽快完成希特勒交给他的重新组建德国空军的任务了。1935年1月，戈林主持了新的空军大楼的奠基仪式。按照戈林的意见，新的空军大楼占地40多万平方英尺，是一座规模宏大的建筑。建成后将有2800个房间，可容4000名工作人员在内工作。为使这座建筑物更有气派，也为了满足自己好炫耀的心理，戈林还请来全德国最优秀的建筑师和雕塑家，在空军大楼门前竖起了巨大的浮雕。

这一时期也是纳粹德国政治、经济、军事全面发展的时期。德国社会上上下下充满着一种躁动的法西斯情绪，许多工厂都在为德国的军事复兴争分夺秒地生产着。戈林在一次为地方官员作的演讲中夸口说，他将在2年的时间里，使德国从一个毫无防御能力的国家变成一个军事大国，最后他又说，到1935年底，德国将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空军编队”。戈林也并非一味胡说。在8月末，戈林与希特勒和米尔希就德国的今后4年的国防预算进行了商讨，最后将经费定在105亿马克，其中很大一部分就用于空军的建设。然后，他们将预算方案交给纳粹的财政部长沙赫特，让他负责筹措这笔经费。

在希特勒完全控制德国之前，纳粹德国空军的建设一直被视为重要的国家机密。但这时，戈林开始不加掩饰地向外界，甚至向外国人承认这一事实了。一次，戈林向一位英国武官以及他带来的一位英国贵族说，德国组建一支“小小”的部队。几天后，他又告诉这位武官，他上次所说的“小小”的部队，实际上是一支拥有1500架第一线轰炸机的空军部队。戈林的话差点没让英国武官从椅子上滑下来。戈林接着又好像宽慰他似他说：“会有人呼吁扩大皇家空军的，因为在下次战争中，我们将要并肩作战，不让共产主义在欧洲实现。”当这位武官站起来告辞时，戈林彬彬有礼地同他握别，并对他说：“记住我的话，上校。”

此时的戈林几乎每天都忙于各种各样的演讲、集会、舞会以及其他无法胜数的应酬，他乐此不疲，很有如鱼得水之感。由他主持举行的舞会是当时柏林上流社会最高规格的舞会，其奢侈豪华的程度，连一些纳粹党人都感到过分，人们称之为“宫廷舞会”。

在这一段时间里，希特勒多次向戈林暗示，他与埃米·宗内曼的关系应该合法化了。戈林与埃米相逢后，两人便堕入情网，几年来他们的感情一直很好。戈林无论多忙，都要抽出时间陪伴埃米，埃米已为戈林个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只是说起结婚，戈林还有一层心理障碍，他怕再婚有对前妻不忠之嫌。希特勒不愿意他的副手在这个问题上被人说三道四，于是向他提出了同埃米正式结婚的建议。别人也一再劝说戈林再婚并不等于对前妻不讲情义，竭力打消他的疑虑。事已至此，戈林不能再犹豫了，他决定听从希特勒的建议，向埃米求婚。

1935年2月的一天，戈林在送埃米去魏玛的汽车旁，往埃米手中塞了一个纸条，让她到达目的地以后再打开。到达魏玛后，听话的埃米打开了纸条，只见纸条上写道，“你愿意在复活节和我结婚吗？元首将作我们的证婚人。”3月15日，戈林在新建的宴会厅举行了一次私人宴会，参加宴会的多是纳粹要员和其他国家的外交官。在宴会上，戈林向众人宣布，埃米不再是他的私人秘书，而是他的未婚妻了。他们订婚了。宴会后他又对参加宴会的菲利普斯伯爵说：“我只是遵照元首的命令娶了她，因为元首认为在纳粹上层光棍太多了。”戈林的好友米尔希后来透露，戈林由于在啤酒馆政变后腹股受伤，已经失去了性能力。如此看来，戈林对埃米的迷恋主要不在肉体方面，更多的是满足一种心理需要。喜好奢华的戈林大概把金发碧眼的美人埃米当作件珍贵的装饰品收藏了。

1935年4月10日，纳粹德国二号人物戈林和女演员埃米的盛大婚礼在柏林举行。这一天，柏林的各主要街道披红挂绿，商店张灯结彩，整个城市如同在庆祝一个重大的节日一样。上午10时，由3万军人组成的仪仗队在饰满鲜花的敞篷车经过的街道上，列队向新婚夫妇致敬，军乐队演奏着欢快的乐曲。柏林所有的党政要员、各个行业的巨头都参加了婚礼，许多国家的外交官也应邀出席。尽管希特勒劝戈林不要举行宗教仪式，但戈林还是坚持要德国基督教大主教穆勒在婚儿开始时布道。戈林在婚礼上显得非常严肃，装扮得则有些滑稽。他梳着背头，穿着由他自己设计的空军将军服，斜挎一条宽大的绶带，上面挂满大大小小的各式勋章，似乎将礼眼分割得支离破碎。新娘也许还不习惯于这样盛大的场面，显得有些拘谨。当这对新人从教堂中走出时，200架新型战斗机从上空呼啸而过，向他们致意，碧蓝的天空上留下了一道道白色的痕迹。后来，英国驻德国大使回忆说：“到柏林的客人如果不知道底细的话，很可能以为碰上了皇家的婚礼了……对于他来说，除了帝位，他也许不能再有别的要求……绞刑除外。”美联社记者洛克在给其女儿的信中写道：“……好像是皇帝结婚……但对我来说，最令我惊讶的还不是婚礼本身，因为高潮还在后面。第二天我到议长的官邸去，对这座富丽堂皇的府第的高雅和豪华感到震惊。显然，这里不久前又重新进行了装修……一会儿，赫尔曼出现了，他对大家说，‘朋友们，我请大家到这里来，是为了向诸位展示我的人民对我的厚爱——让大家参观一下他们送给我的礼物，。’”

的确，此次婚礼又使戈林得到了一大批珍贵的贺礼，他的专门存放结婚礼品的房间，令人目不暇接，其中有希特勒送给戈林的由著名画家伦巴赫绘制的俾斯麦像，保加利亚皇帝鲍里斯送给埃米的宝石手锅，汉堡市市长代表汉堡市送给他的银制酒具……，整个房间就像一个礼品博物馆。在这个房间里，人们所看到的仅仅是一些有形的礼物。除此之外，一些趋炎附势的企业家和金融家们竞相为戈林抛掷金钱，如帝国行会理事长为戈林重新装修了起居室，其奢侈豪华的程度远远超过了皇室。在戈林看来，帝国宝库的大门已经向他打开，只要他愿意，无论多么贵重的东西都会有人送上门来。

也许是由于注射吗啡过多的关系，戈林在成为纳粹德国的第二号人物后，他的病态的虚荣心极度膨胀，已发展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对他的种种怪癖，他手下的工作人员都见惯不怪了。但在外人的眼中，戈林的一些举止是极其不正常的，很多人不理解希特勒为什么选定这样一个十足的怪物作为自己的接班人。沙赫特等一批对戈林不以为然的要员们，就常常在一起像讲

笑话一样，说起戈林的种种令人发笑的行为和习惯。沙赫特常对他的朋友讲起戈林的装束——脚登长统皮靴，身穿牛皮紧身上衣，臂套波浪式的袖子，头戴罗宾汉式的帽子，手持长矛——整个一副劣等电影中的小丑的形象。注射吗啡使戈林的荷尔蒙失调，他的身体日益发胖，就像漫画中的人物一样。他好穿丝质内衣，在家里常穿一件华丽的长睡衣。他的部分制服是他自己设计的，受著名服装设计师卡普的影响，他一直喜欢一种紧身皮上衣。

戈林不仅愿把自己装扮成文艺复兴时期的贵族，而且将其官邸改造成一座文艺复兴式的宫殿。他将官邸中本已很大的四个房间改成了一个巨大的书房，并对别人说，这个书房与墨索里尼在罗马的别墅中的书房相比，后者就像一个小会议室。他之所以这样作，是因为他经常想起当年墨索里尼接见他时，在其巨大的书房中的宽大的办公桌后走出来与他握手的情景。仅通过下面一件小事，也足可以看出戈林是多么地挥霍无度。这件事就是为了使他能新买的一块地毯能够放进他想要放地毯的房间，他竟令人不惜花费巨资改建了这个房间，而所用的那些钱又都是从普鲁士财政部拨出来的。在所有各邦的权力都划归中央政府后，只有普鲁士邦财政部的权力被戈林保留了下来。现在看来，戈林此举还是很有“远见”的，至少为他以普鲁士财政部的名义聚敛钱财，提供了方便。

戈林对珠宝的偏爱在当时是很出名的。他不仅大量积攒珠宝珍品，而且对自己佩带的珠宝首饰也非常讲究，讲究其质量。样式，还讲究这些珠宝饰物同所穿服装，甚至同当时的心境的协调性。说起来好笑，每天早晨起床后，戈林常常为今天戴什么样的戒指而长时间思忖。在各类珠宝中，戈林尤其喜欢钻石，有一次，他对一位熟识的珠宝商说，“我想要一罐你最好的钻石。”这位珠宝商满足了他的要求。从此，外出时一位副官就要为他带着这个装满钻石的罐子，以备戈林把玩和炫耀。

除了喜爱珠宝、服饰等奢侈品之外，戈林对勋章和短剑似乎还有一种非同寻常的偏好。他积攒了大量的勋章，还请求希特勒恢复荣誉勋章制，并甚为荒唐他说：“魏玛共和国的垮台，就是在于缺少荣誉和勋章。”希特勒同意了戈林的建议，这使戈林心花怒放，从此他可以尽情地为自己授勋了。前面也曾提到过，戈林独出心裁地为未来的德国空军设计了制服。不少人都觉得戈林所设计的空军制服如同他这个人一样，带有一种虚荣和浮夸的气息，怪里怪气，毫无美感。更加莫名其妙的是，他规定在空军军官的礼眼上应该配有短剑和军刀。人们实在看不出对于现代空军来说，这两件武器会有什么用处。戈林还送给每名将军一把由他亲自签名的精制的短剑。在戈林收藏的短剑中，他最为钟爱的是全体空军将军在他与埃米结婚时赠送给他的那把短剑，剑刃一面写着“帝国空军献给司令”，另一面则刻着“忠于元首的人民和帝国”。戈林几乎每次出席重要仪式和会议时，都将它佩在腰间。他的联襟埃里克·冯·罗森伯爵后来又送给他一把由象牙制作的剑柄，剑柄的圆头上镶有各种宝石，剑鞘上雕着狩猎图，它也深得戈林的喜爱。

收藏艺术品是戈林的另一嗜好。不知是为了附庸风雅，还是出于对艺术的真心热爱，抑或仅为他那疯狂的占有欲所驱使，他对艺术珍品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不择手段地增加他的收藏。在后来的战争岁月里，戈林在帮助希特勒疯狂扩张的同时，也没忘记通过各种罪恶的途径，攫取艺术珍品。这是后话。

这一时期令戈林心怀不满，并始终耿耿于怀的事情是希特勒不同意他担

任帝国总理一职。戈林对俾斯麦的业绩一直钦佩不已，可他认为俾斯麦仍然不能算是一位杰出的外交家，因为他最终将德国拖入了一场战争。戈林立志要成为继俾斯麦以后德国最杰出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一方面他在国内政界加紧活动，不放过任何争名夺利的机会，另一方面他周旋于驻柏林的各国外交使节之间，利用其手中的权力和显赫的地位，拉拢这些外交官。在外国使节中，戈林很有市场，同其他纳粹要人相比，他算是比较容易被接受的。

尽管党内有人对戈林傲慢的言行、浮夸的举止和奢华的生活有所非议，甚至在希特勒面前告他的状，但戈林依然我行我素，根本没把那些人放在眼里。比如，戈培尔曾对戈林婚礼的大肆铺张提出了批评，戈林却认为戈培尔是在妒嫉他，并对戈培尔的“埃米不同于真正的雅利安人”的说法公开表示抗议，要求戈培尔对埃米绝对尊重，称埃米为“我的夫人”。戈培尔在盛气凌人的戈林面前退缩了，面对言辞激烈的抗议，他只好否认自己曾经有过那种说法。不久，戈林又唆使帝国的司法部长起诉每一个敢于“诽谤这位高贵的夫人”的人，当时的司法部长弗兰茨·居内特为此专门向全国的审判系统发了一个通报，提请各地的审判官注意，“帝国的敌对分子正在有组织地散布不利于总理夫人的话，说她不是雅利安人的血统，并曾与一个非雅利安人结婚。对于这样的人一定要严惩不贷”。闹到这种地步，戈林的怒气方才稍稍平息。又过了一段时间，戈林在与居内特和内政部长弗里克谈话时，还不依不饶地指责对那些犯了“诽谤”总理夫人罪的人判得太轻，并提到前不久对这样一位犯人才判了5个月的监禁，“依我看，判5年更合适”，戈林愤愤地对弗里克和居内特说。

到30年代中期，戈林在纳粹党中的权威地位已经不容动摇，尤其是党的中层人士，更将他看成是第三帝国不可缺少的领袖人物之一，是元首最得力的助手和最合格的接班人。

正是：嗜血成性真面目，心狠手毒方显忠。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 第八章 出鞘之剑

操纵经济成霸主，四年计划始施行；

沽名钓誉建空军，牛刀初试扬恶名。

话说戈林在为自己举行完隆重的婚礼后，心满意足，踌躇满志，似乎整个德国都在围着他转，所有的德国权贵都在讨好他。不过，无论戈林多么得意，多么头脑发热，在处理同希特勒的关系方面，他一直很清醒。很明智，从不越雷池半步。他可以把任何人都不放在眼中，唯有对元首的敬意始终不减，从来没有想过对希特勒的权威地位发出任何挑战。在希特勒的亲信中，戈林对希特勒的忠诚是最为突出的。希特勒对此也从没有任何怀疑。也正是因为有了希特勒的信任和支持，戈林才敢有恃无恐地为所欲为。

从 1935 年起，戈林突然关心起了经济问题，并以他那种偏执的热情投入其中，关注着他所感兴趣的每一件事情，在沙赫特等人的眼中，戈林是一个对经济问题一窍不通的门外汉。戈林却不管别人怎样看，只是自以为是地指手划脚，一有机会便插上一手。实际上，戈林在纳粹夺取全国政权后，就意识到经济问题将是决定未来德国能否崛起和称霸的根本性问题。如果要成功地进行一场对东方的战争，德国就必须在今后的几年里，将经济搞上去。他多次在各种场合，包括私下和公开，提到在战争爆发后，石油、橡胶、铁矿石等进口物资很有可能受到敌国的封锁，而这些物资的充足供应又是打赢战争的关键因素之一。在 1933 年 12 月 14 日，戈林同法本化学公司签订了为他的空军生产战时使用的合成石油的合同。可以说，希特勒对戈林的用心是最为了解，也最为欣赏的。尽管他身边不乏经济学方面的专家，但他还是在 1935 年春让戈林去主管汽油和合成橡胶的生产。

戈林的永远也不会得到满足的权力欲继续膨胀，在这一点上希特勒起了很大的作用。说到底，希特勒愿意手下有这样一个忠心耿耿的人为他在一些事务上分忧，尽管这个人有时多管闲事到了令人讨厌的地步。其他人由于知道希特勒对戈林的信任，便投其所好，主动劝说希特勒让戈林在自己分管的部门中兼任一个象征性的职务。可是，戈林却不愿意只挂一个虚名，他往往喧宾夺主，无所顾忌地行使权力，使那些邀请他的人后悔不迭。最早邀请戈林担任挂名职务的是国防部长勃洛姆堡，他让戈林担任“帝国石油经济督察员”。不久，沙赫特又让戈林在其所管的部门中担任“外汇和原料专员”。他们的本意一方面是想利用戈林在党内的声望，为自己的机构装装门面，提高一下自己的地位；另一方面是想以此讨取戈林和希特勒的欢心，送个人情给他们。不曾想戈林却很认真，把这些事情看得很重，他让希特勒给他下达了正式的任命书。勃洛姆堡和沙赫特很快就发现他们原先的想法是多么愚蠢，由于戈林的介入，他们最后竟由部门的主管变成了戈林手下的小伙计。尤其让沙赫特气恼的是，戈林嫌沙赫特的机构碍手碍脚，自己又另立一个“总理戈林将军原料和外汇管理处”，将沙赫特抛在了一边。同年 8 月，希特勒又交给戈林一个重要的任务——调解农业部长达雷和经济部长沙赫特之间的矛盾，协调他们所掌管的两个部门的关系，这就等于让他凌驾于这两个人之上去解决工农业利益冲突的问题。由此也可以看出希特勒对戈林的信任。

戈林自从担任了一系列经济领域的职务后，便开始着手实施一个庞大的计划，这就是复兴德国经济的四年计划。在准备实施这一计划的同时，他将

一直在纳粹党内被视为经济专家的沙赫特踢到了一边，成为纳粹德国经济部门的独裁者，将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握在了手中。

戈林的四年计划的主要内容是：使德国四年后在工业、农业生产上实现自给自足，使德国在战争时期，也能在敌国实行全面封锁的情况下不致于出现经济窒息的情况。具体的作法是将进口减少到最低限度，实行工资和物价的严格管制，将股份持有者的红利限制在 6% 左右。同时，建立大批的生产合成汽油、橡胶、人造织品的工厂，利用德国出产的低品位的矿石冶炼钢铁。总之，使德国工业生产的机器最大限度地开动起来，为未来的战争打下雄厚的物质基础。

四年计划开始施行后，德国企业的利润直线上升，企业家们并没有显得有多么开心，使他们烦恼的是企业的生产要受纳粹的直接控制，生产什么，不生产什么，都要经戈林掌管的主管机构批准。当年纳粹上台时，德国的资产阶级曾为之欢欣鼓舞，因为纳粹政权使有组织的工人运动基本绝迹。可是今天，他们却被纳粹所规定的无以数计的报表和申请文书压得喘不过气来。几乎所有产品的价格、种类、数量都要受到严格的控制，加之没完没了的捐献，使得许多企业家对纳粹政权日益不满，却又对它无可奈何，只好把怨气埋在了心里。

为了进一步控制德国的经济，戈林又想出厂一个新的花招，解散了一切资本在 4 万元以下的公司，禁止成立资本在 20 万元以下的新公司；强制德国现有的各种公司和企业分门别类地并入卡特尔，并由纳粹经济部主持设立新的卡特尔（垄断组织的主要形式之一），新成立的公司和企业一律要加入其中，这样，德国的经济在纳粹国家政权的控制之下，很快就进入了战时的轨道。

沙赫特对戈林侵入他的领地感到极大的不满。在戈林插手之前，沙赫特的经济理论在纳粹党中一直备受尊崇，然而，他现在发现，戈林根本就不理会他的理论。戈林仅凭其直觉来决定一切，并认为沙赫特的理论并不是那样神秘，他对希特勒说，“沙赫特能够做到的，我戈林也能做到，甚至能比他做得更好。”在戈林担任了一系列经济部门的要职后，沙赫特大为光火，命令他手下的人不要听从那位“新出现的独裁者”的话。戈林根本就不在乎沙赫特是怎么想的，他在 1936 年 5、6 月份接连召开的几次外汇管理会议上，对沙赫特的经济理论进行了激烈的攻击和无情的嘲讽，同时提出了他自己的“经济理论”，即扩大出口，利用一切机会和手段赚取外汇，利用外资和赚取的外汇兴办企业，利用本国的资源制造国家急需的一切原料。对戈林的说法，沙赫特尽管在表面上不屑一顾，但心里却不得不佩服戈林的想法确有一些独到之处，发觉此人实属歪才，无怪乎希特勒对他是那样地信任和赏识。

戈林执掌德国经济大权之后不久，将德国企业界的一些头面人物请了来，其中有大名鼎鼎的弗里克、蒂森和弗格勒。在与企业界人士会谈中，戈林再三强调一旦战争爆发，“我们很难从国外得到一滴石油”，他还列举了亚麻、黄麻、铜、锰等一系列战略物资，在战时将会很缺乏，因此，现在就要尽一切力量扩大生产和想法从国外买进。此外，他还指出，橡胶也同石油一样重要。戈林向企业界的各路大亨呼吁，一定要加强合成石油和橡胶的生产。在 6 月 30 日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戈林再次提出德国现在面临着两个重要的任务，一是要解决全国食品的供应问题，二是尽快武装全国，“因为，在万不得已的时候，德国要为自由而进行最后的战争。”



到 1936 年 7 月，戈林的经济班子组成，他利用手中的大权，将他认为有用的人从各个政府机构，大公司等处调来，听候他的，调遣。班子内部有明确的分工，主要分为军工、食品、外汇、对外贸易等几个部门。戈林的作法颇有改革的意思，也收到了一定的成效。他下令利用税收的手段刺激煤炭的生产，同时，让科研机构研制合成煤、合成黄油，提高化学肥料的产量，鼓励使用化肥。在对外贸易方面，戈林亲自出马，先是与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签订了期限为 10 年的双边贸易协定，用德国的旧飞机换取它们的粮食；接着又同西班牙、芬兰、土耳其签订了相同的双边协定，以求得到这些国家的战略物资钨、镍、铬等等。

戈林的经济班子组成后，他正式向希特勒提出要在全国推行他的四年计划。7 月底，当希特勒去拜罗伊特参加一年一度的瓦格纳音乐节时，戈林向希特勒报告了其四年计划的设想，希特勒对此大力赞赏，让戈林进一步完善这一计划。回到柏林后，戈林又将政府各有关部门和企业界的有关人员召集到他的官邸，就如何完善四年计划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磋商，并要求他们提交如何扩大汽油、橡胶、钢铁等一系列战略物资的产量的书面报告。8 月份，各式报告陆续送至戈林处，在此基础上，戈林让其班子夜以继日地整理所有的资料，然后起草一个较为完整的文件，呈交给希特勒。8 月底，戈林来到贝格霍夫，与希特勒共同讨论了这一计划，最后，希特勒对这一计划进行了补充，形成了一个秘密备忘录，这一备忘录后来成为复兴德国经济的四年计划的蓝本。

在这一备忘录中的第一个部分，戈林与希特勒将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一书中所提出的观点又重新加以阐述，特别强调了德意志民族的生存空间和摆脱《凡尔赛和约》束缚的问题。文件宣称，“德国现在是并且一直是西方抵御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中坚。如果布尔什维克主义战胜了德国，不仅会出现对德国的新的《凡尔赛和约》，也将导致德国人民的毁灭……因此，从现在起，德国的经济必须围绕复兴德国的武装力量而有目的地发展。为了德国民族的生存，德国必须拥有足够的生存空间，这样才能解决德国所面临的食物短缺、原料不足的问题。”文件的第二个部分，具体说明了德国所面临的经济困难及施行四年计划的具体步骤和最终目标。显然，这一部分所反映的主要是戈林的设想，其中所明确的一些作法也是戈林提出而沙赫特一直反对的作法，戈林设法使希特勒接受了他的意见。作法是：在今后的若干年里，德国应该尽量扩大外汇收入和国内资源的开发，并在这个前提之下，加快战略物资的存储。在条件成熟时，向外扩张，扩大德国的生存空间。目标是：德国军队必须在 4 年之内作好开战的准备，德国经济必须在 4 年内为战争做好准备。

戈林使其经济主张得到了希特勒的首肯，并最终成为由希特勒签署的文件。9 月 4 日，戈林在柏林主持召开了内阁会议。在会上，戈林得意洋洋地宣读了文件的全文，并一面读一面斜眼看着如坐针毡的沙赫特。在争夺德国经济的独裁者地位的斗争中，戈林以其惯有的大刀阔斧和蛮横无礼的作风，不顾一切地去争夺他认为必须归他所有的位置，终于战胜了一直被认为是纳粹最杰出的经济学家的沙赫特，会议结束之前，戈林还向与会人员传达了希特勒的口头指示，即今后将由他戈林自己以“四年计划专员”的名义全面负责德国的经济工作。

10 月 4 日，戈林下令组建“四年计划办公室”。

与沙赫特相比，戈林有着他的对手所不具备的优势，也有着任何一个经济学家永远也无法具备的各种条件。他拥有在德国境内除希特勒之外的最高的权力，并且得到了希特勒的绝对的信任。在 12 月召开的一次著名实业家会议上，希特勒在讲话中对与会者说，请他们相信“由我亲自选出来主管德国经济的戈林先生”。戈林的研究所此时也充分发挥了作用，大量的国内外经济情报及时送到，这使戈林尽可以放心大胆地去干，而不致于出现什么大的纸漏。沙赫特对戈林这种不顾任何商业和国际贸易准则的作法极为反感，并公开有所表示。有一次，当戈林在对德国的一些企业家和商人的讲话中，说到他希望他们走出国门，“用任何方法和手段赚取外汇”时，沙赫特当即站了起来，破口大骂，使戈林很下不来台。

人们认为戈林是一个政治舞台上的演员，并且是一个只想当主角而不愿当配角的演员。尽管有时他的演技十分拙劣，但他在幕后力争当主角所下的功夫，则是当时德国政治舞台上除了希特勒之外，任何一位政治家都无法与之相比的，他是一个有着强烈的表演欲的人，在前一个角色演完之前，他就开始为下一个角色的登场作准备。就连他的妻子埃米也对希特勒说：“唉，我的元首，。我的丈夫只是一个演员。”戈林从来没有为他这样厚颜无耻地争夺权力而感到羞愧，因为他认为他所得到的的一切都是他应该得到的。戈林不仅喜欢扮演主角，而且更愿意在他登台表演的时候，所有的观众都全神贯注地注视着他，所有的配角都毫无条件地服从他的调遣。

从 1936 年起，戈林成为德国经济领域的无冕之王。一时间，德国实业界大大小小的银行家、企业家又开始争先恐后地讨好戈林，戈林的卡琳庄园和总理官邸中的贵重礼品不断增多，各种名目的赠款、捐款滚滚而来。戈林经常在他的礼品室中费力地挪动着他那肥大的腰身，欣喜地望着琳琅满目的各色礼品。当然，那些以各种名目给戈林送礼的实业家们大都得到了戈林的照顾，拿到了由戈林签发的有利可图的定单。向戈林行贿最多的是德国的烟草大王菲利普·雷姆茨玛。从 1932 年开始，他便每年向戈林提供大笔的现金捐助，而他得到的实惠则是每年以各种方式漏税、偷税，但从没有人对他采取过任何形式的惩罚，这显然是因为戈林从中起了作用，庇护了雷姆茨玛。在 1933 年希特勒下台后，戈林又与雷姆茨玛达成了一项秘密交易，即戈林为雷姆茨玛偷税漏税提供保护，雷氏则必须每年向“戈林艺术中心”捐款，即每季度向戈林的帐户转入 25 万马克。这种捐款一直持续到 1942 年 7 月。戈林对雷姆茨玛的大笔捐款十分满意，他投桃报李，多次帮助雷氏摆脱困境。最为典型的事情是纳粹的冲锋队在 1933 年成立了一个烟草公司，直接与雷姆茨玛唱对台戏。戈林出面使雷氏的公司市场上占稳了脚跟，并最后击败了对手。事隔不久，雷氏又因作伪证被传讯，又是戈林亲自出面使这件事最后不了了之。戈林还劝说希特勒不要从雷姆茨玛的公司中为“希特勒基金会收取捐款”，戈林对希特勒讲，从烟草工业中收取捐款会影响元首和政府的声誉，信奉清教的希特勒居然同意了。

1942 年 8 月戈林竟向占领乌克兰的德国地方官建议，将雷姆茨玛公司生产的几十亿支香烟倾销到乌克兰，换取当地生产的农副产品。不久，他又向雷姆茨玛暗示，希特勒将在战后发动一场禁烟运动，让他尽快将资金投到航空业中。

上面的例子仅仅是一个公司给戈林的捐款，德国航空界的捐款更多。戈林以维持“贫穷的飞行员”的生活的名义建立了一个基金会，并在银行里开

设了帐户，由德国飞机制造业提供基金，据不完全统计，仅在1940年10月至1941年10月的一年的时间里，戈林收到的捐款就达185万马克之多，戈林将这些钱大部分都投到了卡琳庄园的扩建中，但戈林一直对外界声称，他自己没存一分钱，他的财产状况是有目共睹的。将来他可以把卡琳庄园以任何一种形式交给国家。戈林所说的这一切也许只有他自己才相信。

戈林的财富更多的还是来自他的“外汇管理处”。他自从担任了“四年计划专员”以后，控制了德国的全部的外汇储备。德国任何一个公司的任何一笔出口业务，都必须有戈林的签字方可。那些向国外出口产品的大公司和企业，几乎每一个都向戈林行过贿。

戈林在热衷于经济的同时，在内心中始终还把空军放在第一位，将空军视为自己的私有领地，而不允许任何人染指。尽管戈林关心备至，也可以说倾尽了全力，但空军的发展并不是很令人满意的，直到1935年底，德国空军的飞机数量虽说已达到1800多架，可其中真正能够与法国、波兰的飞机相匹敌的战斗机寥寥无几，根本不能形成威慑力量。即便如此，戈林所创建的空军毕竟还是他与其他纳粹上层官员争权夺利的砝码，无论从感情上，还是从理智上说，他都不能不时刻把空军的发展放在心上。戈林毫不隐讳他期望自己能够晋升为空军元帅，并多次含蓄地向希特勒和其他军界上层人士表达过这一愿望，只是始终没能如愿，这大概是因为就其实力而言，德国空军此时还没达到可被视为在未来战争中起决定作用的军事力量的程度。

戈林虽然未能当上空军元帅，但希特勒为了安抚他，在1936年的夏天晋升他为四星级上将。戈林深知自己如果要想晋升为元帅，就必须加速发展德国空军，提高空军的地位，正因为这样，他无论多么忙于其他事务，空军的建设始终是他最关心的事情。不过他实在太忙了，难免有顾不上的时候。因此，空军的日常事务人都由米尔希负责处理。在没有戈林胡乱指挥的情况下，米尔希将空军的事务处理得井井有条，德国的飞机制造公司夜以继日地生产，大批的战斗机源源不断地从德国各地的飞机制造厂运往飞机场，投入使用，通过以前的较量，米尔希对戈林已不敢有丝毫的怠慢，每逢有剪彩、庆祝大会之类的活动，他都事先与戈林打好招呼。戈林也是每请必到，他经常身穿礼眼，腰挎短剑，发表一通慷慨激昂的讲话，然后在众多随从的簇拥下，登上豪华专车扬尘而去。戈林对此很得意，他需要这种能够显示其权势、满足其虚荣心的表演。在得意劲过去之后，戈林最终还是生出几分担忧，他发现被米尔希架空的危险。当一次米尔希请他巡视雷希林机场，并请他观看将要投入生产的最新式的战斗机模型时，戈林发现这种机型他从来没有见过，也没听米尔希讲过。戈林当时没向米尔希表示什么，暗中却已下决心要着手整顿空军。恰好，空军参谋长韦弗在一次空难中丧生，戈林不顾米尔希的反对，将对空军事务一窍不通但精明能干的凯塞林任命为空军参谋长。与此同时，他又将空军技术办公室主任的职位交给了他在二战时期的战友乌德特。这是一位飞行技术十分高超，性格刚烈的军官，在后来的战争中，他成为令对手闻风丧胆的德国空军中最出色的空战指挥者。

尽管空军力量的发展还有待时间，但希特勒和戈林都急于将空军派上用场。戈林利用他与许多国家外交官有私交的条件，不失时机地向他们吹嘘德国空军是如何强大。这一点正合希特勒的心意，因为希特勒念念不忘他在《我的奋斗》一书中所提出的向东方扩张和兼并奥地利的目标，而为使英法对德国未来的行动不加干涉，进行这种武力威慑是此时可采用的唯一的办法。后

来的事实也证明，德国的武力威慑确实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在此之前几年的时间里，希特勒一直在督促军界和经济界为复兴德国的军事力量而努力。这一切开始都是在极为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可纸里终究包不住火，德国在重新进行扩军备战的消息以各种方式在国外传开，引起了英法等战胜国的不安。为了消除他们的不安，希特勒不断向各国保证德国无意恢复军事力量。早在1934年初，希特勒就命令陆军要在年底将兵力由原来的10万人扩充至30万人，海军也在悄悄建造大吨位的战舰。至于空军，那就更不用说了，在戈林的苦心经营之下，飞机的数量已经接近英法等国。

1935年3月17日这一天，对于当时的德国人来说，似乎是一个节日般的日子，这一天是德国阵亡将士纪念日，希特勒在柏林举行的盛大的纪念集会上，第一次向德国国人宣布，德国从此再也不受《凡尔赛和约》的制约了，用希特勒的话说，就是德国人民从此挣脱了“加在德国人民身上的锁链”。从这一天开始，纳粹德国撕去了为扩军备战所作的一切伪装。虽然当时德国有许多人对《凡尔赛和约》极为不满，对希特勒此举曾大加赞赏，甚至为此欢欣鼓舞，但是在若干年后，德国人在进入了一个血与火的残酷年代后，才意识到，正是从那一天开始，德国几乎进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

戈林可以放心大胆地干了。他出于一种好人喜功的心理，以其一贯的武断作风，让米尔希下令停止生产造价极高的大型轰炸机，尽量扩大小型战斗机的产量。他直截了当地对米尔希说，“元首没有问我飞机有多大，只是问我飞机有多少。”他的用意他自己心里最清楚，他明白只有飞机达到一定的数量，他才有可能首升为元帅。

对于德国的军事力量的复兴，当时英国以张伯伦为代表的那些缺乏远见的政治家们，采取了姑息养好的绥靖政策。希特勒在1935年5月21日的德国国会上的和平演说中，以华丽的措辞对德国将公开重整军备的行动进行了辩解，并向第三国保证，德国绝对没有征服其他国家的念头，德国要的只是“和平”。他宣称，德国承认法国对阿尔萨斯—洛林的主权，承认波兰是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对于奥地利，德国既不想干涉其内政，更没有兼并它的念头，希特勒的虚伪的和平保证居然使伦敦的政治家们大喜过望，尤其是希特勒就提出的裁减军备的建议，简直使英国人觉得永久的和平已经到来。英国欣然同意德国的裁减军备的计划，即德国将对一切攻击性重型武器予以限制，海军力量只能达到英国的1/3。英国政府欣然同意。英国的这种作法，实际上就等于承认了德国对《凡尔赛和约》的破坏，也标志着《凡尔赛和约》的寿终正寝。

1935年10月，意大利突然入侵阿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意大利人的行动又为纳粹德国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面对意大利的武力侵略，国联吵着要对意大利实行制裁，但实际上却是无能为力的。希特勒看明白了这一点。次年2月27日，法国与苏联签订了互助条约。希特勒在国会中宣布，既然法苏签订了互助条约，这就意味着《洛迦诺公约》的瓦解，那么，德国就必须在非军事区建立起绝对的主权地位，说干就干，3月了日，德国政府命令陆军对莱茵兰非军事区采取行动，这个命令是由陆军部长勃洛姆堡亲自下达的。接到命令后，德国陆军十分惶恐，他们害怕招致法国的反击，于是在3月7日凌晨，只象征性地派出了3个营的兵力，在看到法国没有任何反应的情况下，才派出后续部队。前后加起来，占领整个莱茵兰非军事区只用了一个师的兵力。法国政府和军队的软弱与忍让，使本来手里捏着一把汗

的希特勒和德国陆军的将军们，终于长出了一口气。

莱茵兰非军事区事件发生的一年后，戈林手中的空中长剑终于在世人的面前亮了出来。在同一年的7月17日，西班牙的法西斯分子掀起了一场武装叛乱。西班牙人民在由共产党、左翼共和党等政党组成的西班牙人民阵线的领导下，坚决地抵抗并还击了叛乱军队，使法西斯分子迅速取胜的梦想破灭。7月22日，西班牙叛乱分子的首领佛朗哥，派使者赶到拜罗伊特晋见正在参加瓦格纳音乐会的希特勒，请求德国提供军事援助。希特勒认为这是一个提高纳粹德国在国际上的声望的机会，同时，希特勒已经看到西方各国对西班牙事件的态度不一，尤其是意大利与英法在如何对待西班牙问题上存在着重要的分歧和尖锐的矛盾。如果使西班牙内战的时间延长，就可以使意大利与英法的矛盾加深，最后将意大利完全拉到德国一方来。由于这些原因，在佛朗哥的使者到达德国后，希特勒马上将戈林与勃洛姆堡召来，让他们立即制定支援佛朗哥的计划。戈林此时知道，这也是希特勒对他这几年的空军建设成果的一次检验。戈林决定将空军中最精锐的号称“秃鹰军团”的飞行大队派到西班牙。

12月，戈林派出的第一个空军飞行中队飞往西班牙，米尔希代表戈林力出征的德国空军壮行。飞机出发的时候，戈林正呆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烦躁不安，因为他对自己的空军的战斗力实在没有什么把握，如果这次行动出现纸漏，他将在那些一直想看笑话的党内人士的面前丢尽脸面，更为可怕的是会使一直信任他、欣赏他的希特勒改变对他的看法。在第一批空军出发后的几个月里，戈林又陆陆续续地将几个空军中队派往西班牙。

1937年4月26日，德国空军的9架容克52型轰炸机分三个小队，对巴斯克人居住的格尔尼卡小镇进行了狂轰滥炸，几乎将这个小镇夷为平地，镇中无辜居民被炸死达32人，这一暴行自然是与戈林联系在一起的，也可以说戈林就是这场悲剧的直接制造者。西班牙著名画家毕加索曾以这一悲惨事件为素材，创作了一幅题名为“格尔尼卡”的油画，以表达自己的悲愤之情。全世界的左派人士纷纷行动起来，以各种形式谴责德国法西斯的罪行。戈林作为罪魁祸首，更是受到了激烈的抨击。可戈林不仅不觉难堪，反而得意洋洋，因为他并不怕人心向背，他的内心也不会为此而不安，他只在乎他的元首是否会对他满意，只关心他能否尽快晋升为元帅。英法等国对此反应强烈。英国的反对党和共产党在国内掀起了一个反对戈林的高潮，称他是屠杀格尔尼卡居民的凶手，“他的皮靴沾满了血迹”，并且强烈反对邀请他参加英王乔治六世的加冕礼。英国大使菲利普斯对其政府警告说，戈林假如敢到英国来，就可能有被刺的危险。英国政府考虑再三，终未向戈林发出邀请。戈林对此事很长时间都不能释怀，他在一次与友人谈话时说，他认为英国如不愿与德国结盟，那么德国潜在的真正的敌人就是大不列颠。

虽然戈林对英国人心怀不满，但是在理智上，戈林与希特勒都幻想建立一个德国与英国的联盟，因为德国的征服对象首先是在东方，而不是在英伦三岛。戈林在与英国航空大臣洛西恩勋爵谈话时，为这位在英国政界有一定影响的人物大肆描绘了一番英德结盟的美好前景，并直言不讳地对他说，他与希特勒都希望能与英国结盟。他说，“德国并不愿意看到大英帝国有任何衰落的迹象，相反，如果需要的话，在英国受到严重的威胁的时候，德国完全可以伸出救援之手，”“这也符合德国的利益。”戈林不无抱怨他说，英国现在对德国的态度并不十分友好，“别的国家都有殖民地，但德国却连一

块都没有。事实上，每当德国想从鹅身上拔一根毛的时候，都被英国和美国的大皮靴将我们的手踢走”。最后，戈林又对洛西恩勋爵说，“德国的空军力量现在比英国的空军要强大，德国并不是一定需要同谁结盟，因为德国完全可以自己保卫自己。”言外之意，德国与英国结盟主要对英国有好处，相反，英国与德国为敌，是不会有好果子吃的，实事求是他说，戈林的这一番威逼利诱，对英国政界并不是没有一点影响的。随着德国军事力量的加强，英国国内的绥靖主义思潮日益泛滥，许多政界人士主张不要与德国为敌，以避免又一次卷入战争。

1937年5月，张伯伦接替鲍德温出任英国首相。张伯伦一向希望与德国和解，并在大选时向选民保证，在其任期内，将实现欧洲的永久和平。为便于同德国政府搞好关系，他派对纳粹德国抱有好感的亨德森出任新的驻德大使。亨德森一到德国，就同戈林打得火热。戈林对亨德森的印象也很好，一来二去，两人后来居然亲密到了无话不谈的地步。戈林经常向这位新大使埋怨英国对德国始终过于苛刻，“英国人连一朵花都不让我们摘”，表白德国以德报怨，与英国签订了英德海军协定，并且，他本人从来没有让其空军将英国作为假想敌进行演习。在另外一次谈话中，戈林对亨德森说，英国与法国结盟是对德国的一种威胁。针对戈林的担忧，亨德森曾含蓄地指责了柏林—罗马轴心的危害。戈林听到这些，不无遗憾他说，“问题就在这里，如果伦敦不与巴黎结成联盟，那么，我们也不会与狗娘养的意大利人搞什么轴心——我们一点都不信任他们！”戈林又对亨德森说，他一直敬仰英国的德雷克（16世纪后半期著名的英国海盗，后被英国女工伊丽莎白授予骑士称号），比起海盗时代的英国，现在的英国明显地变得软弱了。亨德森对这种说法表示同意。亨德森好像被戈林迷住了一般，在给外交大臣艾登的信中他写道：“在纳粹的领导人中，除了希特勒外，最坦率最真诚的就是戈林。”对这样的看法，艾登却不能苟同，他一直认为希特勒和戈林之流的“坦诚”的实质与马基雅维里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1937年7月的一天，戈林在卡琳庄园又一次会见了亨德森。亨德森再次让戈林解释有关德国最终目标的问题。戈林向亨德森表示，德国已经放弃了一切向西发展的目标，也不会重占阿尔萨斯和洛林，他希望亨德森能把这一点向英国政府解释清楚。随后，戈林的话锋一转，很狂妄他说：“既然命运已经将德国放在了欧洲的中心，那么德国就必须在军事上强大起来，”亨德森对戈林说，他以个人的身份劝德国不要操之过急。他还吹捧说，“我注意到了德国现政府的成绩，也十分钦佩希特勒先生的‘高贵品质’，希特勒先生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就将德国的失业人数由600万减少到60万，这一点，在其他国家里几乎是不可能的，也说明了希特勒政府的许多社会计划都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戈林主持实施的四年计划对德国经济的发展影响甚大，可以说，它使德国的经济出现了一次革命性的变化。前面谈到，四年计划的核心内容之一是利用德国的低品位的铁矿石资源炼铁。早在1935年戈林在萨尔布吕肯与当地制铁商赫尔曼·勒希林会面时，勒希林就告诉他，一旦爆发战争，德国肯定就要受到封锁，根本就不能指望从瑞典进口铁矿石。而德国的铁矿石资源足以满足德国在未来战争中的需要，尽管其品位较低，但每年出产1400万吨生铁的原料需求还是能够得到保证的。最初，戈林对此有些怀疑，鲁尔的那些钢铁企业主们对这种说法更是不屑一顾，认为这简直是天方夜谭。因为他们

了解德国的铁矿且不说品位低，就是含硫量太高这一点就是很大的难题，现有的脱硫技术很难将其处理得达到要求。戈林思忖再三，又找了一些专家对这一问题加以充分论证。当时，任何一家德国钢铁公司都不愿承担冶炼德国的铁矿石的任务。戈林最后决定，为了第三帝国的长远利益，必须建立一个由他直接控制的钢铁公司，这个公司不仅要冶炼德国的铁矿石，而且在将来要完全控制德国的钢铁生产。戈林不愿让沙赫特和钢铁业的人士事先知道这一决定，因为他已料到沙赫特和那些钢铁巨头们肯定要反对他的计划。

1937年7月15日，戈林觉得时机已成熟，便向外界透露了这一消息。一周后，戈林又召集了钢铁界的头面人物在柏林召开了一个会议，他在会上宣布将在萨尔茨吉特建立一个全世界最大的钢铁工厂，他解释说：“因为我们的敌对国家在重新武装时都曾遇到缺乏钢材这一难于解决的问题。但是我们将向人们证明，第三帝国能比那些有议会政府的国家更好地解决这一问题。”此后不久，“赫尔曼·戈林帝国来矿与炼铁联合公司”，即“赫尔曼·戈林工厂”迅速成为欧洲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之一。

戈林对报界人士说，在必要的时候，他将出面没收那些他认为他的工厂所需要的矿山。面对戈林的举动，那些曾经为纳粹党的崛起出了大力的鲁尔的实业界巨头们，都目瞪口呆了。9个最具实力的钢铁巨头在克虏伯的带领下，以杜塞尔多夫钢铁联合会的名义，联名签署了一份给政府的抗议书。沙赫特本人也给戈林写了一封洋洋万言的信，呼吁戈林放弃这种集权式的经济政策，并1兵5告诫戈林说，这种经济政策只能导致私营企业最终的破产，而就德国现状而言，现在不但需要国有的大工业，同时也需要大的私营企业的力量，并且国家还需要来自私营企业的税收。戈林很不以为然。他在回信中告诉沙赫特说，为了国家的长远利益，他只能这样做。他自己知道，既然他的四年计划已经得到希特勒的批准，他就不怕来自任何方向的攻击。况且，在此时的德国，他戈林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他现在根本就没有必要把那些实业界的巨头们放在眼里。在给那几个钢铁巨头的回信中，戈林指责在这些人的眼中根本就没有国家的利益，有的只是无耻的利己主义，他们的所作所为是一种破坏帝国利益的行为。他还暗示，如果这些人再对他的作法说三道四的话，他就将对这些人提出起诉。那些人也并非等闲之辈，当然不会善罢干休，在沙赫特的唆使下，他们又向希特勒呼吁制止戈林的举动。但希特勒对这些人说，他绝对相信戈林所作的一切，因为他完全是出于对国家未来利益的考虑才那样作的，希望他们能够理解。

赫尔曼·戈林工厂不属于纳粹德国的任何一个经济部门，这个工厂的直接领导者就是戈林本人。为了便于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管理工厂，戈林任命其亲信皮利·皮尔纳为董事会主席。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德国的经济部门的负责人还在抱怨，没有一个人能够弄清戈林工厂的经营状况，也没有人知道戈林工厂的董事会的情况。戈林工厂利用其特殊的地位，将所谓的“经营”的触角伸到德国各地，甚至悄悄地延伸到奥地利、东南欧、巴尔干地区，并在这些地区以各种形式控制了一系列具有战略意义的公司。它购买了奥地利的施泰尔—戴姆勒—普希汽车公司的全部股票的78%；得到施泰尔钢铁工厂的全部控制权，包括其在瑞士的军人工厂；购买锡默林机器和汽车制造公司的51%的股票；购买多瑙河第一航运公司的控制性股票，从而获得了这一公司的全部的经营权及其在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的全部资产。在国内，戈林更是狮子大张口，将他认为有必要接管的工厂和矿山接二连三地纳

入戈林工厂的领地。其中最著名的有原属于弗立克的矿山，原属于奥地利的帕拉蒂里亚铁矿，在这个铁矿的附近，戈林工厂还建立了一个新的钢厂，以便就近冶炼该矿山的铁矿石。为了保证其钢铁厂的煤炭和石灰石的供应，戈林工厂吞并了德意志煤炭公司。后来，戈林工厂在鲁尔地区又陆续吞并了10个较大的矿山。

正如许多西方现代史学家所形容的那样，戈林好像是一只永远吃不饱的狮子。对于他的性格中的贪婪的一面，众多的史学家曾花费过大量的笔墨加以描述，并把这种性格的形成原因归于他长期注射吗啡。固然，药物的刺激是使其性格畸形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但最根本的原因恐怕还是他的元首希特勒长期对他的纵容。试想，如果希特勒对他稍加约束的话，他戈林即使是有天大的虚荣心，也会有所顾忌，而不敢如此胡作非为。希特勒在同戈林为夺取德国政权而并肩斗争的过程中，已经完全清楚了他这位得力部下常犯的毛病。可是，希特勒并不想过多计较这些，在希特勒看来，只要戈林能绝对忠诚于他，能一心为他出力，其他都是不重要的。况且希特勒也明白，戈林并不是一个庸碌无能的蠢材，说他蠢和懒，只是就他个性中的一个小小的侧面而言的，他的蠢更多的是因为他的超常的占有欲常常使他不择手段，作出一些超出常理的事情来；是因为他的病态的虚荣心常常使他无法自制，作出一些荒唐可笑的事情来。他的懒则是因为他太“忙”了，不知道他每天要参加多少会议和社交活动，每一个炫耀的机会，他都不肯放过，只要能够出头露面，他就有请必到。这样一来，一些“工事”他反倒无暇顾及。在他的同僚的眼中，他难免被看成一个不干正事，只慕虚荣而且有些心理变态的家伙。假如戈林真的一点本事也没有，那么欧洲历史上最大的盗世英雄希特勒岂能选中他做自己的接班人，又岂能让他去掌管第三帝国的许多重要的部门。

正是：不识独夫险恶处，只因未明其面目。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 第九章 帝国的首席猎人

排斥同类惜异类，保护动物法令诏；

首席猎人忙外交，狩猎大会射双雕。

戈林可以说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但是他对动物却有一种说不出的爱恋之情。他酷爱狩猎，可决不像有的人那样，不分青红皂白地狂捕滥杀。戈林在称雄第三帝国期间所做的唯一的一件好事，就是在1934年敦促立法机关制定了比较文明的《帝国狩猎法》，这一法令是在1934年7月3日的内阁会议上通过的。在同一次内阁会议上，希特勒还作了一个有关清洗罗姆集团的报告，夸奖戈林在那个腥风血雨的夜晚成功地除掉了43个帝国的“叛徒”的壮举。然后，内阁会议便通过了戈林提议制定的《普鲁士狩猎法》，其主要内容是严格禁止捕杀未成年的幼兽和怀孕的母兽，列出不许捕杀的各种动物和飞禽，并对狩猎的各种形式作了详尽的规定，这一法律一直保存到现在，令人回味的是，悲喜剧竟同台上演，杀害同类的血腥和保护异类的仁慈竟形成如此鲜明的对照，从中可以看出戈林的内心并非没有任何矛盾，也更反衬出此人的虚伪和残忍。

戈林还在卡琳庄园建立了一个野生动物的避难地，在这里他以人工辅助的方法饲养了大批的麋、鹿、野马、野牛等动物。他在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普鲁士总理后，曾对许多人讲过，在德国狩猎本身就反映了德日社会好像一盘散沙的现状，各州虽都有五花八门的关于狩猎的规定，但出于税收和其他目的，人们仍在自行其是，肆意捕杀，使得德国原有的一些珍稀动物濒临灭绝。他在刚刚担任普鲁士总理后，便对他手下的主任护林员谢尔平说，他已不能容忍上述情况再存在下去了，再也不能眼看着这些“可怜无助”的动物就那样被人们随意捕杀。戈林授权谢尔平，由他出面组织一个全国性的狩猎协会，戈林对他说：“不要担心钱，我会给这一协会足够的钱，花多少钱没有关系，但是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办好，因为我再也不能看到这种野蛮的猎捕现象继续下去了。”不久，一个全国性的狩猎协会宣告成立，这个协会的宗旨是对狩猎进行限制，重修湖泊，对森林加强管理，保护濒临灭绝的动物。协会出面向每一个猎人收费，以维持协会的日常开销。不久，戈林便让谢尔平去负责制定“普鲁士狩猎法”，戈林对谢尔平说：“先建立一个新的普鲁士狩猎法，然后再向全国推广。”

在“普鲁士狩猎法”制订的过程中，戈林对每一个条款都要过问，有些部分甚至亲自动手撰写，如有关禁止猎捕鹰的条文。戈林规定，在德国境内，禁止任何人以任何理由猎捕鹰，否则以违法论处。另外，他还让人在其中加入禁止使用人工照明、毒药、钢夹等方式捕猎的条文。

“普鲁士狩猎法”于1934年1月18日正式实行。可以说，戈林很少注意过某一部法律实行的情况，却唯独对这部法律的推行和实施备加关注，倾注了异乎寻常的热情。在法律开始实行后，他指示有关人员，要选拔最可靠的人担任护林员，最好是纳粹党员，并说：“不管是什么人违反了‘狩猎法’，这个护林员都要敢于直占，要有独立的见解和处理问题的能力。如果有人胆敢不服从这一法律，那么让他来找我！”说归说，其实在后来的很多场合中，戈林都未表现出他有多么赞赏有独立见解的护林人，当年曾在瑞士驻德国大使馆担任外交官的布尔克·哈待教授回忆说，他有一次去拜访戈林，亲眼看

见他对一个给他来电话的护林员大发雷霆。这个护林员对戈林说，在他负责的地区有几头公野猪闹瘟疫，请求戈林允许当地的农民自行处理。但戈林不同意，大概这个护林员争辩了几句，戈林便对着电话大吼：“你再说一句，我就用猎枪把你的鼻子打到天上去。”然后气呼呼地放下了电话，自我解嘲地对布希克·哈特说：“开始革命的时候都是这样，让人们去自行处理吧？”

戈林还在彼美拉尼亚的达尔斯半岛和东普鲁士的罗明顿设立了自然保护区。最使戈林感到得意的还是他在柏林附近的绍夫荒原新开辟的野牛禁猎区，这里有两头纯种公牛和七头杂交母牛，不久又引进了麋。尽管前几代国王也都想把野牛这种动物引进德国，但由于它很难成活，所以多少年来也没有成功。戈林未被以往的失败所阻上，他多次请教动物学专家，咨询有关人工授精的方法。一开始，实验的效果并不大理想，戈林却毫不气馁，坚持要把这项工作进行下去。功夫不负苦心人，野牛这种德国从未有过的动物终于在一块陌生的土地上安家落户了。接着，戈林又先后引进了瑞典麋和加拿大麋，可惜都没能成活。最后，他又前后三次从东普鲁士引进幼麋，到1937年，幼麋长大，并开始生育后代，繁衍下去。引进野牛和幼麋的成功，使戈林极其兴奋。他又让人从韦尔贝林湖畔的狩猎实验室引进了一批动物，其中有猫头鹰、松鸡、灰鹅、河狸和水獭等等。经过几年的经营，绍夫荒原成了柏林附近著名的野生动物观赏区，每年大约有十几万人到这里游览参观。

戈林对动物的热爱与对人类的残酷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他对动物所表现出的那种仁慈，使人很难相信他同时就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

1937年，在戈林的努力下，普鲁士议会通过了禁止动物活体解剖的法律。在这一法律通过之前，戈林在电台发表了一个讲话，在讲话中，戈林言辞激烈地谴责对动物进行活体解剖的人，并说，在禁止这种行为的法律没有通过之前，如果胆敢有人无视他的警告，继续那样做，将被视为犯罪，将被投入集中营。与此同时，戈林的高空实验室却在用活人（罪犯）进行致命的低温低压的实验，戈林对此从未动过任何恻隐之心。

戈林酷爱狩猎。他每次去狩猎区，常常在清晨4时就起床，然后就是持续7、8个小时的捕猎活动。每当这时，平日臃肿笨拙的戈林，就变得十分灵活机敏，他一刻不停地跑来跑去，追逐猎物，从不愿意守株待兔般地等在一个地方，使得陪他狩猎的护林员都累得疲惫不堪，不管有多累，只要有人告诉他说附近又有猎物出现，戈林就会连水都不喝一口，立刻策马前往。二战结束后，戈林在1936至1937年的狩猎日记被人在柏林发现。在这本日记中，戈林绘声绘色地记述了每一次狩猎的经过，甚至将每一次追杀猎物的细节都记录下来，尤其是追逐中的自我心理感受和猎物在被射杀时的情景，戈林都描写得甚为详细。这本日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戈林的变态心理，许多文字都使人或莫名其妙，或难以置信，以致后来的读者假如不知作者是谁，会以为出自一个精神病患者之手。

戈林对他部下中的狩猎好手，从来都是非常宠爱的，这种人一旦被戈林发现，就将很快得到提升。在戈林的日常生活中，狩猎是一项很重要的内容。不过戈林决非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是一个只知道吃喝玩乐的花花公子。在他的狩猎活动中，往往掺杂着不为人知的政治目的，穿插着一些政治色彩极强的活动。戈林在猎枪声中得到的东西绝不仅仅是猎物，可能还有其他纳粹官员希望在谈判桌上得到却又难以得到的东西，可谓一箭双雕。戈林最喜爱的猎场是由他一手创建起来的位于东普鲁士的新施腾贝格的动物保护区，这

里有着大批的野鹿，戈林经常邀请驻德外交官和政治家们在此狩猎，很多人将得到戈林的邀请引以为荣。戈林把狩猎作为重要的外交手段使用，而许多国家的官员们也知道戈林的这项爱好，于是常常利用狩猎的机会与戈林商谈一些事情，有时确能收到在办公室里收不到的效果。戈林经常将杀死的野兽送给他的那些所谓的“名誉猎友”，当然，享有此项殊荣一般都是其他国家的达官贵人，如巴尔干的一些小国的国王等。

1937年春，戈林带着埃米，卡琳的姐姐莉莉·马丁、戈林的姐姐保拉、冯·罗森伯爵以及佣人和保镖等一大批人来到罗明顿保护区狩猎，戈林特意将英国驻德大使亨德森请来。在到达罗明顿的当天傍晚，戈林便与亨德森埋伏在一处高地，等待猎物出现。不久，一只公鹿出现了。戈林与亨德森同时发现了猎物，但戈林没有开枪，因为他知道英国绅士们将荣誉看得比生命还要重要，他要等着亨德森开枪射中猎物，以满足这个英国人的争强好胜的心理，让他享有这种无关紧要的荣誉。亨德森哪里知道戈林的用心，他见到猎物来到面前，立刻站了起来，边跑边射击，居然一枪中的。戈林此时在一旁不动声色地看着兴奋的亨德森扭动着肥大的腰身向猎物跑去，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他看得出，他这次狩猎的真正的猎物已经离他的枪口不远了。

第二天，兴致仍然极好的亨德森与戈林共进午餐。戈林很自然地将谈话引入了正题。他向这位英国外交官透露了德国人的打算，即下一步的行动目标为奥地利、苏台德地区、但泽、默梅尔和波兰走廊。过了一天，戈林与亨德森又一次就德国的下一步行动进行了讨论，戈林希望亨德森能够向英国首相张伯伦解释，德国的下一步行动对英国决无任何敌意和威胁，并再一次向亨德森描绘了未来英德联盟的前景。他向亨德森保证，一旦英德联盟建立，德国将保证英国在欧洲大陆上的利益，而前提是英国心须承认德国在欧洲大陆上的霸主地位。在这一天的日记里，戈林写道：“浓雾，但露出了一丝阳光。”

美丽的奥地利是戈林的元首希特勒所无法忘怀的故乡。希特勒曾在首都维也纳渡过了他一生中最为浪漫也最为悲惨的时光。同他的元首一样，戈林对奥地利也怀有一份特殊的感情。从某种意义上说，戈林对奥地利的感情比对德国的感情还要深。戈林永远也忘不了他童年时代在毛特恩多夫城堡住过的那段日子，更忘不了1923年啤酒馆暴动后，他在流亡因斯布鲁克时当地纳粹分子对他的掩护和照顾。现在，奥地利的施蒂里亚和卡林西亚猎场，更是令戈林无比向往。另外，由于戈林工厂的发展，奥地利的丰富的矿产资源也使他垂涎欲滴。由于种种原因，戈林成了希特勒提出的德奥合并的设想的最积极的拥护者。

在纳粹党取得国家政权后，希特勒在公开场合一直信誓旦旦地声称德国决不会要求与奥地利合并。意大利的独裁者墨索里尼则以奥地利的保护者自居，曾多次明确地表示意大利将反对德国对奥地利的兼并，因为他不愿意看到意大利的北部边界驻扎着德国军队。在纳粹党没有控制德国之前，墨索里尼就曾就此对希特勒发出过警告，希特勒也多次向这位意大利独裁者保证那种事情不会发生。但是，在暗地里，希特勒连一天都没有忘记过奥地利。当纳粹党在国内猖獗活动之时，希特勒也派出了大批的纳粹党徒到奥地利进行纳粹的宣传，并不断发展当地的纳粹力量。

1934年7月25日，希特勒指示在维也纳的纳粹党徒暗杀了一直与他们作对的奥地利总理陶尔斐斯，与此同时，纳粹党徒占领了维也纳电台，宣布

陶尔斐斯“辞职。”由于许士尼格率领的奥地利政府军很快平息了纳粹分子的暴乱，重新控制了奥地利政局，纳粹的阴谋才没有得逞。意大利为了防止纳粹德国趁火打劫，将4个师派驻在勃伦纳山口。希特勒见势不妙，急忙声明奥地利出现的一切都是奥地利的内政，并对陶尔斐斯的被害表示“遗憾”，又将已经担任德国驻奥地利大使的巴本派去重新与奥地利修好关系。4年后，德国国内形势和国际形势出现了变化。纳粹已经牢牢地掌握了德国的一切，德国在经济和军事方面的力量日益强大起来。而且，意大利也与德国结成联盟。希特勒认为吞并奥地利的时机就要成熟，不过，为了掩人耳目，他想最好还是能迫使奥地利政府自己找上门来，“要求”德奥合并。因此，自1937年起，希特勒逐渐加紧向奥地利施加压力。

在实现希特勒的计划中，戈林自然一马当先。戈林首先通过他的两个姐姐与奥地利的纳粹头目们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在空军部的大楼门前和卡琳庄园，经常可以看见奥地利的珠宝商人米勒曼的身影，他是戈林与奥地利纳粹分子之间的联系人，在笼络奥地利纳粹分子的同时，戈林也知道，最终解决奥地利问题仅仅依靠奥地利的纳粹分子是不行的，还得在奥地利上层人物身上下工夫。经过一番考察，戈林发现奥地利的副外长吉米·施密特是一个可以利用的人。此人年纪不大，出身显赫，办事颇有魄力，因而在未来的奥地利政坛上，是一个颇有前途和影响力的人物。看准目标之后，戈林便想千方百计把这个人拉过来，一次，戈林在奥地利的一家电影公司工作的弟弟阿尔贝特受公司之托，求戈林为德国多从奥地利电影公司进一些电影片。戈林同意了，但是，他提出了一个条件，即让这个公司设法将施密特引见给他。

1936年11月，施密特与戈林第一次会面。开始，施密特对这位德国纳粹的二号人物保持着警惕，而戈林则显得很善解人意，只是很友好地就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与他聊了起来。当他知道施密特对狩猎也很在行，就好像遇到了知音一样，马上将话题转入了狩猎。这样，两人的距离又缩短了一些。第一次会面给施密特留下了比较好的印象。尽管在会面时，施密特很强硬地对戈林说：“只要我在奥地利有一天发言权，奥地利的独立就一天下会改变。”戈林对此未置一词，只宽容地笑了一笑。回到奥地利后，施密特对他的同事说：“这个德国人对奥地利至少是随和的，我想与他还能谈得来。”

不久，施密特给戈林写了一封信，感谢在德国时戈林对他的友好款待，并邀请戈林到奥地利狩猎。戈林马上给施密特回了信，并称赞他是“德奥关系中的最友好的人”。此后，戈林与施密特的通信联系保持了一年之久。

1937年的夏天，施密特提出想与戈林再次会面。戈林欣然应允，通知施密特他将在卡琳庄园接见他。施密特如约来到卡琳庄园。有一天，施密特与戈林在庄园附近的猎场猎鹿，施密特打死了一只名叫赫尔曼的公鹿，戈林开玩笑似地大声地叫道：“好啊，你把我打死了。”施密特生性诙谐，也是个爱开玩笑的人，他回头对戈林说：“我早就想打死你了。”话一出口，施密特就有些后悔，看到戈林神色自然，并没太在意，他才放下心来。

回到庄园的会客厅，戈林诡密地向施密特眨了眨眼，然后招来一个仆人对他耳语了几句。施密特不知戈林在搞什么鬼，就没当一回事，坐下来后，戈林与施密特又海阔天空地谈了起来。不一会儿，那个仆人走了进来，戈林对他摆了下手，仆人走出门，再进门居然牵进来一只狮子！戈林笑嘻嘻地对施密特说：“这是我养的狮子，”那只狮子摇摇摆摆地走到施密特跟前，爬到桌子底下舔起施密特的脚。施密特吓得面如土色，可又不想示弱，他结

结巴巴地对戈林说：“下次我带一只我养的动物来，一只羚羊。”戈林接着他的话说：“好，还有一只黑绵羊，许士尼格先生。”言罢，哈哈大笑起来。施密特由此才青出戈林决不是一个宽容大度的人，如果他觉得自己受到了伤害，就决不会善甘罢休，肯定会以牙还牙的。

施密特临行前，戈林告诉他，德奥合并是任何人都不能阻挡的趋势，在其他场合，戈林也大肆宣扬德奥合并的必然性。在一次招待奥地利企业家的宴会上，戈林对那些奥地利企业家说：“德国将向世界献出一个既成的事实，任何人都不能改变它。”在接受英国记者沃德·普莱斯采访的时候，戈林咄咄逼人他说：“许士尼格居然想以复辟哈布斯堡王朝来阻止德奥合并，那么，我们将告诉他，如果他胆敢这样做的话，‘大炮将代替我们发言！’”戈林又谈到，如果举行公民投票表决的话，“我想，约有90%的公民会赞同合并”。在谈到捷克苏台德地区的日尔曼人能否独立的问题时，戈林则很自信地指出，捷克人必然会让步。

戈林一边向人们灌输德国兼并奥地利及对外扩张的合理性，一边不失时机地向英国人许诺，德国将保证英国在西方，包括在比利时、荷兰和法国等国的利益。不过，作为对等的条件，英国人必须让我们在东方绝对自由。在与加拿大总理麦肯奇·金莱谈话时，他又一次谈到了德英合作的问题，并询问假如英国人对德奥合并加以阻拦的话，加拿大是否会步英国的后尘。面对戈林的诘问，温和的加拿大总理旁顾左右而言他，不作正面回答，只说英国人之所以对德英联盟不感兴趣，可能是因为他们一直担心德国会突然发动战争，在欧洲燃起战火，听到这里，戈林默不作声了。9月份，戈林在纽伦堡与英国大使亨德森会面。戈林再一次谈起德国的战略目标，他对亨德森说：“德国的战略目标保守得会让你们英国人吃惊，我已经同施密特在非正式场合谈过这一问题（指在卡琳庄园会面时）。德奥合并是不可阻挡的潮流，奥地利与德国的合并越早，对奥地利越有利，德国在德奥合并之后，下一个目标是捷克的苏台德德国少数民族地区，到最后，波兰就会自动就范。我们德国决不想攫取英国的任何利益，在殖民地问题上也与英国没有冲突，德国只想要回战前德国原有的罢了。德国愿意与英国结盟，并愿意为自己的盟友战斗，如果英国愿意的话，德国可以拿出一半的兵力为英国而战。我们对英国所要求的回报只是在我们受到来自东方的攻击时，英国能够保卫我们的后方交通畅通。”亨德森竟真的为戈林的“坦诚”所感动，当即满口答应一定把戈林的话转告给英国首相。

戈林与希特勒一样，对意大利反对德奥合并的态度十分恼火。有一次，戈林对一位奥地利人说：“我不能容忍意大利人扮演警察的角色来分裂我们，在我下一次见到墨索里尼时，我将告诉他，不管他愿意与否，德奥合并终将成为事实。”1937年1月，戈林宣称为解决西班牙问题，他要作为希特勒的特使出访罗马。墨索里尼也以为戈林此行仅仅就是为了解决西班牙问题，不料，在会面时，还没等谈到西班牙问题，戈林就迫不及待地同这位意大利独裁者谈起了奥地利问题。戈林对墨索里尼说：“让600万德国人生活在帝国境外是一件违反人道和不讲道德的事情。”墨索里尼对戈林突然提出这个问题毫无思想准备，所以半天没能说出话来。稍后，他对戈林说：意大利政府一直认为，1936年德奥签订的条约是不可侵犯的，意大利不希望看到德奥合并这样的事实。戈林这次意大利之行，没有使意大利在奥地利问题上作出一丝一毫的让步，也就是说戈林出访的真正目的并没有达到，这使戈林有些恼

羞成怒。回国后，戈林对他的老朋友、德国驻意大利大使冯·哈塞尔说，不管墨索里尼现在的态度如何，意大利都终将有一天要接受德奥合并这一事实。

同年9月，墨索里尼回访德国。戈林特意安排了墨索里尼访问卡琳庄园。戈林事先让一位画家在庄园的一堵墙上绘制了一幅将奥地利包括在其中的帝国地图，墨索里尼来到庄园后，戈林便把他引到此处，尔后，又对他大谈起德奥合并的前景，弄得墨索里尼心里很是窝火，但又不便当场发作。看着他的老对手墨索里尼的尴尬之态，戈林的心中平添了几分快意。

戈林似乎将奥地利看成了他的元首让他捕捉的一个猎物，他以其惯有的执著，像一个不肯认输的猎人一样，不依不饶地追逐着，寻找着捕获的机会。在戈林的眼中，墨索里尼就是那个他曾经要用猎枪打掉他的鼻子的愚蠢的护林人，尽管戈林撤不了他的职，但他完全可以绕过他，甚至可以根本无视他的存在。当然，这不仅仅是戈林本人的意思，希特勒也是这样指示他去做。

说到这位帝国首席猎人最为荣耀的时刻，人们不会忘记1937年11月那次盛会，月初，戈林主持的柏林国际狩猎展览大会召开，他以德国狩猎协会的名义邀请了许多国家的代表参加这次大会。在大会筹备期间，戈林便指示有关人员一定要将大会办得轰轰烈烈，要能让人们看到“新德国的气象”，绝不能以营利为目的。在大会开幕的那一天，柏林城区张灯结彩，在各主要街道两旁，众多的德国青年和少女挥舞着花束，热烈欢迎来自各国的猎人们。在会场门前，戈林的“赫尔曼·戈林”师的仪仗队不时向来参观的客人们行持枪礼，旁边的军乐队演奏着德国的民间音乐。戈林在这些日子里，整天满脸笑容，迎来送往。每天夜晚，戈林还要举行各种形式的宴会，招待一些重要的客人。举办这次政治目的极强的展览会，戈林当然不会忘记关照他的拉拢对象——英国人，大会开幕前，戈林专门嘱咐手下人，一定要将英国展区的活动组织得出色一些，在展览会开幕的那一天，柏林的歌剧院演出了冯·韦伯的歌剧《神枪手》。趁幕间休息，戈林又与英国大使亨德森亲热地交谈起来，他提到前些天德国的空军高级代表团在伦敦受到的热情接待，并对亨德森说：“如果人们之间的关系像英国和德国空军那样融洽友好，互相尊重，那么如果出现战争就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戈林举办的狩猎展览大会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欧洲各国的“猎人们”（自然都是各国的显要人物，平民百姓是没有资格参加的）大都赞不绝口，满意而归。戈林则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充分施展他的外交才能，与各国要人频繁接触，其中有英国的内阁大臣哈里法克斯勋爵。奥地利国家保安首脑保罗·雷韦特拉、戈林的“老朋友”施密特等人。

雷韦特拉是一个狩猎迷，他对在柏林举行的狩猎盛会很感兴趣，但又不想惊动柏林方面，更不愿意在这种场合与戈林见面。因此，他秘密前往柏林。不料，在展览大厅，戈林的姐夫弗兰茨·休伯发现了他，并立刻报告给戈林。戈林自然不会放弃这样一个与奥地利上层人物接触的机会，当天傍晚，他便派人将雷韦特拉接到了他的别墅，戈林首先煞有介事地对雷韦特拉能来参加他主办的活动表示感谢，尔后又埋怨他事先为什么不通知德国方面。雷韦特拉解释说，这次他是个人身份来柏林的，所以觉得没有必要同德国政府官员打招呼。戈林又就狩猎大会和建立新的狩猎保护区的问题侃侃而谈，随后话锋一转，谈起德奥合并的问题。戈林对雷韦特拉说，他希望雷氏能在未来的合并中出一把力。雷韦特拉立即表示这是不可能的。戈林见雷韦特拉面露

温色，便急忙把活岔开，转而恭维雷韦特拉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材，又说奥地利是一个出人材的地方，如果有一天德奥合并成为事实，那么将会为第三帝国提供大量的领导型人材。雷韦特拉这种人在奥地利实在是一种浪费，要是在第三帝国，他这种人一定会得到重用的。

雷韦特拉对戈林这种肉麻的吹捧和露骨的引诱十分反感，但又不好说什么，只好以沉默来表示自己的不满。戈林也许是装疯卖傻，也许是压根就没有注意别人的表情，兀自在一旁滔滔不绝他说着。他又对雷韦特拉说，奥地利一直在破坏 1936 年的德奥条约，“奥地利和德国人民”对此很不满意，“迫切地要求我们解决这一问题”。说着说着，他不能自持地站了起来，晃动着硕大的脑袋，挥舞着肥厚的大手说：“我们的第 7 兵团（纳粹德国专为解决奥地利问题而建立的部队）驻扎在德奥边境，它会像切黄油一样穿过奥地利，没有人能阻挡我们。”接着，戈林又说，奥地利别想指望法国和英国干涉，法国现在已经走向没落，自顾不暇。英国政府即便想干涉，它的各个自治领地也不会同意。那么，只剩下一个能干涉的国家了，“但是我们不怕，早晚我们也将解决它”！尽管戈林没有明确他说明是哪一个国家，但雷韦特拉明白戈林指的是捷克。在近两个小时的会谈中，雷韦特拉只敷衍他说了几句话，余下的时间便听戈林一个人口沫横飞地胡言乱语。回到下塌的饭店，雷韦特拉越想越气，兴致全无，第二天就回奥地利去了。说实话，戈林胆敢对他那样放肆，主要是因为当时奥地利太弱小了，戈林从骨子里不愿把奥地利人放在眼里。对待弱者，戈林经常表现得像一只戏弄老鼠的猫一样，残忍、无聊，而又自觉兴趣盎然。

然而，对待强者，戈林则又是另一副嘴脸了。在国际狩猎大会期间，戈林曾与英国内阁大臣哈里法克斯勋爵进行过会谈。会谈前后，戈林极尽奉承讨好之能事，先是派最豪华的小汽车将勋爵从饭店接到卡琳庄园，并在庄园中举行盛大的宴会，欢迎并感谢勋爵拨冗前来参加这次大会。戈林满口谀词，将这位来自英伦三岛的绅士捧得飘飘然忘乎所以。酒足饭饱之后，戈林又将话题转入英国与德国建立联盟这一老生长谈的问题上。这次，这位英国显贵替英国政府向戈林说了真心话，“我们不希望，也从来没有希望世界永远按照现在这个样子发展下去，也从来没有想永远将当今的世界秩序保持下去，因为它毕竟有不合理之处。但是，我们现在最关心的是如何使这些问题得到理智的解决。”戈林马上对此表示赞同。他接着勋爵的话说：“德国从来都不想用武力来解决问题，我们希望大英帝国能够公正地对待这些现实问题，因为英国在世界和平事务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但是德国必须得到公正的对待，它有权力拥有特殊的势力范围。如果英国与德国这两个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发生战争，那么对世界来说，将是一场灾难。”勋爵也对戈林的话表示赞同。勋爵走后，戈林立即给希特勒打去电话，告诉他与勋爵的谈话非常成功。在电话中，戈林对希特勒说：“他们已经意识到现在这样对待德国是不公正的。”

勋爵对戈林的印象极佳。回到伦敦后，勋爵曾对人说，“戈林真是一个让人着迷的人，我实在不敢相信，正是他指挥着杀了那么多的人。他看起来就像一个充满生气的大孩子，对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感到自豪，他向我夸耀了一番他的森林和动物，然后穿上绿皮上衣，挎上红色短剑，高谈政治。”勋爵可谓慧眼识“英雄”，他对戈林的看法很有一些可信之处。

尽管解决奥地利问题，只是希特勒宏大的计划中的一个微不足道的部

分，正如希特勒在 1937 年 9 月的一次谈话中所说的：

“我们将解决奥地利问题，但是我们的真正希望是在波罗的海，在俄国广阔的空间。如果我们能够得到这一使我们自由呼吸的空间，我们宁可在未来的战争中牺牲 200 万人！”

然而，奥地利问题毕竟是个现实问题，必须及早得到解决，因为这是第三帝国走向世界的第一步。在这个问题上，最能领会元首意思的人恐怕就是戈林了。对这一点希特勒不止一次在与戈林私下会晤时，向戈林表示过。戈林感到受宠若惊，他这个人太爱听好话了，尤其是从他的元首嘴里说出的好话。

正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猎人”之心不可测。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 第十章 陆军大元帅

陆军将领遭暗算，戈林荣任大元帅；  
费尽心机设圈套，如愿以偿除障碍。

话说戈林自从当上了空军司令之后，确实为纳粹德国空军的崛起出了一把力，可以说立了头功。在前面提到过的西班牙事变中，纳粹空军第一次显露出其威力，惨无人道地制造了格尔尼卡事件。尽管事后戈林受到了国际舆论的强烈谴责，但他并没觉得有什么不安，他看重的是希特勒的赞许，得意的是终于使其他纳粹头面人物看到了自己几年来苦心经营的成果，使他们不得不暗中佩服他确实不是一个只知玩乐不于正事的花花公子，戈林为此着实兴奋了一阵子。

不过，戈林还有一块心病未去，他想起来心中便隐隐作痛，那就是希特勒始终没有授予他陆军元帅的头衔。戈林曾不止一次转弯抹脚地向希特勒提出请求，可希特勒总是对此事装聋作哑。更使戈林愤愤不平的是国防部长勃洛姆堡居然已经晋升为陆军元帅。这样一来，戈林在纳粹德国的军事指挥系统中的身份就十分微妙复杂了。作为空军总司令，他应隶属于作战部长勃洛姆堡，与陆军总司令弗里奇上将平级。作为空军部长，他又与勃洛姆堡平级。而他又常常以元首的接班人自居，自认为应该居于勃洛姆堡之上。戈林对此事一直耿耿于怀，不明白为什么希特勒就是不让他任陆军元帅，使他一直处于一个很别扭、很尴尬的位置上。戈林一直怀疑勃洛姆堡在暗中作了手脚。

戈林并不知道，勃洛姆堡对他个人从来就没有任何成见。1938年1月18日，勃洛姆堡在与希特勒谈话中，就曾经提出建议，将来由戈林作他的继任者，可是，希特勒拒绝了勃洛姆堡的提议，尽管当时他没有向勃洛姆堡说明原因。没有人比希特勒更了解戈林的性格了。一方面希特勒知道戈林对自己忠心耿耿，愿在任何时候为自己卖命，这使他满意。另一方面，希特勒对戈林那种任性胡为的处事方式和奢侈腐化的个人生活，很是反感，非常不以为然。在希特勒的心目中，戈林并不是一个真正懂得军事的人。在即将发动对东方的战争之际，他不愿意将军事重任委与戈林这种人。同时，陆军中的老派军官们，始终把戈林和米尔希建立的新的德国空军看成不可能在未来战争中发挥任何重要作用的摆设。

戈林对此一无所知，只把自己未能如愿的帐记在了勃洛姆堡身上，对勃洛姆堡在军队中的位置竟然排在了他的前面，很不服气，非常气恼。可以说从勃洛姆堡担任陆军元帅之日起，戈林便在急切地等待机会将勃洛姆堡干掉，自己取而代之。但勃洛姆堡的行为一直无可挑剔，戈林也不好下手。不过，戈林深信，机会总会到来的。

勃洛姆堡对戈林未存任何戒心，并视戈林为纳粹上层中唯一一个真正同自己有共同语言的知音。在许多事情上，勃洛姆堡都是唯希特勒和戈林马首是瞻。他做梦也没有想到，正是自己认为最可信赖的人，却在时时刻刻准备在他背后戳上一刀。

到1937年底，戈林在确认希特勒已不可能同意他担任空军元帅之后，便开始着手筹划除掉勃洛姆堡的阴谋。但是，虽然戈林千方百计设圈套，使用了各种手段，无奈勃洛姆堡的所作所为却使他没有下手的机会。戈林无计可

施，只好在希特勒的面前中伤勃洛姆堡。他不止一次对希特勒说，德国军官团的高级将领们很有可能在密谋推翻纳粹政权，而勃洛姆堡则是参与幕后策划的主要人物。希特勒确实对德国军队的上层人物有些不放心，但他却无法相信勃洛姆堡会卷入其中。因为在德国的军官团中，勃洛姆堡显然是对纳粹政权最为忠诚的人物。戈林见希特勒对他的中伤不感兴趣，只好作罢。不料，一个偶然的事件终于为戈林搬倒勃洛姆堡提供了机会。

勃洛姆堡的发妻早在 1932 年就已经去世，此后，他一直鳏居。

1937 年，勃洛姆堡与他的秘书格鲁恩小姐好了起来，此后他们的感情迅速升温。到 1937 年底，有一天，格鲁恩小姐突然告诉勃洛姆堡说，她已经怀上了勃洛姆堡的孩子。勃洛姆堡闻言，立刻慌了神，因为这样一来，他就只能与格鲁恩结婚了，否则这件事情张扬出去，将是一场丑闻。但是，格鲁恩小姐出身低微，与她结婚又必然在贵族气极浓的军官团中引起人们的非议，特别是会受到那些老派军官的反对。万般无奈之际，勃洛姆堡想到了戈林，他知道如果这位无所不能的人物肯帮助他的话，他必将能渡过难关，妥善地处理好这件事。

在 1937 年底的一个夜晚，勃洛姆堡来到了戈林的别墅，把这件使他为难的事情向戈林说了出来。戈林一听，心中窃喜。原来，他已经听说了这件事，不过假如别人不对此表示什么，他戈林也就无话可说。他在静观事态发展的同时，他手下的人早已对格鲁恩小姐的出身进行了调查。这位陆军元帅的秘书，早年由于生活所迫，曾经有过一段卖笑生涯，这就非同小可了。戈林明白，希特勒若是知道他的陆军元帅竟跟一个曾经当过妓女的人结婚的话，一定会大发雷霆的。到那时，勃洛姆堡即使不想辞职，希特勒也不能再让他继续担任陆军元帅了。戈林听勃洛姆堡讲完，马上很恳切地对勃洛姆堡说，这桩婚姻无可非议，他本人不也是续弦再娶的吗？元首那里，他可以去帮忙疏通一下，估计元首是不会反对的。至于军官团那里，戈林劝勃洛姆堡不要太在意，第三帝国是不允许有社会偏见的。最后，戈林还假惺惺地对勃洛姆堡说，他愿意在任何时候，以任何方式帮助勃洛姆堡。不明戈林用意的勃洛姆堡自然是感激涕零。临走时，勃洛姆堡吞吞吐吐地对戈林说，他现在确实有一件事需要戈林帮忙。戈林忙问是什么事，他告诉戈林说：格鲁恩小姐有一个十分讨厌的追求者，希望戈林能够利用他的权力将那个人送到国外。戈林马上表示，处理这件事容易得很，可以下令将那个人送入集中营，勃洛姆堡一听，连说不妥，因为这样做实在是违他做人的原则。戈林听罢哈哈大笑起来，爽快他说，既然如此，那么就把他送到国外去吧。不久，那位格鲁恩小姐的追求者，就真的糊里糊涂地被戈林送到了南美洲。

虽然得到了戈林的“热心”劝慰和承诺，但勃洛姆堡仍然感到不放心，因为他还不知道希特勒到底会对这桩婚事采取什么态度。12 月 22 日，在慕尼黑的英烈祠为鲁登道夫将军举行葬礼，希特勒等纳粹上层人士都参加了。葬礼结束后，勃洛姆堡找到希特勒，直接谈了他的婚事。令勃洛姆堡感到惊讶的是，希特勒并没觉得此事有什么不妥，只是祝愿他妻子婚后幸福。

1938 年 1 月 12 日，勃洛姆堡在柏林的官邸举行了婚礼。这一天恰好是戈林的生日。在生日宴会上，戈林忽然不顾满座宾朋走了出去。有人问他干什么去，他古里古怪地一笑说，他去参加一个婚礼，去一下就来。许多人怔怔地看着戈林走出大厅，实在不明白谁的婚礼这样重要，竟然使戈林在自己的生日宴会上走开。

勃洛姆堡的婚礼比较简单，但却非同一般，因为希特勒与戈林都参加了婚礼。婚礼后，两位新人就离开柏林到意大利度蜜月去了。

戈林对勃洛姆堡的打击是在这位新郎离开柏林的第二天开始实施的。先是陆军部不断收到一些不明身份的女人的电话，她们都自称青楼女子，声称感谢陆军部将她们的同道接纳为元帅夫人。在1月21日，有一个男人居然冒充一位将军，请陆军司令弗里奇将军接电话。被拒绝后，这个人在电话中喊道：“告诉将军，陆军元帅娶了一个婊子！”柏林警察总局负责调查一个时期以来不断干扰陆军部的有关元帅新夫人的谣言的警探，突然收到了一份标有“埃娜·格鲁恩”字样的档案材料。他打开一看，不禁大吃一惊，原来袋内装有关于格鲁恩小姐在进入陆军部之前曾经做过妓女的全部情况的详实材料。他不敢擅自作主，就把这个材料交给了柏林警察总局局长赫尔道夫。本来，赫尔道夫打算将这份材料交给他的顶头上司盖世太保头子希姆莱。但转念一想，如果他将这份材料握在手中，那么，就可以要挟勃洛姆堡，没准这个大人物会成为他手中的一张王牌。反复思忖之后，又觉不妥，害怕万一有一天勃洛姆堡利用什么机会报复他。最后，他决定将这份材料交给勃洛姆堡手下的得力干将凯特尔将军。这位将军曾经得到过勃洛姆堡的帮助，并在不久前受到了勃洛姆堡的提升。他想，将材料交给凯特尔，勃洛姆堡必然会对他感激不尽。不料，凯特尔是一个极端自私的家伙，他害怕要是就这样将这件事压下去，一旦有朝一日被人发现，或者赫尔道夫将此事捅出去，传到元首那里，那他凯特尔就要承担欺“君”的罪名了，这他可吃不消，因为他知道清教徒出身的元首对这类事情从来都是极为保守、严厉的。因此，凯特尔看完材料后，又将材料还给了赫尔道夫，并建议他将材料交给戈林看一看。

戈林早就算好元帅夫人的档案材料最后还会回到他的手中，他知道没有任何人敢将这份材料压下。赫尔道夫将这份材料交给他后，他马上拿着这个材料兴冲冲地到总理府去见希特勒。但希特勒不在，他去上萨尔斯堡了。戈林焦急地等了几天。在希特勒回到总理府时，戈林已经等在总理府的大门前了，当然，他的手里拿着那份材料。这时，他看见勃洛姆堡的副官也在这里。戈林把他叫了过来，问他要干什么，勃洛姆堡的副官毕恭毕敬地向戈林报告说，他奉元帅之命，求见元首，请元首尽快约见他。戈林马上气势汹汹地让他离开这里，告诉他说，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同元首谈，这个时候元首是不会见别人的。勃洛姆堡的副官不明白戈林为什么突然对他发火，只好赶快夹着皮包走了。戈林看着勃洛姆堡副官的背影对希特勒的副官说：“这个让人讨厌的胖子（指勃洛姆堡）今天就要完蛋了！”

希特勒一到，戈林随后便走了进来，他一言不发地将手中的材料递给希特勒。希特勒知道这一定是一份十分重要的文件，否则他的这位副手是不会这样久等在这里的。希特勒匆匆将材料打开，一看便勃然大怒，气得在屋里乱走，戈林趁机火上浇油，他凑上去对希特勒说，勃洛姆堡不仅违反了军官法，而且给整个德国军队的脸上抹了黑。希特勒气急败坏地对戈林说，“不仅仅这样，他还欺骗了我们两个人，把我们当成了傻子，居然让我们两人给他当什么证婚人”。随后，他让戈林立刻代表他找勃洛姆堡谈话，并让戈林通知他必须辞职。

当天下午，戈林来到勃洛姆堡的办公室。勃洛姆堡面色灰黄，似乎在这一打击面前完全垮了下来了，他对戈林说，他将马上和格鲁恩小姐离婚。但戈林对他说，仅仅离婚是不够的，元首和陆军部要他马上辞职。勃洛姆堡知

道这一切都无可挽回，便绝望地看了戈林一眼，慢慢地走出了办公室的大门。戈林看着勃洛姆堡的背影，脸上露出了阴险的笑容。

同一天，陆军部便发出一个文告，向外界宣布了陆军元帅勃洛姆堡辞职的消息。与此同时，下台的前陆军元帅勃洛姆堡又启程去意大利的卡普里岛继续度他的蜜月了，仿佛被迫辞职的是别人，他已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了。许多人，包括戈林在内部对勃洛姆堡此举感到疑惑不解，不知他为何能迅速解脱出来，居然还有心思去度什么蜜月。这个答案只有勃洛姆堡自己知道。原来，事发后，希特勒召见了她，安抚他说，由于发生了这件为众人所瞩目的事情，他不得不下令让勃洛姆堡辞职。但一旦战争爆发，他将立刻重新任命勃洛姆堡为德国陆军的最高统帅。因此，勃洛姆堡虽然对刚刚发生的事情感到沮丧，但在得到希特勒的这一允诺之后，又好像注入了一针强心剂，恢复了自信，看到了希望。然而，希特勒的这一诺言直到纳粹帝国垮台也未能兑现。这是后话。

戈林以为这一次他担任陆军元帅的夙愿可以顺利地实现了。

可他哪里知道，还有一个人也在惦记着勃洛姆堡的职位，这个人就是陆军总司令弗里奇将军。在勃洛姆堡被任命为陆军元帅之后，弗里奇就一直对他嫉妒得要命，他认为勃洛姆堡之所以担任了陆军部长和陆军元帅，是因为他与纳粹党的关系非同寻常，而并不是靠着什么真才实学。在维护陆军的传统方面，弗里奇是一个十分正统的人，他认为，军队不应置于政党的统治之下，更不能成为某个政党手中的工具。弗里奇在纳粹取得德国政权后，就从没对纳粹党真正地效忠过。由于勃洛姆堡是纳粹内阁中的陆军部长，所以他从一开始就反对将德国军队的最高指挥权交给这样一个人。同时，弗里奇还对戈林的空至很不以为然，曾对别人说，戈林于中的空军只不过是一群会飞的“铁鸟”罢了。对于这一切，希特勒和戈林早就十分不满。不过，由于弗里奇在德国陆军中拥有一大批支持者，而且他在军事方面又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材，暂时还真有点奈何不了他。

在勃洛姆堡去卡普里岛度蜜月时，希特勒曾经约见过弗里奇，对陆军中一直存在的“无政府主义思潮”表示不满。弗里奇当即让希特勒拿出证据，被希特勒拒绝了。一周之后，希特勒在陆军部对数百名陆军高级军官发表谈话，大肆宣扬生存空间对德国民族的重要性，大谈自腓特烈大帝以来的德国的光荣历史，最后，他直着脖子挥舞着手臂，日沫横飞地叫喊，要想得到德国所应得到的生存空间，就只有一条途径，那就是武力，除此之外，别无他途。会后，弗里奇在见到希特勒时，并没有表露出希特勒所想看到的那种热情。此事更促使希特勒下决心彻底解决陆军的问题。戈林对希特勒的心思当然清楚得很，因此，他并没把弗里奇太放在心上，更不害怕在与弗里奇的角逐中输掉。况且，戈林手中还抓着弗里奇的一根小辫子。那就是两年前，柏林警察局曾经抓获一名专事窥测别人隐私的敲诈犯。这个自称施米特的案犯在审讯中供称，他曾经勒索过一位被称作弗里奇将军的人，使这位将军就范的把柄便是他与一名叫作魏因格特纳的男妓在一起鬼混。为此，将军付了他2500马克。此外，他还宣称他掌握着几个纳粹领导人搞同性恋活动的证据。这件事惊动了纳粹的最高层，希特勒曾经下令进行调查。不久，发生了莱茵兰事件，希特勒只好又下令中止调查。但是，盖世大保显然没有忘记这件事，调查也并没有完全停止。希姆莱将此事告诉了戈林，戈林如获至宝，让希姆莱将一直押在帕彭堡集中营的案犯送到柏林重新审讯。

在盖世太保的审讯室中，盖世太保同性恋罪犯缉捕队队长迈辛格将弗里奇将军的照片给罪犯看了，并问他那位“弗里奇将军”是不是这个人。案犯肯定他说，就是这个人。戈林得知审讯结果后，非常高兴，马上命令将这一案犯送到他的别墅来，他要亲自审讯。在戈林的办公室里，戈林先是将一堆照片放在案犯面前，让他指认哪个是弗里奇将军，案犯居然一下子就将弗里奇的照片找了出来。随后，他又进一步半诱半吓地对这名犯人说：“你不想老实招认都不行，因为那个叫魏因格特纳的男妓早已经将你从照片上认了出来。”案犯显然对这一点深信无疑，连声保证说他讲的都是事实。

戈林在得到案犯的“确实口供”之后，兴奋得头脑发热，已经不考虑希特勒会不会怀疑他挟私诬陷了，他在将勃洛姆堡妻子的材料交给希特勒的第二天就把弗里奇搞同性恋的有关材料送给了希特勒。在戈林去希特勒那里之后不久，弗里奇就得知了这一消息。将军怒不可遏地来到总理府，准备向希特勒询问此事。不料，在大门前，他被警卫挡住了，警卫告诉他，元首让他在这里等候召见。过了许久，希特勒的一个副官才走出来告诉弗里奇，元首在图书馆里召见他。他走进希特勒的屋子，发现戈林也在那里。希特勒面色阴沉，戈林则一副幸灾乐祸的表情。希特勒没容弗里奇作任何解释，就对弗里奇说，他的同性恋的犯罪事实已经得到确认，如果弗里奇对此供认不讳，那么他可以保全将军的声誉，对外保密，但从今天起，弗里奇必须要休长假，离开德国。戈林在一边也随声附和着表达了这个意思。弗里奇立即表示抗议，声称这是明显的诬陷。希特勒没有理睬弗里奇的申辩，戈林则开口说了话，他对弗里奇说，这个罪犯与一百多个案件有牵连，已经全部据实供认了，在这件事情上，他是不会胡说的。言外之意是说弗里奇的事也一定是真的。弗里奇气得说不出话来。这时，希特勒把施米特的档案和供同扔给了弗里奇，弗里奇拿过来没看几页，便惊呆了，甚至连自己的单片眼镜跌落下来，都没察觉。希特勒按了一下电铃，几名盖世太保将案犯施米特押了进来。

案犯施米特穿着一套不知从哪里弄来的衣服，松松垮垮。他面色苍白，目光呆滞，显然是经过长期关押和营养不良所致。他萎靡、怯懦地扫了一眼在座的人，然后将目光转向了弗里奇，突然用颤抖的手指着弗里奇大声喊道：“就是他，就是他！”弗里奇此时反倒极为镇静，他知道现在说什么也没有用了。

希特勒看了弗里奇一眼，弗里奇似乎想说什么，嘴动了几下又没有说出来。希特勒摆摆手，示意弗里奇可以走了。弗里奇走出希特勒的图书馆后，在大厅里见到几个盖世太保官员径直向他走来，其中的一个人对他说：“奉元首的命令，将对将军您进行审查。”弗里奇失魂落魄地跟着那几个盖世太保走了。

在对弗里奇案件的审讯中，敲诈犯施米特仍坚持原来的口供，而弗里奇却无论如何也不承认自己搞过同性恋。不久，那个男妓魏因格特纳在审讯中又推翻了原来的口供，否认弗里奇将军就是那个嫖客。这一下，可把戈林急坏了。他马上打电话给司法部长，让他陪同自己一起对魏因格特纳重新进行审讯。在审讯中，戈林竟然让魏因格特纳对他从前的口供起誓，但无论戈林怎样威胁，魏因格特纳就是不肯，气得戈林在审讯室中就大骂起来。在审讯魏因格特纳的第二天，一个叫胡伯尔的盖世太保侦探无意中发现一份涉及骑兵上尉冯·弗里奇同性恋案的卷宗里，有一个被没收的存折，其中有一笔支出，与施米特所声称的2500马克相吻合。胡伯尔也曾参与了对弗里奇案子

的调查，因此觉得事关重大，马上向希姆莱和海德里希进行了汇报。希姆莱和海德里希立即将这份材料调来，看过之后，也意识到极有可能这个弗里奇就是那名真正的同性恋嫖客。可是，事已至此，已经没有回转的余地了，决不能再向希特勒和戈林汇报。那边，戈林也没向希特勒汇报再次审讯魏因格特纳的情况。

此时，希特勒已经向陆军的主要高级将领通报了弗里奇的事，陆军高层立即对此事作出了反应。他们建议陆军方面组织一个荣誉法庭，由这个法庭接管弗里奇案件。可是，希特勒在参加陆军最高将领的会议时，已对弗里奇案件盖棺定论，认为是否组成荣誉法庭已经不重要了，弗里奇是个同性恋者是不容置疑的事实。

然而，接连废黜两名陆军的最高将领并不是一件小事。一时间，柏林城内谣言四起，这座城市似乎又如同1934年6月底那样，弥漫着一股紧张的气氛。陆军中一大批高级军官对此极为不满，认为弗里奇事件肯定是盖世太保设下的一个陷阱。有人传言，陆军要在1月30日希特勒举行执政5周年演说活动时包围国会，发动政变，逮捕希特勒及所有的纳粹高级官员和议员。由于国会的会议突然宣布无限期后延，从而使这一传言更显得具有可信性。

不久，陆军方面也有人发现了骑兵上尉弗里奇的事情。许多陆军高级军官认为，这一偷梁换柱、嫁祸于人的事实如果披露出来，不仅可以使弗里奇将军的冤情大白于天下，同时也会给仗势欺人的盖世太保以沉重的打击。假如盖世太保走上罗姆冲锋队的老路的话，那么第三帝国的统治基础就会被动摇，连希特勒本人都有可能要下台。要是希特勒试图掩盖盖世太保的罪行，那么陆军方面就可以问心无愧地采取行动了。然而，事与愿违，事态的发展证明，陆军的老将领们又一次在他们从前的下士面前失败了。

在荣誉法庭开庭之前，希特勒突然召开了内阁会议，这次内阁会议是第三帝国时期召开的最后一次内阁会议。在会议上，希特勒宣布，弗里奇的陆军总司令的职务已被解除，他本人将掌握整个德国武装部队的统帅权。会议结束后，这个命令立刻通过电台向全国发布，命令的第一句话就是：“从现在开始，我亲自接管整个武装部队的统帅权。”陆军高层一片混乱，他们中间没有任何人想到希特勒会来这一手。在这一迅雷不及掩耳般的打击面前，陆军中没有任何一个将领能够拿出一个切实可行的对策来。希特勒可是没有丝毫的犹豫，在命令公布后，旋即对陆军上层进行了一次快速的清洗，几十名陆军高级将领被解职，有的甚至当时还不知道自己已被解职，在被解职的第二天才从《人民观察家报》公布的被解职人员的名单中，发现了自己的名字，知道原来的职位已不再属于自己了。

希特勒的举动为一些人带来了灾难，也使一些人感到伤心，在最伤心的人之中，就有戈林一个。他原指望铲除了勃洛姆堡和弗里奇，希特勒就会任命他为陆军总司令，那时他就既是空军司令，又是陆军司令，成了整个德国军队的统帅，这该有多么风光啊。没想到，希特勒居然来了这么一手，他只能扼腕悲叹自己自费了这许多苦心！希特勒当然知道戈林的心情，为了安慰他，希特勒将勃洛姆堡的陆军元帅的职衔授给了他，这才总算使戈林从沮丧的心境中解脱出来。如此一来，戈林就成为德国军队中拥有最高军衔的人了。

在希特勒一系列的清洗工作完成之后，由陆军元帅和空军司令戈林主持的荣誉法庭举行了关于弗里奇一案的听证会。在听证会召开之前，弗里奇委托的律师对施米特声称碰到弗里奇将军搞同性恋的地区进行了详细的调查，

终于发现了那个真正的同性恋者，确为骑兵上尉弗里奇，在证据面前，那位弗里奇只好承认了他所犯下的同性恋罪行，同时出示了施米特以“侦探克勒格尔”名义写下的2500马克的收条，经验证，笔迹与施米特一致。至此，弗里奇案件已经真相大白。希姆莱和海德里希事前并没有将事情的真相完全告诉戈林，所以，戈林在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后，大吃一惊。因为他作为弗里奇将军的主要指控者，可能会陷入一个可怕的境地，他不但成了诬陷犯，而且将在德国陆军中引起一场危机。如果希特勒也认为自己受到了戈林的愚弄，后果更会不堪设想。戈林得知消息后，立即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赶到了希特勒的总理府。使戈林既感到意外，又觉得高兴的是，他一来到希特勒的办公室，希特勒就对他说了，陆军现在竟然又找到了一个弗里奇。戈林一听心中暗喜，明白他已经不用再向希特勒解释什么了，于是，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希特勒又对戈林说，这个弗里奇只不过是陆军为了掩盖弗里奇的罪行所搞出的一个新名堂而已。然后，希特勒指示戈林说，不管陆军方面如何想掩盖这桩丑闻，戈林都应将这个案件搞清楚。其实，这时没有比戈林更清楚弗里奇案件的真实情况的人了。但他绝不能轻易承认弗里奇无罪，对于他来说，这件事无疑是命运攸关的大事，到了这一步，也只能硬撑到底了。

不久，荣誉法庭开庭。开庭的那一天，戈林穿着陆军元帅的制服，手持元帅的节杖，面带微笑，神态自若地步入陆军部大楼，威风凛凛地宣布对弗里奇将军的案件的审理开始。弗里奇将军坦然地坐在被告席上，这使戈林内心更感到不安。尽管希姆莱曾向他保证，证人施米特已经就自己的供词签署了宣誓书，在宣誓书中，施米特声称，他所指控的弗里奇将军的案件，与那个后来出现的骑兵上尉弗里奇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证人施米特被带了进来。在开庭之前，陆军曾经将充当证人的两名案犯从盖世太保的手中夺走，但在戈林的干预之下，他们很快又被送回盖世太保的监狱中，被盖世太保关押在地牢中。由于长期在地牢中度过，施米特的脸上全无半点血色。在法庭上，施米特仍坚持自己在盖世太保授意下所编造的供词，这使戈林很满意。当弗里奇将军的辩护律师准备为他的当事人辩护时，戈林突然站了起来，宣布由于某些事情将牵涉到国家的利益，所以，荣誉法庭将无限期休会。

希特勒对戈林处理问题的方式十分满意，他现在实在没有功夫再为这种无关大局的事情分心了。他对德国的控制逐渐完成，阻碍其实现政治理想的那些被他称为“老朽”的保守分子，基本失去了在德国政治舞台上的影响。而对于戈林来说，也有理由得意一阵子，尽管没有得到他所期望的德国军队最高统帅的职务，但毕竟得到了他梦想已久的陆军元帅的头衔。

不过，戈林由于一直心怀鬼胎，在弗里奇事件中扮演着不光彩的角色，心里终归难以平静，尤其是那个真正的弗里奇出现后，他更是忐忑不安。荣誉法庭第一次开庭，已使得戈林捏了一把汗。

虽然当时借故休庭，但他心里也明白，这一事件终须得到解决。

在陆军方面的强烈要求下，7天后，荣誉法庭再次开庭。这次开庭，弗里奇找来了十几位证人，他们都是一些年轻人，这些人在法庭上言明，弗里奇将军多次招待过他们，却从来没有骚扰过他们。案犯施米特被带了进来，他又一次复述了由盖世太保帮他写好的供词。在弗里奇将军的律师的严辞追问下，施米特的供词不断露出马脚，把戈林急得坐立不安。更使戈林生气的是，施米特自称他知道弗里奇将军的一所住宅，他就是在那里发现弗里奇将

军与那个男妓鬼混的。弗里奇将军的辩护律师戈尔奇伯爵抓住这一环节，马上要求法庭对之进行调查。第二天，继续开庭，当法官又一次问施米特，是否能认定他所说的那所住宅就是弗里奇将军的，施米特一口咬定，那就是他发现弗里奇将军与那个男妓鬼混的住宅。这时，弗里奇将军的律师站了起来，清楚地对法官说，施米特欺骗了法庭，那所住宅的所有者不是弗里奇将军，而是骑兵上尉弗里奇。听众席上一片哗然。戈林再也坐不住了，他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对施米特大声吼道：“你究竟还想欺骗法庭多久？”施米特满脸惶恐地对戈林和法官说：“我刚才说的话是假的。”戈林粗声大气地对施米特说：“你为什么要说假话，难道你不知道欺骗法庭的后果吗？如果你讲实话，我可以保证任何人都不能伤害你。”施米特用颤抖的声音说，“今天上午侦探迈辛格来到我的牢房对我说，如果我在法庭上改变原来的口供的话，那么……”施米特顿住了，打了一个手势，将大姆指向上翘了翘。戈林紧追不舍，问道“这是什么意思”，说着他也滑稽地将大姆指像施米特那样向上翘了翘。“那么就处决我。”施米特垂头丧气地对戈林说。

一切都已大白于天下，弗里奇将军是无罪的。法庭正式宣布弗里奇将军无罪后，戈林走下审判席，假惺惺地握着弗里奇的手，弗里奇面无表情，没有跟他说话，众目睽睽之下，使戈林十分难堪，除了难堪之外，戈林内心更有一层隐忧，他担心希特勒知道了事情的结果后，会不会恢复弗里奇原来的职务。使戈林感到欣慰的是，希特勒似乎对弗里奇将军是否有罪并不太感兴趣。其实，早在弗里奇案发之时，希特勒经过一番考虑，就已任命了冯·勃劳希契为新的陆军总司令，尽管这位由希特勒亲自选定的陆军总司令也曾陷入离婚丑闻之中。不过，由于勃劳希契所找的那位金发女郎，按照戈林的后来说，是一个百分之二百的纳粹分子，因此在这桩风流案中，希特勒和戈林都坚决支持勃劳希契离婚，并且利用各种手段促成新的婚姻，使勃劳希契如愿以偿。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位新的陆军司令的确对希特勒唯命是从，没有辜负希特勒对他的信任和器重。

在清洗陆军内部的同时，希特勒对内阁各部也进行了清洗，其中包括将不太听活的外交部长牛赖特调离，换上了对纳粹极为忠诚但思想浅薄的里宾特洛甫；另外一个十足的庸才，人所共知的同性恋者冯克则被正式任命为经济部长，以代替早已经被解职的沙赫特，此外，一些驻外大使也被调换或解职。

在勃洛姆堡和弗里奇事件过去不久，希特勒在一次接见外宾时，正式向外界透露了纳粹统治集团内部的座次。在希特勒之后，排在第一位的便是戈林，后面依次是赫斯。里宾特洛甫和牛赖特。

使外界感到不解的是牛赖特的调职。平心而论，在牛赖特担任外长期间，纳粹的外交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因此，他在国内外都有一定的威信。如今若将他撤职，势必会引起某种程度的混乱。为了扰乱视听，遮人耳目，由新的外长里宾特洛甫出面，宣称建立一个由牛赖特担任主席，由三军首长和内阁以及党内最重要的成员组成的秘密内阁，它的任务就是“为元首提供在外交政策方面的指导意见”。但实际上，这一所谓的秘密内阁纯属子虚乌有，上如后来在纽伦堡审讯中戈林本人的证词所说的那样，“这一内阁并不存在，但是这种名称使人听起来好像是真的……，我发誓，这个秘密内阁从未举行过一次会议，甚至一分钟也没有举行过。”然而，当时在戈培尔的宣传机器所造的舆论中，这个秘密内阁仿佛是一个超级内阁，而牛赖特在这一内



阁中担任主席，给世人的印象好像是他又升官了。实际上，勃洛姆堡、弗里奇、牛赖待以及沙赫特等人，都是当年兴登堡总统为了遏制纳粹党势力的发展而刻意安排的人选。这些人从来就不是真正的纳粹分子，且始终在与以希特勒为首的纳粹党人争夺第三帝国经济、外交、军事方面的控制权，是希特勒彻底控制德国，使第三帝国走上战争之路的绊脚石，是希特勒的眼中钉。如今，在戈林等人的谋划下，这一批人先后下了台，从而使德国完全处于纳粹的统治之下了。如果论功行赏的话，那么，在这场以排除异己为目的的权力争夺战中，头功应该非戈林莫属。虽然他的个人野心没有完全得到满足，但他所敬仰和忠诚的元首也没有亏待他，将陆军元帅的权杖授给了他，使他在德国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显赫地位。

正是：用心险恶全为利，翻云覆雨至其极。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 第十一章 吞并奥地利

为助元首归故里，不择手段施诡计；

冬季舞会藏阴谋，侵吞奥国动武力。

正当戈林为勃洛姆堡和弗里奇的事情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希特勒则在加紧实施吞并奥地利的计划。在审理弗里奇案件的第一次听证会上，戈林突然宣布无限期休庭，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希特勒告诉他，“帝国的陆军元帅有许多重要的事情要做，这种小事让别人去忙吧。帝国现在正面临着—个重大的抉择。”希特勒这里所说的“重大的抉择”，就是指对奥地利的吞并，他让戈林放下手头的事情，全力以赴地协助他解决奥地利问题。

戈林当然愿意以元首的全权代表的身份出现在世人的面前。在过去的很长—段时间里，戈林—直受到牛赖特的排挤。直到最近—年里，他在外交部的势力才有所发展，他很为自己在外交方面的“才能”而自得。这次他以为牛赖特下台，元首会让他兼任外交部长，不料半路杀出—个里宾特洛甫，着实令他恼火了一阵子。可能是为求得心理平衡吧，在里宾特洛甫担任外长后，戈林对许多人讲，在德国只有—个人能够决定国家的外交政策，那就是希特勒，弦外之音是说里宾特洛甫只是—个摆设。

早在前—年的6月，当时还是陆军总司令的勃洛姆堡根据希特勒的密令，指示德军参谋部制定了关于—旦哈布斯堡王朝在奥地利复辟，德国军队将马上入侵奥地利的计划。在德国人入侵的威胁面前，奥地利总理许士尼格也不敢轻举妄动了。与此同时，奥地利的纳粹分子们在德国纳粹的支持之下，气焰日益嚣张，—时间，德奥合并的叫嚣在奥地利随处可见。—些奥地利高级官员在纳粹的威胁和利诱之下，也纷纷倒向德国。奥地利几乎每天都有纳粹党徒以各种不同形式制造的暴力事件发生。在边远山区，纳粹组织的大规模的武装示威活动，经常发展为暴动，奥地利政府对这些地区的控制微乎其微，几乎已经等于零。—切都为希特勒最后吞并奥地利提供了条件。

1938年1月，奥地利警方查禁了设在维也纳的奥地利纳粹中央指挥机关，在搜查中，发现了一份由纳粹党魁赫斯亲自签署的文件。在这份文件中，赫斯表示同意奥地利的纳粹在该年春天发动大规模暴动，如果奥地利政府进行镇压的话，第三帝国将以“防止日尔曼人内部的流血”为借口入侵奥地利。据巴本回忆，另有一份文件指示奥地利的纳粹分子在必要的时候，刺杀巴本或者德驻奥的武官莫夫中将，从而为德国入侵奥地利制造借口。老奸巨滑的巴本曾将他手中掌握的这些文件转移到了瑞士，并扬言，他如遇不测，这些文件就将公诸于世。但是，希特勒并没有批准刺杀巴本的计划，而是免去了他驻奥地利公使的职务。回到柏林的巴本，立刻像—只哈巴狗那样，跑到希特勒那里摇尾乞怜。希特勒对巴本少不了又是—番假惺惺的抚慰，尽管他们都知道对方是在演戏给自己看。巴本明白，希特勒对他永远是—不会放心的，但他又暗自庆幸自己终于保住了性命。为了表示对希特勒的忠诚，巴本建议希特勒亲自与许士尼格会谈，商定最后解决奥地利问题的办法，在两个星期之前，巴本在与许士尼格谈话中已得知他有这个愿望。希特勒—听，觉得这—建议不错，他好像忘记了巴本已被解职，马上让他去维也纳安排有关会见的事宜。

与希特勒在幕后紧张策划的同时，戈林则赤膊上阵，公开向奥地利政府

施加压力。早在1936年7月，戈林在征得了希特勒的同意后，就任命了威廉·开普勒为新的驻奥地利的商务代办，实际上他是戈林的私人代表。开普勒可以绕开巴本，同奥地利的纳粹党直接联系。

在巴本被解职之后，戈林命令开普勒与奥地利的纳粹头面人物赛斯·英夸特博士进行接触，让赛斯·英夸特与许士尼格政府商谈对被取缔的奥地利纳粹组织解禁的问题。但是，双方的会谈毫无结果。接着，赛斯·英夸特与亲德的奥地利国务部长格莱德·赫斯诺将军表示要向许士尼格提出辞职。戈林听到这个消息，有些生气，他一面大骂奥地利的纳粹分子都是一些经不得一点挫折的幼稚鬼，一面急令开普勒无论如何也要阻止他们辞职。同时，戈林又请来奥地利纳粹党的另一个头面人物约瑟夫·利奥波德，向他面授机宜，告诉他不管怎样，他们在奥地利政府中所占有的位置都一定不要丢掉，在必要的时候，德国会对奥地利局势作出应有的反应，到那时，奥地利政府中的纳粹分子就将发挥出无可替代的作用。

在各种公开场合露面的戈林，毫不隐讳地频频向奥地利政府发动攻势，施加压力。1938年1月初，奥地利的邻国南斯拉夫的总理访问柏林，戈林对其来访的活动日程和细节亲自作了精心安排，欢迎场面之热烈和接待规格之高是奥地利人从来不曾享受过的。奥地利驻德国公使陶西芝见状醋意大发，向许士尼格报告说，如果再像现在这样与德国的关系僵下去的话，奥地利真不知将要受到什么样的对待。在南斯拉夫总理离去后，陶西芝登门拜会了戈林。只见戈林态度冷淡，举止傲慢，并且意味深长地对他说，德国如何支付从奥地利进口的铁矿石和木材的款项的问题，到今年的春季（指1938年春）就会得到解决——并且是一劳永逸的解决。陶西芝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立刻将他与戈林谈话的大致内容电告了许士尼格，告诉他德国可能很快就会对奥地利采取行动了。

在陶西芝向许士尼格报告了戈林谈话的用意之后不久，巴本就又回到了维也纳。他向许士尼格转达了希特勒同意与许士尼格会谈的意见。在柏林的戈林听说希特勒将与许士尼格举行会谈，马上赶到希特勒那里，气急败坏地劝告希特勒取消与许士尼格会谈的计划，他对希特勒说：“对于维也纳那个蠢材，一切都是多余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将我的军队开过边境去！”而希特勒没有听从戈林的劝告，仍旧安排了会谈。

正式会谈定在2月12日，地点是位于德国的伯希特斯加登的希特勒的山庄。2月1日，在戈林的好友、外交部次长吉米·施密特的陪同下，许士尼格来到了会谈地点。希特勒站在山庄大门前的台阶上迎接许士尼格，他见许士尼格对他身边站着三个德国将军微露惊讶之色，便解释说，这几位将军是偶然因为其他原因来到这里的，希望许士尼格不要介意。但是，在会谈中，这几位将军一直面色严峻，凶神恶煞般地坐在旁边。

许士尼格属于老派的奥地利人，他希望与希特勒的会谈能够像绅士之间的谈话那样进行。可不曾想，谈话开始不久，希特勒便发作起来，许士尼格后来回忆说，希特勒就像一个歇斯底里的病人一样，大喊大叫，令人不寒而栗。希特勒指责奥地利一直在破坏德奥之间的友好关系，德奥关系恶化的责任全部在奥地利一边。希特勒说：“许士尼格先生，我现在可以告诉你，我已经下决心要使这一切终结。德国是一个大国，如果它解决它的边界问题的话，是不会有一个人出来反对的。”然后，希特勒又指出奥地利在德奥边界设立了大量的工事，用以对付德国。许士尼格否认有这种事情，而希特勒告诉许

士尼格说：“不要以为你们的行动我不知道，在德奥边界，你们只要搬动一块石头，我不用半个小时就会知道。另外我还要告诉你，没有任何国家会为德国与奥地利的事务而出头的。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同我是一致的，英国不会为奥地利动一动手指头，法国更不会为此而与德国作对，因为他们已经失去了机会，在莱茵兰时，他们本可以制止德国，那么我们就不得不后退，但是他们没有那样做，现在他们就更不会为奥地利去承担任何风险了。”

许士尼格与希特勒的会谈最后变成了希特勒的个人演讲，许士尼格只有静听的份了，根本就容不得他插嘴。最后，希特勒强硬地向许士尼格宣布，他必须接受一个新的条约。说着，他把这个条约的草案交给了许士尼格，并告诉他说，他要在下午听到答复。紧接着，纳粹的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走了进来，他告诉许士尼格说，这是元首对奥地利政府的最后的“要求”，元首不希望这个协定再有什么变动。

许士尼格拿过德国人强加于他们的“协定”一看，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因为接受了这一协定，就等于完全放弃了奥地利的独立。这一协定的内容包括要求奥地利政府在一星期之内取消对奥地利纳粹党的禁令，任命奥地利重要的纳粹分子赛斯·英夸特博士为内政部长，主管全国的警察和保安力量，由亲纳粹的霍尔斯特瑙将军担任国防部长，为将奥地利的经济纳入纳粹德国经济发展的轨道，还要奥地利政府任命另外一个亲纳粹分子许包克博士担任经济部长。

许士尼格看完条约的草案，陷入了沉思。他自从担任奥地利总理以来，几乎每天都在为如何消除德国的威胁，保住奥地利的独立而绞尽脑汁。1937年7月11日，德奥双方曾签订了一个德国保证奥地利独立和德国不干涉奥地利内政的条约，这使得奥地利在纳粹德国的魔爪下喘息了一段时间。许士尼格一直企望德国能够恪守这一条约，事实却使许士尼格最后的一丝希望都破灭了。许士尼格正在冥思苦想时，巴本走了进来。他对许士尼格说，他对条约的内容也感到吃惊，但他还是劝告许士尼格接受这一条约。这时，希特勒的副官走进来告诉许士尼格，希特勒请他去，许士尼格被带到了希特勒的书房。希特勒面无表情地对许士尼格说，“我不会改变草案中的任何一点内容，你必须原封不动地在这个文件上签字，在三天内满足我的要求，不然，我将下令向奥地利进军。”许士尼格痛苦地看着摊在他面前的文件，慢慢地拿起笔在上面签了字，站在一边的希特勒见状满意地笑了。许士尼格签完字后，不甘心地对希特勒说，按照奥地利的宪法，这种条约必须得到总统的批准方能生效，他表示愿意呼吁总统接受这一条约，不过他不能保证做到这一点。希特勒声色俱厉地对许士尼格说：“你必须保证这一点！”然后他疾步冲到门前，对着门外大吼道：“让凯特尔将军到我的办公室来！”他又转过身来对许士尼格说：“我回头再来找你。”说完走了出去。不一会儿，许士尼格又被带到了一个小会议室里，吉米·施密特也在那里。施密特见送许士尼格进来的德国军官走了出去，便惊恐地对许士尼格说：“我想我们今天是回不去了。”许士尼格无言以对，只是勉强地苦笑了一下。

实际上，刚才的一幕只是希特勒演给奥地利人看的一出戏。当凯特尔听到希特勒的叫喊，急忙从休息室中跑了出来，问希特勒有何吩咐时，希特勒笑着对凯特尔说：“没事，我只是让你到这里来一下。”半个小时后，已被吓坏了的许士尼格和施密特又被带到希特勒的书房。希特勒对许士尼格说：“我又改变了主意，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改变主意。但是我警告你，这是你

最后的机会了。”

戈林由于不赞成希特勒与许士尼格举行什么会谈，故而没有参加，只派了他的艺术顾问米尔曼去了希特勒的山庄，以便随时向他报告会谈的情况。会谈结束的当天晚上，许士尼格和施密特婉拒了希特勒为他们安排的晚宴，失魂落魄地驱车直奔边界而去。第二天，希特勒回到了柏林。当天晚上，戈林去见希特勒，希特勒得意洋洋地告诉他，奥地利问题的解决指日可待。希特勒还绘声绘色地给戈林讲述了他是如何恐吓许士尼格的，他对戈林说，在与许士尼格共进午餐时，他把两名凶恶的将军叫来做陪客，在餐桌上，他与这两位将军大谈德国新近建造的新式轰炸机和德国空军的强大，听得许士尼格脸色一阵阵地发白。戈林听后哈哈大笑，并对希特勒说，真有些后悔没有亲眼看见这出戏。

3天后，奥地利政府迫于压力，批准了许士尼格带回的《伯希特斯加登条约》。柏林和奥地利的纳粹党徒们弹冠相庆。在2月20日德国国会召开的大会上，希特勒竟向议员们声称德国将同时遵守这一条约和1936年7月签订的那份条约。不久，戈林给他的好友吉米·施密特写信说，他本人对《伯希特斯加登条约》抱有很大的希望，同时祝贺施密特出任奥地利外长。

但是，戈林的信还没来得及寄出，就从维也纳传出了一个使柏林方极为恼火的消息，那就是许士尼格突然宣布将在奥地利进行全国范围的公民投票表决，决定是否重新确立奥地利的独立。希特勒和戈林听到这一消息后，犹如热锅上的蚂蚁，急得团团转。此时离许士尼格宣布的投票表决时间只有3天了。希特勒立刻将在柏林的有关军事将领统统召到他的办公室，告诉他们，在未来的3天里，即在奥地利举行公民投票表决之前，德国将对奥地利实施军事入侵。

3月11日早晨5时半，熟睡的许士尼格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奥地利警察局长报告，德奥两国铁路交通已被中断，听说德国军队正在向奥地利边界聚集。上午10时，有人从柏林带来了希特勒要求取消公民投票的命令。听到这些消息，许士尼格开始为自己仓促做出的公民投票的决定懊悔了。他在同总统及其他内阁成员紧急磋商后，决定同意取消这次公民投票，下午2时，他将这一决定告诉了赛斯·英夸特。六神无主的许士尼格同墨索里尼通了电话，通报了德国的入侵计划，并征求墨索里尼的意见，墨索里尼有些轻描淡写地对他说：“我想德国人不会这样做的，因为戈林曾经亲口向我保证过这一点。”

在德国准备入侵奥地利的那几天里，全柏林最忙的人可能就要数戈林了。他一会儿主持军事会议，进行入侵的各种军事布署，一会儿又不断地给在维也纳的纳粹分子们打电话，指示他们如何在德军入侵时采取行动，作好配合。戈林对将要组成的新的奥地利内阁最为关心，他派开普勒给奥地利的纳粹送去了一份由他亲自选定的奥地利内阁成员的名单。在这份名单中，有戈林的姐夫弗兰茨·休伯，戈林给他安排的职位是司法部长。

据战后从德国空军部发现的戈林研究所的电话记录所载，3月11日14时45分，戈林在电话中告诉赛斯，许士尼格仅仅取消公民投票是不够的，还有什么要求，要在同元首商量后再给他回电话。15时5分，戈林回了电话，他让赛斯命令许士尼格辞职，并且要在两个小时内任命赛斯·英夸特为奥地利新总理。这是戈林在希特勒的授意下，向奥地利发出的最后通牒。此后，戈林几乎一步不离地守在电话机旁，等候来自维也纳的消息。

17点30分，赛斯·英夸特从奥地利总统府给戈林打来电话，告诉戈林说：“许士尼格已提出辞职，总统接受了他的辞呈，但拒绝将总理的职位委任给我。”戈林大怒，对着电话大声喊道：“这不行！绝对不行！……他一定得把联邦总理的权力交给你，接受我们原来安排的内阁。”最后，戈林对赛斯·英夸特说：“你同莫夫中将（德国武官）一道去告诉米克拉斯（奥地利总统），如果不答应我们的要求，我们的军队将在今天晚上就开过边境，奥地利的存在就会结束。……告诉他，如果在4个小时之内还不明白，那我们就在4分钟之内让他明白！”说完，他啪的一声将电话摔到了一边。

出乎戈林的预料，正直、顽强的奥地利总统依然不肯屈服。

18时30分，戈林又同赛斯·英夸特等人通了电话，他们报告说，米克拉斯还是拒绝他们的要求。戈林恶狠狠地说：“那好吧，必须把他废掉。”

在许士尼格通过广播发表告别演说之后，戈林在电话中对莫夫说：“最好是米克拉斯辞职。”莫夫回答：“是这样，可他不肯，他说他不会向武力屈服。”戈林不相信似地反问：“是这样吗？这么说，他是要人赶他出去？”莫夫肯定了这一点，戈林坏笑着说：“养了十四个孩子，只好赖着不走。不管怎样，必须让赛斯上台。”

在戈林不停地同奥地利通话的时候，希特勒那里也乱成了一团。希特勒心中充满了对许士尼格的愤怒，是这个人的出尔反尔使他陷入了措手不及的境地。他深知，如果奥地利真的进行公民投票的话，一旦公民投票的结果不利于德奥合并，那么再要解决奥地利的问题就将在国际社会上招惹麻烦。里宾特洛甫的国务秘书魏茨泽克提出了一个建议，认为入侵最好打着合法的旗号进行，设法让奥地利政府“请求”德国政府出面解决奥地利当前所面临的问题，“恢复奥地利国内的正常秩序”。希特勒对这一建议很感兴趣，因为入侵奥地利所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就是目前还不知道意大利、英国和法国的态度，如果有了借口，就无需再考虑这些国家的态度了。但戈林却对这一建议不以为然，他对希特勒说：“我们根本不需要采取这种形式，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我们都要进去。”

戈林的话更加坚定了希特勒入侵奥地利的决心。当天晚上，戈林在空军大楼举行冬季晚会，参加晚会的有1000多人，驻柏林的各国公使也应邀出席了这个盛大的晚会。尽管舞会的场面很豪华，但由于德国军队即将入侵奥地利，参加舞会的大部分人心头都好像压着一块石头，兴奋不起来，谁都不知道将要发生的事情会有怎样的结果。不时有一些穿着特殊服装的人进出晚会，向戈林等纳粹要员报告情况。在大厅的一角，意大利的外交官们聚集在一起，个个都是面色凝重，眉头紧锁，显得焦虑不安，他们还无法断定墨索里尼对德国人侵入奥地利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

意大利的外交官们可能不会想到，此时此刻，希特勒和戈林比他们还要不安，还要急着知道墨索里尼的态度。就在当天的早晨，戈林让菲利普王子带着他与希特勒的亲笔信前往罗马。在这封信中，希特勒和戈林为德国入侵奥地利寻找一大堆理由，希望墨索里尼及其意大利政府能够理解。

戈林根本就无心参加舞会，在空军大楼的大厅里鼓乐喧天的时候，他却悄悄来到了总理府，等待维也纳和罗马的电话。大约在晚8时左右，开普勒又打来了电话，告诉戈林，除了许士尼格个人引退之外，其他所有事情都没有任何的结果。戈林立刻向希特勒通报了情况，希特勒一听，让戈林迅速赶到他那里去。戈林赶到后，发现陆军的几个主要将领都在那里。希特勒见戈

林来了，马上对在场的人说：“‘曳托计划’马上就要实施，第三帝国的新纪元就从现在开始了。”在场的人都紧张得屏住了呼吸。接着，希特勒让在场的人来到一幅巨大的地图前面，询问入侵行动的每一个细节的落实情况，在场的将领一一向希特勒作了汇报，希特勒在确信每一个环节、每一项部署都毫无问题后，便签署了入侵的命令，这时，时钟的两个针正好指在晚8点45分上。

晚8点48分，也就是在希特勒签署入侵命令的3分钟后，戈林通过电话指示开普勒让赛斯·英夸特把如下电文发到德国：

在许士尼格辞职后，认为其自身使命是建立奥地利的安宁和秩序的奥地利临时政府，向德国政府发出紧急请求，要求支持它完成这一使命和帮助它防止流血事件。为此，它要求德国政府尽快派遣军队进入奥地利。开普勒当即表示请元帅放心，他一定立刻将电文给赛斯-英夸特看。戈林又叮嘱说：“他甚至不必发电报，只需说一声‘同意’就行了。”一个小时后，开普勒给戈林口电话说：“赛斯·英夸特同意了！”又解决了一个难题，戈林想，这一下德军可以“名正言顺”地进入奥地利了。

当戈林重新走进舞会大厅时，正在舞池中翩翩起舞的一对对舞伴好像互相感染一样，纷纷走出舞池。戈林没有注意到这一情况，他径直走向米尔希，对他耳语道：“我们将在拂晓前进入。”然后，他又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向在场的人频频点头致意。其实，他与米尔希的低语已被旁边的人听到，德国将要入侵奥地利的消息迅即在舞会中传开。捷克大使马斯特尼走到戈林面前，问他德军在即将开始的行动中会不会向因斯布鲁克以南推进，如果向南推进的话，捷克政府就将认为自己的国家受到了来自德国的威胁。戈林立刻向他作出了保证，他对马斯特尼说，德国与奥地利的事情“只不过是一件家务事而已”，希特勒希望与捷克政府改善关系。

戈林又对马斯特尼说，请他与本国政府打好招呼，千万不要为此事在国内搞什么备战动员。不一会儿，马斯特尼与捷克外长通了电话。接着，他找到戈林说，他的国家并没有进行动员，捷克政府无意干涉奥地利的事务。闻听此言，戈林非常高兴，又对马斯特尼说，他可以代表希特勒保证，德国不会对捷克采取任何不友好的行动。这时戈林的副官走到他的身旁，交给他一份电话记录。戈林看后，脸上露出了兴奋的表情。电话是在维也纳的威廉·开普勒打来的，他告诉戈林，在一小时之前，奥地利总统米克拉斯向奥地利军队下令，在德军入侵时不要抵抗。也许是受到戈林的情绪的影响，晚会的气氛突然又热烈起来。

不一会儿，晚会特邀的柏林芭蕾舞团开始演出歌舞。戈林从节目单上撕下一张纸，用铅笔匆匆写下几行字：“乐曲结束时，你愿意与我谈一谈吗？我想把最近发生的事情向你解释一下。”然后，他让他的随从副官将这个便条给英国大使亨德森送了过去。

在大楼内的一间休息室里，戈林与亨德森单独见面。戈林向亨德森解释了德国入侵奥地利的理由，对他所说的各种理由，亨德森并不赞同，他对此表示了不同的看法，特别强调：“即使许士尼格的作法过分，德国也没有理由对一个主权国家这样地大动干戈。”戈林觉得很扫兴，他试探地问了一下亨德森，对于这件事，英国政府将会作出什么样的反应。亨德森对戈林说，英国政府对此将会表示十分的“遗憾”。戈林要的就是这句话，他知道这就

是说英国政府不会采取什么实质性的行动，这样一来，德国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几乎在戈林同亨德森谈话的同一时间，负有使命的菲利普亲王也从罗马给正在焦急等待的希特勒来了电话。希特勒从接线员手中抓过电话，急切询问墨索里尼的态度。菲利普告诉希特勒说：“我才从威尼斯宫回来，意大利领袖以非常友好的态度对待整个事情。他向你问候……许上尼格告诉了他德国将要入侵的消息……墨索里尼说奥地利对他是无要紧要的。”希特勒大喜过望，在电话中对菲利普说：“请告诉墨索里尼，为了这件事，我将永远不会忘记他……永远不会，无论发生了任何情况。”

而法国此时正处于政局动荡之中，根本就无暇顾及别国的事情。这一下，希特勒和戈林都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在戈林见到希特勒时，希特勒得意地对戈林说：“我一直都很清楚，我们可以依靠墨索里尼。这是我一生中最愉快的时刻，我从没怀疑过领袖的伟大。”对于希特勒给予墨索里尼的评价，戈林只能假装颌首同意，其实他心里永远也忘不了当年在罗马这位“伟大”人物使他受到的冷遇。

3月12日拂晓，德国军队分多路越过德奥边境进入奥地利境内。作为一个奥地利人，希特勒也许是全德国最渴望在这一天进入奥地利的人，他决定亲自率领大军进入奥地利，临行前，他将国家的最高权力交由戈林代管，这一下可把戈林乐得差点儿晕了过去。希特勒在奥地利的那些日子里，戈林时时刻刻都在贪婪地品尝着作为国家元首的滋味，他在陶醉、满足之余，内心只是遗憾日子过得太快。

戈林很快便进入了角色，并且显得很自然。希特勒刚刚离开柏林，捷克外长克罗夫塔便从布拉格赶来，要求拜会希特勒。戈林派人将克罗夫塔带到他的办公室，对他说，元首因为有其他事情到“别的地方”去了，临行时将国家的最高权力交给了他，如果有什么事完全可以直接同他讲，他能够履行国家元首的职责。克罗夫塔向戈林表示，他得到了捷克总统的指示，授权他向德国政府通报，捷克政府不会进行敌对的军事动员。戈林当即再一次保证，德国军队不会进入离奥捷边界10公里的地区，请他将这个意思转告捷克总统。

戈林一方面为希特勒重返奥地利而感到由衷的高兴，另一方面内心还隐藏着一个也许只有他自己才明白的想法，那就是不希望希特勒再回德国。他在幻想，如果奥地利总统米克拉斯下台，希特勒就任奥地利总统，那么德国的最高权力自然而然地就会落到他的手中。为此，他在希特勒进入奥地利的当天，就派米尔希带着他给米克拉斯的亲笔信去了维也纳。在信中戈林劝诱说，如果米克拉斯立即辞职，那么他会保证米克拉斯领取保险金的权力的。不过，戈林的想法终归是一厢情愿，他并不知道希特勒最后将对奥地利作出怎样的安排。

正当戈林沉醉于权力的幻想之中时，希特勒回到了他的故乡林茨，受到了当地几十万纳粹分子及其支持者的欢迎。在隆重的欢迎仪式上，希特勒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几个小时后，希特勒在林茨给戈林打电话说：“戈林，你很难想象，我完全忘记了我的国家有多美。”戈林为元首在进入奥地利后立刻给他打来电话而自豪，甚至有些受宠若惊的感觉。第二天早晨，他在见到里宾特洛甫时，不无炫耀地说：“昨天晚上元首给我打来了电话，他已进入了角色。”尽管希特勒亲自出马，但戈林还是担心一旦希特勒回到德国，掌



管奥地利的权力就会被希姆莱等人抢去。为防患于未然，在德国军队一进入奥地利，戈林就电令开普勒接管奥地利的监听机构，不允许任何人插手其中。

与此同时，戈林已经开始考虑对奥地利的犹太人的处置问题了，因为在德国军队进入奥地利的24小时之内，已经有大约2万多犹太人越过奥地利与波兰边界，进入波兰。菲利普亲王在电话中向戈林建议，应该完全开放边界，这样，我们就能除掉这些贱民了。戈林最初表示同意，但转念一想，奥地利的许多犹太人都是富人，决不能让他们把财产带走，因而他又指示菲利普说，“犹太人可以走，但是必须把财产留下。对于那些反对我们的人，能关起来的要关，不能关起来就把他们赶走，但是有一点，有外汇的把外汇留下才能走。”

4天之后，希特勒回到了他青年时代曾经穷困潦倒地生活过的维也纳。在他的内心，他不希望奥地利仍然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而存在，这在《我的奋斗》一书中早就明确地表露过了。可是，戈林仍在寄希望于希特勒改变想法，以使奥地利仍保持独立的地位，然后由希特勒担任国家元首，而他则接任德国的国家元首。不料，在希特勒到达林茨的当天晚上，戈林的研究所把一份刚刚监听到的奥地利外交部给奥地利驻德国公使陶西芝的电话记录交给了他，上面说以赛斯·英夸特为首的奥地利新内阁已经接受了希特勒的建议，同意两国合并，组成一个联邦。这对戈林来说，无异于当头挨了一棒，使他从美梦中惊醒过来。正好在他身旁的里宾特洛甫见戈林的举止有些失态，忙问他怎么了，戈林将监听记录交给了他。里宾特洛甫匆匆看完，急忙抓起电话与奥地利公使陶西芝联系，想证实一下消息是否可靠，不料戈林一把将电话抢了过去，大声对陶西芝叫喊：“见鬼，事情到底怎么样了。”站在一旁的里宾特洛甫不解地望着这位帝国元帅，不明白他这是怎么了。

既然希特勒还要回来主宰德国，戈林也就只好老老实实地收起了想当德国元首的念头。当然，戈林还没有狂妄到真想将希特勒取而代之，只是他这个人权欲熏心，有时脑袋里跳出一些稀奇古怪的想法也是不足为奇的。试想，希特勒就算对他的祖国爱得发狂，想得要死，他也绝不会轻易将为之奋斗了20余年的德国交给别人的，尽管这个人就是忠实于他的戈林。戈林居然连这一点都忽视了，还真有点让人难以置信。

在入侵奥地利的时候，戈林没有忘记他的朋友施密特。在德军一开始进入奥地利时，戈林就派自己的私人飞机将施密特从维也纳接了出来，并派专人将他送到卡琳庄园。戈林在施密特到达之后，与他长谈了两个多小时，他明确地告诉施密特，他完全可以为施密特提供一切保护，使他不致于落到盖世太保的手中。与许士尼格相比，施密特所受到的待遇真可谓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了。在德军进入维也纳的第二天，许士尼格就被逮捕，并遭受了极为残酷的迫害。从3月12日至3月28日，他被盖世太保软禁，在一段时间里，盖世太保一直让他处于一种极为恐怖的状态之中，并且不让他睡觉。此后又将他关在维也纳大都会一个小房间里长达17个月，他还被强迫从事各种常人所不能忍受的苦役。到第二年的3月，当医生为他作例行的体检时，发现他的体重减轻了58磅，但盖世太保让医生在体检报告中写上了一切正常的字样。后来，许士尼格和他的妻子一起被关入达豪集中营，直到1945年5月4日，许士尼格与其他一些政治犯从达豪集中营撤退，途中被一支美国军队发现，他才获得自由。

德国侵吞奥地利后，戈林也踏上了这块久违了的土地。他到处作迎合奥

地利人的民族主义情绪的演讲，还许愿要进行社会改革，要修建电站和高速公路等等，渴望和平与富足的奥地利人相信了他。1938年4月10日，公民投票结果使戈林满意，绝大部分选民表示信任希特勒。许多国家的政府要员为之疑惑和忧虑。

希特勒的梦想——德奥合并、荣归故里，终于都实现了！元首非常感谢戈林在这场政治欺诈中为他所做的一切，戈林也为此而自豪，现在他又像一只凶恶的鹰犬一样，准备听候喝令，扑向下一个目标。

正是：巧取豪夺作帮凶，恃强凌弱成祸首。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 第十二章 捷克事件中的彷徨

为保权势欲和平，见风使舵得虚衔；  
宰割捷克耍手段，无可奈何忙备战。

德国人在奥地利取得的胜利，使希特勒清楚地认识到，英法两国在德奥问题上所表现出的软弱，正是他继续实现他在《我的奋斗》中所阐明的所有理想的最好条件。同时，德奥合并，也使得捷克在战略上处于无法防御的位置，希特勒认为，这正是天赐良机。在奥地利事件结束不久，希特勒便开始着手准备实施他的“绿色方案”。“绿色方案”是纳粹德国进攻捷克斯洛伐克计划的代号，它是1937年6月由当时的国防部长勃洛姆堡主持制定的。在当年的11月，希特勒在对德军高级将领讲话时，对“绿色方案”又作了详细的说明。希特勒强调，对捷克的进攻，应当“以闪电式的速度来进行”，最有可能是“在1938年即予执行”。

现在时机已经到来，作为德国三军统帅的希特勒指示陆军要以一个“偶然的事件为借口，发动闪电式进攻”。他对陆军参谋长凯特尔说：“在采取军事行动的头两天，从政治上来说，是决定性的，如果不能采取决定性的军事行动，那么，就会引起欧洲危机。所以，军事上的胜利，一定要使外国认为军事干涉是没有希望的。”但是，戈林对“绿色方案”的反应却使极度兴奋的希特勒有些失望。

在希特勒为“绿色方案”的实施绞尽脑汁的时候，戈林却正在忙着扩大他的工业帝国，在侵占奥地利之后，他便将总部设在维也纳的阿尔卑斯山公司的大部分股份收买过来，从而使这一欧洲著名的钢铁公司的一系列矿山和工厂成为戈林工厂中的新成员。滚滚而来的财源，使戈林心花怒放，也使得他对“绿色方案”还不如对庞大的戈林工厂中的任何一个分厂更感兴趣。同时，戈林对“绿色方案”没有什么热情，也同他个人对捷克没有丝毫的敌意有关。前面提到过，在德国对奥地利采取行动的当夜举行的冬季舞会上，他就已经向捷克大使马斯特尼保证过，德国对捷克没有任何领土要求，请捷克政府放心。当时他说的确实是他的真心话。捷克外长克罗夫塔在与戈林会面时，也曾向他表示过，捷克政府将与德国政府保持一致。另外，他还对戈林说，捷克政府要对一个传说中的将对戈林采取行动的暗杀集团进行认真的调查，以防止出现任何不测。戈林对此表示感谢。在克罗夫塔临行之前，戈林还对他讲，任何对捷克不利的行动，都是“愚蠢”的，也是德国所不愿意看到的。戈林对捷克没有任何敌意的一个最有力的证明就是，在戈林别墅墙壁上那幅巨大的修改过的地图上，捷克的边界根本就没有变动。克罗夫塔在出入戈林别墅时已经注意到了这一事实。

希特勒知道了戈林对捷克的态度。尽管希特勒对此感到失望和不满，但在此关键时刻，他还是非常希望得到戈林的支持。一向了解戈林的希特勒，决定采用老办法——许以高官厚禄，拉拢戈林。但让他为难的是，戈林现在已经是陆军元帅了，还能再给他升什么官呢？希特勒明白戈林内心一直渴望能够担任国家元首，即使是名义上的。这并不是说戈林对他有什么敌意，或者说有什么不敬，戈林只是需要满足他那永远也不会满足的虚荣心和权力欲。对于来自任何方面的任何形式的虚荣和浮华，戈林都是从不拒绝的，都是会令他乐不可支的。希特勒早就看到了戈林这一弱点，每当需要戈林出来

为他卖命时，他就会找一个机会为戈林加官晋爵，得到的回报便是戈林拼命地卖一阵子力气，这已是屡试不爽的妙招。

这一次由于已无什么实际的利益可给戈林，希特勒便开出一张空头支票。4月23日，希特勒在其政治遗嘱中，指定戈林为他的接班人。尽管这是一个遥遥无期的许诺，但在戈林看来，元首的接班人，这本身就是一个带有光环的头衔了。戈林在看过希特勒的遗嘱之后，马上一改过去在捷克问题上的暧昧态度，摇身一变为强硬派。在许多公开场合里，他大肆宣扬希特勒灌输给他的“将可恶的捷克人赶回俄国去”的论调。不过，戈林的内心并非没有担忧，他始终担心如果对捷克采取行动的话，英国和法国是不会袖手旁观的，而他们一旦采取行动，便会导致一场新的战争。因此，他在表面大唱反捷高调的同时，暗地里却在不断地劝告希特勒一定要谨慎从事，但希特勒总是斩钉截铁地告诉戈林，“将捷克从地图上抹掉，是我不容动摇的决心！”

在对捷克采取行动之前，希特勒亲自前往罗马，同墨索里尼密谈。从罗马归来，希特勒似乎更加坚定了解决捷克问题的决心。他的罗马之行，引起了整个欧洲政界的关注。希特勒一回到柏林，各大国驻柏林的使节便千方百计打探消息，形形色色的间谍也在使尽浑身的解数，将从各种渠道得到的消息发回本国。一时间，人们议论纷纷，忧心忡忡，整个欧洲大陆笼罩着战争的阴云，好像一场大战已是一触即发。

从5月20日开始，形势日趋恶化，伦敦、巴黎、莫斯科、布拉格政府都惶惶不安，许多欧洲政坛要人认为，自1918年一战结束后，这是欧洲离战争最近的时刻了。作为这场战争危机的策划者的希特勒比任何人都要不安，因为德军参谋部告诫希特勒说，“绿色方案”有可能已被泄露，捷克政府正在进行全国动员。

5月21日，捷克苏台德地区的两名日尔曼农民被捷克警察打死，这一事件使整个欧洲都大为震动，人们意识到这一事件很有可能成为德国进攻捷克的理由。希特勒对这一事件作出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注意英国和法国的反应，使他气愤的是，来自伦敦和巴黎的抨击越来越强烈，敏感的英法政客一再指责德国向边境调遣军队的行动。希特勒此时的感觉就像一个贼在还没来得及行窃时就被别人抓住一样。英法两国的大使一再会晤纳粹的高级官员，告诫德国，如果他们贸然进攻捷克，就将引起欧洲大战。陆军的高级将领们也一再对希特勒说，现在对捷克开战，必将招致英法的干涉，而德国军队暂时还无力同时与英法抗衡。这一切都使希特勒举棋不定。

这时，戈林又对希特勒念起了和平经。戈林实在不愿意在他的权势如日中天的时候，德国卷入一场战争。希特勒对戈林喋喋不休的劝说十分厌烦，他直截了当地对戈林说，关于和平解决捷克问题的话题以后就不要再提了。戈林却一再坚持说，德国在西部的防线还没有建好，一旦法国要干涉捷克事务，德国就将腹背受敌。希特勒不为所动，在一次会议上，他对戈林和一些高级将领们说，将捷克从欧洲地图上抹掉是任何人都不能改变的事实，也是我最最后的决定。戈林见状，知道不能再与希特勒争执下去，以免惹得元首不高兴，使自己丢掉了刚刚得来的元首接班人的头衔。5月24日，希特勒在最高统帅部的会议上，再一次强调，对捷克的入侵必须在秋天完成，并且婉转地批评了戈林的“和平解决”的想法。

戈林既然知道他已无法使希特勒改变主意，便转而为迎合希特勒，又以一个坚定的主战派的面目出现。希特勒很为戈林的转变高兴，尽管他知道戈

林也许并不是发自内心地拥护他的对捷作战的计划，但不管怎样，在这个时候他需要给局外人一种纳粹上层团结一致的印象。

在这个难忘的春天，对于戈林来说，还有一件大事，那就是他的女儿去世了。已满45岁的戈林，听说女儿出世的消息，欣喜若狂。但不久他初为人父的喜悦就被战争的阴影所淹没，即将到来的战争弄得他心绪不宁，他甚至没有心思多看看他那漂亮的小女儿。

戈林认为，从前些天伦敦方面对德国即将入侵捷克一事的态度中看出，德国未来最主要的敌人很可能就是英国人。这样一来，他这些年极力想改善的英德关系就会毁于一旦。最令他感到担忧的是，如果开战，戈林工厂和其他生意都将受到影响。他对希特勒的一意孤行感到不满，可又无可奈何。

戈林绝不是天生的和平主义者，当他个人的利益受到威胁，或者为了追求个人的某种利益时，他从来都是不惜挺而走险，并且不择手段的。他以往的所作所为，尤其是前不久他在奥地利问题上所表现出的强硬态度，早已证明了他的本性是凶残、冷酷的。此时他在捷克问题上所表现出的犹豫不决，多半是出于对个人利益的考虑。在奥地利被吞并之后，戈林工厂的规模迅速扩大，他个人的权势和财富也呈上升之势，可以说，他已经成为第三帝国最大的既得利益者。为此，他不愿意由于希特勒的野心膨胀，而使德国重新与英法为敌。他最害怕的就是在战争爆发后，英法插手其间，使德国面临战败的威胁。假如德国战败，后果将不堪设想，他多年来所苦心经营的一切就将付诸东流。每每想到这些，戈林都不寒而栗。

其实，希特勒又何尝不担心英法插手呢？只是他的眼光毕竟要比戈林放得远，对形势的洞察也要比戈林深刻。通过奥地利事件，希特勒已经基本得出了结论，英法只是虚张声势而已，决不会真正为其他国家出兵卖力的。不过，在战争开始之前，这还只能算是一种推测，对英法在未来战争中的举措，他也是吃不准的。正因为如此，在对捷克采取行动之前，希特勒还主持制定了一个详细的针对英法两国的计划。这份计划的主要内容就是，首先要在行动之前，造成“一段时间的外交上的争吵和军事准备所造成的紧张局面后，再利用这种局面来把战争的罪过转给对方”。而这种作法的最最终目的，就是要在世界舆论面前，将德国打扮成受害者，让世人知道德国人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才出击的，以使英法找不到干涉的理由。其次要在德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进行宣传战的口号，即一方面以威胁的手段恫吓捷克人并瓦解其抵抗能力，给苏台德地区的日尔曼人提供一切帮助，并使他们之间的中立分子倒向纳粹，同时，在德国进攻时，使他们尽一切力量援助德国军队。另一方面，就是要动用所有的宣传工具，利用各种公开和不公开的场合宣传德国军队的强大，从而给外界一个德国武装力量不可战胜的印象，使英法不敢轻易对德采取行动。公开的宣传工具自然要由纳粹的喉舌戈培尔加以控制和使用，对戈培尔的才能，希特勒是十分赞赏的。而在与外国使节及要员接触的场合中，发动宣传攻势，则要借助戈林的力量。与其他纳粹官员相比，戈林在各国外交官的心目中，还算得上是一个比较“诚实”和具有“和平主义”精神的人，加上戈林这些年来一直刻意塑造自己在外国人眼中的形象，并与一些国外要人交上了朋友，因此，由戈林出面在外国人中间周旋、游说是最为合适的。

戈林对自己所负有的使命并不太感兴趣，可他又无可奈何，因为元首的意愿是不能违抗的。他再一次苦口婆心地劝告希特勒，认为英国不会插手捷克事务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英国人不会轻易地放弃在欧洲大陆建立霸权

的企图，更不愿意让德国重新成为它在欧洲大陆的主要对手。希特勒还是不理睬戈林的劝告，不顾一切地要求德国陆军务必在秋天之前完成入侵捷克的准备工作。在给陆军总参谋长约德尔的指示中，希特勒写道：“我的不可变更的决心就是在最近即以军事行动粉碎捷克斯洛伐克。”在希特勒的催促之下，德国陆军以最快的速度进行着各种战前的准备。戈林尽管并非心甘情愿地介入这场战争，但他又不愿意让他一手创建的空军在磨拳擦掌的陆军面前显得无能，因此，他命令米尔希也要全力进行战前准备。

当年夏天，空军的备战工作完全就绪。戈林的空军将在这场战争中投入的力量有：战斗机 400 架、俯冲轰炸机和歼击机 200 架、运输机 250 架。另外，戈林并没有因为希特勒对英国不会参战的判断而放弃同英国开战的准备。在布置对捷战争的同时，他还命令费尔美将军所指挥的空军第 2 联队在德国西北部机场严阵以待，准备对付英国人。

在加紧备战的同时，戈林仍在暗暗祈祷英国千万不要卷入这场战争，他不失时机地向英国人展开了外交攻势。7 月份，戈林批准米尔希的建议，邀请了一个英国空军中队对德国空军进行友好访问。接着，他又让与伦敦方面关系密切的霍亨斯陶芬王朝的霍思洛厄公主带去口信，请求英国人同意戈林去他们国家进行一次友好访问。英国外交大臣哈里法克斯同意了戈林的请求，但提出了一个条件，就是不向公众宣布戈林将要来访的消息，以免引起公众的不满，因为许多英国人依然对戈林在西班牙内战中下令屠杀无辜平民耿耿于怀，对他抱有很深的敌意。戈林虽然对这个条件有些不快，无奈还是同意了。戈林如此渴望去英国访问，除了想游说英国人，使他们放弃参战的想法外，他潜意识中还想借这次出访出一下风头。不料，希特勒一口回绝了戈林出访英国的请求，对他说，在此时机是不宜出访英国的。

希特勒告诉戈林，不要考虑英法的态度，不管英法做出什么样的反应，“绿色计划”都要实施。戈林现在主要的工作，就是继续对英法和捷克施加压力，戈林的研究所要在这场被希特勒称为“磨刀片”的宣传战中发挥重要作用。

至此戈林完全打消了劝阻希特勒的念头，他知道在捷克问题上，希特勒已经不可能有任何让步。他现在所能做的事情，就是设法使英法退缩，具体地说，最好的作法就是通过宣传战使英法不敢轻举妄动。1938 年 8 月中旬，法国空军总司令弗里曼将军应戈林的邀请，访问德国空军。戈林精心安排了所有的细节，他要通过对弗里曼的接待，使他的宣传战收到奇效。

戈林先是陪同弗里曼参观了多布里茨飞机制造工厂为工人建造的花园、啤酒馆、游泳池、桑拿浴室等设施，然后，他又带着弗里曼一行参观了机场，弗里曼的随从们果然被机场上下断起落的新式 ME109 战斗机的数量所震惊。在弗里曼一行将要离开的时候，一架新式的四引擎康多尔战斗机缓缓降落下来。在此之前，德国的一些宣传工具曾将这种飞机的性能吹得神乎其神，弗里曼等人只是将这种飞机看成德国宣传机器制造出来的神话而已，现在却眼见为实了。接着，戈林又陪同弗里曼参观了海因克尔飞机制造厂，看到组装线上的一架架 HE110 战斗机，弗里曼问起这家工厂的生产能力，戈林告诉他说，月产量 70 架。不出所料，弗里曼着实吃了一惊，因为这一数量已经超过了法国飞机制造业的全年产量的总和。参观后，德国空军司令乌德特陪同弗里曼乘坐一架斯多齐型飞机离开，当飞机降落时，弗里曼发觉这种飞机的性能超过了 HE110 型战斗机。在柏林机场上，前来迎接弗里曼的米尔希在同他

一阵寒暄之后，便装做漫不经心地对乌德特说：“能看一下这种飞机的生产计划吗。”乌德特故意踌躇了一下，米尔希对乌德特说：“没有关系，让我们的同行和朋友们看一看你的成就。”乌德特对米尔希说：“第二条生产线刚刚开工，第三条在三周内就可以投入生产。”其实，这种飞机目前仅有一架，尚处于实验阶段。

戈林的安排收到了预期的效果。弗里曼回到巴黎后，向达拉第总理汇报说，德国空军“具有真正的毁灭能力”。弗里曼此番出访德国的所见所闻，对不久之后法国政府决定在捷克问题上采取的对策，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使法国政府中以达拉第为首的对德绥靖派占了上风。

当希特勒通过巴黎的间谍网得知法国政府的态度时，不由得对戈林的表演大加赞赏。不过，戈林本人对“磨刀片”的作用还是没有多大把握，他不知道希特勒究竟会不会马上实施“绿色方案”，也不知道英法和意大利对这一事件究竟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在这种情况下，戈林开始认真地对待军事上的部署。他不断地召见有关的军事将领，研讨“绿色方案”的每一个细节，对他认为不切实际的地方提出修改意见。他还不断地提醒最高指挥班子，一定要把握好进攻的时机，也就是说要在最合适的时候，为德军发起进攻制造借口，以使对捷克的征服行动收到最佳效果。同时，他一再命令空军方面对作战计划加以修订，其目的就是保证万一英法增援捷克，能够尽快将其击垮。

但是，英法的态度尚不明朗。戈林通过亨德森，不断地向英国政府发出试探的讯号。他在9月初对亨德森说，希特勒已经授权给他，让他通知英国政府，德国政府愿意就捷克问题与英国举行谈判。他还很露骨地说，苏台德地区随时都有发生事变的可能，比如出现暗杀苏台德地区日尔曼人首领的事件，因此，英国与德国在捷克问题上达成共识已是当务之急。戈林对亨德森说，最好张伯伦首相能来德国与希特勒会晤，如果那样，也许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亨德森立刻向伦敦方面通报了这个消息。张伯伦其实早有此意，只是碍于国内的反德情绪而不敢轻举妄动。接到亨德森的报告后，他并没有立刻给予答复。几天后，法国人的举动却使张伯伦下了决心。

9月13日，法国内阁召开会议，商讨捷克事务。内阁的大多数成员表示不愿意为捷克而冒着引起世界大战的危险与德国对峙，尽管捷克与法国早已签订了共同防务条约。在这种情况下，达拉第会后立即召见了英国驻法国大使，要求他立即与英国首相张伯伦取得联系，请他与希特勒进行磋商，尽可能以和平的方式消除这场战争危机。

14日早晨，亨德森给戈林打了一个电话，请他绕过里宾特洛甫，直接与希特勒联系，安排张伯伦到德国访问的有关事宜，戈林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放下电话后，戈林立刻与在伯希待斯加登的希特勒通话，希特勒让戈林负责安排这件事。当日深夜，希特勒收到了来自伦敦的急电。电报是由张伯伦打来的，电文是：

鉴于局势日益严重，我建议，立即前来与你会晤，以寻求和平解决的方法，我将在

明日乘飞机前来。请将会谈地点和时间赐告，请立即赐复为盼。

希特勒收到电报后，兴奋得不禁大呼起来。他知道这位大英帝国首相从来不肯乘飞机，这次居然破例要求飞来与他会谈，足见他在伦敦的首相府中已坐不住了。戈林等人对张伯伦的来意颇感困惑，只有希特勒断定，张伯伦

这次来德国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向德国保证，英法是不会为了捷克斯洛伐克而向德国宣战的。

9月15日，张伯伦在慕尼黑机场着陆，直接从机场转乘专列到伯希特斯加登去见希特勒。希特勒并没有到车站去迎接张伯伦，而是站在伯格霍夫别墅的台阶上居高临下地迎候这位英国的老首相。张伯伦一路上心情极为紧张。希特勒特意在他所乘专列的行驶路线上，安置了大量的军车，在伯希特斯加登车站，张伯伦看到了一列列装着士兵和重炮的火车。这种恐怖的景象使他深受刺激，也使他更加感到自己肩负的使命无比重要，他似乎觉得整个欧洲和平的希望都完全寄托在他一个人身上了。

会谈的结果是，张伯伦以他个人的名义对希特勒说，他同意按照民族自决的方式解决苏台德地区的问题，即同意希特勒提出的苏台德地区脱离捷克斯洛伐克的主张。他还表示回到英国后，要向英国政府汇报，并说服英国内阁的其他成员同意他的意见。希特勒与张伯伦约定，一周后他们将再次会谈。

9月17日，亨德森来到卡琳庄园，与戈林商谈张伯伦与希特勒再次会晤的有关事宜。在会客大厅里，亨德森要求戈林劝说希特勒在第二次会谈之前，不要发动对捷克的进攻。他还对戈林说，他对里宾特洛甫的好战情绪实在担心，希望戈林能够阻止里宾特洛甫。戈林对亨德森说，他可以劝说希特勒暂不下令进攻捷克，“但是——”，戈林突然面露凶相地对亨德森说：“有一点英国政府必须认清，如果英国对德作战，在战争结束之前，捷克已经不可能剩下多少人了，伦敦也不会再存在！”亨德森既惶恐又不解地看着戈林，在他的印象中，戈林好像从没这样声色俱厉地对他说过的话。戈林也马上意识到自己的态度有些过分，便将面色和缓下来，安慰亨德森说：“除非有灾难性的事情发生，否则没必要担心。”

亨德森走后，纳粹德国驻英国空军武官乌德特·凯斯勒被戈林召了进来。戈林见他进来，只是冷冷说了一声“坐吧”，然后就不理不睬，继续装模作样地批阅文件。凯斯勒呆呆地站在那里，不知所措。过了一会儿，戈林停下笔看了他一眼，突然说：“听说莱茵兰事件时，你将大使馆里的空军文件全部都烧掉了，并且还劝告陆军武官也同你一起做。”凯斯勒窘得满脸通红，好久说不出话来。过了一会儿，他才支支吾吾地说：“因为我那时相信英国将要与我们打仗。”“要打仗？”戈林接过凯斯勒的话头：“我告诉你，英国决不敢和我们打仗，亨德森刚刚从我这里离开，他想让我让步，但我告诉他，英国要是敢与德国开战的话，英国就会完蛋！”凯斯勒怔住了，他不知道戈林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戈林像一头被关在笼子里的狼一样，烦躁地走来走去，最后他停下来，神情庄重地对凯斯勒说：“我将任命你为空军第二参谋长，但是我希望我的参谋长能够坚定自己的信心，那就是英国如果参战的话，我们一定会打垮他们！”说完，他盯着凯斯勒，等着他的回答。戈林以为凯斯勒会十分激动，没想到凯斯勒却对戈林说：“元帅先生，我十分感激您对我的信任，但是我不得不对您说，即使英国被打垮，美国也将参战，同时在海战方面我们也难于取胜。”戈林面色铁青，几乎是咆哮着对凯斯勒说：“美国人不可能远涉重洋来干涉欧洲的事务，而英国舰队一旦被打垮，英国也就完了。我同意你的看法，德国的海军确实无法消灭英国的海军，但是德国空军却能够，对这一点我坚信无疑。”凯斯勒无言以对，默默地走到门口。临出门时，他向戈林表示，他将接受这一任命，并将不辜负元帅对他的期望。



希特勒也在紧张地等候着张伯伦的消息。在此期间，捷克苏台德地区的局势更为紧张。9月22日，戈林的研究所截获一份布拉格方面给捷克驻德大使马斯特尼的电报，电报中说，德国驻捷克公使遭到了一伙人的袭击，让他密切注意德国方面的动向。然而，奇怪的是，在20分钟后，研究所又截获了撤销上述命令的电报。与此同时，戈林的研究所还得到捷克总统贝尼斯的几份电报。从电报所反映的情况来看，捷克方面不想对德国作任何让步，因为他们相信英国在德国发动进攻时是不会袖手旁观的，他们还认为英国正在进行备战而欢欣鼓舞。戈林把亨德森叫来，将贝尼斯的电报给他看，并质问：“英国政府一方面让我来说服元首不对捷克采取武力行动，而另一方面又唆使捷克政府与德国对抗，不知道大使先生对英国政府的作法有何感想？”亨德森面红耳赤，嗫嚅着说：“如果真有这种事情的话，我相信决不会是张伯伦首相的本意。我将立即与伦敦方面取得联系，以澄清这一事实。我相信英国政府决不希望事态扩大。”

亨德森走后，戈林久久地对着欧洲地图出神。在整个德国，也许只有他一个人真正了解英国空军的实力，说心里话，相比较之下，他对德国空军的远征能力实在不敢有 too 高的估计。他前几天从东普鲁士回来后，收到了德国空军“英国事务特别参谋部”参谋长费尔美将军的一份秘密报告，在这份报告中，费尔美对德国空军的现状进行了详细而令人信服的分析。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德国空军现在还没有能力突袭英伦三岛，因为德国空军中的轰炸机群无法得到战斗机的护航，就是说，暂时还没有一架德国战斗机能够一直飞到伦敦。戈林知道费尔美所说的都是事实。尽管他刚才还在亨德森面前威风十足，但心里却有些底气不足，他明白如果真要开战的话，德国人面对英吉利海峡只有望洋兴叹的份儿。戈林思忖了半天，拿起笔在费尔美的报告上写道：“迄今为止，我们的空军对于海外作战一直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立即解决这一问题是我们当前最重要的任务。”

为了解决德国空军缺乏海外作战能力的问题，9月27日，戈林专门将空军的所有高级将领召集到卡琳庄园进行研讨。可在这次会议上，没有一个人能拿出一个像样的解决问题的方案。最后，无计可施的戈林只好下令立即大批量生产还处于试飞阶段的“容克88型”战斗轰炸机。戈林认为只有这种轰炸机具有飞赴海外作战的能力，它可以在没有战斗机护航的条件下对英国任何一个地方施行轰炸。可是，米尔希提出，这种战斗轰炸机尽管续航能力较强，但如果满载炸弹的话，它的实际飞行速度只有180英里，而不是设计时标定的最高时速——240英里，它的作战半径只有900英里，而未能达到理论上的1300英里。这些问题太让戈林头痛了，而更使他为难的是已经没有解决这些问题的时间了。

卡琳庄园的空军高级将领会议结束后，希特勒告诉戈林，捷克必须在9月28日下午2时之前交出苏台德地区，这是最后的时限，逾时德国军队将向捷克发起进攻。

离开希特勒，戈林便现出满面愁容，他的心情十分沉重。他为英法可能插上并由此可能引发的战争而惶恐，为自己费尽心血建立起来的庞大帝国——戈林工厂的命运而担忧，更为其权力和财富的前景而心悸。但他也明白，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他只有跟着希特勒走到底了，否则，一切就更难说了。作为纳粹帝国的第二号人物，他的命运早已与他的元首紧紧地联在了一起。出于维护私利的个人目的，他极力说服元首放弃这场战争，并在自己的权限

范围内设法阻止这场战争，除了这些，他还能做些什么呢？第三帝国的真正主人是希特勒，而不是赫尔曼·戈林，得罪元首将意味着什么，这大概戈林要比任何人都清楚。尽管他知道张伯伦正在努力争取和平，但他对和平的可能性，实在不敢有太高的估计。

这一天戈林度日如年，他不时给他的研究所打电话，询问是否有伦敦和巴黎方面的消息，得到的回答总是没有任何消息，这更加重了他的不安。就在戈林心急如焚的时候，电话铃又响了。戈林研究所报告，他们监听到了英国和法国大使馆的电话，双方在交换对希特勒最新建议的意见，都提到了本国政府在尽力消除眼前这场战争危机。戈林听完，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他知道，战争的阴云终于要被驱散了。

9月28日上午11时，离希特勒为捷克人限定的最后时间只有3个小时了。戈林和里宾特洛甫都来到希特勒那里，等待希特勒作最后决定。这时，意大利驻德大使求见希特勒，两人单独交谈了一会儿。之后，希特勒回来对戈林和里宾特洛甫说，墨索里尼受英国人之托，向他提出能否把给捷克人的时限延缓24小时。希特勒问戈林和里宾特洛甫有何意见。听到这里，戈林再也忍不住了，他大声对希特勒说：“元首先生，我不得不告诉您，我的空军实际上并没有做好同英国和法国开战的准备。但是有人——”他故意地顿了一下，看了一眼里宾特洛甫，“居然不顾帝国的命运，一味想发动战争……”里宾特洛甫见戈林将矛头指向他，马上反唇相讥，他说戈林身为帝国元帅，却处处为自己的利益着想。戈林恼羞成怒，面红耳赤地要与里宾特洛甫继续争论下去。希特勒制止了他们，他很威严地说：“谁也不想打仗，无谓的争吵于事无补，还是想一点正经事吧。”戈林见希特勒说出这样的话来，顿时心里充满了喜悦。自从制定“绿色方案”以来，他还是第一次听见希特勒以这种调子说话，到现在，戈林才知道希特勒并不是不知道德军的实力，也并非是一定要在此时发动战争，他之所以要摆出大战的架势，完全是在冒险，是在下赌注。希特勒所导演的这幕政治恐吓剧，将包括戈林这位帝国元帅在内的所有第三帝国的当权者们都蒙在了鼓中，更何况外人呢？

里宾特洛甫走后，希特勒对戈林说，他已经意识到德国空军尚没有做好战前准备，同时，他对意大利人作为德国盟友的可靠程度也抱有极大的怀疑。然后，他告诉戈林，现在就准备与英国、法国、意大利人谈判。戈林笑逐颜开，喜滋滋地走了出去。

邀请英、法、意三国首脑到慕尼黑会谈的电报立即发了出去，英国首相张伯伦、法国总理达拉第及意大利独裁者墨索里尼一刻都没有耽搁地来到了会谈地点。9月29日12点45分，四国首脑会谈正式开始。戈林参加了第一轮会谈。因为希特勒告诉戈林，英国和法国对德国的空军是很发憊的，作为空军总管的戈林出现，将会起到一种威慑的作用，会使德国在会谈中显得实力更强。在长达12小时的会谈中，希特勒所要求的一切均得到了满足。张伯伦和达拉第在德国人的战争压力面前，一味退让，他们愿把捷克当做使希特勒放弃战争的一个诱饵。可怜的捷克代表竟被排除在会谈之外，而对会谈的内容一无所知，他们被出卖了，只能悲惨地任人宰割了。

12小时后，即30日凌晨2点30分，会谈的双方最终达成了协议，这一协议便是历史上有名的不光彩的《慕尼黑协定》，该协议使德国得到了苏台德地区。捷克代表在协议签订之后才知道会谈的结果，当他们向通报这一消息的英国首相张伯伦的随员格瓦希金提出抗议时，格瓦希金对他们说，这是

英国与法国政府所能争取到的最好的结果，他们如果对此不满意的话，那就只能直接与希特勒打交道了，但据他所知，德国政府起初的要求要比现在苛刻得多，具体的细节不便说出。捷克代表闻言只好悲愤地走了。

会谈刚一结束，戈林就急急忙忙赶回家，进门就对正在床上睡觉的埃米大声叫道：“我们胜利了，和平了。”说完，他兴奋得难以自持地在卧室里踱来踱去。

戈林做梦也没有想到，为了保住他的帝国，他所付出的代价是在希特勒心中的地位一落千丈。希特勒虽然达到了目的，但一想起这段时间戈林的表现，心里总有些不舒服。他当面并没有指责戈林什么，私下里却不只一次在里宾特洛甫等人面前指责戈林是个胆小鬼，声称再有大事不能找他商议。有一次，希特勒在谈及捷克事件时，对里宾特洛甫等人气愤地说：“下一次，我的动作一定要快，决不让‘老妇人’有反对的时间。”尽管希特勒没有明说“老妇人”是谁，但在场的人心里都跟明镜似的，他们知道，希特勒说的“老妇人”是指戈林。

戈林并未察觉希特勒的想法，他为希特勒在捷克问题上所取得胜利而高兴，并受到了鼓舞。他又一次为他的元首的胆略所折服，下决心要跟着元首大干一场。他在送意大利外长齐亚诺去火车站的路上，对齐亚诺说：“德国不久要重整军备，那将是世界历史上从没有出现过的壮举。”如果他的元首知道，通过捷克事件戈林已经有所改变的话，那么就不会到处发泄对他的不满了。

正是：权势熏天难自弃，左右逢源终有失。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 第十三章 水晶之夜

戈培尔报恩施暴，戈林反目怨鲁莽；  
挖空心思耍手段，反犹战车是大将。

对德国犹太人的最后归宿，希特勒早在《我的奋斗》一书中作了安排，那就是坟墓。希特勒的这一观点，一直深受德国乃至欧洲的排犹主义集团欢迎，在捷克事件后，纳粹德国到处弥漫着反犹情绪，纳粹分子们更是磨拳擦掌，随时准备出击，置犹太人于死地。一向忠于元首的戈林，自然成了希特勒反犹战车上的一员主要的战将。

最初戈林的反犹情绪并不强烈，也可以说他对排犹没有多少兴趣，他甚至还有一些犹太财阀朋友。但是，出于迎合希特勒的目的，在公开场合，戈林始终都是高喊排犹口号的，所以，在欧洲的排犹分子眼中，戈林是一名坚定的反犹主义者。而实际上，戈林真正对犹太人进行迫害，则是在他担任四年计划总监以后开始的。

在德国吞并奥地利以后，戈林就曾经下令搜尽奥地利犹太人身上的每一个铜板。在1938年3月26日的讲话中，戈林向有关人员强调，要以最低廉的价格强行购买犹太人手中的一切工商企业，然后卖给非犹太人经营。并说，这项工作既要以合法的形式，又要坚决地进行。聪明的犹太人当然不会轻易低头，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反抗。许多犹太人设法隐瞒财产，还有一些犹太人用金钱买来第三国国籍。6月24日，戈林针对强行收买犹太人财产所遇到的问题，又签发了《关于排除德国经济中的犹太人的通报》。此后，他又在一次讲话中提到，“据说在这一段时间里，在德国、奥地利和苏台德地区出现了许多‘美国人、英国人和一些其他国家的人’，我跟你们讲，我对这些人和那些犹太人是一视同仁的，国籍的改变，对于我们来说没有任何作用。”戈林对小打小闹不感兴趣，他的目光始终盯在那些犹太人的大公司的财产，包括海外财产上。

侵吞犹太公司的财产也并非易事。早在希特勒夺取德国政权之后，一些犹太人的公司就已经有计划、有步骤地将财产隐蔽起来，主要方法是请真正的“雅利安人”作为公司的假的所有人进行经营。所以，真正摸清这些大公司的底细，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为此，戈林专门成立了一个以他的经济顾问赫尔穆特·沃尔泽特为首的侦破小组，其成员还接受了专门训练。在这项工作中，戈林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他因此得到了希特勒的夸奖。就连平素与他不和的希特勒在党内的副手鲍曼，这次也称赞戈林的行动为德国的排犹运动注入了新的血液，认为是解决德国和奥地利犹太人问题的“决定性的起点”。

使戈林最为头痛的是清理朱利叶斯和伊格纳茨·佩特切克兄弟财产的工作。戈林早就知道他们兄弟俩是地地道道的犹太人，可在1934年佩特切克死前，他就将他名下的价值2亿多马克的财产分别转送给了他的4个儿子，而这4个儿子又都加入了捷克国籍。朱利叶斯则一直自己经营公司。佩特切克的4个儿子入捷克籍后，马上将他们的大部分财产投到了德国，开办了几家公司。但是，谁也说不清究竟哪几家公司是佩特切克家族的财产，因为这些公司都是由佩特切克兄弟雇请的德国人经营的，佩特切克兄弟在布拉格遥控指挥。尽管戈林和沃尔泽特知道这些情况，但就是找不到证据，这使他们着

实有些恼火。最后还是戈林自己想出了办法。他让沃尔泽特先从朱利叶斯的公司下手，扫清外围，通过调查朱利叶斯的公司找出佩特切克兄弟公司的蛛丝马迹。最后，沃尔泽特借助盖世太保和戈林的研究所的力量，终于发现佩特切克家族通过3个辛迪加控制了德国的褐煤生产。这一情况使戈林等人大吃一惊。沃尔泽特在摸清了佩特切克兄弟的底细之后，便发动了一场商业战争。佩特切克兄弟也非等闲之辈，为了保住家族的财产，他们请美国、英国和瑞典的一些银行家出面，让他们以部分佩特切克公司控股人的身份与戈林交涉，抗议戈林对这些公司进行调查。戈林可不管这一套。他在6月14日签发了《第三帝国国籍法》。根据这一法案，佩特切克家族最大的公司——德国煤炭贸易公司被确定为犹太企业。因为在“国籍法”中规定，“所有由犹太人控股的公司应视为犹太公司”。接着，佩特切克公司一个接一个地被宣布为犹太企业。戈林的作法遭到了一些外国股东的抗议，希特勒指示戈林要妥善处理这一问题，戈林将原来由佩特切克兄弟掌握的几个大煤矿卖掉，从而偿还了外国股东的全部股金，同时他还用这笔钱购买了威斯特发里亚煤矿。这对于戈林来说，实在是发了一笔意外之财。戈林手下的人还没收了佩特切克家族全部商业档案，审查后发现，他们欠下德国8000万马克税款，这笔追回的税款加上罚款，又是一笔可观的收入。戈林将这些情况向希特勒作了汇报。希特勒告诉戈林还应进一步努力，因为重整军备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或几个犹太企业的财产，“你要将这些猪猡身上的每一个硬币统统都搜出来”！

排犹浪潮不仅在德国和奥地利泛滥，也波及到东欧和中欧的一些国家。在欧洲大陆，从德国、奥地利、捷克、波兰等国家逃出来的犹太人就像无人收留的孤儿一样，境遇极为悲惨，没有哪一个国家愿意收留这些失去家园的犹太人。当被从波兰驱逐的犹太人因无处可去，又大批涌回波兰时，遭到了波兰政府的拒绝。客居法国的一名波兰犹太人得知这一消息后，气愤异常，一怒之下，袭击了德国驻法国大使馆，枪杀了德国驻法国大使馆三等秘书冯·腊特。这一事件成为纳粹德国大规模迫害犹太人的导火索。

最初，戈林对这一事件并没有太介意，但戈培尔却把它看成报答戈林的一次好机会。前不久，戈培尔因与捷克女演员丽达·巴洛瓦有染，引起醋海风波，戈培尔的妻子玛格达跑到埃米那里哭诉。戈林得知这一情况，决定借此打击一下戈培尔。他让研究所日夜监听戈培尔的电话，然后将戈培尔与丽达的绯闻在纳粹上层传播。希特勒听说后，将戈培尔叫去大骂了一通。戈培尔为此惶恐不安。他左思右想，只好跑到戈林那里，求他去希特勒那里帮忙讲情。戈林见目的已达到，便想出面平息这件事，以使戈培尔感恩戴德。至少，帮了戈培尔这个忙，戈培尔在短时间内是不会再同他作对的。戈林答应了戈培尔的要求，并真的使希特勒“原谅”了戈培尔。实际上，希特勒根本就不会因为这件事处罚戈培尔的，在纳粹上层人物中，像戈培尔这样的人比比皆是。希特勒对这种事从来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况且连他本人也不是完全干净的。

1938年11月9日，戈培尔就巴黎发生的犹太人袭击德国大使馆事件发表了公开讲话，他将这次事件说成犹太人早有预谋的行动，声称雅利安人如果不先发制人，彻底消灭犹太人，德国就将毁在犹太人的手中。他号召所有的雅利安人都行动起来，对犹太人进行一场大规模的报复。同时，他宣布，在当天晚上德国人民将举行一次“自发性的游行”。其实，这才是一次有组

织有计划的行动，具体的指挥者便是海德里希。但戈培尔却把这次即将开始的行动说成是戈林的意思，他认为戈林知道这件事后，一定会很高兴的。他想让戈林知道他戈培尔绝对不是一个知恩不报的人。

11月9日夜，被戈培尔的演讲煽动得头脑发热的纳粹党徒们在柏林街头四处乱窜，他们见到犹太人的商店和教堂就冲进去，乱砸乱抢。柏林街头火光冲天，凄厉的叫声和玻璃的破碎声不绝于耳。凌晨时分，柏林各个主要街道上的犹太人商店和教堂几乎都化为一片片正在冒着青烟的废墟，不时可以看到纳粹党徒的汽车满载着抢劫来的东西疾驶而去，整个柏林被一片肃杀之气所笼罩。

薄雾中，布满路面的玻璃碎片闪着清冷的光，这个可怕的夜晚被称为“水晶之夜”。

事发的当晚，戈林没在柏林。他为参加女儿的洗礼仪式，回到了卡琳庄园。前面说过，这一年的春末，戈林喜得爱女。如天使般美丽的小埃达令戈林无比疼爱，他将女儿视为可向众人炫耀的掌上明珠。戈林怀抱小埃达的照片印在了明信片上，销售了几百万张。

11月4日，戈林为小埃达举行了洗礼仪式，主持人是第三帝国的大主教穆勒，希特勒亲任教父。为了讨好戈林，成千上万的德国人送了礼物，德国空军全体官兵捐钱在卡琳庄园为他的公主建造了一座小宫殿。由此也可以看出当时戈林是何等显赫的人物！

10日上午，参加完女儿洗礼仪式的戈林回到了柏林。在进入柏林市区时，他见到的是一场激战刚过的景象，满地是闪闪发光的碎玻璃，有的地方更是烟雾腾腾。戈林不禁大吃一惊，急忙问随行的副官，发生了什么事情，副官回答说不知道。他命令司机开车直奔空军部大楼。

戈林得知了事情的真相后，顿时勃然大怒。尤其是听说戈培尔以他的名义制造了这起激起民愤的事件，更是气愤得难于自制。他将纳粹党内的大部分高级官员召到了他的办公室，开了一个简短的会议。会上，戈林指责一些纳粹高级官员“缺乏训练和头脑”，并称这次行动是一次“暴行”和“血腥的屠杀”，将一切都搞乱了。他还声明，这次行动他毫不知情，至于戈培尔为什么把他说成是这次行动的策划者，他也不明白，他将直接去希特勒那里澄清事实。同时，他也强调，对这件事感到遗憾和气愤，并非是怜悯这些“可恶的猪猡”，而是因为觉得这种轻率的、毫无必要的报复行动只能招致国际上的麻烦和经济上的损失。的确，在冯·腊特遭到袭击的当天，戈林就签署了一个命令，下令对德国和奥地利的犹太人社团采取惩罚性行动，并对采访他的记者说：“当他们再次谋杀我们的时候，会三思而行的”。最后，戈林还是克制住自己，没有说出太过分的话来。

听到戈林的反应，戈培尔感到非常意外，也非常委屈，实在没想到戈林居然会这样对待他。他马上跑到了希特勒那里，告了戈林一状，可不曾想又让希特勒数落了一顿。希特勒告诫他，今后绝对不允许在没有得到他的同意的情况下采取这种行动。戈培尔走后，希特勒马上下令停止这种行动。

下午，戈林与希姆莱一起来见希特勒，他们以激烈的言辞对戈培尔加以攻击。戈林对希特勒说，戈培尔的行动，“将使我们失去大批的财产，这些都是我费尽心血所争取来的”！而希姆莱则对戈培尔擅自动用党卫军力量，表示了极大的不满。希特勒在戈林和希姆莱面前未置可否。但在希姆莱走后，他将戈林召到了另一个房间里，与戈林就犹太人问题进行了一次谈话。希特

勒对戈林说，对犹太人的处理，在现阶段一定要注意慎重和妥善，必须制止现在所出现的无纪律现象。他还委托戈林监督有关部门和人员。戈林走后，希特勒又让鲍曼给戈林带去一封信，让戈林在采取行动时务必与他保持一致。受希特勒的委托，戈林在 11 月 12 日主持召开了内阁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戈林毫不客气地对戈培尔进行了抨击、弄得戈培尔垂头丧气。戈林很严厉地说：“这次行动并没有怎么伤害犹太人，但是确实实实在在地伤害了我，因为我是掌管德国经济的人。”

戈林确实感到痛心。“水晶之夜”毁掉了 7500 多家商店、100 多座犹太教堂。另外，一些非犹太人的商店也被殃及，总损失额约 2500 多万马克，而这些损失最终却要落到德国保险公司的头上。使戈林最为心痛的是，纳粹政府将要失去来自这 7500 家商店的税收款，这个数目是不会太小的。戈林在与德国保险业巨头希尔加德谈话时，曾流露出让对方拒付犹太商店保险金的意思，但被希尔加德拒绝了。希尔加德本人也是狂热的纳粹支持者，可他从德国保险业发展的角度考虑，无法赞同戈林的主意。他认为，德国保险业要想在国外重新开展业务，就必须偿付犹太人的保险金，否则，德国保险业在国外的信誉就将受到极大的影响。不过，最后希尔加德给戈林出了一个主意，即先由保险公司全部偿还保险金，戈林再想法将这笔钱没收。戈林一听，马上高兴起来，说道，“我只要一颁布法令，情况就会大不一样。”

不久，戈林签署了两个命令。一个是《关于在经济领域完全驱逐犹太人的命令》，另外一个是有向所有犹太社团征收 100 万马克罚款的命令。这笔罚金款项巨大，以至戈林在国防会议上说，出售犹太企业和这笔罚金的收入，弥补了德国在国防预算上的不足。接着戈林又签发了一系列法令，从而为实现希特勒所提出的“合理、有秩序地解决犹太人的问题”，奠定了基础。

然而，戈林也明白，如果完全将犹太人屏弃于经济领域之外，德国的经济就将受到严重影响。所谓将所有企业彻底“雅利安化”的想法，在短时间是无法实现的。在 12 月份签署的一份文件中，戈林说：“为确保行动上的一致，所有关于对犹太人处理的文件和法令，在正式签发之前，必须先交由我本人审批，因为犹太人问题对我们整个经济利益是至关重要的。”与此同时，戈林又下令释放了在水晶之夜被拘捕的 2 万犹太人中的所有参加过一战的老兵。

在对犹太人的处置问题上，戈林与希特勒逐渐达成了共识，即在现阶段应采取有节制的控制和歧视政策，然后逐步将在德国的犹太人迁移到“合适的地方”。所谓合适的地方，主要是指近东（巴勒斯坦）、马达加斯加等地。为此，1939 年 1 月，在戈林的督促之下，成立了中央帝国犹太移民局，负责处理有关犹太人移民的一切事务，由戈林亲自掌管。此后，向德国境外大规模迁移犹太人的行动正式开始，一直到 1939 年 10 月，这一行动由于大战爆发而停上，在此期间，大约有 40 多万犹太人被从德国、奥地利、波希米亚和摩洛哥地区迁走。在戈林等人看来，将犹太人迁走只是计划中的一个步骤，他还有一个彻底解决犹太问题的办法，那就是从肉体上消灭他们。在 1938 年底，戈林就曾经对其下属说过：“如果在未来，第三帝国处于外交和政治冲突之中，对于这些可恶的犹太人，我们就将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清算。”果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国纳粹开始惨无人道地大规模屠杀犹太人，尽管戈林本人不是直接的指挥者。

正是：“合理”排犹始作俑，欲壑难填终为患。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

章分解。



## 第十四章 失宠之忧

怯战求和失恩宠，访意拉英虑后患；  
为挽颓势变腔调，取悦元首立誓言。

苏台德地区被德国吞并之后，戈林与希特勒的分歧越来越明显。戈林主张，德国当前对捷克的对策不应仅限于武力上的威胁或者吞并，而首先应在经济上将捷克完全击垮，使捷克最后成为德国经济的仆从，而这一天为期已经不远了。他多次向希特勒陈述自己的看法，但希特勒并不以为然。在希特勒看来，吞并了捷克，捷克不就成为另一个奥地利了吗？捷克外长马斯特尼曾代表捷克新政府向戈林保证，捷克政府将调整其外交政策，与德国建立全新的亲密的关系。因为捷克政府已经认识到与德国建立亲密关系，是保证捷克“独立自由”的保证。马斯特尼婉转地请求戈林，不要将捷克经济搞垮，捷克政府将以全面的亲德政策来报答德国。同时，他又向戈林保证，捷克政府将“严肃地处理犹太人问题”。

戈林与希特勒在整个东南欧问题上，也存在着分歧。他想利用经济战和其他秘密手段迫使东南欧地区的国家就范，然后，通过波兰的帮助，在东南欧地区建立一个德意志帝国，那时，他戈林作为这一庞大帝国的经济的主宰者，就可以大展宏图了，但这一想法他始终不敢向希特勒说清楚。他知道，希特勒的目的决不仅仅是控制一个东南欧地区，他也决不会听任戈林为所欲为地实现其个人野心的。戈林虽然明白这些，但又不甘心放弃自己的打算，他要利用一切机会，宣传他的主张。按照戈林的估计，希特勒大约在 1942 年发动战争，在战争爆发之前，他还有足够时间为实现个人野心作好安排。戈林的目光紧紧盯在了东南欧这一大片土地上，他在日记中写道，“必须征服巴尔干。在北欧我们一定要把握住。”

在苏台德地区的问题得以解决之后，戈林感到他与希特勒之间过去那种亲密、和谐的关系已不复存在了。尤其是在捷克问题以及后来的一系列问题上，他对希特勒在一些秘密讲话中所提出的谋求新的霸权的思想极为反感。他认为，德国现在需要的不是战争，而是经济上的扩张和强大，当务之急是挖掘东南欧的经济潜力，而不是在经济还没有真正强大起来之前，就贸然发动战争。但戈林不想与希特勒公开发生冲突，他的内心深处，一直在企盼有朝一日能接希特勒的班，并且相信这一天一定会到来，他不想因得罪了希特勒而失去来之不易的元首接班人的位子。另一方面，他又不愿意在国际社会上给人留下好战的印象，在许多场合，戈林都小心翼翼地将自己打扮成一个温和派。戈林知道，他在国际上的形象，是与其经济利益密切相关的。世上的事很难两全，既不想得罪急于称霸的希特勒，又要以温和派的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恐怕是不可能的。据当时希特勒的副官韦德曼回忆，在 1939 年以后，经常去希特勒寓所的有戈培尔、赫斯、鲍曼等人，很少见戈林去那里。

当然，不管戈林与希特勒之间有何问题，戈林也决不会像陆军中的一些高级将领那样，寄希望于发动一场武装政变来解决问题。这大概是因为，他不是传统的普鲁士军人集团中的成员，尽管他现在是陆军元帅。他同希特勒在 20 年代纳粹运动兴起时共过患难，戈林所拥有的一切，包括权势、财富等等，不能不说是希特勒所赐。没有希特勒，就不会有他的今天。而从希特勒的角度来说，他也不能轻易将戈林放弃。戈林身上尽管有许多让他厌恶的毛

病，如好大喜功、虚荣浮夸等等，但他毕竟是多年来忠心耿耿地追随着自己，为自己效力的部下之一，特别是他为希特勒上台立下过汗马功劳。在希特勒夺取政权之后，戈林也是鞍前马后围着他转，尽全力为他的元首卖命。这一切都使希特勒难以将戈林视作可随意处置的一般部下，不是在戈林女儿受洗的时候，希特勒还充任了教父吗？况且，在未来的战争中，用得着戈林的地方还有的是。希特勒一直对德国陆军不放心，而在纳粹上层人物中，真正懂一点儿军事的人还真不多，不管怎么说，戈林毕竟算是一个。在希特勒的心目中，戈林还称得上是难得的人材。因此，不管戈培尔，里宾特洛甫、鲍曼等人如何在他面前诋毁戈林，希特勒就是不动声色，虽然他对戈林在捷克事件中所表现出的妇人般的犹豫和软弱极其不满。

1939年初，欧洲的局势并没有因为慕尼黑协定而好转，和平的希望依然渺茫，张伯伦所说的“一个时代的和平”已经成为一种虚幻的神话。谁都知道，战争是不可避免的，难以预测的仅仅是时间而已。希特勒在这一时期不断召见高级军官，询问有关军备的进展情况。在此关头，戈林又被希特勒委以重任。

在一次有德国主要的军工实业家参加的会议上，戈林对与会人员说：“元首指定由我负责实施一个庞大的计划。与这一计划相比，我们过去所做的一切都是微不足道的。”这一计划的主要内容就是要由戈林牵头，将德国军事工业的生产能力扩大到极限，其中最重要的工作是将飞机的生产能力扩大5~6倍。戈林在同德军总参谋长凯特尔将军谈话时指示，现阶段他们所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有三个：第一是加紧食品工业的生产；第二是加紧并扩大出口商品的生产，以筹集外汇；第三是最重要的，那就是加强空军的战斗力。同时，他还与米尔希商量，建立一支秘密舰队。这支舰队由凯斯勒指挥，由空军直接控制，由装备有最新研制的鱼雷和高射炮的快速巡逻艇装备，其任务是在一旦与英国开战后，封锁英伦三岛。不久，戈林恢复了长时间休会的国防会议。第一次会议在空军办公大楼召开，戈林滔滔不绝讲了几个小时，强调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将德国军事的总体水平提高3倍。同时，戈林也提出了现在所面临的问题，即生产能力、人力及外汇的不足。

戈林内心对英国的恐惧始终不减，正因为如此，他与一直不把英国人放在眼里的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而与英国大使亨德森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好。一次，亨德森来访，向戈林提到外交上的一些问题，戈林不无气恼地对亨德森说，里宾特洛甫与他的前任牛赖特相比，简直就是一个没有任何修养的无赖。亨德森知道，在牛赖特时代，这位外长对戈林插手外交事务从来都是视而不见的，甚至听任戈林摆布，使得戈林有如鱼得水之感。现在则不然，里宾特洛甫几乎将戈林赶出了外交界。对里宾特洛甫的一切，戈林差不多一无所知，他只能从其研究所的报告中了解到一点情况。于是，亨德森别有用心地说：“现在是里宾特洛甫一手遮天的时代。”戈林站了起来，激动地对亨德森说：“这种情况不会继续下去了，现在元首已经命令里宾特洛甫随时向我汇报，况且，波兰、南斯拉夫，仍然是我的势力范围。”接着，亨德森又将话题转到有关德国不久将向欧洲发动一场战争的传闻上，戈林矢口否认。他对亨德森说：“没有人愿意发动战争，只有蠢人才会用战争来解决问题。在这个世界上，要达到目的的手段太多了，并非只有战争一条途径。”

希特勒是不会按照戈林的意愿行事的。就在戈林与亨德森大谈如何避免

战争的时候，希特勒已命令陆军作好入侵捷克的准备。几天后，英国的几位金融专家到柏林访问，戈林出面接见了他们。当他们问到最近在伦敦盛传的德国即将入侵捷克的说法是否可靠时，戈林马上对之加以斥责，称其为毫无根据的胡说八道。

这一时期，戈林的身体状况不好，他向希特勒请了假，说是要到地中海去休养。3月1日，戈林与埃米一起参加了空军节的庆祝活动后，便启程前往意大利的圣雷莫度假。就在戈林在爱妻的陪伴下，尽情地享受地中海的旖旎风光的时候，希特勒则在柏林紧锣密鼓地准备对捷克采取行动。戈林对此竟一无所知。

3月10日，他的情报长官施米德上校带来希特勒的一封密信，戈林急忙打开一看，不由得怔住了。希特勒在信中说，他已经决定入侵捷克。戈林放下信后，几乎要虚脱过去，他对埃米说：“我刚刚离开柏林，就出了事，我不能再呆在这里，我要立即回柏林去。”这时，一直站在一边的施米德立刻说：“元帅先生，元首让我转告您，在入侵捷克之前，希望您继续留在这里度假。”戈林一听，难受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他知道希特勒不让他现在回柏林，唯一的目的是不让这位“老妇人”在他的身边喋喋不休地劝说。戈林思忖了一会儿，便让施米德与他一起回别墅，他给希特勒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请求希特勒暂时不要采取行动，因为在这个时候入侵捷克，英国人很有可能介入，从而会导致与英国的对抗。施米德带着信走后，戈林让埃米赶快收拾行李，他决定不顾希特勒的禁令，立刻返回柏林。

3月14日，戈林回到了柏林，到车站去接他的是米尔希。戈林忙问米尔希，现在情况怎样？米尔希告诉他，想做什么都已经晚了，希特勒已向陆军下了命令，将在15日上午6点开始行动。

戈林决定直接到他的研究所去。到了研究所后，施米德告诉他说，刚刚监听到张伯伦给英国大使馆的密电，英国女王指示英国政府，不要介入捷克事务。戈林一听，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这时，他意识到再劝希特勒不要入侵捷克，就是自讨没趣了。因此，他又马上赶到希特勒处，向希特勒表示对入侵捷克的支持。希特勒听完戈林的表白，嘴上说他很高兴，其实内心极为反感。戈林有点看出了希特勒的心思，他猜希特勒一定是对施米德带回的那封信不满。为了消除希特勒的不满，在以后几天的活动中，戈林表现出一种超乎寻常的热情。

当天晚上，捷克总理哈查来到柏林，与希特勒进行最后的会谈。这是一次没有其他大国参加的“慕尼黑会议”。哈查对希特勒所提出的要求几乎全部点头称是，只是请求希特勒不要入侵捷克。坐在一旁的戈林狐假虎威，一字一顿地警告说，不要违反元首的意愿，否则的话，他的空军立刻就会飞临布拉格上空，到那时，炸弹就会替他说话了。不要指望英国和法国会出来说话，他的空军的炸弹同时也是对英法两国的警告。在希特勒和戈林的威逼利诱下，哈查终于垮了下来。凌晨4时，哈查给布拉格的捷克军队总司令打了电话，命令在德军进入时，不要作任何形式的抵抗。

3月15日清晨6时，德军开始入侵捷克。希特勒亲自上阵，统领大军向捷克进发。戈林又一次受命代理国家元首。

在希特勒进军的途中，戈林给匈牙利大使打了一个电话。因为据他的情报官报告，有人说匈牙利将出兵援助捷克。匈牙利大使马上否认了此事，并表示匈牙利政府对德国进军捷克将持中立态度。戈林又对匈牙利大使说，如

果波兰人胆敢跨过波捷边界一步，德军就将予以痛击。不一会儿，波兰大使打来了电话，说波兰政府本来让他立即会晤里宾特洛甫，有要事相告，却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他。戈林对波兰大使说：“我很同情你，但我也找不到他。”接着，英国大使也打来了电话，抗议德国入侵捷克，戈林故作惊讶地说：“大使先生，贵国政府对这种小事也做出如此强烈的反应，实在让我感到吃惊。”

对捷克的入侵在几天内就完成了。当希特勒回到柏林时，戈林率内阁全体成员到车站毕恭毕敬地迎候。希特勒神情冷淡地与戈林打了个招呼，然后径直驱车回到了总理府。戈林心里七上八下的，不知道希特勒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

捷克被占领后，戈林马上发现这次行动给戈林工厂带来的经济利益是前所未有的。过去那些难于打交道的捷克实业家，现在都变得俯首帖耳。戈林乘此机会收买了捷克的大军工企业，使戈林工厂一跃成为欧洲最大的联合企业。连当时的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都不得不承认戈林工厂极具实力，在美国的德国公司都要受其控制，而戈林由于拥有巨额财富而成为欧洲最为危险的人物。

捷克事件结束后，戈林又返回圣雷莫继续度假，但不久便发现他与柏林几乎断绝了一切联系。柏林发生的任何事情都无人向他通报，这在从前是根本不可能的。就连里宾特洛甫威逼立陶宛将梅梅尔归还给德国一事都是后来才听说的，尽管他备感失意和惆怅，但还是给希特勒发了一个用词极为恭敬的贺电。戈林的内心非常痛恨里宾特洛甫，认定是他从中作梗，离间了自己与元首的关系。不过，他心里也明白，希特勒决不会抛弃他的，因为希特勒在许多方面还离不开他。戈林觉得现在还不能回柏林，他要在这里好好地想一想下一步所要采取的对策。

4月初，孤独寂寞、愁闷不堪的戈林决定去北非访问。临行前，他让手下人给希特勒发了一份电报，祝贺德国海军的新式战列舰“狄比斯”号下水。4月10日，戈林来到意大利控制下的的黎波里。墨索里尼指示当地官员，对戈林的到来要给予最高规格的接待。当戈林乘坐的游轮蒙塞待拉号在两艘意大利护卫舰的引领下，缓缓地开进的黎波里港时，当地的阿拉伯人身着节日盛装，挥舞着鲜花和彩带列队迎候着他。站在甲板上的戈林见到这种场面，不禁心花怒放，这些日子心中的不快一扫而光。戈林在的黎波里一直呆到4月中旬。有一天，他突然想到这一切都是墨索里尼的安排，自己应该到罗马拜见一下这位大人物，一来表示感谢，二来要让罗马知道他在德国的外交方面还是有一定的决断权的，从而削弱里宾特洛甫的影响。

4月14日，戈林到达罗马。由于他最近一个阶段与柏林失去了联系，不敢信口开河乱说一气，只发表了措辞谨慎的讲话。

15日，戈林与墨索里尼会面。为了显示他在德国的影响力和他与希特勒之间的亲密关系，他竟撒谎说，他刚接到希特勒给他的电话，让他向墨索里尼问好，并说“对意大利最近入侵阿比西尼亚感到高兴”。而实际上，希特勒对此事十分不满。在谈到上个月德国对捷克的入侵时，戈林为了掩饰他所受到的冷落，居然说尽管事前他在圣雷莫，但希特勒随时与他取得联系。在谈到德国与英国的关系时，戈林说，英国的空军力量至少到1942年才能有所改观，而德国尽管最新式的飞机——容克88型飞机的装配线还没有最后完成，但肯定已为期不远，因此，英国政府应该主动改善两国关系，放弃其一贯的反德政策。

结束罗马之行后，戈林回到了柏林。当晚，希特勒在与他共进晚餐时，突然对他说，如果波兰不肯接受德国提出的条件，即拒不交出但泽的话，他将考虑使用武力。戈林闻言，大吃一惊。他没想到希特勒对领土的要求会到了这种地步，况且，波兰一直属于他所控制的地盘，他实在不愿意再出现一个布拉格或维也纳。

他定了定神，结结巴巴地对希特勒说，这件事一定要慎重考虑，它很容易导致上场新的危机。希特勒冷冷地对戈林说，过去我处理了一系列此类事情，不是都得到圆满的结果了吗？这次也不例外。然后，希特勒说戈林现在太女人气了，简直成了一个“老妇人”。戈林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来。最终两人竟无言以对，不欢而散。

波兰问题迟早要得到解决，因为希特勒永远也不会忘记凡尔赛条约将但泽划归波兰这一事实。在奥地利与捷克先后向德国俯首称臣之后，希特勒被轻而易举便得来的胜利冲昏了头脑，特别是英、法的一味退让已使他习以为常。希特勒认为，既然他们能在莱茵兰事件、奥地利事件，苏台德事件以及最近的捷克事件中忍气吞声，那么他们在波兰问题上又能有什么作为呢？在所有与德国相接壤的国家里，波兰是最应该警惕德国，却又对德国的威胁最视而不见的国家。在凡尔赛条约的所有条款中，没有哪一项条款要比给波兰一个出海口，将东普鲁士与德国分开更使德国人仇恨的了。希特勒在 1939 年 1 月与波兰外长会谈时宣称：“但泽是德国的，它永远是德国的，而且迟早要成为德国的一部分。”4 月 20 日是希特勒的 50 岁生日，他志高气扬地向三军司令宣布，现在正是他的才能处于巅峰之时，也是德国还拥有军事优势的时候，所以一定要出击。

戈林对希特勒的举动深感忧虑，同时无法排解的失落感又时时困扰着他，以至使他觉得没有勇气再在柏林呆下去了。希特勒知道戈林的想法后，非但没有任何抚慰的表示，反而对他更为冷淡。戈林的政敌里宾特洛甫很快便察觉到了这一切，他要落井下石，趁这个机会打击戈林。于是，在里宾特洛甫的“关照”下，戈林接连遇到了倒霉事。

4 月底，戈林计划同西班牙的佛朗哥将军会晤，但由于里宾特洛甫的百般干预，佛朗哥一怒之下，拒绝与戈林见面。经过戈林在西班牙的代理人的斡旋，佛朗哥才答应在另外的地点与戈林见面，戈林对佛朗哥确定的地点提出了异议，并在没有取得佛朗哥同意的情况下，就前往他在一开始确定的地点（瓦伦西亚）。不料佛朗哥根本就不买戈林的帐，他拒绝去那里同戈林会谈。这样一来，戈林的小舰队只好停在卡斯特立翁。戈林本想上岸去散散心，却又突然收到希特勒发来的电报，电报命令戈林不要上岸。戈林进退两难，他派使者去见佛朗哥，请佛朗哥务必来同他见面，佛朗哥置之不理。就此灰溜溜地回柏林去，戈林实在不甘心，尤其是一想到里宾特洛甫那张不怀好意的笑脸，戈林心中就泛起一阵阵酸楚的感觉。

他真是想不通，希特勒现在为什么那么信任里宾特洛甫，难道他戈林出生入死这么多年，到头来竟不如一个三流的政客？

戈林既与佛朗哥谈不成，又不想马上回柏林。无奈他又派使者去见佛朗哥，想劝他回心转意。使者回来后，告诉戈林佛朗哥答应考虑一下。几天过去了，迟迟不见西班牙人的影子，戈林心急如焚。在这种情况下，戈林只好打道回府了。就在戈林即将启程之时，收到了一封里宾特洛甫的信。在信中，里宾特洛甫对戈林前些日子未经许可便对罗马进行所谓的“国事访问”提出

了尖刻的批评，同时又对戈林这次遭受的外交上的失利感到“遗憾”，他指责说，戈林这次外交上的失利，将会给人造成德国政府内部不团结、机构涣散的印象。看到这封信，戈林面前幻化出里宾特洛甫在希特勒面前摇唇鼓舌，诉说他的种种过失的情景，真恨不得狠狠地揍他一顿。然而，现实不允许戈林有太多的想法，他必须尽快赶回柏林，他不能让里宾特洛甫再在元首面前诽谤他了。

满腔怒火的戈林问到柏林后，却没有见到希特勒，更没有办法解释这次出访失利的原由，他只能同他的一些心腹以及同他一样对里宾特洛甫心怀不满的人，在一起尽情地斥骂里宾特洛甫。为此，他在这一段时间里尽量避免参加由外交部安排的外事活动。5月21日，意大利外长齐亚诺到柏林参加德国与意大利缔结军事联盟的盟约签字仪式，里宾特洛甫通知戈林参加这一仪式，戈林勃然大怒，他对里宾特洛甫说：“你以为我是一个白痴，我连签些什么都不知道，你竟然让我去参加什么仪式！”第二天，希特勒召集纳粹的高级官员去总理府开会，戈林托病没有参加，而让米尔希代替自己去应付一下，自己却跑去参加万塞军事学院的开学典礼。

思前想后，戈林觉得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他已经意识到，氏此以往，希特勒肯定会在某一天找一个借口将他抛在一旁，他就会落个同当年的沙赫特和牛赖特等人一样的结局。想到这里，戈林不寒而栗。如果真的发生这样的事，他戈林几年来费尽心血建立起来的帝国和苦苦奋斗了大半辈子才到手的荣华富贵，都将付诸东流。“不，不能这样，我不能失去这些！”在戈林的内心深处，有这样一个声音在呐喊。

不久，稍微敏感一点儿的人都发现，戈林在公开场合再也不谈什么和平之类的话题了，再也不同别人讲他对波兰与南斯拉夫负有“特殊的责任”之类的话了，他的老友亨德森也注意到了这一变化。

在欢迎南斯拉夫保罗王子的仪式上，亨德森站在戈林的旁边，观看由戈林组织的大型空军军事表演。亨德森望着空中穿梭而过的一队队德国飞机，不无忧虑地对戈林说：“我实在担心目前的形势，这样下去，战争总有一天会爆发。赫尔曼，我想跟你再说一遍，我们英国人决不想要战争，但是如果德国有一天进攻波兰的话，我想英国肯定会卷入战争。假如希特勒先生能够明确地表示他将放弃其侵略政策，那么张伯伦先生会给他一个满意的答复的。”戈林沉默了一会儿，说：“但是，我认为在伦敦确实存在着一个战争集团，他们千方百计地想与德国打仗，我想这一点你不会否认吧。”亨德森也不客气地回答：“在柏林不也同样有日夜盼望战争的人吗？比如里宾特洛甫。”戈林叹了一口气，又说：“实际上，谁都可以随便说一说，但一旦元首作了决定，我们每一个人的作用比脚下的砂砾又能重要多少。”亨德森无语，他知道戈林说的是实话，在这个独裁国家中，只有一个人能够决定战争还是和平，这个人就是希特勒。在亨德森离开柏林时，戈林对他说：“你是知道我的，在去年的9月，我曾竭尽全力地反对战争，今后我也将反对战争。”当亨德森的车子开走后，戈林不禁有些迷惘，他不知道自己说这些话究竟是为了什么。他明白，自己并不是真正反对战争，而是怕战争的结果不利于德国，从而使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德国如果战败，他个人的命运可想而知。

戈林极力避免再说出什么令希特勒不快的话，他只是暗中利用一切机会说服英国政府与德国缔结和平条约。戈林认为，只要消除英国人参战的威胁，希特勒就可以在欧洲大陆肆无忌惮为所欲为，他也就不怕任何战争了，只要

于己无害，哪管他生灵涂炭，这便是戈林之流的处世哲学。他知道，除了英国之外，欧洲大陆任何一个国家，包括法国在内，此时军事力量都是难与德国同日而语的。

5月末，瑞典人、著名的百万富翁温纳·格伦来到柏林，他是作为英国人的特使来见戈林的。戈林在卡琳庄园与温纳·格伦谈了大约3个小时。在这位瑞典人面前，戈林又恢复了往日的自信，他大谈在他的领导下德国经济所发生的巨大变化。这位瑞典人却直言不讳地说：“正因为如此，才让人感到可怕，因为这种巨大的变化，除了会导致战争之外，不会让人感到别的。我觉得如果一旦发生战争，这场战争是一场会给德国人民带来无尽灾难的战争，这太可惜了。”戈林马上说：“我们德国并不需要战争，只有伦敦的战争狂人们才希望战争。”戈林建议温纳·格伦到伦敦见到张伯伦时，替他转告他想与张伯伦单独面谈的意思。最后，他对温纳·格伦说：“如果与张伯伦先生会谈的话，我相信我们双方一定会找到互相谅解的基础的。”温纳·格伦临走时，戈林表白说，他与希姆莱、里宾特洛甫、戈培尔等人不一样，这些人都希望在战争中捞一把。他又提起要与英国缔结25年和平条约，但前提是英国人必须满足希特勒所提出的最后的领土要求。

温纳·格伦到达伦敦后，向张伯伦转告了戈林的意思。张伯伦则表示，如果他在满足希特勒的“最后的领土要求”的前提下与戈林或者其他纳粹领导人进行所谓的和平谈判，那么不出一个月，他就得被国人赶下台。不过，张伯伦对戈林本人的评价还是很高的，认为他是纳粹上层唯一可以与之“坦率交谈”的人。格伦不辞劳苦，马上返回柏林，将张伯伦的意见告诉了戈林。他对戈林说，英国政府现在不能与德国进行任何实质性对话，因为英国政府想看到纳粹德国拿出真正的和平行动，这样才能取得英国政府的信任，否则，即使会谈也不会有什么结果。

回到斯德哥尔摩后，格伦又给戈林写了一封长信，提出了如何与英国人重新建立互相信任关系的建议，即德国彻底放弃其战争政策，停止对犹太人的迫害，封闭所有的集中营，释放奥地利前总理许士尼格等人。戈林看了这封信后，苦笑着摇了摇头，随手把它放进了写字台的抽屉里。他知道如果将这封信的内容告诉希特勒的话，希特勒肯定又会怀疑他背地里搞了什么小动作。现在他已别无选择了，只能全力以赴地去备战，因为希特勒不可能放弃波兰，而英国的态度又越来越强硬，如果德国入侵波兰，战争就不可避免。在这种情况下，戈林只有一种选择，那就是跟着希特勒走到底，哪怕是走向毁灭。

于是，戈林像换了一个人一样。他到处视察，以德国经济的主管人的身份，督促人们为未来的战争作好准备。6月21日，在视察大众汽车厂时，戈林与管理人员商讨在战争爆发时，该厂将汽车引擎生产转为飞机引擎生产的可能性。两天后，戈林主持召开第二届国防会议，在会上他声色俱厉地指责有关机构至今为止还没有注意到在煤炭的生产、运输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大声疾呼，如果不注意这些问题，就无法应付突然出现的军事对抗。他还要求，有关部门必须在短时间内作好战争的准备。

不久，戈林又组织了一次秘密的最新空军装备展览，这完全是为了重新讨取希特勒的欢心。功夫不负有心人，这次展览确实让希特勒高兴。见到如此之多的新型飞机和武器，希特勒竟乐得不知道说什么好。看完展览，他激动地对戈林说：“这次展览让我第一次了解了德国空军的实际力量，我更加

坚定了决心。”希特勒没有想到，这次展览完全是一场虚假的魔术表演。在展览会上展出的各种主要机型和装备，绝大多数都远远没有达到批量生产的程度。甚至有的飞机仅仅是实验室里的产品，连试飞都没有经过。这次展览给希特勒造成了一种错觉，那就是德国空军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武器装备方面都是其他国家所无法匹敌的，这也是后来希特勒在波兰问题上一意孤行，不惜冒着引起世界大战的危险而坚持用武力解决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

戈林尽管在希特勒面前表现得同以前判若两人，但暗地里并没有与伦敦方面断绝联系。他多次派赫尔特·沃尔泽特去伦敦，代表他与英国人会谈。在会谈中，双方就德国放弃战争的问题反复讨价还价，最后形成的初步意向是：如果纳粹德国放弃目前的扩张政策，英国连同美国就会给予德国大量贷款；如果希特勒同意裁军的话，英国和美国就答应帮助德国收回其一战后丢失的殖民地。沃尔泽特将这些情况秘密报告给戈林，戈林也严守秘密。可未曾想，英国政府中的反德派将此事捅了出去，报纸发表了一则消息，称英国政府正在与戈林及其纳粹德国作一笔交易，并说英国政府已经向德国提供10亿英镑的贷款。由于此事是戈林背着希特勒干的，因此，一经报界披露，戈林便陷入被动之中。迫于各方面的压力，他只好声称这一消息完全是无稽之谈。

尽管困难重重，戈林却依然不肯停止与英国举行谈判的努力。他请瑞典商人达勒鲁斯作他与张伯伦之间的秘密联系人，达勒鲁斯向张伯伦建议，英德两国政府首脑应在一个中立的国家举行会谈。张伯伦仅仅表示可以考虑这一建议，此外并没表现出太大的热情。戈林却认为促成这件事的可能性极大，所以他马上同温纳·格伦联系，向他借豪华游艇供会谈使用。就在戈林满怀希望的时候，达勒鲁斯捎来一封令他极为沮丧的信。信中说，张伯伦已向他明确表示，目前不宜举行戈林所企望的那种会谈，因为一旦消息泄露，他本人将会受到反德派的强烈反对，他的政府也将难逃垮台的厄运。同时，张伯伦已经看出他与戈林的想法并不一致，因此他也怀疑，即使举行会谈，是否能收到什么令人满意的结果。

看到这封信，戈林当时的感觉就如坠入无底深渊一般，绝望、恐惧、恼怒……冷静下来，他才发现自己走得太远了，真不知道希特勒会怎样处置他。此后的几个月里，戈林无论是在公开场合还是在私下交谈中，都一再表示，一定要与元首保持“高度的一致”。言外之意，就是决不再背着希特勒搞鬼。

7月25日，戈林在威斯特兰召集将军们开会，命令他们尽快使手里的捷克工厂投入军工生产。他还下令停止军用飞机的出口，理由是形势发生了变化，保证德国的需要是第一位的。8月7日，戈林跑到大北方，同7名颇有影响的英国商人会面。在进餐时，他提议为和平干杯。8月12日，戈林打电话告诉达勒鲁斯，他已命令新闻界要以温和的态度对待英国。这一切都说明，此时，戈林的内心充满了矛盾。他既惧怕战争，因而不愿放弃拉拢英国人的努力，又绝对不想得罪希特勒。

希特勒在准备对波兰采取行动的同时，并不是完全不考虑英国和法国的态度。只是他心中还打着另外一个算盘，那就是与苏联缔结一个条约，从而利用苏联来牵制英法。从1939年1月开始，希特勒就不断派人去莫斯科，试探苏联的反应。希特勒认为，同德国一样，苏联与波兰之间也有尚未化解的矛盾，在波兰问题上，苏德极有可能采取一致的立场。为了显示自己对元首的一片忠心，戈林一有机会便宣扬同苏联恢复贸易关系的好处，以配合元首



的行动。他还警告亨德森以及法国大使说，“德国与苏联的关系不会永远不好，我们仍然可以与苏联谈判，我们在俄国仍有许多朋友。”看起来好像戈林与希特勒之间有一种默契，其实他是在刻意迎合元首。

与苏联的谈判进行得十分困难。莫斯科同伦敦也在商谈签订友好条约，由于他们之间在一系列问题上很难达成共识，因此双方虽然经过多轮会谈，但仍然没有任何结果。李维诺夫（当时的苏联外交委员）突然被解职后，苏联的外交政策由李维诺夫时代一贯强调加强与英法联合，共同对抗德国的威胁，开始向与德国建立良好关系转变。对此，希特勒十分高兴，他督促里宾特洛甫加紧与俄国联系，一定要赶在英苏签约之前，与苏联签订一个互不侵犯条约。特别让希特勒感到欣慰的是，8月12日斯大林终于同意接见等候在莫斯科的德国代表，这是一个很好的信号。此后，双方频繁接触。经过十余天紧张磋商，在双方讨价还价的基础上，8月23日，里宾特洛甫飞赴莫斯科，并于当日代表纳粹德国与苏联政府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在里宾特洛甫等人紧锣密鼓地与苏联政府交涉的时候，戈林也正在通过各种渠道加紧与英国人联系，不过他事先已做好了与英国人磋商失败的准备，所以，在苏联问题上他也想插上一手。戈林既然已经发誓不再与希特勒作对，在这一段时间里他也就有意缓和与里宾特洛甫的关系。在里宾特洛甫不知如何与苏联人取得联系时，是戈林帮助他下决心直接与斯大林通话。可以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也有戈林的功劳在内。希特勒并不知道戈林在背着他与英国人联系，而是以为他一直在为苏联的事情奔忙。因此，当里宾特洛甫从莫斯科打来电话报告条约已经签订的消息时，希特勒第一个就把这一消息告诉了戈林。

戈林如释重负。《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意味着在进攻波兰时可以不顾及英法两国的态度了。事后，戈林在与纳粹负责东方事务的官员贝波·施米德谈到波兰问题时说：“现在可以肯定，英国决不会干涉波兰事务，我们注定要赢这盘棋了。”然后，他又情不自禁地赞叹：“元首真是一个天才，我现在发现，我每次从他那里回来，都像成了一个新人一样。”在波兰问题上。戈林再一次发现论搞政治玩权术，希特勒永远要比他技高一筹，他只能甘拜下风了。

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的前夜，希特勒曾将他的三军将领召集到总理府训话。希特勒容光焕发地站在一架大钢琴旁。他向毕恭毕敬地站在面前的将领们宣布，解决波兰问题是他不可改变的决心。其口吻与当初入侵捷克时一样。然后，他宣布里宾特洛甫即将前往莫斯科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现在，我几乎等于得到了我一直想得到的波兰。”希特勒一副胜券在握的样子。他又以严肃的口吻分析了目前德国与英法两国的力量对比，声称德国空军的力量已经超过了英法两国空军力量的总和，因此，英国与法国肯定不敢同德国打仗，只是也许会对德国实行封锁。“但这对于我们来说，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我最担心的是有些不自量力的人去进行什么‘调停’”。最后，希特勒说：“现在我已经尽了我的力量，该轮到你们了。”这时，戈林走了出来，神色庄严地面对着希特勒说：“我的元首，我代表德国武装力量向您宣誓，我们将尽自己的义务。”

正是：得意也有失意时，小巫诚服大巫计。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 第十五章 大战前夕

纳粹磨刀向波兰，戈林惧强拉英法；  
外交攻势未奏效，四面楚歌战幕拉。

且说那天希特勒召见三军将领，戈林当场立下了誓言。他貌似信心十足，其实内心还是有点儿不安。尽管苏德签订了条约，尽管他对希特勒的才能已佩服得五体投地，但万一英国与法国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定要向德国宣战，德国未来的命运也是不能不令人担忧的。同英法开战，实际上就等于同全世界开战。对大英帝国及其联邦成员国的力量，戈林从来就不敢轻视。另外，戈林内心还有一层隐忧，那就是美国人将会采取什么态度还是个未知数。戈林确实并非庸人自扰，任何一个经历过一战的德国人对美国人后期参战的情景都会记忆犹新，正是美国人的参战使德国战败成为无可挽回的事实。戈林知道，这次如果美国人仍然参战，战争的结局就更是不可预测。一想到这些，戈林的心中就一阵烦乱。

据战后公布的当时英国外交大臣哈里法克斯勋爵的日记记载，在苏德条约签订之后，戈林曾经通过其特使——瑞典人达勒鲁斯给他带去了一封信，表达了要在短期内与张伯伦进行秘密会谈的愿望。这回张伯伦对戈林的建议作出了积极的反应，并立即让手下的工作人员全力以赴地为戈林的来访做准备。戈林收到张伯伦的回信，觉得应该向希特勒报告。当他把与张伯伦联系的具体细节向希特勒做了汇报之后，希特勒有些不高兴了，他很不耐烦地对戈林说：“你怎么现在还在与英国人搞这些，他们对这些不会真正有兴趣的。他们现在只能反对我们的行动而不会再作任何其他的事情。现在需要你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全力以赴准备对付波兰的事情。我们在近期内就要发起进攻。”那边，达勒鲁斯频频打来电话，催促戈林拿出会谈的计划，戈林只好让人给他回电话说“形势已经恶化”。

8月23日，戈林受希特勒的委托，在卡琳庄园召开了纳粹内阁全体会议。戈林向全体与会人员宣布：对波兰的战争已经决定下来，但必须绝对保密。他还故作轻松地说：“不会发生世界大战，冒这次风险是完全值得的。”

会议结束后，戈林下令为卡琳庄园披上防空隐蔽网。晚上，戈林参加了为庆祝苏德条约的签订而举办的晚会。里宾特洛甫洋洋得意，同戈林大谈他在莫斯科所受到的礼遇。随后，戈林在希特勒那里见到了条约的附件，他这才知道在德国军队侵入波兰后，苏联也将从东部进攻波兰。希特勒告诉戈林，由于苏联的介入，英法两国肯定不会采取行动。不过，假如英国人发动“虚假的战争”，他并不感到意外。他还对戈林说，他已向亨德森谈过这一想法。最后，他通知戈林说，进攻将在8月26日凌晨开始。

8月25日，希特勒给墨索里尼发去了一份急电，向这位独裁者通报苏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有关情况，并向他表明德国随时都会进攻波兰的决心。虽然希特勒没有明确说出希望意大利参战，但根据德意之间的协定，意大利有义务在德国与第三国发生冲突时给予援助，所以他对罗马方面还是比较放心的，当日，希特勒下令切断与伦敦和巴黎的所有电讯联系。不曾想下午5时，情况突然有所变化。意大利外长齐亚诺照会德国外交部，表示意大利不会参战。这一消息使希特勒大失所望。他对手下的人说“意大利人又要玩1914年那一手了”，意思是意大利人不顾德意之间的“钢铁同盟”，在德国最需

要意大利人帮助的时候，将德国抛弃了。一时间，在希特勒的总理府中，对意大利的骂声不绝于耳。

希特勒怎么也不会想到，打击还仅仅是刚刚开始。过了半个小时，法国大使求见希特勒，代表法国政府正式向希特勒提出警告，如果德国进攻波兰，法国就将向德国宣战。下午6时，各电台播出了一条让希特勒等人吃惊的消息，英国宣布正式与波兰结成军事同盟。希特勒目瞪口呆，他原指望苏德条约会阻止英法两国介入波德事务，可如意算盘打错了。希特勒面色苍白地给德军总参谋长凯特尔打了一个电话，让他下令暂时停止“一切行动”。然后他又给戈林打去电话，告诉戈林他已经下令停止实施“白色方案”。戈林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急忙赶到希特勒那里。得知详情后，戈林问希特勒是否这就意味着“白色方案”已被废止，希特勒回答说“不会是永久的，我必须看一看能不能避免英国方面的干预”。直到这时，戈林才知道希特勒对英国人参战也是心存恐惧的。希特勒又对戈林说：“我想我只需要大约四五天的时间就有可能排除英国的干扰。”戈林紧追不舍地问道：“您确实认为可以排除这一干扰吗？”希特勒没有说话，只是坚定地地点了点头。在戈林就要告辞时，希特勒又对他说：“你可以通过达勒鲁斯再与英国政府取得联系吗？尽快告诉我。”

戈林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进行“和平”行动了，他真恨不得立刻见到达勒鲁斯。这位说话慢声细气的瑞典机器进口商，前些日子作为戈林与英国政府间的牵线人空忙了一通后，灰溜溜地回到了斯德哥尔摩。在德军准备进攻波兰之前，戈林就留了一个心眼，让达勒鲁斯赶到了柏林。不出戈林所料，达勒鲁斯果然派上了用场。走出希特勒的总理府，戈林很为自己的“神机妙算”陶醉了一番。

戈林迅速地给英国外交大臣哈里法克斯写了一封信，交由达勒鲁斯带往伦敦。在信中，戈林对英国政府信誓旦旦，声称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决不会影响德国与大英帝国达成谅解。并说：“元首建议通过谈判来解决如何归还但泽和‘走廊’的问题，然后，德国将保证波兰的新边疆。”然而，张伯伦对此并不感兴趣。

在慕尼黑事件之后，张伯伦就看出德国的侵略野心不但没有收敛，反而愈发膨胀。想想自己在德国人面前的表现，他真有一种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的感觉。他知道，如果波兰问题再得不到妥善解决，他就只有一条路可走了，那就是夹着皮包从唐宁街出去。因此，这次他一改往常的态度，坚持只要德国还处于战争动员的状态之中，就不能与其讨论殖民地问题，德国与波兰的边界问题必须由五大国来解决，不能只凭希特勒的一句后就轻而易举地进行无效的谈判。至于‘走廊’问题，要由波兰与德国直接谈判解决，达勒鲁斯带上英国外交大臣哈里法克斯给戈林的亲笔信，乘戈林特意为他此行配备的专机，回到了柏林。

一下飞机，达勒鲁斯直奔卡琳庄园，戈林正在那里焦急地等候着他。达勒鲁斯将英国人的意见复述了一遍，却在临行前才想起哈里法克斯的亲笔信。戈林几乎是从达勒鲁斯手中将信抢了过去，迫不及待地读了起来，可在这位外交家的信中，找不到任何实质性的东西。戈林顿感失望，但他还是决定带着这封信去见希特勒。

希特勒看过戈林带来的信，又让人将达勒鲁斯叫来。此刻这位瑞典人洋洋自得，似乎觉得是他使一场战争破制止。他滔滔不绝地又叙述了一遍他这

次伦敦之行的情况，希特勒静静地听着，一反常态地没有插嘴。达勒鲁斯停了下来，希特勒才开口说话。他先是对达勒鲁斯的伦敦之行表示了谢意，然后便开始慷慨陈辞。他对达勒鲁斯说：“不管德国的敌人坚持多少年，德国总能比它的敌人多坚持一年。”这时，戈林从地图册上撕下了一张地图，边用铅笔将但泽和波兰走廊地区圈了起来，边说：“只要英国在但泽和波兰走廊问题上帮助德国，德国就将与英国结成一个真正的同盟。”希特勒接过话茬说，“德国将不会支持任何国家与英国做对，包括日本、意大利和苏联。”希特勒原地转了一个圈子，突然歇斯底里般地叫道：“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与英国总是不能达成协议，你能不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我想你对英国是很了解的。”达勒鲁斯犹豫了一下，吞吞吐吐地说：“据我了解，英国人似乎对您和您的政府不太信任。”希特勒更加激动，他使劲挥舞着手臂，大声嚷道：“这些白痴，我这一辈子什么时候撒过谎。”随后，希特勒平静下来，同戈林及达勒鲁斯一道重新讨论了要与英国人再次磋商的条款。

第二天，达勒鲁斯重返伦敦，同张伯伦等人会面。张伯伦等人对希特勒和戈林提出的建议还是不感兴趣，因为它同达勒鲁斯前些天所带来的那些建议并没有什么根本的区别。英国人又一次提出了他们的条件，即英德两国可以在下述前提下取得谅解：英国政府一定要履行对波兰政府的义务，德同与波兰之间的争端必须和平解决。

达勒鲁斯回到柏林之后，将张伯伦等人的意见转告了戈林。戈林对此不甚满意，没想到希特勒却表示同意。凌晨1点，戈林给达勒鲁斯打了一个电话，告诉他，如果星期一晚上英国大使亨德森前来通报的英国政府的正式答复与他所说的一致，希特勒就将接受英国政府的条件。戈林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兴奋地对达勒鲁斯说：“这件事能够成功，你应该算是第一功臣。”说完，他竟在电话里哈哈大笑起来。

星期一晚上，亨德森来到柏林，给希特勒带来了英国政府的正式答复。希特勒接过文件，几乎一目十行地看完，然后对亨德森说，他原则上同意英国政府的要求。“但是”，希特勒话锋一转，“波兰人已经让我们无法再忍受下去了，他们在但泽、波兰走廊和西里西亚所做的一切，使每一个德国人都无法忍受下去了。我们为了谋求波兰问题的和平解决尽了最大的努力，这也是我们的最后一次努力。”亨德森对希特勒说：“我理解元首此刻的心情，可我不得不再说一遍，英国政府的态度是，英国希望得到德国的友谊并且希望和平，但是如果德国进攻波兰，英国就只有出兵一条路了，希望元首也能够理解我们。”希特勒以他少有的和悦态度同亨德森就波兰问题进行了磋商。最后，他对亨德森说，我们必须把戈林找来商量一下。亨德森显然为希特勒的态度所迷惑，认定德国确实有诚意以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因此，他在向英国政府汇报时，指出德国将放弃进攻波兰的计划。

而实际上，希特勒根本就没有打算接受英国人的建议，仍然准备在这个周末实施“白色方案”，因为他固执地认为，英国不会真的对德国采取行动。别说英国人，就连戈林都被希特勒骗住了。8月29日上午10时左右，戈林见到了达勒鲁斯，他热情地同达勒鲁斯握手，继而又是拥抱和狂呼：“要和平了，和平有望了！”他告诉达勒鲁斯：“元首对英国人提出的条款很满意，但还不知道英国人所希望的这种和解是以条约的形式还是以联盟的形式实现。假如这一点确定下来，那么一切都将是真实的了。我想英国政府现在不会再有什么别的花招了吧。”达勒鲁斯在与戈林见面后，立刻将这一消息告

诉了亨德森。可是，亨德森现在已对此不抱太大的希望了，尽管前一天他还坚信希特勒确实有和平解决问题的诚意。原来他接到了伦敦方面的通知，提醒他不要轻信希特勒的诚意，不要对谈判有什么过高的期望。

当天晚上，亨德森去总理府听取希特勒的正式答复。希特勒告诉亨德森，他可以接受英国人提出的条件，但前提是不能以牺牲德国的利益为代价。他又一次老调重弹，口沫横飞地陈述波兰人的罪行，最后提出：“为了德国同大英帝国的友谊，我们准备接受英国的建议，与波兰政府直接谈判。但是，英国政府应保证波兰政府在8月30日之前派一名特使到柏林。德国政府先拟出一个自己可以接受的方案，并尽可能在波兰政府的特使到达之前把它交给英国政府。”亨德森接过希特勒交给他的照会文件，马上回使馆去了。

亨德森将希特勒的答复通报了伦敦方面。张伯伦给希特勒写了一封短信，希望希特勒能够克制，并能够给英国政府足够的时间，因为英国政府正在紧急商讨希特勒的“建议”。与此同时，外交大臣哈里法克斯在同一天给德国政府发了三份电报，语气一份比一份强硬。英国政府现在已经确认希特勒前几天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设了一个圈套而已，其最终目的就是要将战争的责任完全推到波兰一方，从而使英法两国无法插手波兰事务。

戈林对希特勒的变化无常一开始就感到很迷惑，但又不敢过多地追问。8月30日夜，在希特勒将戈林召去重新研究“白色方案”时，他对希特勒说：“咱们就不要将庄家的全部赌本都赢过来吧。”希特勒的回答却是：“我所学会的唯一的游戏就是赢庄家的钱。”戈林听罢，默不作声。希特勒告诉戈林，他相信，现在已排除了英国人的干扰，在下一步的行动中，德国可以完全放心大胆地去干。他还得意地说：“迄今为止，我还没有出现过判断上的失误。”戈林随之兴奋起来，他暗自想，自己多次反对过希特勒的计划，不止一次被希特勒讥讽为“老妇人”，这次再也不能表现得软弱了，否则就很可能无法再在现在的位置上呆下去。两人商议的结果是，将实施“白色计划”的时间定在9月1日。

8月30日一整天，身心交瘁的亨德森一遍遍地向伦敦和华沙呼叫，却没人能给他一个明确的答复。亨德森在电话中将希特勒的建议全部告诉了波兰驻德大使利普斯基，并建议他立即与戈林会面。可那位大使满不理会上床睡觉去了，他觉得反正有英国人撑腰，大可不必惊慌失措。亨德森完全失去了往日的绅士风度，他就像一只被猎狗紧紧追逐的野兔一样，惶恐不安。8月31日上午，亨德森又一次提醒波兰方面，离德国人给出的期限只剩下几个小时了，波兰政府却指示利普斯基“不要进入任何具体的谈判”。亨德森将情况报告了英国外交部，并分析说，希特勒的建议很有可能是纳粹的一场骗局，德国对波兰的行动是谈判所无法阻止的。

战争的阴云已难以驱散，人们被沉重的战争气氛压得喘不过气来。柏林上层社会中的一些人还是不甘心眼看着自己的舒适生活被一场无情的战争所葬送，他们在千方百计地寻找制止战争的途径。前德国驻罗马大使搬出了戈林的姐姐，希望她出面劝说戈林设法扭转局势。戈林的姐姐打电话说这件事时，戈林正在为波兰政府的态度而恼火。他大骂波兰人无礼之后，怒气冲冲地对他的姐姐说：“你问这是不是最后通牒？我可以说不，如果波兰政府再不派代表来柏林的话，这就是最后的通牒，这话我也将对亨德森说。”戈林知道波兰方面不会再派人来了，因为他的研究所已经监听到利普斯基打给波兰大使馆的电话，这位波兰人预测，在未来的几天之内，德国会爆发一场“革命”，

那时希特勒将会被推翻。戈林认为这一切都是捕风捉影，根本就不存在波兰大使所说的“革命”的可能。

下午1时，希特勒下达了执行“白色方案”的命令。戈林接到命令后，立即召开了国防会议。戈林一反过去那种一想起战争便忧心忡忡的样子，情绪异常高昂。他声称，“不管波兰怎样拖延时间，我们的决心都决不会动摇。在未来的48小时之内，我们就将给波兰人做出回答，那就是将他们击败。波兰人对我们的建议置之不理，说明他们根本就没有和平的诚意，因此英国人已无话可说了。如果英国人一定要插手的话，在我们彻底击败波兰人后，我们将全力以赴地备战，同英国人血战到底。”其实，即使在他慷慨陈辞的时候，他也仍在暗暗地祈祷英国人千万不要参战。在戈林的心中始终萦绕着一战战败的阴影，他对英国及其站在它身后的巨人美国，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感。但无论如何，既然希特勒已将德国拉上了战争之路，他也只能在这条路上走下去了。

亨德森又来找戈林了。他见戈林手下的人一个个都在忙忙碌碌地装点器物——戈林收藏的那些价值连城的古董和细软，就知道一切都已成定局，再多费口舌已没有什么意思了。亨德森和戈林见面后无话可说，这在私交甚好的两人之间还是第一次。亨德森不愿意再给戈林摇唇鼓舌的机会，寒暄了几句就告辞了。他仍存有一丝侥幸的心理，寄希望于波兰人及时派出特使，波德暂时和解。但是，波兰方面仿佛一切都凝固了，只在静静地等待着德国飞机飞临华沙的上空。

令戈林难受的是英国人的态度愈发强硬起来。英国外交大臣哈里法克斯在给希特勒的照会中说：“英国人不能劝说波兰人按照希特勒的要求讨论解决两国之间的矛盾的办法。捷克的命运就是前车之鉴，波兰人不愿重蹈慕尼黑黑覆辙。假如出现那种情况，他们愿意战斗到最后一个人。”波兰人当然知道英国政府的态度，因此有恃无恐，对德国人的威胁和亨德森的劝说采取了不理不睬的态度。尤其是利普斯基，他对亨德森的劝说始终置若罔闻。亨德森在同法国大使谈及此事时说：“这也太滑稽了，我真不敢相信，一个国家能如此随便地将命运交付在别人手中。”戈林却为波兰政府的态度而庆幸，因为这样一来，英国人就难以理直气壮地替波兰人说话了。

对于亨德森来说，1939年8月31日是他终生最难忘怀的一天，他似乎对一切都已绝望，一切又似乎都存在着转机。他就像坐在一艘行将沉没的船上一样，眼前危机四伏，但远处的地平线又隐约可见。这一天中午，利普斯基终于去见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了，不过他并没有得到波兰政府的授权。德国人好像要考验利普斯基的耐心，居然让他等候了5个多小时。大约晚上6点半钟，里宾特洛甫才出来同利普斯基见面。当他得知利普斯基不是波兰政府的正式代表时，马上就将面孔板了起来，几乎将他赶了出去。回到大使馆，利普斯基急忙往华沙打电话，却发现电话已被切断了。在这一天，英国政府也开始紧张起来，因为他们发现希特勒是一个为达到目的而不惜冒任何风险的狂人。连那位躲在罗马静观事态发展的独裁者墨索里尼也跑了出来，大声疾呼“克制”和“理智”，他是应英国政府的要求这样做的。同时，他站在希特勒的立场上，要求波兰将但泽让出来，用他的话说就是：这是德国人的一个最低的要求，如果连这个要求波兰人都不能满足的话，他就无法说动希特勒了。这时，德国进攻部队大部分都已进入预定位置。

值此大战迫在眉睫的时刻，纳粹要人戈林在做什么呢？他正在柏林有名

的爱思普兰德大饭店与达勒鲁斯推杯换盏。戈林谈笑风生，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他夸奖达勒鲁斯要的白兰地是酒中上品，说临走时还要拿上两瓶。正当戈林酒酣耳热的时候，达勒鲁斯建议他再与亨德森谈一下，戈林很痛快地应允了。从饭店出来后，戈林马上把亨德森邀到寓所喝茶。亨德森坐立不安，戈林却根本不理睬这些，他足足谈了两个小时，说得最多的照旧是前些天说过的所谓波兰人的罪行。戈林还声称：“如果波兰人不让步，那么德国就会像掐死一只虱子那样将波兰消灭掉。如果英国人执意要对德国宣战的话，我个人表示十分遗憾，而且总有一天，每个英国人都会认为这是轻率的举动。”事后，亨德森回忆道：“戈林在这样的日子里居然拿出这么长时间来同我喝茶，其用意很明显，就是在最后的关头想通过我迫使英国政府放弃波兰，尽管他也许知道这是徒劳的。戈林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不放弃一切机会捞取好处，往自己的脸上贴金。如果在最后的关头，他能使英国置身事外，他就会成为‘白色方案’实施过程中的第一个功臣。”亨德森还写道：“在与戈林谈话当中，我有一个不祥的预感，那就是战争大概在明天早晨就会爆发，而戈林一定已将归自己所管的一切都安排停当了，否则他不会这样泰然自若。”

从戈林那里出来后，亨德森立即往伦敦发了一个电报，他向张伯伦提出：“现在如由我再向德国人提任何建议都是不明智的，因为任何建议在此时此地都已经是徒劳无益的。我们现在所能采取的唯一方针就是以不可动摇的决心以武力对武力。”面对窗外黑沉沉的夜空，亨德森的心情十分郁闷。他知道，这些年他所奉行的个人外交的策略完全失败了。他被希特勒和戈林欺骗了，尤其是戈林，他一直以一个老朋友的身份同自己交往，而且似乎一直都在为和平而奔走，但在最紧要的关头，恰恰是这位“老朋友”愚弄了自己，他居然能那样若无其事地请自己“喝茶”。

1939年9月1日拂晓，150万德国军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波兰发起了进攻。戈林空军的机群如一群群乌鸦一般，飞向波兰的军队驻地、军火库、重要桥梁和一个个不设防的城市。这一天是波兰人永生难忘的一天。地面和天空就像喷火一样，无数无辜的波兰人葬身于火海之中，希特勒和戈林曾在西班牙导演过的惨剧以更大的规模在波兰的土地上重演。

在战争爆发的当天，英法两国除了通过新闻媒介谴责了德国的侵略行动之外，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这使戈林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晚上，戈林独自得意地坐在他那巨大的办公桌后，品味着白天发生的事情，不由得暗自庆幸这一次实在是跟希特勒走对了。他感觉到，元首对他这次的表现非常满意。9月1日白天，希特勒身穿灰色的士兵服装，来到国会大厦，向国会议员们宣布，德国军队已经进入了波兰。他还宣布：“如果在此次战斗中我遭遇不测，那时，我的继承人将是党员戈林。”站在希特勒身后的戈林神情庄严，真有点临危受命的样子。

9月2日一整天，英法两国仍然没有什么动静。戈林心里高兴极了，希特勒也是面带喜色，他们以为纳粹的扩张阴谋又一次得逞了。

当天夜里，戈林的研究所监听到张伯伦向英国大使馆发出的指示。指示说，鉴于当前的形势，英国政府将向德国政府发出最后通牒。戈林开始紧张起来。3日零点，戈林的研究所又监听到伦敦方面直接给亨德森本人的指示，内容是让亨德森于3日上午9时去见里宾特洛甫，将英国政府的最后通牒通知德国——要求德国必须无条件从波兰撤军。并让亨德森在11时听候德国政府的明确答复，如果过了这一时间，英国政府就将不再与德国政府通话。上

午 9 时刚过，戈林就给里宾特洛甫打去电话，询问英国方面有何消息。里宾特洛甫冷冷地告诉他，已接到英国政府的最后通牒，他正要向元首汇报。快到 11 时时，戈林没听见希特勒有什么反应，他知道希特勒根本不可能从波兰撤军，这场战争只能打下去了。戈林面色苍白，脸上冒着冷汗，上气不接下气地对一直守候在他身边的达勒鲁斯说：“这些英国人简直是一群不可理喻的蠢驴，竟在这种时候还让一支已经得胜的军队在没经过任何谈判的情况下就撤军，这在历史上还从未有过呢。”达勒鲁斯突然想出一个主意，他建议戈林立即飞往伦敦，与张伯伦当面进行谈判，这也许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戈林听从了达勒鲁斯的建议，立即给希特勒的副官博登萨茨打去电话，告诉他自己准备亲赴伦敦，并保证说，他将掌握谈判的分寸，在没有得到张伯伦明确表态之前，他是不会表态的。达勒鲁斯将戈林同意去伦敦同张伯伦会谈的消息用电话通知了英国外交部，并说戈林的专机已经备好，正在机场预热。这边戈林让他的侍从给他准备去伦敦要穿的夜礼服，心里则在想着他作为“和平的使者”，在伦敦将要受到多高规格的欢迎。然而，让戈林始料不及的是，张伯伦和哈里法克斯一口回绝了达勒鲁斯的建议。他们给戈林的回答是，在德国没有答复英国的最后通牒之前，英国政府将不与任何德国政府代表进行接触。如果英国政府在今天上午 11 时之前得不到德国政府令人满意的答复，那么自该时间起，英德两国就处于交战状态之中。戈林得知英国政府的态度之后，沮丧之极。他走出房间，在一棵山毛榉树前的椅子上坐下，心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恐惧。这时，侍从跑来说元首请他接电话。戈林猛然一惊，快步走向屋里。希特勒在电话中大声斥责戈林在这种时候还在幻想同英国人和谈，并告诉他，11 点 30 分，英国政府已向德国宣战。希特勒大叫道：“收起你的幻想吧，现在需要的是你全力以赴地去准备与英国和法国开战！”戈林唯唯喏喏，面露土色，一个劲说：“是，我的元首，是，我的元首。”放下电话，他对副官说：“马上备车，我要去总理府。”

在总理府，纳粹的主要领导人聚齐了。希特勒的会议室里笼罩着一片紧张的气氛。希特勒先是面色阴沉，一言不发，过了一会，他恶声恶气地对里宾特洛甫说：“现在怎么办？”说这话时，他面露凶光地看着总是自以为是的外交部长，似乎在责备他判断错了形势。但里宾特洛甫好像没看到希特勒的表情一样，火上浇油似地说：“我想不用再过 1 小时，法国政府会送来一份同样的通牒。”戈林对站在他身旁的戈培尔说：“如果这场战争我们打败了，那只有请上帝救我们了。”戈培尔没有说话，只是怔怔地站在那里。

英国人参战的消息确实如一瓢冷水泼向了头脑发热的希特勒，他从一开始就估计英国人不会真的向德国宣战。他对戈林与英国人之间的来往并非一无所知，但他不愿过多地阻拦，他也希望戈林的努力能够奏效，来自英国的威胁毕竟不可等闲视之。如今这一切都成了泡影，他和戈林再也不用绞尽脑汁地想利用外交手段将英国人排除在外了，现在需要考虑的是如何将战争的责任推到英国人及紧随其后的法国人身上，怎样对国人有个交待，怎样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在这个时候，戈林想的几乎与希特勒完全相同。他已看清，要保住荣华富贵，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跟着希特勒走到底，打赢这场战争。此外，戈林还抱有一丝幻想，那就是英国人不过是虚张声势而已。于是，他的脑子里又开始转开了设法同张伯伦取得联系的念头。

正是：欺世美梦难成真，如意算盘终落空。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 第十六章 黄色方案

手举屠刀喊和谈，诡计成空备战急；  
西欧大陆逞淫威，为抢头功误战机。

话说白色方案施行之后，戈林对阻止英法参战仍然寄予着希望。9月4日，戈林在同那位前些日子忙成一团的客串外交家达勒鲁斯话别时说，德国决不会先行对英法发动进攻。当天晚上，面带忧伤的亨德森同戈林告别，戈林也对他说了同样的话。亨德森半开玩笑地说：“万一有一颗炸弹击中了我怎么办？”戈林回答：“我一定派专机去伦敦给你送花圈。”在战争初期，戈林同英国一直通过几条秘密渠道保持着联系，这也体现了戈林在人格方面的矛盾。他屡次规劝自己不要再违抗希特勒的决策了，并且在空军的备战指挥中尽心尽力，使希特勒在这方面无可挑剔。但他内心中对英美的恐惧有增无减，尤其是在后来战争的结果越来越无法预料时，这种恐惧更加严重。在公开场合，他往往夸夸其谈，大声叫嚷德军无敌、德军必胜。可在私下里，戈林对德国陆军在占领区的暴行则颇多微辞。也许戈林还尊崇着里希特霍芬中队的传统，试图表现得颇有中世纪的骑士风度，而把凶狠和残忍的一面藏了起来，连他的对手也承认这一点。隆美尔、曼施坦因、哈尔德等职业军人对他的做作和伪善很不以为然，他们当面不敢说什么，在背后则常常以轻蔑的语气说起他，把他说成一个对军事一窍不通的蠢货。

在德军占领华沙后，戈林受到了希特勒的特殊嘉奖。希特勒授予了他大十字勋章，即缓带上配铁十字勋章，这是一般人所不敢奢望的荣誉。爱慕虚荣的戈林当然打心眼里高兴，他着实为此兴奋了几天。尽管如此，戈林的秘密外交并没有停止。

此时他有更便利的条件了，那就是希特勒由于忙于波兰事务和制订针对西欧的“黄色方案”，将国内的大部分工作都交给了戈林，这使戈林再一次有了大权在握的感觉。由戈林控制的国防会议，那时几乎变成了新的内阁，每周都要举行几次会议，而内阁成员只有在戈林的指派下才能参加。在战争刚一爆发，英法两国按兵不动，宣而不战，即后来被称为“奇怪的战争”的那段时间里，戈林认为还有可能使英国人回到谈判桌上，便加紧同英国政府接触，甚至还委托他在墨西哥的代理人同美国总统的特使多次进行会谈，他极力使英美等西方国家相信德国不会侵犯他们的利益。1939年冬天，戈林通过他的特使向英国人暗示，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他就会成为在德国真正“说话算数的人”，希特勒将担任毫无实权的总统之类的职务。到那时，他将使德国停止迫害犹太人，让德军从波兰的“非德国领土”上撤回。在一些他认为能同英国政府说上话的人士面前，戈林一直强调德国将耐心地等待英国政府拿出和平的举动，德国的空军决不会首先袭击英国，德国愿意寻找一条能够解除两国目前的敌对状态的“通往和平”的道路。

戈林最为大胆的行动是同美国方面秘密谈判。9月上旬，戈林给他的朋友、实施“四年计划”时在美国的代理人威廉·罗德·戴维斯发出多份密电，暗示说他实际上已执掌了德国政权，希望得到美国政府的支持。他提出的条件是，假如美国政府表示支持他，他可以保证在对波兰的战争结束后，德国绝不再发起新的战争。戴维斯同罗斯福总统取得了联系，并出示了戈林的电报，得到罗斯福的批准，他作为总统特使去柏林见戈林。临行前，戴维斯给

戈林发了一份密电，告诉戈林，“罗斯福已经同意，将向你随时提供灵活的帮助。”

9月30日，戴维斯到达柏林，准备同戈林进行密谈。戴维斯来到柏林后，戈林觉得这件事肯定会被希特勒知道，那时候希特勒说不定要怪罪下来，因此，他先将情况报告了希特勒。其实，希特勒对美国人能否参战的问题，同戈林一样关心，因而对戴维斯的到来也极感兴趣。戈林先派沃尔泽特去同戴维斯会面，以便摸清他的底细。沃尔泽特回来告诉戈林，罗斯福已明确表态，只要德国从波兰撤军，美国政府就将保证德国恢复1914年前的边界和失去的殖民地。希特勒同戈林一道研究了罗斯福的建议，随后给罗斯福写了一封由他们两人亲笔签名的信，待戈林同戴维斯会谈后，让他转交给罗斯福。戈林同戴维斯进行了一次长谈，他口头答应，如果罗斯福的诺言能够兑现，他就将保证恢复捷克与波兰的独立政府。戴维斯带着希特勒和戈林的信走了，希特勒和戈林焦急地等待着罗斯福的回音，但始终杳无音信。直至战后，才有人透露，戴维斯回到华盛顿后，并没有见到罗斯福。他把希特勒和戈林的信交给了美国国务院的一名官员，这名官员不知是忘了还是没有机会或者其他什么原因，总之把这封信就压了下来。1940年戴维斯病逝前，他把这封信的事情讲给了护理他的教士听，战争结束后，这名教士才将这件事说了出来。不过，至于为什么这件事就那样不了了之，谁也说不清了。

在这一时期，瑞典人达勒鲁斯又来到了柏林。他是应戈林之邀而来的，戈林又开始打他的主意了，戈林想通过他再同英国政府进行接触。达勒鲁斯到了之后，戈林带他去见了希特勒。戈林同希特勒一道，再次提出同英国达成和平协议的条件，让达勒鲁斯同哈里法克斯取得联系。达勒鲁斯点头应承下来，并在到达柏林的第二天便同哈里法克斯联系上了，英国政府却迟迟未作任何反应。戈林等了几天，实在沉不住气，便又带着达勒鲁斯去见希特勒。戈林向希特勒建议，由他写一封亲笔信，详细地说明德国的和平条件。希特勒觉得有些不妥，可一下子又拿不出更好的主意，只好让戈林和达勒鲁斯明天再来商议。第二天，戈林和达勒鲁斯又去了希特勒那里。这回希特勒和戈林终于敲定了方案，即先由戈林同英国的艾恩赛德会谈，然后举行首脑会议，具体讨论波兰、裁军、殖民地和人口迁移等问题。德国将在波兰维斯杜拉河沿岸设立一条反苏防线，作为西欧防范共产主义的东部壁垒。希特勒对戈林说，“还得加上一句，告诉英国人，这场战争如果持续下去，必然将危及数百万人的性命，这是两国政府都必须正视的问题。”

次日，达勒鲁斯飞赴伦敦。结果是戈林的希望又一次落空了。在达勒鲁斯到达英国的第二天，张伯伦在广播电台发表了一个公开讲话，表示在德国没有做出不进一步扩张的承诺之前，英国人决不会同德国人坐到一张谈判桌上。在达勒鲁斯面前，哈里法克斯说得更加直接、坚决，那就是除非德国高层出现重大内部变动，言外之意是说除非希特勒下台，否则英国政府同德国就无话可谈。达勒鲁斯回到柏林后，将哈里法克斯对他说的话告诉了戈林。戈林沉默不语，他还不能下决心采取决定性的行动，况且他也没有这种把握。虽然他对希特勒的一些做法不满，但真要让他起来推翻希特勒，他是不愿干也不敢干的。按照戈林的想法，希特勒最好能够自己退下来，将手中的权利交给他。

戈林在达勒鲁斯伦敦之行失败后，还是不肯放弃同英国人和谈的企图。他又通过德国大众汽车公司欧洲公司的经理范斯塔特，向英国放出诱饵，即

德国愿意恢复捷克和波兰的独立。如果英国和德国达成和平协议，德国可以抛弃俄国和日本。不久，范斯塔特给戈林带来了回信，英国政府对纳粹领导人已失去信心，认为现在同德国谈判，只是徒费口舌而已。范斯塔特还暗示戈林，英国人都在期待着戈林拿出行动来。什么行动呢？戈林心里明镜一样，这对于他来说风险太大了，何况他并不愿意那样。戈林见自己的努力一次次失败，只得又将达勒鲁斯找了回来，让他再去一次伦敦。达勒鲁斯十分为难，可碍于老朋友的情面不好拒绝，只得答应下来。戈林再一次告诉达勒鲁斯，他可以提交具体的关于解决波兰问题的建议，供双方讨论。同时他也强调，元首不可能在捷克问题上作出什么让步。达勒鲁斯此行还是一无所获。

进入 1939 年冬季，戈林同英国之间的几条秘密联络渠道先后都断了，戈林只好暂时放弃争取英国人的努力，一心一意帮助希特勒制定进攻西欧的“黄色方案”。

戈林对实施“黄色方案”的信心极为不足。尽管空军在对波兰作战时，将波兰 500 架作战飞机中的绝大部分炸毁在机场上，并将其所有的地面设施一举摧毁，但是，戈林自己清楚，这次大获全胜绝对是由于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并非由于德国空军拥有多么强大的战斗力。戈林对德国空军能否完成按照“黄色方案”的部署所应担负的重要使命，没有一点把握。对陆军方面的作战能力，戈林也不无担忧。作为陆军元帅，他对目前德军的装备情况非常了解，他知道陆军的情况并不比空军好多少。希特勒本打算在波兰战事一结束，马上就对法国开战，但受到了陆军高层将领的一致反对，因为那时陆军在军火供应、装备维修等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问题。主管钢铁生产的托玛斯将军向希特勒报告说，如果所有的军工厂都满负荷工作的话，那么钢产量必须每月增产 60 万吨。施图尔纳将军则报告说，陆军现存的军火只够 1/3 的部队半个月之用，而要想在半个月之内打垮法国显然是不可能的。希特勒根本不想听到这些，他把这几位敢于直言相谏的将军痛骂了一顿，使得陆军司令部的将军们再不敢说三道四了。这些情况戈林都了解，他提醒自己不能再做令元首讨厌的“老妇人”了，最好什么都不说。然而，不走运的是，一个偶然的事件又使希特勒对戈林发火了。

在 1940 年 1 月初的一天，希特勒把戈林找去商议有关实施“黄色方案”的细节问题。最后，两人敲定在一周后实施“黄色方案”。可就在那一天，空军的一架传送邮件的飞机出了故障，在比利时迫降。机上的一名空军情报官严重地违反了保密规定，随身带着绝密的关于“黄色方案”的详细文件。比利时的警察和军队将飞机包围，并搜查了飞机和机组人员。事后，这名情报官向德国驻比利时的武官报告说，在飞机迫降后，他已将这份文件烧毁。戈林最初听到这一消息，心急如焚，因为这份文件一旦落到比利时人手中，必然要使“黄色方案”流产。后来接到文件被焚的报告，他又长出了一口气。然而，没有几天，比利时的一家报纸声称这份文件并没有被毁掉，而是让一名比利时军官从火中抢了出来。戈林顿时乱了方寸，如果比利时报纸说的是事实，希特勒第一个怪罪的人肯定是他。在前几天，希特勒就曾对空军中存在的军纪涣散、作战分析无人过问等问题提出过批评，戈林当时还向希特勒保证，空军在实施“黄色方案”的行动中决不会出现任何纰漏。才隔了几天，就出了这么严重的一件事，让他怎么向希特勒交待？戈林在寓所里丧魂落魄，情急之下，竟使出了笨招，让人拿了一些文件扔进火炉中，试验文件烧起来的速度究竟有多快。他还让人请来一位星占家，测算文件是否已烧掉了。

星占家让戈林不要担心，说那份文件早已不存在了。不管戈林这边怎么忙活，都不能妨碍希特勒过问这件事，不出戈林所料，希特勒向他大发雷霆。戈林百般解释，就是不能平息元首的怒气。虽然希特勒没把戈林怎样，但将出事的空军第 2 军的军长和参谋人员撤了职，他内心对戈林的不满又重新被唤起。希特勒执意要将实施“黄色方案”的时间推迟，戈林有苦说不出，只能俯首听命。

接着，又发生了几起比较严重的泄密事件。比如，在比利时事件过去后不久，戈林的研究所多次截获意大利同比利时之间的往来密电，发现电文常常涉及“黄色方案”实施的时间。从电文内容分析，纳粹上层出了一个叛徒，他将希特勒每一次推迟实施“黄色方案”的时间，都透露给了意大利驻柏林的武官马拉斯，再由意大利外长齐亚诺向比利时和荷兰驻罗马大使馆的武官转达。这个人究竟是谁，不得而知。希特勒对此大为恼火，他对戈林和陆军总司令布劳茨说：“我坚信我们将取得胜利，但是如果不学会保密的话，那就什么都谈不上了，我们就将输掉这场战争。”

在“黄色方案”推迟实施的这段日子里，戈林又同希特勒发生了冲突。戈林坚持要把比利时和荷兰列为“黄色方案”的目标，因为德国一旦同英国直接交战，比利时和荷兰的机场就是德国空军轰炸英国时最理想的基地，希特勒却不愿马上将战火烧至中立国家。戈林力陈占领比利时和荷兰的理由，希特勒一直没有同意。最后，还是空军参谋长耶顺内克说动了希特勒，“黄色方案”最终将比利时和荷兰也包括进去了。让戈林和希特勒感到吃惊的是，“黄色方案”将比利时和荷兰列为进攻目标的消息，很快又被泄露出去。因此，指望打闪电战的德国人只得把动手的时间一推再推。

当然，“黄色方案”推迟实施的原因不仅仅是泄密，从内部情况来看，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国内生产能力不足；从外部环境来看，英国人那种不友好的态度，对德国人来说也是一种压力，至少使他们不能无所顾忌地行动。希特勒等人认为，这时，不仅要考虑如何摧毁法国，同时也要考虑给英国人以沉重打击，免得他们总是指手划脚、跃跃欲试。于是，在各种公开场合，戈林都指责英国人无端地对德国怀有敌意，并说英国参战的唯一目的就是要消灭德国。在一次同路德主教贝格拉夫的谈话中，戈林听这位主教说他刚从英国回来，感觉到英国人并不像官方所说的那样对德国人深恶痛绝，一下子来了兴趣，忙问主教：“那你认为我们没有必要对英国人作战了？”主教不语，默认了这一点。戈林接着说：“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同英国人谈过，他们坚持要我们先接受他们的先决条件才能谈和平问题。但是，英国人提出的那些条件是我们所无法接受的，他们居然让我们从捷克和波兰撤走。这正是我们讨价还价的筹码。”主教问戈林：“元帅先生，请问胜利与和平您到底要哪一个？”戈林不假思索地说：“当然要和平。”主教一愣，戈林好像要掩饰什么地笑着补充说：“我更想先取得胜利。这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同英国人拼到底，但是，为了少让他们多嘴多舌，有必要狠狠地教训他们一下。”戈林说到这里，突然激动起来，他站起来对主教说：“我真不明白，这群英国人为什么要这样顽固不化，难道他们以为我们要消灭大不列颠帝国吗？”

为了维护自己在公众面前的形象，戈林还利用大战前短暂的平静，做了几件事。首先，他强调严明军纪，严禁德军在占领区胡作非为。有一次，一名德军强奸了驻地的妇女，戈林下令就在受害妇女所在的那个村庄绞死罪犯。空军中尉、纳粹分子希施费尔德酗酒，无故枪杀了几名波兰囚犯，戈

林主张将他处以死刑。戈林认为，德军在占领区的暴行对德国是不利的，甚至是一种潜在的威胁。在严明军纪的同时，戈林也想让人们看到他是一个爱护士兵的仁慈的人。一天夜里，三名士兵在外面喝醉了酒，很晚才回营房。值班的军官让他们出示身份证，他们却跑掉了。空8军长官里希特霍芬把他们交给了陆军司令官，行刑队以违抗命令罪处死了他们。戈林听说这件事后，非常生气，他派人把作出决定的两名将军找来，训斥他们说：“你们不仅有责任维护纪律，还有义务照顾好手下的士兵，可你们却在我们需要人材的时候抛弃了这三名空军士兵。”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黄色方案”已后延了几个月。在这一阶段，戈林受希特勒的委托，对德国经济作了全面整顿，以便使生产进入战时轨道，为发动对西欧的闪电战作好准备。与此同时，戈林多次出面主持军事会议，讨论“黄色方案”的每一个细节。为了弥补物资的匮乏，戈林下令利用捷克和波兰两地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声称要把捷克和波兰变成德国的粮仓，要把这个地方的废钢铁、旧橡胶和皮革等等，统统集中起来，运往德国。他还给纳粹的傀儡——波兰总督汉斯·弗兰克下令，不许他从波兰其他地方调运任何东西。按照希特勒的意思，戈林向弗兰克建议，波兰政府应该有秩序地接受德国一些省份的犹太移民。戈林对自己近期内的成就沾沾自喜，他以为希特勒肯定会对他满意的。然而，没有想到，戈林的自尊心又一次受到了挫伤。3月2日，戈林收到德国进攻挪威的作战计划，有些生气，因为希特勒在此之前根本就沒同他商量。在随后的几次会议上，他一再攻击这份由陆军方面制订的挪威计划。希特勒对戈林的表现心生反感，干脆通知戈林不要再参加后面的军事会议了。戈林见状，只得敛声屏气，不敢再说什么了。

3月30日，戈林的研究所截获了一份芬兰驻巴黎大使馆发往赫尔辛基的电报，电报中透露，英国组织了一支远征军，准备占领挪威北方的纳尔维克港口，这是挪威向英国出口铁矿砂的唯一的港口。戈林迅速向希特勒通报了电报内容。当天，希特勒下令，德军立刻采取行动。4月2日，第一批进攻挪威的德军乘坐3艘伪装成英国轮船的运输舰，秘密驶往纳尔维克港。第二天，由10艘驱逐舰组成的舰队也出发了。几乎就在同一时刻，英国的远征军也登上了开往挪威的几艘巡洋舰，并先于德国人到达了目的地——纳尔维克港。

4月9日，德军入侵挪威和丹麦。在武力进攻的同时，纳粹德国先是通过外交部向这两个国家发出最后通牒，声称德军要援助这两个国家，以使它们免受英国入侵，希望这两个国家不要进行抵抗，否则将要受到严惩。看来恐吓奏效了一半，丹麦政府在德军一进入他们的国家就宣告投降。但是，挪威政府则明确地告诉德国人，他们绝不会投降。这样，德军便开始以强硬的手段对付挪威。戈林的空军一马当先，显示出了威力。德军的伞兵在挪威守军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便占领了挪威的几个主要机场。空军则对每一个被英国远征军占领的村庄进行了猛烈的轰炸，使英国远征军溃不成军。进攻纳尔维克港的德军却遭到挪威守军意想不到的抵抗，陷入重围。为了解救纳尔维克港的德军，希特勒让戈林同瑞典政府商谈，允许德国经其领土运送军事物资。瑞典政府派海军司令法比安·塔姆中将出面处理这件事，这位海军中将很干脆地对戈林说：“瑞典政府不允许任何国家通过它的领土进行军事方面的行动，必要时，瑞典将以武力保卫自己的边疆。”戈林马上问道：“那么这也意味着包括英国在内吗？”塔姆义正辞严地回答道：“包括任何

企图以武力通过瑞典边界的人。”这条路被堵死了，戈林采取紧急空运的方式缓解了危机。4月底，挪威的大部分地区都已被德军占领。这一事件的前前后后，戈林和他的空军出尽了风头。戈林以功臣自居，大有不可一世的派头，甚至把自己看成了拿破仑式的人物。一天，戈林在他的专列上对着镜子练拿破仑的手势时，恰好被冯·瓦尔道上校撞上了。上校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不能理解，纳粹德国的第二号人物居然会浅薄到这种地步。

丹麦和挪威被占领后，5月1日，希特勒命令戈林，让整个空军做好实施“黄色方案”的准备。5月4日，戈林派他的专机把米尔希从挪威接回德国，以便让他留在柏林负责处理空军的其他事务，自己则亲赴前线指挥空军实施“黄色方案”。戈林认为，既然“黄色方案”中的空军行动部分是在他的过问下确定的，就理所当然应由自己抛头露面、指挥实施。但是，尽管空军在挪威战役中的表现使戈林在希特勒心目中的形象有所改善，希特勒仍然不愿意让戈林插手西欧事务，因为这一切对于希特勒和纳粹德国太重要了，希特勒不放心任何人。希特勒没让戈林去西线指挥，但却让他留在柏林替代自己行使元首的权利，这对于不甘寂寞、急于表现的戈林来说，也算是一个安慰。

1910年5月10日拂晓，当太阳将从地平线升起的时候，约4000架纳粹德国轰炸机和战斗机，进入法国、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对这些国家重要的防空设施和军事目标一通狂轰滥炸，为从地面向这些国家推进的136个步兵和装甲师扫清了道路。

这一天，戈林特意换上了一套白色的夏季元帅制服，戴着 he 最喜爱的几枚戒指，神气十足地来到设在柏林郊外的空军司令部，同空军主要将军们会合，遥控前方部队的行动。在此后的5天里，戈林始终呆在空军司令部里。每天，米尔希将军都带着他亲手拍摄的作战照片向戈林汇报空军的战绩。在开始实施“黄色方案”的第二天，德国空军就已击毁了1000多架敌机。在法国的色当，布鲁诺·勒歇泽率领的空2军给海因茨·古德里安将军的装甲部队以有力的空中支持，使这支部队势如破竹，迅速挺进。戈林恨不得每一次都亲自将空军的捷报交给希特勒，他每天都同在前线的希特勒取得联系，随时向他的元首报告空军的战绩。如同挪威战役一样，戈林的空军对地面战斗的胜利再次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5月14日，德军在对鹿特丹的进攻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抵抗，戈林命令空军猛烈轰炸鹿特丹。戈林坚信，荷兰人只要领教一下他的空军的威力，就会马上束手就擒的，去年在华沙就是这样。其实，就在戈林下令轰炸鹿特丹时，荷兰政府已经准备同德国围城部队接洽，商谈投降事宜。还没等荷兰代表带着投降书进城，纳粹的轰炸机已出现在鹿特丹上空，这座古老而又美丽的城市顿时陷入火海之中。这是纳粹空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犯下的又一次屠杀和平居民的罪行。事后，戈林为这次行动辩解说，鹿特丹不是一个不设防的城市，荷兰军队正在坚守，“况且，我事先并不知道投降谈判正在进行”。他不屑于再多作解释了，他想起了当年高卢人在攻破罗马城时说的一句话，“战败的人就得死”！今天的荷兰人不像当年战败了的罗马人吗？

不到一周的时间，法国军队就已经全线崩溃。5月15日，新任英国首相的丘吉尔接到了法国总理雷诺的电话，在电话中雷诺惊慌失措地对丘吉尔说：“我们将要战败了！”5月16日，德国军队突破色当防线，法国北部的英法联军及比利时部队共22个师陷入重围，法国失败的命运已定。19日，

戈林请来瑞典驻巴黎总领事，希望他给法国政府带去投降的建议，并说，他可以代表纳粹德国“同意法国合理的条件”。事后，他向希特勒汇报了这件事，希特勒对他的作法表示赞许。为了继续向法国人施加压力，第二天上午，戈林在他的专列中下令轰炸巴黎周围的机场。他拿着电话，声嘶力竭地对空军参谋长大吼：“耶顺内克，让我的空军遮住天空！”然后很拙劣地做了一个手势——他所认为的拿破仑的那种手势。

5月23日，戈林亲赴前线，亲手将8枚骑士十字勋章交给空降部队司令官，让他授予有功的将士。

就在这一天，英国远征部队抛弃了他们的比利时和法国盟友，向英吉利海峡方向撤退，逃回本土。这时由古德里安指挥的装甲部队已开到离英吉利海峡仅有50公里的地方，并占领了布伦，包围了加莱，使得英国人完全无法利用这两个重要的港口。现在，英国远征军只有从敦刻尔克渡过英吉利海峡了。24日，法国和比利时原来驻扎在法国北部的军队也逃到这里。这样，大约有40万英、法、比军人挤在一个不到70英里的三角形地带，而且眼前没有任何突围的希望，从四面八方赶来的德军将这里围得水泄不通。德国陆军将帅们都在摩拳擦掌，准备大开杀戒。但是，5月24日晚，陆军前线指挥部接到了希特勒一个奇怪的电话，命令他们原地待命。英国人意外地得到绝好的喘息机会，求生的欲望驱使他们创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一个奇迹，即在短短的几天时间里，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运输工具，成功地将几十万军队撤到英伦三岛。二战开始以来德军最严重的战略错误终于铸成，这个错误荒唐得别说德军将领不能理解，就连英国人都不敢相信。

后来才搞清楚，希特勒出现如此重大失误的根源就在戈林身上。希特勒对德国陆军一直怀有戒心，“黄色方案”越是接近成功，希特勒对陆军种种的忧虑越是加深，戈林深知希特勒的心事。当德国陆至横扫西欧大陆时，他对希特勒说，如果征服欧洲的全部功劳都被陆军抢去的话，希特勒的威望就会受到损害，同时在陆军中也就可能出现新的不稳定因素。为了避免上述情况发生，可采取的唯一办法就是用空军去进行决战，而不是用陆军。从表面上看，戈林是为元首着想，说穿了，这是他的一个诡计。好大喜功的戈林不愿意眼看着陆军把风头出在前面，他要为自己的空军争取到参加最后决战的机会，而且最好能一战定乾坤，从而将头功据为己有。

5月25日上午，戈林在电话中对希特勒夸下海口，说他的轰炸机群将把敦刻尔克变成一片火海，一举全歼困在那里的敌军。希特勒相信战争已近尾声，后面的问题可以很轻松地解决了，所以，他明确地表示同意由空军去结束战斗。当天晚上，戈林神气地对米尔希说：“我们的空军将肃清英军。我已说服元首，停止陆军的进攻。……元首让我们给他们一次永远难忘的教训，”戈林让米尔希通知空军有关部队，立刻作好消灭敦刻尔克敌军的准备。同希特勒一样，戈林也认为胜利就在眼前，战争基本结束，放松下来之后，收藏艺术品的嗜好便开始缠绕着他。在向米尔希下达命令的第二天，戈林在勒歇泽和乌德特的陪同下，乘飞机察看了鹿特丹遭受破坏的情况，然后由陆路前往文物和艺术之城阿姆斯特丹，戈林此行的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以最“合适”的价格“购买”一些文物和艺术品。果然不虚此行，他拿回了一批珍贵的“小玩意儿”。心满意足的戈林回到希特勒的大本营，煞有介事地汇报空军在敦刻尔克进行的“歼灭战”的“战果”，他对希特勒说：“只有渔船来救英国人，希望英国大兵能够游回家乡。”

实际上，戈林的空军由于天气恶劣未能及时出动，在天气好转的时候又遭到英国皇家空军的拼命般的攻击。尽管德国空军也炸沉了一些英国的船舰，使港口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但离戈林所说的全歼英法联军的目标还差得很远。从5月27日到6月4日，从德军的鼻子底下撤出了33万多英军。戈林自然不相信会撤出那么多英军，他坚持说能够死里逃生的敌军的数量是微不足道的，陆军所报告的情况，完全是出于对空军的妒嫉的夸大其辞。

戈林和希特勒对战争的乐观估计也不是没有根据的。此时，法国的两位在一战中战功显赫的将领——贝当元帅与魏刚将军已经准备投降了，而这两个人现在正是法国政府的领导人。剩下的就是英国人了，戈林和希特勒都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英国人就会乖乖地坐在谈判桌前同德国人议和。在对目前欧洲形势的看法上，他们没有分歧。

正是：虎狼同生害人心，奸盗共做如意梦。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 第十七章 不列颠战役

征服法国旧仇报，帝国元帅盛装披；  
对英空战受重创，身心俱损图再起。

话说戈林的虚荣和疏忽使得大部分英军逃出了敦刻尔克，希特勒却并没有责怪他，这是因为希特勒和其他纳粹领导人正沉浸在战胜西欧各国的喜悦之中。希特勒最强烈的念头就是他为德国人报了仇，终于让曾经不可一世的法国人也尝到了战败的滋味。

在德军的猛烈攻击下，法国的陆军和空军已近瓦解，几乎失去了作战的能力，更不要说同有备而来、势头正猛的德军较量了。由贝当元帅和魏刚将军领导的法军最高统帅部，已经决定不再同德国人对抗下去了，而是要走求和这条路。德军在6月初潮水般地涌向法国，沿途没有遇到有力的抵抗。6月10日，法国政府撤出巴黎，逃到了波尔多。4天后，冯·库希勒将军率领的德军第18军团开进了巴黎这座充满传奇色彩的历史名城，埃菲尔铁塔上飘舞着纳粹的卐字旗。6月16日，雷诺辞职，贝当接任总理。贝当在任职的第二天，就向德国提出了停战的请求。希特勒同意这一要求，但要法国人在康边森林同德国人进行停战谈判，那里正是第一次大战结束前，德国人在投降协议上签字的地方，当年作为停战协议签订场所的英法联军统帅福煦的专列还在，那里已变成一个永久性的纪念场所。希特勒特意将那里选作谈判场所的用意是很明显的，他就是要复仇，要雪耻，要狠狠地羞辱曾羞辱过他们的法国人。

在法国要求停战的当天晚上，戈林举行了一个酒会庆祝胜利。在他看来，法国投降，实际就意味着战争结束，英国人迟早会接受德国人的和平条件而退出战争的。在酒会进行当中，一名副官给戈林送来一份材料，他打开一看，是米尔希在视察前线之后写的书面报告，米尔希报告说，即将成批生产的容克88轰炸机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希望能够引起戈林的注意。戈林现在对此毫无兴趣，因为战争已经“结束”，即将面对的只能是凯旋与荣誉，而不是改进轰炸机的质量。

6月21日，戈林和希特勒一道参加了在康边森林中的福煦专列上举行的停战仪式，随行的还有勃劳希契、雷德尔、里宾特洛甫、赫斯等人。在步入康边森林时，希特勒走在最前边，戈林紧随其后，他没有忘记拿着那把象征权力和威严的元帅手杖。希特勒一行在一块林间空地中停了下来，所有人的目光都被一块大约3英尺高的石碑吸引住了，石碑上写道：“1918年11月11日，德意志帝国在此屈膝投降——被它所企图奴役的人民所击败。”原来，这是一块铭刻着德国人在一战中的罪恶和耻辱的不同寻常的石碑。希特勒等人在石碑前默默地站了一会儿，人们为希特勒的面部表情所震动——那是一种交织着仇恨、屈辱和蔑视的复杂表情。同时，也有人注意到了戈林的反应，他似乎没有理会希特勒的表情，胖脸上一直是一付洋洋得意的神情，也许他正在盘算着下一步希特勒会给他什么奖赏，会不会是他渴望已久的至高无上的军衔——帝国元帅呢？

法国人尽管还想就德国人拟定的停战协议上的某些条款讨价还价，但希特勒用他所惯有的那种最蛮横的方式——威胁对方如不接受全部条款，德国人就将用大炮来说话，胁迫法国人最终在协议上签了字。就这样，在正式开

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号称欧洲大陆第一军事强国的法国，便俯首称臣，沦为德国的附属国。

在法国宣布投降后的第三天，戈林乘坐他的专列“亚洲号”回到了柏林。临行前，希特勒告诉戈林，他将在国会发表讲话，向英国人提出颇为大度的和平建议。希特勒和戈林都坚信，在法国投降之后，只要给英国人开出合适的条件，英国人就会同他们握手言和。在进攻波兰前后的日子中，他之所以对戈林同英国人幕前幕后上演的那一出出和平闹剧，基本采取不闻不问的观望态度，就是因为他也认为最终可能要走同英国人议和这条路，也就是说他同戈林的想法有相同之处，只不过是在时机和方式的选择上有所不同。希特勒认为，同英国人坐下来议和的最佳时机是在法国被彻底打败之后，而不是相反。只有让傲慢的英国人看到纳粹德国的力量，尝一尝德国坦克和飞机的厉害，他们的气焰才会低落。在西欧战争结束后不久，希特勒在同墨索里尼会谈时，大谈大英帝国在欧洲存在的必要性，甚至说，他不想让英国人作出任何牺牲，只要求英国人能够承认德国人在欧洲大陆的霸权。希特勒在取得征服欧洲大陆这一巨大的胜利之后，轻易不想再冒险了。戈林内心不得不佩服元首又比自己棋高一着，因为此时同英国人谈判自然要比战前有利得多。

不过，戈林毕竟同英国人打过多年交道，知道英国人不是太好对付的。于是，他提醒希特勒，英国人也许不会那么顺利地接受和平建议，他们虽然可能会允许德国保留阿尔萨斯和洛林以及波兰走廊，但肯定要在波兰主权和西欧问题上同德国人发生争议。希特勒以轻蔑的口吻对戈林说：“看不出英国还有同德国继续作战的必要。我只要求英国人交还我们在一战前的殖民地，只要求英国人给我们在欧洲大陆上充分的自由，而对英国人在海外的事务，我们也将给予充分的自由。另外，英国同波兰、法国不同，他们可以体面地同我们议和。在这样的条件下，英国人如果还要拒绝我们的和平倡议，那就简直太不可思议了。”希特勒说完这番话之后，又对戈林说，他准备晋升戈林为帝国元帅。戈林一听，不由得激动万分，感激涕零，语无伦次地对希特勒说了一些感谢栽培和发誓效忠的话。

回到柏林后的戈林趾高气扬。几天来，他一直在煞费苦心地琢磨选用哪种布料做元帅服。手下的人给他送来了许多不同质地不同颜色的布料，戈林最后选中了一种珍珠灰色的软面料，并命令他的副官罗伯特将这种布料立即送到裁缝那里去。罗伯特拿着布料踌躇着没有离开，戈林诧异地问：“还有什么事？”

“这是女人的面料。”罗伯特小声嘀咕了一句。

“什么？如果我穿上，那就是男人的面料。”戈林蛮横地大声叫道。

戈林知道了希特勒对英国问题的真实想法后，就完全放下心来，对旨在虚张声势胁迫对方就范的代号为“海狮”的入侵英国的计划不再过问。戈林认为，对付英国人，以武力恐吓要比动用陆海空三军力量实施入侵更为合适。正是基于这种想法，戈林从没让他的空军参谋部拿出一个针对英国的真正有意义的军事计划。况且，教皇和瑞典国王正在从中斡旋，在英德之间充作调停人。这时候戈林根本就不关心英德两国会不会重新开战，他想的最多的就是怎样使他的帝国元帅头衔尽快到手。6月上旬，德国政府通过多种渠道敦促英国人同他们议和。但是，丘吉尔接连在不同的场合申明英国的态度——“德国必须用事实而不是空话作出确实的保证。它必须保证恢复捷克斯洛伐克、波兰、挪威、丹麦、荷兰、比利时，特别是法国的自由和独立的生活……”

希特勒对丘吉尔的谈话很不以为然，他认为丘吉尔只不过是做做姿态而已，他所能做的也只有这种政治家的夸夸其谈。戈林提出，在目前僵持不下的状态下，空袭英国的海上生命线可以迫使英国政府接受他们的意见。希特勒表示同意。从6月下旬开始，戈林命令空军飞行中队开始小规模地空袭英国的港口，特别是军港。同时，戈林明确规定，飞机绝对不能轰炸内地城镇，他不愿意扩大事态。

7月19日，希特勒在国会上发表了针对英国问题的讲话。事前，希特勒并没让戈林看他的讲稿，这使在这些事情上极为敏感的戈林有些不快。不过，希特勒随后正式发表的授予他为帝国元帅的任命，使他的不快烟消云散了。作为帝国元帅，他现在已是欧洲乃至全世界级别最高的军官。希特勒在公布了对戈林的任命之后，又宣布授予勃劳希契等12人元帅军衔。

国会会议结束后，戈林急急忙忙赶回家中，照着镜子试穿早已准备好了的华丽的元帅服，然后特意穿着它去了总理府。在总理府，希特勒将一个镶嵌着钻石和蓝宝石的盒子郑重地交给了他，里面装着一份羊皮纸制成的帝国元帅委任状。戈林欣喜若狂，一再对希特勒表示感谢。此后，他便时不时将这个盒子摆到办公桌上，对人讲这是元首送给他的最珍贵的礼物。7月21日，戈林在卡琳庄园举行酒会。酒会上高朋满座，热闹非凡，戈林春风满面地同客人大声寒暄，每一个参加酒会的人都能感觉到，他心中充盈着掩饰不住的得意。

戈林在被任命为帝国元帅的第二天，邀请刚获元帅头衔，同样情绪高昂的凯塞林和米尔希到卡琳庄园讨论对英国的空战计划。戈林谈到，因为英国拒不接受元首提出的和平条件，元首授权他指挥对英决战，他的空军将在最近一周内对英国进行战略性轰炸。他指示德国空军现在将英国商船也要列为攻击的目标，扬言“将以激烈的进攻扰乱其整个国家”。这次戈林并没有涉及具体的行动方案，他要等希特勒最后拿主意。

7月22日，英国外交大臣哈里法克斯代表英国政府正式发表谈话，言明决不接受希特勒的和谈建议，并向全世界宣告英国将同纳粹德国血战到底。这样一来，同英国人作战就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但是，迄今为止，德国海陆空三军均未考虑拿出实施入侵英国的“海狮计划”的详细意见来。希特勒责成德军统帅部抓紧讨论这件事，可还是迟迟未能形成具有实战意义的方案。最后，希特勒宣布，他计划再观望一下此前为期10天的“猛烈空战”的结果。戈林在布置他的空军猛烈轰炸英国各个战略目标的同时，也没有放弃同英国人的秘密接触，他想软硬兼施，尽快达到目的。

然而，空战没有产生戈林和希特勒所期望的结果。由于希特勒对德国空军的行动作了许多限制，如禁止夜间轰炸、禁止轰炸民用目标、禁止轰炸伦敦等等，就使得空军无法在英国人面前显示如戈林所说的那种“真正的力量”。戈林认为这是希特勒的一个战略错误，但又不敢同希特勒争辩。另外，他还有一个不便与外人道的心病，那就是作为主战飞机的双引擎Me110和Mc109战斗机，在空中格斗的机敏性和燃料的携带能力方面，都差强人意。更糟糕的是，戈林发现英国空军不但没有被摧毁，反而战斗力日益增强。他本指望利用德国空军在数量上的优势，一举摧毁英国所有的战略目标，给英国人以毁灭性打击，可希特勒一再要求再等一等看一看，就在这要命的等待中，英国空军的力量眼看着一天天壮大起来。直到8月1日，希特勒才下令，让戈林“在空战中彻底消灭英国空军”，可又附加了一个指示，那就是严禁

对英国进行“恐怖性的空袭”。

8月6日，戈林再次将凯塞林、米尔希等人召到卡琳庄园，研究对英空战的一些具体问题。他首先向凯塞林等人传达了希特勒的最新指示，要求空军独自承担同英国作战的任务，要继续打击英国的军事目标，尤其是要消灭英国的空中力量。在戈林的提议下，这一新的行动计划被称为“鹰计划”，开始行动的那一天被称为“雄鹰之日”。会后，空军司令部按照戈林的指示，讨论了“鹰计划”的全部细节。戈林在向希特勒汇报时说，他相信他的空军在4天之内就会打垮英国人，从而迫使他们坐到谈判桌前。实际上，早在7月间他就向陆军的一些将领说过这样的话。

就德国空军的实力而言，戈林所说的并不完全是大话。德国空军此时共有战斗机和轰炸机2000多架，而英国能够起飞作战的飞机最多也就在700~800架之间，就数量而言，双方确实不可同日而语。

8月12日，戈林下达了第二天正式实施“鹰计划”的命令。同一天，德国空军出动了大批的轰炸机，在强大的战斗机群的掩护之下，对英国机场和雷达站进行了狂轰滥炸，目的就是迫使英国剩下的飞行中队升空同德国空军决一死战。13日，德国空军以凯塞林的第二航空联队为主力，先后出动了1500多架次飞机轰炸英国皇家空军的机场。但是由于气候恶劣，能见度极低，加之英国空军的拼死抵抗，战果并不理想。

14日，希特勒在总理府给新晋升的元帅们训话，戈林也在此列。希特勒说，“‘海狮计划’仍然只能被看成是一种威慑措施，它只有在其他压力无效时才能真正付诸实施。”戈林听后，心里很不舒服，因为这说明希特勒对戈林指挥实施的“鹰计划”已没有什么信心了。当天晚上，戈林将米尔希和其他两位空军元帅召到卡琳庄园，对他们大发雷霆，指责他们无能，并让空军在第二天进行“决定性的攻击”。

8月15日，德国空军几乎出动了所有的飞机。在英国的南部海岸，德国空军战果辉煌，炸毁了4个飞机制造工厂和5个战斗机机场。但在东南部海岸，德国的第5航空队却遭到了沉重的打击。戈林本以为英国的东南沿海是英国空中防御的空档，不料在这里德军遇到了英国皇家空军7个战斗机中队的拦截，第5航空队出击的轰炸机和战斗机被击落了30架，而英国人却无一损伤。英国人的胜利要归功于他们的雷达和扇形站。每当德军飞机一起飞，英国人的雷达便发现，并将它们的航线清楚地显示出来，然后再让战斗机群在最有利的时间和地点予以拦截。而如同地面控制中心的扇形站则根据雷达、地面观察站和侦察机提供的综合情报，用无线电指挥空中战斗机作战。戈林在8月12日命令德国空军猛烈地攻击了英国的雷达站之后，不知是忽略了雷达的作用，还是对之束手无策，总之放弃了这种攻击。在德国空军今天受挫后，戈林还是说：“我对继续攻击雷达是否还有意义是有疑问的，因为受到攻击的雷达站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失去作用。”

在此后几天的空战中，德国空军虽然在数量上占据优势，但却始终没有取得决定性的战果。在8月17日的空战中，德国空军又损失了71架飞机，而英国皇家空军仅损失了27架。尤其让戈林恼火的是，曾在波兰战役和法兰西战役中令敌军闻风丧胆的斯图加特式俯冲轰炸机，在英国人的喷火式和飓风式飞机的攻击下竟毫无还手之力，在这种情况下，戈林只好命令不要再出动这种飞机了，这样一来，德国空军的力量就差不多削弱了1/3。8月19日至23日，由于天气的原因，德国空军没有出动。在此期间，戈林同米尔希等

人研究了对英国作战的情况。戈林指出，“我们对英国的空战已经进入了决定性的时期。需要重申的是，我们的目标仍然是消灭英国的空军，头等目标就是消灭英国人的战斗机。”凯塞林提出了英国雷达和扇形站的问题，认为德军空战失利的原因就在于此。戈林当即下令在 24 日对英国的扇形站施行一次彻底的打击。

8 月 24 日，德国空军再次大规模出动，集中攻击了设在伦敦四周各机场的扇形站，并取得了重大战果，此举无疑对破坏英国的空中防御系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使战争形势迅速向有利于德国人的方向发展。

8 月 24 日至 9 月 6 日，恼羞成怒的戈林竟然命令德国空军每天出动 1000 多架次飞机。在如此重击之下，英国的空中力量已濒临崩溃的边缘，2/3 的作战飞机被德军击落，更为严重的是富有战斗经验的飞行员大部分阵亡或受伤。“局势已对空军不利，……人们感到十分焦虑。”丘吉尔这样写道。如果德国空军的进攻重点继续放在英国空军上，那么不出几个星期，英国就将陷入失去空中防线的险境。但是，从 9 月 7 日起，德国空军的打击目标转向了伦敦等一些城市，大空战出现了转折，英国空军得救了！这已是大战开始以来，英国人第二次绝处逢生了。

戈林为什么突然下令改变进攻目标，从而再次犯下致命的战术错误呢？这要从前几天发生的事情说起。

8 月 23 日深夜，几架德国轰炸机在轰炸伦敦附近的一个军事目标时，由于航向有误，飞临伦敦上空，将几枚炸弹投到了市中心，致使一些民房被毁，一些无辜的居民被炸死。英国人认为这是德国人蓄意所为，应该予以报复。第二天晚上，英国出动由 81 架飞机组成的机队轰炸了柏林。由于那天柏林上空浓云密布，再加上柏林城防的高射炮火极为猛烈，一部分英国飞机根本就没有找到目标，柏林的物质损失可以说是微乎其微的，但对士气的打击却是不容忽视的，这毕竟是柏林第一次遭受飞机轰炸，柏林人为此受到极大震动。在战争开始时，戈林曾在一次集会上夸口说，他的强大的空军的存在，会使柏林固若金汤，不会受到任何空中的攻击。柏林人相信了他，事实却使他们失望了。戈林也感到再这样下去，他将在民众中失去威信。最令他担心的还是，希特勒会再次对他产生不信任感。他已发觉，那些对他怀有敌意的政敌，非常想借此机会在元首面前攻击他。并不是戈林胡乱猜疑，这件事的确使希特勒怒火中烧。轰炸结束后，希特勒立刻把戈林召到总理府，命令他制定一个大规模报复的计划，准备对英国各主要城市进行攻击。而何时实施这一报复计划，还要听候他的命令。

8 月 28 日夜晚，英国皇家空军派出了更多的飞机轰炸柏林，并且“第一次在德国的首都打死了德国人”。据官方统计数字，这次空袭炸死了 10 人，炸伤 29 人。在此后的一周里，英国空军接连不断地夜袭柏林。英国人这样做，已不仅仅是为了报复了，更重要的是要唤起德国人的幻灭、疑虑以及厌恶战争、渴望和平的情绪，他们的目的基本达到了。

英国人的行为激怒了希特勒，他命令戈林作好月底报复英国人的准备。但直到 9 月 4 日，不准空袭伦敦的禁令仍未解除，虽然此时英国空军已轰炸柏林六七次了。9 月 6 日，希特勒下令取消长达一年之久的禁令，戈林却又犹豫了。他绝望地想到，轰炸伦敦，就意味着彻底失去同英国人议和的可能，也就表明他几年来在英国人身上花费的功夫付诸东流。空军中的几位将领，发现戈林在接到元首的命令时，一反前些天那种恨不得立刻将伦敦夷为平地

的态度，显得十分犹豫。执行轰炸任务的冯·里希特霍芬将军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今天下午命令轰炸伦敦。希望帝国元帅立场坚定，但我对此表示怀疑。”

在最初的犹豫之后，戈林宣布他将亲自指挥空军对英作战。9月7日，他乘火车抵达临近英吉利海峡的小城德律奇。在那里，戈林命令轰炸伦敦的机群起飞。在凯塞林元帅和勒歇泽将军的陪同下，戈林边目送着乌鸦群一样的轰炸机飞过英吉利海峡，边狞笑着对凯塞林和勒歇泽说：“不知道今天晚上伦敦歌剧院上演的是莎士比亚的什么作品。”那天夜里，380名伦敦市民死亡，一场以屠杀对方和平居民为主要目标的空战开始了。从9月7日至11月3日，德国空军每天都要出动上千架次的轰炸机，疯狂地轰炸伦敦及英国其他重要城市，使戈林感到苦恼的是，对伦敦的轰炸持续了半个多月，数以千计的伦敦市民丧生，他却看不到英国在政治上溃败的迹象。

戈林和希特勒都没有意识到德国空军自9月7日起开始的行动是无法弥补的错误。德国空军如果继续打击英国空军的话，那么就会如丘吉尔所说的那样，“不出一个星期，英国的上空将没有空中保护力量”。德国的入侵就将成为现实。然而，自9月7日起，戈林似乎忘记了英国空军的存在，他将德国空军的主力几乎全都投向了伦敦、曼彻斯特、考文垂等城市。夜间空袭差不多持续了一个星期，伦敦等城市惨遭破坏。在“胜利”的鼓舞下，戈林的空军决定开始在白天行动。

9月15日中午，德国空军的200架轰炸机由600架战斗机护航，杀气腾腾地扑向伦敦。在此之前，轰炸伦敦的德国空军几乎没有遭到英国空军的有力拦截。但是，在这一天，还没等德国的机群进入伦敦上空，由数百架战斗机组成的英国空军机群便迎面扑来。这些英国飞机不顾德国战斗机的拦截，凶狠地围攻其轰炸机。失去保护的德国轰炸机像断线的风筝一样，一架接一架地落下，其余的只得仓皇逃窜。在混战中，德国战斗机始终难以寻找同英国战斗机格斗的机会。当德国轰炸机逃离后，英国的战斗机又扑向了德国的战斗机。德国空中指挥官害怕逃离的轰炸机再次受到攻击，便命令德国战斗机群立刻撤离战场，可英国战斗机紧追不舍，在追击的途中又击落了多架德国战斗机。据伦敦电台报道，此次空战，英国皇家空军击落德机185架，英国自损26架。第二天，戈林下令改变战术，即规定白天出动轰炸机不再是为了轰炸，而是用以作为引出英国战斗机的诱饵。他宣称，敌人的战斗机“应当在四五天内消灭”。

在空中大搏斗的同时，英国空军还出动了大批轰炸机对德军入侵的各个港口进行了猛烈的轰炸，使德军集结在此准备登陆时使用的舰船、军火库、人员受到了惨重的损失，坐镇柏林的希特勒不断接到各个港口遭到英国空军袭击的报告。第二天，英国空军又重复了前一天的攻击。可以说，9月15日的空战是不列颠战役的一个转折点。在这场空战后的两天，希特勒被迫宣布推迟入侵英国的计划。英国保住了！当法西斯恶魔肆虐欧洲大地的时候，是英勇的英国战斗机飞行员痛击了敌人，捍卫了自己的家园。

为了寻求对付英国人的对策，9月18日，希特勒主持召开有陆海空三军主要将领参加的会议。会上，陆军和海军将军都提出如果没有有力的空中保护，再在各个港口积蓄力量，实际上就等于自杀。尽管没有人直接指责戈林指挥的空军无能，希特勒也没有当面发泄对戈林的不满，但推迟行动计划的显而易见的原因，就是戈林空军在对英国空军作战中不占优势，从而无法为

地面部队提供有效的空中掩护。事实已经说明了问题，至少说明了戈林一直在说大话，希特勒内心不可能对戈林没有想法。9月19日，迫于情势，希特勒下令停止在各个港口集结船只和部队，“以避免再次遭到英国空军的攻击，将集结的船只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从这一天起，希特勒尽管让戈林继续指挥空军轰炸英国，可它已经完全失去了战略上的意义，变成了一种毫无目的的野蛮的报复行动。

戈林对这种乏味的作战越来越没有兴趣，他感到轰炸伦敦已不会收到什么实际效果了。9月底的一天，在闲谈中，戈林问空军参谋长耶顺内克：“你认为柏林被毁灭之后，德国会屈服吗？”

“当然不会。”耶顺内克脱口而出。

当他意识到戈林的用意后，尴尬地笑了笑。他本人一直是主张对伦敦进行恐怖式轰炸的主要人物之一，他曾向戈林说过，只要德国实行大规模的恐怖轰炸，不出一个星期英国人就会投降。刚才的回答等于打了自己的耳光。

“英国人的士气，要比我们脆弱。”他自我解嘲似地说。

“这就是你的错误所在。”戈林说完，起身走了。耶顺内克知道戈林又要找替罪羊了。

10月初，体力和精力都快耗尽，显得十分疲惫的戈林回到了柏林。由于空袭警报时常出现，柏林居民的防空问题的解决已经刻不容缓了。在回到柏林的第二天，戈林不得不主持召开一个紧急会议，会议的主题就是如何解决柏林的防空问题。戈林没有再提英国人在不久的将来就会投降之类的大话，只是声色俱厉地强调，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这个问题。10月4日，戈林去见希特勒。在元首面前，戈林流露出对不列颠战役的忧虑，没想到希特勒不但没有责备他，反而对空军的表现表示满意，并说英国人在几年的时间里是无法再与德同相对抗的。在戈林临走前，希特勒又对他说，一定要将西欧和北欧的事情处理好，占领区的事情交他全权处理，他现在最好能呆在法国。戈林尽管不太情愿，无奈留在柏林也没有能让他打起精神的事情去做，第二天，他启程去了法国。

希特勒在这个时候派戈林去法国，并不完全是为了让戈林处理占领区的事务，更多的原因就在于自9月15日德国失去对英国作战的主动之后，希特勒不想再在英国问题上耗时费力了。他认为从根本上说英国已不具备同德国抗衡的实力，尽管丘吉尔还很顽强，但在近期内英国人肯定没有能力再在欧洲大陆成气候。因此，他决定迅速结束不列颠战役，并尽快将战略重点转向东方，转向最终的打击目标——社会主义苏联。

针对苏联的行动计划，早在8月间就已开始酝酿。当希特勒和陆军的将领们在巴伐利亚研讨这一计划时，戈林正在卡琳庄园为对英空战作准备，希特勒根本就没同他通气。虽然进攻苏联是戈林预料中的事情，但他没想到希特勒会这么快就转移打击的目标。8月14日戈林在总理府参加会议时，希特勒曾在会上暗示，如果苏联背离目前的亲德政策，或者他们一旦染指芬兰或罗马尼亚，德国就将对苏联采取行动。当时，希特勒这番话并没有引起戈林大多的注意。不过，在那次会议上，戈林也提出，德国没有必要不断满足俄国对军事物资没完没了的需求。

戈林一直在法国呆到1940年11月初。在此期间，希特勒加紧制订进攻苏联的“巴巴罗萨计划”，戈林对此一无所知。希特勒倒不是有意不让戈林参与“巴巴罗萨计划”的制订，他只是担心戈林假如知道他准备进攻新的目

标，会同他纠缠不清。因为放弃对英国的进攻，其实就等于承认德国人在戈林唱主角的不列颠战役中暂时束手无策，而帝国元帅是不愿意承认自己无能的，尽管他内心知道使英国人屈服并非易事。

来到法国之后，戈林的情绪始终不好。戈林将对英空战的指挥权交给了前一段时间表现出色的加兰将军，他是戈林亲手提拔起来的将军之一。此后，他对战况就漠不关心了，整日沉醉于收集名人字画和各种艺术品，或者出席豪华宴会这类奢侈闲散的活动中，这时他好像不是统领千军万马的帝国元帅，而是颇有造诣的艺术鉴赏家或气度不凡的社会活动家。他还常常乘坐他的“亚洲号”或“鲁宾逊号”专列沿法国沿海铁路线视察各处的机场和驻防部队，他喜欢这种微服私访式的视察，每当看到当地德军指挥官诚惶诚恐的样子，听到士兵们震耳欲聋的欢呼声，他的心境才能平和下来，才能真切地体会到那种大权在握的美妙的感觉。可是，陶醉之后，一切如旧，戈林仍然无法排解心中的忧愁和烦闷。他在给其姐夫埃里克·冯·罗杰的信中，提到自己已“筋疲力尽”。

一天，戈林在乘车视察多维尔空8军基地时，凭窗远眺，看到旁边的果园已是硕果累累，红苹果、紫葡萄把周围装点得千娇百媚，随风飘来的阵阵果香令人心醉，果农们正在忙着采摘，他被这战乱中难得一见的田园景色迷住了，心中不由得涌出一股思乡之情。他想，现在要是在自己的东普鲁士庄园里该有多好啊。猛然，他像被惊醒了一样，思绪又回到了现实中，一种未曾有过的强烈的身心交瘁的感觉袭来。他不能就这样消沉下去，他需要休一次假，以使自己受损的元气得到恢复，然后重新振作起来。

10月末，戈林踏上了回乡之路。在巴黎停留了两天后，他回到了卡琳庄园，宣布将休息一段时间。正是：寂寞乡愁难自抑，魔鬼也有困顿时。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 第十八章 艺术品大盗

掩耳盗铃欺世人，艺术珍品落魔掌；  
疯狂掠夺癖性成，柏林强盗恶名扬。

话说 11 月初，戈林回到了卡琳庄园。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他的情绪和健康状况大为好转。此时，他好像已有点看开了，不太把不列颠之役的失败和希特勒对他的冷落放在心上。他或者同妻女共处，享受天伦之乐，或者在他的艺术品收藏室中，整理和欣赏他在最近一年时间里“收集”来的艺术品，每天倒是悠哉悠哉，自得其乐。

提起艺术品，值得多说几句。戈林对艺术品的兴趣始终不减，他常常自称“艺术品鉴赏家和收藏家”，而在占领区的艺术商和博物馆工作人员眼里，他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强盗。自大战爆发以来，戈林的收藏室中的艺术珍品日渐增多，其规格已不亚于一个相当级别的博物馆了。戈林每次到占领区巡察，都同古代罗斯国王的索贡巡行一样，必派他的艺术品顾问沃尔特·霍弗等人搜寻一番，所到之处只要发现有价值的艺术品，一律都想法得到。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戈林收藏的艺术品以当时的价格估算，也已值数亿美元。戈林有一次在同别人谈话时，厚颜无耻地宣称：“我收藏的艺术品，都是用最合法的手段，最公平的价格获得的。”

戈林是纳粹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疯狂掠夺战败国的艺术品的最典型的代表，当时他被占领区的艺术品商人们称为“那个来自柏林的强盗”。从 1940 年下半年起，戈林利用手中的权利，派他的艺术顾问们或亲自出马，涉足占领区艺术品的黑市交易，得到了大量的稀世珍品，其中包括鲁本斯、伦勃朗、戈雅、哈尔斯、弗美尔、华托、雷诺兹等近代画家的作品和一些古代艺术大师的作品。由于戈林的行为，在战后半个多世纪里，各国政府及其收藏家仍在为收回失去的油画、石膏像、大理石雕刻作品和青铜制品打官司。

具体地说，戈林在二战中对西欧各国艺术品的掠夺始于 1940 年夏天。当德军占领了荷兰和比利时之后，戈林便以视察为名来到了阿姆斯特丹。其实，他的真正目的是寻找一位名叫古德斯蒂克的荷兰犹太富商、艺术品收藏家。关于此人的情况，戈林早就打听得一清二楚。他拥有一个装饰着各种艺术品的城堡，这些艺术品的价值据戈林的艺术顾问估算，大约在 600 万荷兰盾左右，3000 件现代美术作品和古代大师的佳作闪耀着诱人的光芒，其中不乏像高更、克拉纳奇和伦勃朗这样的大画家的杰作。

在德国进攻荷兰前的几个月，古德斯蒂克害怕纳粹来了之后会没收他的财产，故而已将其转移到了一个由非犹太血统的荷兰人开设的公司里，自己则在德国人攻入之前离开了荷兰。在古德斯蒂克离开荷兰之后，他的代理人在德机轰炸时被炸死。戈林一来到阿姆斯特丹，立即派人了解古德斯蒂克的情况。不久，戈林的副官埃里奇·格里茨巴赫带来了一个荷兰人，此人自称古德斯蒂克的遗孀的代理人。原来，古德斯蒂克在去往美国的途中，因乘坐的客轮触雷已遇难。据这个人说，在战争爆发之前，古德斯蒂克的代理人曾将一批艺术品以抵押的名义存入荷兰银行，后来荷兰银行以古德斯蒂克的遗孀不是抵押人的理由取消了她的赎回权。由于当时的紧急情况，这批艺术品在抵押时，估价仅为 150 万荷兰盾，而它的实际价格远远不止于此。一位名叫米德尔的艺术品商人告诉埃里奇·格里茨巴赫说，这批艺术品的价格现在

已涨至 250 万，在阿姆斯特丹还没有人能一下子找到这么多现金。埃里奇·格里茨巴赫让米德尔第二天将有关资料带到德军司令部交给戈林，使戈林大喜过望的是他把古德斯蒂克的全套档案都拿来了。戈林以一个行家的眼光审视后发现，在古德斯蒂克所收藏的艺术品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价值连城的珍品。戈林立即表示他想买下这批艺术品，并让米德尔尽力想办法。米德尔说，只要戈林能够给他 200 万贷款，他就有办法帮助古德斯蒂克的遗孀从银行赎回这批艺术品，但戈林最后买下的价格可能要达到 350 万。财大气粗的戈林答应，只要古德斯蒂克的遗孀肯卖，钱的问题由他来解决，前提是古德斯蒂克的遗孀必须“以合理的价格”卖掉这批艺术品，而戈林则是第一买主，在他挑选后，剩余的才能再卖。经米德尔斡旋，古德斯蒂克的遗孀同意了戈林的要求。

此后，由米德尔出面同荷兰银行进行交涉，当然这里少不了戈林的“帮助”。银行最后同意古德斯蒂克的遗孀以 150 万荷兰盾赎回这批艺术品。1940 年 7 月 1 日，一位名叫阿·顿·布罗伊克的人代表卖方在出售合同上签字，米德尔则代表买方签字。戈林拿出 200 万现款，交给了米德尔。按照他同米德尔约定的条件，他作为第一买主来到了古德斯蒂克的城堡。按照米德尔后来的话说，戈林拿走了“所有能移动的东西”。戈林命令手下的人将这批艺术品全部包装好运回卡琳庄园，在卡琳庄园，戈林精心挑选出最好的留下，另选 53 件送给了希特勒。在戈林挑完之后，米德尔对戈林说，他将以 150 万的价格买走其余的艺术品。在这件事之后，通过米德尔，戈林又收购了一些艺术品。

1942 年后，米德尔隐秘地离开了荷兰。

戈林后来每当提到这件事，都极为恼火。他认为在这笔交易中，只有他一个人是最诚实的，他对人讲：“我用我自己的钱，使所有参与这件事的人得到了好处。我按古德斯蒂克的妻子开出的价格付了钱，也使银行得到了应得的抵押款。而米德尔欺骗了我，我付了收买这笔艺术品的全部款项，而米德尔——这个混蛋实际上分文未付，便拿走了艺术品，因此，等于我付给了米德尔一大笔钱。”依戈林的强盗逻辑，买东西花钱，而且替别人付钱，确实是一件让人心痛的事。

战后，荷兰政府声明戈林所买走的这批艺术品是纳粹“掠夺的荷兰人民的共同财产”，要求德国政府全部归还。这是题外话。

1940 年夏天，一批专家被纳粹政府派往已沦陷的西欧，搜寻“逃亡的敌对分子”所留下的艺术品。其实，这批人中的绝大部分是由戈林派出的，同时，希特勒也派人参加了这项工作。戈林的主要艺术顾问沃尔特·霍弗，经常以“帝国无帅艺术收藏品保管员”的头衔出面活动，而希特勒派出的艺术专家则是霍弗的朋友弗雷德·罗森伯格，元首交给他的任务是“妥善保管逃亡犹太人所遗弃的‘无主’艺术品，并以逃亡税的名义将其没收。”戈林当然不愿意有人抢了他的好处，即便这个人是他所敬畏的希特勒，因此，他让其手下的亲信时刻注意罗森伯格的行踪。当时驻巴黎的德国占领军头目之一是戈林任命的国务秘书哈罗德·特纳博士，他一直对戈林心存感激，并了解戈林对艺术品的那种狂热的爱好。

为了报答戈林，他每次都将在占领军当局没收的艺术品的情况和巴黎艺术品市场的交易信息提前告诉戈林，请戈林决定如何处置这些艺术品。这样，戈林往往捷足先登，将有价值的艺术品一股脑装入他的专列“亚洲号”，希

特勒的“艺术教授”汉斯·波斯和卡尔·哈伯斯托克连看都来不及看一眼。

纳粹上层的一些人对戈林的行为一开始就颇有微辞。在1940年10月下旬，纳粹司法部长拉斐尔·阿利贝尔曾就戈林9月份在巴黎搜掠艺术品的行动，向巴黎的德国占领军司令艾尔弗雷德·斯雷休斯将军提出过异议，但得到的回答是“帝国元帅的事情我们无权干涉”。而希特勒的代表罗森伯格没有公开表示什么不满，他只要求给搜集到的艺术品拍照、分类、存档，以备希特勒在未来有可能进行的和平谈判中，用作讨价还价的砝码。

戈林没有希特勒那么多想法，他只牢记他的货币代理人能够打开任何一家法国银行的金库，因而他在艺术品市场从来都是出手大方。巴黎的艺术品商人都知道，同戈林做生意根本不用担心收不回钱，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这笔钱是从他们的国库里拿出来的。戈林是用法国人的钱“买”法国人的东西，这同掠夺没有什么两样。

11月4日，被不列颠战役拖得疲惫不堪的戈林来巴黎散心，法国维希政府专门派官员接待了他。次日，戈林在人们的前呼后拥下来到了举世闻名的卢浮宫博物馆。博物馆馆长马赛尔·奥伯特教授代表“全法国的艺术家们”感谢戈林在德军进攻巴黎时，下令禁止轰炸这座具有历史意义的建筑物。在参观中，戈林对几件雕塑作品流露出非常欣赏的意思，特别是罗丹的青铜雕塑《泉边号角》。参观结束后，他命令罗丹的铸造工罗迪尔为他复制一件。

戈林对卢浮宫中的藏品并没有表现出太大的兴趣，因为他知道出于政治目的，希特勒禁止任何人染指这些宝物，而法国犹太人手中的艺术品则不在此列。这次来巴黎，戈林最想看到的就是在卢浮宫网球场大厅中存放着的，希特勒的代表罗森伯格搜罗来的一批珍品，即从逃亡的犹太巨商拉扎尔·威尔斯泰因那里得到的302件艺术品。看过之后，戈林让他的随从将其中的4副绘画作品从墙上摘了下来，并用一种威严的，不容置疑的语调对罗森伯格的工作人员说，这几幅画他将带回德国。当看到罗森伯格的工作人员表示为难时，戈林对他们说，你们会接到收条的。当天晚上，戈林发布了一项指令，对在卢浮宫负责管理没收的犹太人的艺术品的工作人员的任务作了规定：一是为这些艺术品分类；二是为元首和帝国元帅选中的艺术品装箱，“在德国空军的帮助下”迅速运到德国；三是拍卖剩余的艺术品。也许是为了掩人耳目，戈林最后又规定：“拍卖所得将交给法国政府，用于对战争死难者家属的抚恤。”这笔钱究竟用于何处，别人是无法过问的。

在这种情况下，戈林更是为所欲为。1941年2月4日上午，戈林的两位艺术顾问——安格雷尔和霍弗，得知网球场大厅又来了一大批新搜出的犹太人藏匿的艺术品，立即报告了戈林。戈林让他们去作进一步核实，安格雷尔和霍弗很快回来告诉戈林情况属实。第二天一大早，戈林就急不可待地带着这两位艺术顾问和大批的随从去了那里。戈林一行刚一登上台阶，两名德国文职官员闻风走出迎了上来。这两个人戈林都见过，一个是驻巴黎德国陆军艺术品委员会主任、大名鼎鼎的弗里茨·沃尔夫·梅特尼希伯爵，另一个是分管网球场艺术品的官员本杰斯。戈林傲慢地告诉他们，他要参观一下“阿拉丁岩洞的珍宝”，他们两人显然对帝国元帅的“参观”有些不安，但谁也不敢阻拦。戈林对这批藏品极感兴趣，他饶有兴味地边走边看，发现能看上的东西，就在上面留下记号。本杰斯疑惑地问戈林：“这是什么意思？”戈林告诉他，他将把这些打过记号的艺术品运回德国。

本杰斯结结巴巴地对戈林说，“拿走这些东西，在法律上也许会惹出麻

烦，另外，法国政府也会提出抗议。”

“德国驻巴黎的军事总督卡冯·施蒂尔普纳尔将军就被没收的犹太财物的处理问题又签发了一个文件，规定这里的艺术品的处置将由陆军部负责。”梅特尼希补充说。

听了他们两人的解释，戈林不禁大怒，他咆哮着喊道：“我的命令高于一切！”他指着本杰斯说：“你就按我说的办。”本杰斯膛目结舌，不知所措。梅特尼希不知什么时候溜走了。

戈林拿过一张纸草草地写下几行字，把它交给了本杰斯，然后，和颜悦色地拍着本杰斯的肩膀说：“亲爱的本杰斯，外交和法律上的事情由我来操心，”他突然又提高了声调，“我就是这里的最高法律权威。”

戈林一行走出大厅后好大一会儿，本杰斯才缓过劲来。他将戈林留给他的纸条打开，见上面写道：

1. 所有标有“H”的画是给元首的。
  2. 所有标有“C”的画是给我的，外加没标记的柳条箱。
  3. 所有特殊的黑色柳条箱是给元首的。克里斯塔护士有钥匙。
- 另：我的东西——画、家具、银器、挂毯送到我的住处。

在巴黎沦陷的4年里，逃亡德国的犹太富商和法国的犹太富商的艺术财富，通过设在卢浮宫网球场的这座纳粹珍宝库，源源不断地流入戈林的艺术收藏室中。应当承认，纳粹基本上没有公开掠夺法国非犹太人的艺术品，到后来，对从犹太人手中夺来的艺术品，也要公开标价拍卖，尽管买主往往只有一个人，那就是戈林。为此，纳粹工作人员还聘请了一位奴颜婢膝的法国教授雅克·贝尔特伦德，专职为艺术品估价。身为法兰西版画家协会主席的贝尔特伦德慑于戈林等人的淫威，每次估出的价格都低得荒唐。有一次，他给马蒂斯的两幅画、莫迪格里阿尼和雷诺阿的各一幅肖像画的总估价仅为10万法郎（当时约合500美元），毕加索的两幅画估价仅为3.5万法郎，华托的名作《风流景象》为3万法郎。戈林对此非常满意。既要满足自己的私欲，又不想落下恶名，贝尔特伦德帮了他的大忙。不过，戈林及其同伙的举动无异于掩耳盗铃，以低廉得出奇的价格“买”走珍贵得惊人的物品，至少不能算作公平交易吧？对这不公平的交易背后的名堂，人们有目共睹，只是敢怒不敢言罢了。

戈林时刻注意着巴黎艺术品市场的动向。每当得到那里出现值得他收藏的东西的消息，他都要亲自去看。他的“亚洲号”经常处于待命状态，以便能在几个小时之内就把心急如焚的帝国元帅送到巴黎。在巴黎和柏林盛传着身为帝国元帅的戈林，经常像黑社会的头子一样，保镖身前身后簇拥着他，在黑市同那些“最不可靠的通敌艺术商人、声名狼藉的律师、类似商人的评估专家们”做着见不得人的生意的“谣言”。也许戈林听说了这些传言，他尽量不再采用毫不掩饰地掠夺的方式，而是设法找到一种至少表面上看来公平一些的交流办法，拿走他想得到的东西。对有些珍品，戈林甚至肯出令时人咋舌的大价钱。希特勒的艺术品代理人卡尔·哈伯斯克在同一位帝国部长谈话时曾经说过，他们在收购艺术品方面之所以经常被戈林的人抢了生意，原因之一就是“他们有的是钱，开出的价格要比我们的高得多”。战后当米德尔又在阿姆斯特丹露面时，曾经有人找到他，询问他当时同戈林做的几笔

生意的情况。在被问到戈林是如何在他的帮助下，用什么手段得到了埃米尔·伦德斯所收藏的佛勒芒的原作时，米德尔一口咬定，那幅作品是卖主心甘情愿出售的，他还为此赚取了一大笔佣金，因为戈林出的价钱——1200万比利时法郎高出市价几倍。后来，在戈林的艺术顾问霍弗的档案里发现，确有证明米德尔没说假话的证据。

在可以不花钱便达到目的时，戈林当然决不会多花一分钱。1940年底，戈林曾到一个名叫唐·威尔金森的客居巴黎的英国人家中作客。对他到这个素不相识的英国人家中作客，他手下的人开始迷惑不解，去了之后他们才恍然大悟。威尔金森一家对八面威风的纳粹德国的帝国元帅的到来诚惶诚恐，丝毫不敢怠慢，戈林则像对待一个老朋友一样，同威尔金森谈笑风生。在主人的陪同下，戈林参观了他的艺术品收藏室，主人发现戈林对他的收藏品似乎不感兴趣。走出收藏室后，戈林好像漫不经心似地问道：“听说贵府有一幅朱丽安娜·冯·斯托尔伯格的肖像画？”威尔金森终于明白了戈林来访的本意。他把戈林带到了主人的小起居室，戈林在一幅肖像画前停下了脚步，两眼放出了贪婪的光。“可以拿下来看一下吗？”戈林问道。威尔金森快步走上前去，摘下那幅画恭恭敬敬地送到戈林手中。戈林把画拿到窗前仔细地审视了一番，然后一声不响地将它挂回了原处，目光直直地看着窗外的塞纳河。回到客厅坐下后，戈林像是不经意地问起了女主人。威尔金森面带愁容地说他的妻子因为一件小事被拘留了，他乞求得到戈林的帮助。戈林看了一眼威尔金森，一字一顿地说，“我将尽力而为。”不久，戈林收到了威尔金森写来的一封信，他在信中对戈林帮助他的妻子获释表示感谢，信的最后写道：“我们都同意，让您拥有‘朱丽安娜’，以此来表示我们全家对您的最真挚的谢意。”几天后，戈林果真收到了那幅16世纪的德国名画。

在大多数时候，戈林不用亲自出马，他手下的艺术顾问们就能替他安排好一切。这些人当中，要数霍弗最为能干，最受戈林重用。在戈林的档案中，有一封1941年9月26日霍弗写给他的信，霍弗报告，因价格上涨，同时也由于没有太值得购买的货，在最近举办的一次拍卖会上，他只为戈林买了一幅18世纪的画。但在那个网球场大厅里，他已谈定了一笔价值为378万法郎的交易，打算买入的画作包括卡米耶·科洛待的7幅作品、奥诺雷·多米尔的3幅作品、莫奈的4幅作品、雷诺阿的5幅作品、凡高的1幅作品，这些画作全部来自犹太人，都是通过“特别适当的交换”弄到手的，由于霍弗“工作”得卖力，在自1941年9月至1942年10月这一段时间里，至少有596件画作、雕塑品、挂毯和家具从网球场大厅流入戈林的艺术品收藏室。

为了“合理”分配从法国掠夺来的艺术品，戈林于1940年11月5日专门颁布一道密令，命令有关人员按下列分类方法分别处理：

1. 元首对其用途保留决定者。
2. 对充实帝国元帅的收藏有用者。
3. 适于送交德国各博物馆者。

对戈林赤裸裸的掠夺行为，一些法国官员曾提出过抗议，可戈林只把他们的活当作耳边风，依然我行我素。当一位名叫本耶斯的德国艺术家提请戈林注意，他的所作所为违背了有关国际公约时，戈林居然毫不隐讳地宣称：“这份心还是由我来操吧。我是全国最高法律权威，我的命令就是最终的决定，你的任务就是遵照执行。”本耶斯留下的报告写着：“准备归元首所有的文物，以及帝国元帅看上的文物，将用两个车厢装运，挂在帝国元帅的专

列之后，运往柏林。”

戈林的艺术收藏品的另外一个来源是意大利。他在战争爆发之前，早已对意大利的艺术宝藏垂涎三尺，可碍于墨索里尼的威势和情面，总是不能肆无忌惮地攫取。大战全面爆发后，特别是墨索里尼由于在军事上一再失利，由德国纳粹的盟友变成受其操纵的傀儡之后，情况有了变化。墨索里尼开始在各个方面的着意讨好德国人，戈林这位曾受过他的冷遇的德国纳粹二号人物，此时更成了他拼命巴结的对象。尽管墨索里尼后来曾为化解他同戈林之间的积怨作过努力，但戈林始终难弃前嫌，这是很令墨索里尼发愁的一件事。1940年1月，在戈林过47岁生日时，墨索里尼投其所好，通过霍弗送给他8幅维普蒂诺的作品，作为庆贺的礼物。戈林十分高兴，马上给墨索里尼写了一封信，表示感谢和友好之情。

从此，意大利的艺术宝库向戈林敞开了大门。戈林仍像在其他国家一样，以他所认为的合法的手段疯狂地购买意大利的艺术品。只是意大利毕竟不是德军占领的荷兰和法国，海关税总是要交的，为此，戈林的代理人经常以压低报价的方法逃避关税。意大利海关管理人员就这个问题请示墨索里尼，墨索里尼哪敢得罪戈林，他赶忙作出指示，凡是戈林的东西，他想报多少就算多少吧。得知墨索里尼的态度，戈林手下的人更加肆无忌惮了。

1941年11月的一天，几名德国人开着一辆汽车来到罗马海关报关。货物是发往卡琳庄园的，货物清单上的货名一项填着艺术品，总数有34个柳条箱，报价却仅为20万里拉（当时相当于1000美元）。海关人员明知有诈，可又不能说什么，只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故作不知。事实上，柳条箱里装着大批的艺术珍品，文艺复兴时代威尼斯和佛罗伦萨的艺术大师们的一些画作都在里面，其中有15件艺术品是霍弗在这一年的5月29日和10月20日，两次共花1250万里拉从佛罗伦萨的一家古玩店买得的。次年7月，霍弗又以同样的逃税办法，把67个装有古代和文艺复兴时代的艺术珍品的柳条箱运出意大利海关。

在艺术品交易中，占尽了便宜的戈林偶尔也有上当受骗的时候。比如，他曾弄到一幅他一直想得到的维尔米尔的作品，几年之后，他才得知这幅价格昂贵的画作是出自一个伪造专家之手的赝品。还有一次，戈林花40万法郎从巴黎的一位艺术商人那里买了一块描写查理曼大帝的生活的挂毯，后来得知这块挂毯是卖主最近以不到40万法郎的价格收购的，戈林连呼上当。不过，这样的事并不多，当时敢骗戈林的人毕竟没有几个。

曾任纳粹德国军备和战时生产部部长的阿·施佩尔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戈林却在战争中想尽一切办法来增加他的艺术品收藏。卡琳庄园的各个大厅和房间的墙上挂满了贵重的绘画作品，达三四排之多。墙上挂满之后，他还在宽敞的门厅的房顶，安上了一组画。……在楼上的一个大厅里，四壁都是绘画，它们原是荷兰一位著名的艺术品商人的财产，德军占领荷兰后，被迫以玩笑般的低廉价格卖给了戈林。在战争中期，戈林以高出原价几倍的价钱，抱它们卖给了党的大区区长，并且非常可笑地告诉我，这些画作由于曾是“大名鼎鼎的戈林的收藏品”而更显珍贵，因此要额外加上一笔钱。

大约在1943年的一天，我从一个法国人那里听说，戈林正在给维希政府施加压力，要用他所收藏的一些没有什么价值的作品去换卢浮宫中的一幅名画。我知道希特勒是不允许侵犯卢浮宫的收藏的，所以便对这位法国人说，你们不要屈服于戈林的压力，如果戈林

坚持那样做，就再来告诉我。后来听说戈林没再坚持。……对这位“国家第二号人物”掠夺艺术品的行为，希特勒常常怀有愤恨之情，但从来不敢当面责问他。

到1944年底，戈林自己为卡琳庄园的艺术收藏品估算的价格共计为5000万德国马克，这样一笔巨额财富，使得戈林的政敌们无不又妒又恨，鲍曼等人经常庄希特勒面前就此事抨击戈林。希特勒一向对戈林的个人生活比较宽容，甚至持放纵的态度，但这回他终于忍不住了。有一天，希特勒向戈林问起这批艺术品将来如何处置的问题，戈林信誓旦旦地表示，这批艺术品属于德国人民，他只不过代为收集与保管——“有朝一日，我将把它交给元首，让元首代我交给德国人民。”这番话听起来情真意切，说得戈林自己都有些动情了。此后，希特勒再也没向戈林提过这个问题。

实际上，收藏艺术品就如同他无法戒掉的毒瘾一样，已成为戈林的一种有些变态的需要，而不是出于对艺术的热爱，或者说同艺术本身的关系不大。一直到纳粹德国面临灭顶之灾，戈林仍在着迷地搜集、欣赏艺术品，由此也可以看出他对艺术品收藏狂热到了什么程度。据施佩尔的回忆录记述，在战争快要结束时，有一天，戈林请他和他的朋友布雷克尔到卡琳庄园作客。用过午餐后，戈林兴致勃勃地带他们去看他陈放在地下室的珍宝，其中有一些是来自意大利那不勒斯博物馆的珍品。在介绍这些收藏品时，戈林始终是一副骄傲、陶醉的神色，而那时离纳粹德国垮台已没有几天了。

1945年2、3月间，英、美、苏三国军队日益逼近柏林。同所有的纳粹要人一伴，戈林知道第三帝国灭亡的命运已经注定。六神无主的戈林此时早已无心过问军事上的事情了，心中想的只是如何保住被他视若生命的艺术珍品。他派人到奥地利去物色合适的隐匿地点，经过反复考虑，最后，将这一地点确定在奥地利阿尔特奥塞的一个废弃矿井中。戈林先后多次派人将卡琳庄园的艺术品运到这里分头藏了起来，而一些太重或太大的艺术品由于搬运不便，戈林则下令就地掩埋。

关于戈林收藏的艺术品的去处，是战后对他的审讯的一项重要内容。然而，无论审讯者使出多少计策，戈林直至告别人世，也没有露出一点儿口风。

正是：强盗本自柏林来，贪心至死终未改。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 第十九章 百足之虫

两线出击生恐惧，曲意逢迎驾战车；  
初战告捷斗政敌，余威在身登宝座。

前面提到，在不列颠战役期间，希特勒已将目光转向了苏联，他在加紧制订针对苏联的“巴巴罗萨计划”，为了避免戈林推三阻四，希特勒派他坐阵法国，关于苏联的事情，没向他打任何招呼。戈林虽然对此并非一无所知，但既然元首不想同他商量，他也就不便主动找元首争辩对俄国开战的利弊，何况他知道希特勒只要决心已定，就没有挽回的余地了。

对英作战受挫，使得戈林心中始终罩着一层阴影，也使得他对纳粹德国的下一步行动——“巴巴罗萨计划”的实施越发感到不安。别看戈林在公开场合常常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架势，大吹德国空军如何如何神勇无敌，英国空军是多么不堪一击，其实他内心比谁都清楚，英国皇家空军不但没有瓦解，而且越战越强，越来越难对付。在这种形势下，再把他的空军抽到东方去作战，他就更加捉襟见肘了。每每想起这些，戈林都是忧虑万分。除了军事上的原因之外，戈林反对进攻苏联，更重要的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他担心失去苏联这个石油和粮食基地，为了抵消“巴巴罗萨计划”的影响，有一段时间，戈林到处鼓吹他的战略设想，即德军先同意大利、西班牙军队协同作战，攻占英国的军事要塞，控制苏伊士运河，封锁地中海，然后，占领巴尔干和北非地区。戈林自认为他的战略设想最高明、最合理，可是，任凭他使出浑身的解数游说，就是没有多少人感兴趣，希特勒更是充耳不闻，毫不理会。

1940年11月14日，戈林暂时把空军的指挥权交给米尔希，离开柏林，住到了离苏联边境仅30英里的东普鲁士的罗明顿，他的48岁生日就是在这里庆祝的。讲究排场的戈林即便在情绪低落的时候，也不愿放过任何一次摆阔的机会。那一天，戈林先是在漫天飞舞的雪花中检阅了他引以为自豪的赫尔曼·戈林师，接着又在一家餐馆举办了豪华的生日宴会，随后又同众人一起欣赏了普鲁士州歌剧院的演出。为戈林的生日庆典锦上添花的是墨索里尼委托意大利大使赠送的礼物——一只15世纪的祭坛，它由几幅精美的画作和木刻作品组成。其他生日礼物也是琳琅满目，戈林比较喜欢的还有妻子埃米送给他的一个镶满宝石的香烟盒，可是，使他扫兴的是，这个香烟盒竟在众目睽睽之下。从摆放礼品的桌子上失踪了，过完生日，戈林便回到了柏林。这个生日庆典在德国纳粹紧锣密鼓地准备向苏联开刀的日子里，是唯一令戈林感到快慰的一段小插曲。

话题还是回到让戈林头疼的“巴巴罗萨计划”上来，1940年12月18日，希特勒正式发布题目为“巴巴罗萨计划”的第21号指令，提出“德国武装部队必须准备在对英国的战争结束之前以一次快速的战役击溃苏联”，要求“准备工作……必须在1941年5月15日以前完成”，进攻时间约定在第二年的5月中旬。这样一来，整个1941年春天，戈林都是在烦乱不堪中度过的。只有回到卡琳庄园，面对漂亮可爱的小女儿和日益增多的艺术品，他才能暂时忘却内心的愁苦。

戈林试图劝说希特勒放弃“巴巴罗萨计划”，并想寻找几个同盟者，可是，转念一想，恐怕没有人愿意和他一道去劝说元首改变主意。因为整个陆军部成员都是对苏开战的狂热支持者，而海军元帅雷德尔由于海军航空兵的



建立和指挥问题，已同他闹得很僵，根本就不可能站在他一边。尽管戈林深知困难重重，可他还是下决心再试一次。2月11日，戈林让负责重签对苏贸易协定的德国外交部官员施努勒和他一起去见希特勒。他借商议协定的内容旁敲侧击，反复强调苏俄是纳粹德国粮食和石油的主要供应国，两国一旦开战，至少在一个时期内，会使德国经济陷于困境。戈林说了半天，希特勒却不置可否，这是戈林最后一次劝说希特勒放弃“巴巴罗萨计划”。第二天，戈林到东普鲁士狩猎去了。

回到柏林，戈林彻底丢掉了劝说希特勒放弃“巴巴罗萨计划”的念头，希特勒也似乎忘记了戈林前几天的建议。戈林明白，同前面捷克、波兰乃至西欧事件一样，到了这种地步，希特勒是轻易不会回头的。他如果一味坚持自己的看法，被元首视为“老妇人”的耻辱就会重新落到他的头上，而且，这次元首很可能不仅仅是冷落他，而是完全可能抛弃他。想到这些，戈林不由得有几分后怕。权衡了一番利弊之后，他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于是，他故伎重演，再一次见风使舵，摇身一变而成为“巴巴罗萨计划”的积极拥护者。在几天后的一个会议上，戈林在希特勒重申“巴巴罗萨计划”的重要性后，第一个站起来表示，空军将为“巴巴罗萨计划”的实施尽一切力量。对戈林的转变，希特勒显得很高兴，虽然他知道戈林说的未必是真心话。

2月19日，戈林和希特勒共进午餐。下午和晚上，希特勒整整用了6个小时，同戈林及耶顺内克将军商讨在对苏作战中德国空军如何行动的问题。在谈话中，希特勒突然对戈林说，他不再想听到有人谈“巴巴罗萨计划”对德国经济不利，如果再听到这种话，他就要堵上耳朵。希特勒也许觉得这话说得太伤戈林的自尊心了，也许是想解释什么，他又把口气放得和婉一些说，“如果俄国先进攻德国，那么经济因素就不存在了。”戈林只得做出一副心领神会的样子，讨好地对希特勒说，前一天，他已经和他的石油顾问费希尔博士认真讨论了未来德国石油基地的问题，结论是罗马尼亚将取代苏联。

2月26日，戈林在同最高统帅部的托玛斯将军谈论“巴巴罗萨计划”对德国经济发展的长远影响时，彻底改变了腔调，大肆鼓吹占领苏联油田的好处。他说，仅仅占领乌克兰是不够的，“无论如何，我们也必须得到巴库周围的油田。”他好像检讨自己似他说，“元首的观点是正确的，德军进入苏联后，布尔什维克政权就会如同雪崩一样溃败。以前我所担心的供应线和铁路遭大规模破坏的情况其实是不会出现的。”停了一会儿，他恶狠狠地告诉对方，“当我们的飞机到达莫斯科上空的时候，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就会发抖，但如果做到万无一失，首先要将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统统干掉。”

3月5日，戈林向正在维也纳访问的罗马尼亚独裁者安东内斯库将军问起他们的国家能否增加石油产量的问题，并很神秘地解释说：“我们有朝一日会失去另一个石油供应国。”他所说的“另一个石油供应国”显然是指苏联。他又好像不经意地问，“现在还有多少罗马尼亚人生活在俄国领土上？”安东内斯库回答了之后，戈林做了一个表示“挖掘”之意的姿势，安东内斯库点了点头，意思是他已领会了戈林的意思。

为了声东击西，引开人们的注意力，特别是迷惑英国和苏联，3月8日，希特勒又一次派戈林坐镇西欧，指挥对英空战，处理占领区的经济事务。戈林乐得清闲，又乘机忙起了他最感兴趣的艺术品收藏。他先是在海牙和阿姆斯特丹同一些不法艺术品商人作了几笔交易，然后在11日和12日两次来到巴黎，再一次洗劫了卢浮宫旁边那个宝窟般的网球场大厅。

3月19日，戈林回到柏林。他没有马上下车，而是打电话让人将托玛斯将军叫到他的专列上，让他汇报“巴巴罗萨计划”的准备情况及燃料等战略物资的储备情况。戈林虽然明知希特勒这次派他出去实际同放逐差不多，目的就是阻止他插手同“巴巴罗萨计划”有关的一些具体的工作，可不甘寂寞爱出风头的本性还是驱使他始终把纳粹德国下一阶段的任务——“巴巴罗萨计划”的实施当做头等大事，他不肯置身于中心之外，听完托玛斯的汇报后，戈林心头的阴影又加深了一层。从这位将军汇报的情况看来，德国的战略储备仅仅能够维持3个月左右，可是，德国能在3个月内彻底击败俄国人吗？戈林心里实在没有底。

第二天，米尔希元帅来到卡琳庄园，他在同戈林谈起“巴巴罗萨计划”时，坚持认为“巴巴罗萨计划”的实施肯定要拖到冬天，这样，战争就很可能无限期地拖延下去。这次轮到戈林安慰别人了，他信心十足他说：“一旦战争开始，俄国就会像一座纸房子那样倒塌。因为我们的元首是一位举世无双的领袖，这是上帝给德意志的恩赐。”即便是背后提起希特勒，戈林也忘不了如此肉麻地吹捧几句，可见，戈林是多么急切地想重新取得元首对他的信任 and 好感，这也说明他跟着元首走到底的决心已定。

“巴巴罗萨计划”的要点之一，就是要利用巴尔干南翼国家——罗马尼亚、南斯拉夫、保加利亚、希腊等国，作为德国军事力量的集结地和后勤供应基地。然而，由于希腊的亲英派始终不肯向墨索里尼屈服，意大利军队自1940年10月23日进攻希腊，半年过去了，不仅没有取得战果，反而节节败退。更为严重的是，英国人乘援助希腊之机，占领了克里特岛和莱莫斯，对德国在巴尔干半岛的利益构成了极大的威胁。英国的飞机可以随时在上述两地的机场起飞，轰炸罗马尼亚的油田，直接妨碍着“巴巴罗萨计划”的实施。为了帮助政治盟友摆脱困境，同时电为了使德国的利益不受侵犯，为“巴巴罗萨计划”的实施扫清道路，希特勒决心出兵干涉希腊事务。正在准备行动的时候，一件始料不及的事情发生了，3月26日，南斯拉夫发生了军事政变，亲德政权被推翻。虽然新上台的西莫维奇将军表示愿同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但希特勒得知，这位西莫维奇将军是一个亲英分子，因此，在未来的战争中，南斯拉夫新政权决不会听任德国摆布，或者说不会接受前政权作为德国人的傀儡的地位。

3月27日中午，正在和再次来访的达勒鲁斯话别的戈林，突然接到通知他立刻到总理府参加紧急会议的电话。戈林急忙赶到希特勒那里，只见里宾特洛甫等纳粹领导人已整整齐齐地坐在那里。戈林入座后，希特勒简单地介绍了南斯拉夫的局势，并说他决定立即“摧毁南斯拉夫”，同时入侵希腊，为此，现在需要组织一支空军和陆军特别部队，开赴巴尔干，打一场速战速决的战斗。希特勒宣讲完他的决定后，便让大家分头行动去了。

吃过午饭，戈林马上把乌德特、瓦尔道、施密德和军需官冯·塞德尔将军召到他那里，就即将开始的南斯拉夫战役进行了详细的布署。当天晚上，戈林向希特勒作了汇报。他向希特勒表示，德国空军将遵照元首的旨意，迅速摧毁南斯拉夫和希腊的战略目标。并以饱和轰炸的方式将贝尔格莱德夷为平地。希特勒对戈林这次能毫不含糊并如此迅速地落实他的指示深感满意，很亲热地夸奖了戈林几句。

4月4日，戈林来到奥地利的塞默林，在此指挥空军作战，直到3周后巴尔干战役结束才离去。4月6日清晨，德国空军出动300架轰炸机袭击了

贝尔格莱德，酿成 17000 人死亡的惨剧。由于希特勒禁止轰炸雅典，所以在希腊战役中，戈林的空军除了骚扰一下英国的运输舰船之外，几乎无事可做。德国陆军则势如破竹，李斯特元帅率领的第 12 军团，在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里，就结束了希腊战事，而在此之前，墨索里尼的军队在 6 个月里都没能使希腊人退后一步。英国人从利比亚调来的 4 个师，也遭到德军的沉重打击。4 月 23 日，希腊投降，英军大撤退，英国人在希腊的地盘只剩下克里特岛，戈林的空军如同在敦刻尔克一样，又一次未能阻止英军撤离。

在苏联问题上，戈林虽悦在公众面前极力摆出一副胸有成竹的架势，其实他的内心始终忐忑不安，随着“巴巴罗萨计划”实施日期的迫近，戈林的恐惧感与日俱增。他害怕历史重演，一战中德国两线作战的窘境和最后战败的惨状时时在他的脑海中闪现。不知出于一种什么心理，在 4 月初达勒鲁斯再次来访时，戈林竟向这位“业余外交家”透露了绝密的“巴巴罗萨计划”的内容及其实施的日期，他不会不知道达勒鲁斯肯定要把这个重要情报传达给英国人。假如希特勒发现了戈林的行为，真不知会把他怎样，反正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塞默林属于山区，早春 4 月的阴湿气候，使戈林的心脏一直不适。他很想回柏林，但一想到希特勒就在离此不远的地方，只得打消了这个念头。每隔两三天，他必须驱车前往停在蒙尼克兴山区的两个隧道之间的希特勒的专列，汇报战况。在进攻南斯拉夫的同时，戈林下令轰炸英国，以分散英国人对巴尔干地区的注意力，于是，德国的轰炸机再次飞临考文垂、布里斯托尔、格拉斯哥和利物浦这些重要城市的上空。为了报复，4 月 9 日，英国空军轰炸柏林。州立歌剧院等一些有名的建筑物被炸毁，英国报纸报道，3000 柏林居民在这次空袭中死亡（真实数字是 11 人）。4 月 16 日，戈林命令他的空军对伦敦进行大规模轰炸。

空袭伦敦后的一天，德国空军技术代表团从莫斯科归来。代表团团长施文克上校专程来到塞默林，向希特勒和戈林汇报情况。他说，这次访苏的一个最重要的观感就是苏联军工部门已全面动员起来，那些工厂的规模之大是他们所没有料到的，仅古比雪夫一家飞机引擎制造厂的产量就已超过德国 6 家最大的同类工厂的总和。施文克还提到，在 8 日的欢迎晚宴上，苏联飞机设计专家米高扬借着酒意对在座的德国代表团成员说：“你们现在已看到了苏联强大的技术力量和生产能力。我们有把握粉碎来自任何方面的侵略！”施文克走后，戈林故作镇静地对希特勒说，施文克的报告纯粹是悲观主义论调，根本不必放在心上。希特勒却显得十分焦躁，过了很长时间，他才咬牙切齿地说，施文克的报告使他坚定了同苏联人作拼死一战的决心。

1941 年 5 月初，巴尔干战役结束。在回柏林之前，5 月之日。戈林带着他的艺术顾问霍弗去了巴黎。一到巴黎，他们马上驱车前往网球场大厅，收罗了一大批有价值的艺术品。尔后，在巴黎占领军当局官员们的陪同下，戈林接见了德国空军的王牌飞行员维也纳·莫勒斯和阿道夫·加兰。晚上，他在马克西姆大饭店纵情享乐了一番。5 月 4 日下午 4 点，戈林乘专列抵达柏林，几分钟后他便出现在总理府，同希特勒秘密商谈德军的下一步行动安排。希特勒指示，在正式实施“巴巴罗萨计划”之前，还要继续对英国加强攻势，以达到进一步迷惑苏联人和英国人的目的。两个小时后，戈林和希特勒一起来到总理府的小会议厅，在希特勒作关于巴尔干战役的报告时，戈林和希特勒的党内副手鲁道夫·赫斯坐在一起，他没有注意到赫斯有什么异样。赫斯

确如平常一样，表现得十分含蓄、沉静，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在几天后将要作出惊人的举动，难怪戈林事后回忆道：“我实在想不到他竟然会做出这种荒唐事。”

第二天，戈林视察了当时任建筑总监的施佩尔最新设计的城市模型。他看上去心情不错，竟肉麻地吹捧那位深得希特勒赏识和器重的年轻建筑师说，“我曾经向元首表示过，除了他之外，您就是德国所曾有过的最伟大的人。”话一出口，戈林似乎又觉得不妥，于是，他又急忙加上了一个前提，“在我看来，您绝对是一个最伟大的建筑家。我愿意这样说，我高度尊重您在建筑方面的才华，就如同我高度尊重元首在政治和军事方面的才华。”在这个时候，戈林可能还不会想到他正恭维的这个人日后会成为他的强有力的政治对手，会对他的地位、权威形成威胁。

5月11日下午，戈林在卡琳庄园接到希特勒的副官博登萨茨的电话，电话是从上萨尔斯堡打来的。博登萨茨语气慌乱地告诉戈林：“元首要见你！”没容得戈林问发生了什么事，那边电话就挂上了。戈林惊慌失措，匆忙坐上他的专列去了慕尼黑，然后又换乘汽车赶到希特勒的大本营。走进大厅后，戈林首先看到的是他最讨厌的一个人——总是一本正经的党棍马丁·鲍曼，他是赫斯的副手。只见他咧着大嘴踱来踱去，见到戈林后，只是机械地象征性地问候了一声。里宾特洛甫坐在大厅的一个角落里，他一反往日颐指气使的神情，面色灰暗，神志萎靡，看见戈林进来，只是勉强地打了一个招呼。戈林意识到了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更加疑惑了。正在戈林发怔的时候，博登萨茨快步走到他面前说：“元首让你到他的书房去。”走进书房，希特勒一言不发，把几页纸塞到他的手里，然后缓缓他说：“帝国部长赫斯乘飞机到英国去了，他留下了这封信。”戈林飞快地将赫斯的信看了一遍。赫斯在信中宣称，为了第三帝国和德意志人民的利益，他愿冒生命危险去同英国人议和，以期早日结束这场战争。看完信，戈林大叫：“赫斯一定是疯了。”希特勒让戈林动用一切力量，迅速查清赫斯出走英国的细节。

次日，戈林和乌德特将军同希特勒及里宾特洛甫等人，讨论了赫斯能否驾驶单人很难操作的梅塞施米特110飞机飞越北海，在苏格兰平安降落的问题。戈林安慰希特勒说，从技术角度来看，像赫斯这样的飞行门外汉，极有可能由于操作失误，导致飞机坠毁。里宾特洛甫则忧心忡忡地提出，万一赫斯安全到达苏格兰，英国电台公布这一消息，就会使轴心国联盟四分五裂。整个下午大部分时间，戈林都在同里宾特洛甫争论。最后，还是希特勒发话让他们不要再争论了，因为首要任务是赶快拿出稳妥的应急对策。

大约晚7时左右，戈林回到他的专列上。他还没等坐稳，手下的人就报告说，英国电台正在广播赫斯已在苏格兰着陆的消息。戈林的脑袋里嗡的一声，顿时乱了方寸，他赶紧给希特勒打了一个电话。第二天，即5月13日，梅塞施米特航空公司总裁梅塞施米特教授和赫斯的几十个同僚一同被捕。戈林手下的人发现，赫斯制订了一份复杂的水平飞行计划，包括利用无线电射束导航。戈林在审问梅塞施米特教授时大发雷霆，“我看，尽管有规定，但谁都可以在你的机场上起飞。”

梅塞施米特反驳说，“赫斯不是一般人，他是帝国的一位重要的部长。”

“你难道不知道赫斯疯了吗？”戈林大叫。

下午，纳粹的重要官员们纷纷从各地赶到贝格霍夫，希特勒将就赫斯事件作一次报告。在报告会开始前，希特勒先同戈林单独商议了近一个小时，

议题是由谁来接替赫斯担任“党的部长”的问题。戈林本想重提恢复虚设的副元首头衔一事，可见希特勒对此根本不感兴趣，只得打住了话头。戈林坚决反对提拔马丁·鲍曼接任赫斯的旧职，他对希特勒说：“这个人野心极大，总有一天会对我们不利！”其实，戈林所说的“我们”，就是指他自己，因为鲍曼不止一次批评过戈林的工作作风和生活方式。

“提拔鲍曼，更多是从党的需要的角度来考虑的。”希特勒似乎在解释。

戈林仍然坚持，“如果你认为鲍曼会就此满足，那就错了。”

希特勒却说，“鲍曼是否有野心，现在无关紧要，我现在需要一个能干的人来主持党的日常工作。”戈林无话可说了，他终于没能说服希特勒。

希特勒在作报告之前，先让鲍曼宣读了赫斯留下的信件。戈林表情沉郁，人们还以为他完全是因为赫斯的事情在发愁，大概没有人会想到同鲍曼有什么关系。随后，希特勒简短地介绍了赫斯出走的背景和原因，说来说去只有一条，那就是赫斯发“疯”了。

几天后，戈林通过晨报得知希特勒最终还是选择了鲍曼，任命他为“党的总理府主任”。戈林心中充满了怨恨和不安。他历来看不起这位乡巴佬一样的党棍，而鲍曼在公开场合对他从来都是敬而远之，私下里则曾多次抨击帝国元帅的沽名钓誉和穷奢极欲。戈林本来想找机会报复他一下，只是碍于希特勒和赫斯都认定他是难得的“人才”，一直无从下手。后来戈林在同别人谈起鲍曼时说：“我和鲍曼一直合不来。他是靠阿谀奉承和迎合元首的手段爬上来的，他假意酷爱工作，就这样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他使他的工作日程和元首相一致，在元首需要时，召之即来，挥之即去，就像一条狗一样。没想到他今天却要骑到我的头上。”

其实，希特勒起用鲍曼并不是没有理由的。首先，鲍曼是一个铁杆的纳粹分子，在反宗教和反犹太人方面，比戈林等人更为激进；其次，他不像戈林及其他第三帝国的领导人那样，生活腐化，丑闻迭出，而是过着清教徒一样的生活，从不收取任何形式的贿赂，容易引起公众的好感；另外，他工作勤奋，肯吃苦，也是为希特勒所看重的一个优点。他在担任新职后，曾将希特勒在吃午饭时随口对时局作的评论，整理成一份很有水平的元首书面公告，深得希特勒赏识，也更使希特勒觉得自己没有用错人。后来鲍曼和戈林长期明争暗斗，两人成为不共戴天的政治死敌，直到第三帝国灭亡前夕，鲍曼还在为把戈林置于死地绞尽脑汁。1945年10月，有人间已沦为阶下囚的戈林，“你认为鲍曼死了吗？”戈林激动地把双手往上一举，大声喊道，“如果我说了算，我希望他在地狱里受煎熬！”在即将走向生命的尽头时还不忘诅咒对方，可见戈林对鲍曼的仇恨有多么深了。

5月上旬，希特勒下令夺取英国人占领的克里特岛，戈林亲自策划了这次行动。5月20日，德军的一个空降兵师作为进攻的主力，在空军和海军的援助下袭击了岛上的英国人。英国人似乎事先已得知德军进攻的消息，他们作了充分的准备。尽管德军最终占领了克里特岛，但毕竟付出了数千人死亡，150架飞机被击落的代价。克里特岛争夺战结束后，有人指出这次战役之所以损失惨重，甚至得不偿失，原因之一就是德军的密码被英国人破译，对此，戈林矢口否认、拼命辩解，他一直将这次战役看成他个人的一项杰作。戈林极好面子，喜欢贬低别人抬高自己，从来不肯服输认错，他的这种性格特点在接下来发生的几件事中暴露得很充分。

伊拉克首相拉希德·阿里策划了一场反英暴动，戈林派费尔美将军率领

两个飞行中队前去援助暴动军队。可是，由于德国援军的力量不够，加上出动得太晚，这次军事援助行动归于失败。事后，戈林为了掩饰自己的失误，将责任一股脑推到了具体指挥这次行动的费尔美身上。他对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说，“费尔美等人对外出飞行简直一无所知。我个人认为这次行动没有任何战略意义，因为向阿拉伯地区空运燃料不切实际，而且代价太高。”这样，戈林就将自己考虑不周的责任推得干干净净。不久，德国最新战列舰“俾斯麦号”被击沉，致使2300名水兵丧生，戈林趁此机会在希特勒面前大肆攻击海军元帅雷德尔，与此同时，他向希特勒呈交了一份克里特岛大捷的报告，极力吹嘘自己的指挥才能。两相对比，希特勒少不了又夸奖了戈林一番。

5月初，戈林的研究所得一份有关斯大林4月初在克里姆林宫一次宴会上的讲话的秘密报告，斯大林宣称苏联进攻西欧只是时间问题。看到这份报告，戈林再次对希特勒佩服得五体投地。不过，他即便明白苏德交战势在必行，也还是想先同英国讲和，再向苏联宣战，因为他实在不愿看到德军在两条战线同时作战的窘境重现。然而，“巴巴罗萨计划”已不可能更改，戈林只有寄希望于希特勒所说的对苏战争速战速决会成为现实。进入6月份之后，戈林按照希特勒的指示，频繁地往来于德国的周边国家，以各种形式游说、动员这些国家为“巴巴罗萨计划”的实施尽一份力。瑞典被排除在外，希特勒不让戈林再同瑞典人多费口舌。理由是瑞典政府上层人士“基本都是亲英派”，对瑞典怀有特殊感情的戈林表示遵从希特勒的意见，希特勒则对他的屈从感到满意，曾说：“连帝国元帅对瑞典的迷恋心理都被纠正了过来。”

6月1日，希特勒同戈林及耶顺内克三人再次长时间会谈，他们仔细推敲了“巴巴罗萨计划”中空军行动方案的细节。3日，希特勒和戈林单独商谈了一个下午。紧接着，希特勒向墨索里尼，日本驻德大使及其他各盟国发出即将对苏发动进攻的暗示，匈牙利、罗马尼亚、芬兰、保加利亚接二连三给希特勒回电，郑重声明将参与德国的行动，同一天，达勒鲁斯在斯德哥尔摩收到一份密码电报。一个星期后，他向英国大使详述了这份密码电报的内容，并称这份电报是一位密友发来的，“具有绝对的可靠性——这是一份绝密的电报……德国可能在6月15日进攻俄国。”达勒鲁斯还将电报的主要内容通知了美国使馆，美国战后公布的档案材料对这件事有所记述，其中有一段文字是“达勒鲁斯……已从戈林那里得到德国准备立即进攻俄国的可靠资料。”

6月14日上午11时，德国海陆空三军及参谋机构的40多名主要将领齐聚柏林总理府，听希特勒作关于即将开始施行“巴巴罗萨计划”的报告。希特勒再次陈述了必须进攻俄国的理由，宣称“战胜俄国是德国最后赢得战争的唯一出路。德国已别无选择”。接着他在谈到英国问题时说：“德国的主要的敌人仍然是英国，英国之所以还要坚持打下去，是因为他们幻想美国和苏联的介入，他们的战斗也只有在上述条件下才有意义。……俄国人一旦被打垮，英国人就会意识到已经没有必要同德国对抗下去了。因此，我们希望同苏联的冲突早日到来，诚然，我们不想丧失目前的有利条件——苏联人还没有做好开战的准备，美国人还没有参战。”最后，希特勒宣布将实施“巴巴罗萨计划”的时间定在6月22日。

会后，戈林单独向希特勒汇报了空军的计划。他告诉希特勒，在同苏联开战的第一天，他就将派出2700架飞机，这些飞机的主要任务是摧毁俄国布置在边境线上的4000多架飞机和1000多个无线电侦察情报站，然后全力支

援地面部队的进攻。希特勒没有对戈林的布署提出异议。

次日，戈林将各航空队、防空区及各军司令员召集到卡琳庄园开会。后来，米尔希回忆道，戈林在那一天“心情沮丧”，会议结束后，他独自一人默默地在水园里散步。即便在这种时候，戈林也没有忘记他的艺术品，他抓紧时间同霍弗等人谈了一个多小时。随后，戈林登上他的专列准备返回柏林。在开车前的一分钟，达勒鲁斯就像从天而降的幽灵一样，悄悄地出现在戈林的专用车厢。

6月19日，流亡伦敦的波兰总理求见美国大使托尼·比德尔。会面后，比德尔向华盛顿发电：“据可靠消息，戈林已通知他的一位瑞典朋友，德国可能在6月22日，星期天，向苏联发起进攻。”

1941年6月22日，星期天，德军在自波罗的海至黑海的1000多公里的战线上向苏联大举进攻。在最初的一个月里，苏军似乎已经完全崩溃，苏联人似乎只有束手待毙的份儿了。直到10月3日，希特勒回到柏林，还在公众集会上狂妄地宣布：“东方的敌人已被打垮，再也无法站起来了……在我们部队的后边，已经有了相当于我在1933年执政时德意志国家幅员两倍的土地。”10月8日，德军攻陷莫斯科南方重镇奥廖尔。希特勒的新闻发布官狄特里希向世界各国新闻界宣布：“从各种军事意义上看，苏俄已被打垮，英国人的两线作战的迷梦已经破灭。”纳粹党徒们手舞足蹈，个个都是一副大功即将告成，世界就要归他们主宰的神气活现的模样。

戈林狂喜之余，暗自庆幸自己没向达勒鲁斯透露更多的东西。他现在完全振奋起来了，并同其他纳粹上层人士一样，坚信对苏战争在几个星期内就会结束，于是关心起来在新的政治格局的建立中自己能捞到什么好处。一场权力和地位的角逐已在纳粹上层展开，戈林当然不会居干人后。最完得到好处的可能要数戈林最憎恨又最瞧不起的鲍曼了，两个星期以前，希特勒已将帝国的党务部长这一要职交给了他，这使得戈林又怒又怕。

6月28日，对苏战争刚刚打响一周，戈林便迫不及待地跑到新的元首总部，再次提醒希特勒注意鲍曼的“野心”，并婉转地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希特勒则安慰说，戈林在第三帝国中的地位是任何人都无法取代的，他会让戈林满意的。第二天，即6月29日，希特勒果然签署了一份秘密命令，确认戈林为他死后的“唯一”的接班人，并且可以作为他的“一切事务的代表”。戈林心花怒放，尽管他知道这一许诺能否兑现依旧是个未知数。可他的身份——纳粹德国的二号人物，毕竟再一次得到强调。不过，戈林也明白，即便有此“尚方宝剑”，他也决不能掉以轻心，像鲍曼、里宾特洛甫、戈培尔、希姆莱等都是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他们仍然野心勃勃，不甘居于戈林之下，随时都有下毒手、使绊子的可能，他们难以将戈林打倒，戈林也难以将他们铲除。

对苏战争开始之后，戈林在罗斯特肯建立了自己的东方总部，这里距希特勒新的大本营仅一个小时的路程，以便同希特勒保持着最密切的联系。

总的来说，在对苏战争的最初阶段，戈林的处境有所好转，由失意到得意的势头已现。美中不足的是他的身体状况欠佳，尤其是心脏经常出问题，他几乎每天都要接受心脏病专家海因里希·策勒教授的治疗。有一个时期，他甚至不再关心战局，而把注意力完全放在医生为他制订的健身计划上，坚持每天游泳、散步、骑马，锻炼身体；一有机会就乘飞机去观赏歌剧，或回卡琳庄园看望妻女，以便放松自己，减轻业已衰弱的心脏的负担。在那年夏

天，他一反常态，没去前线视察过一次。有一天，驻挪威的第5航空队司令官施通普夫专程到卡琳庄园汇报，没想到戈林刚听了一会儿，就不耐烦地打断他的话，嚷道：“行了！现在咱们去看看卡琳庄园吧！”戈林借命的心情不难理解，他太怕死在希特勒的前面了。很简单，假如他先元首而去，元首指定他为接班人的秘密命令就真正成了一张空头支票，他戈林今生今世也就无法尝到站在权力的顶峰，以至君临天下的滋味了。

正是：司马之心路人知，南柯一梦权臣喜。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 第二十章 兵败莫城

烽火难熄怀倦意，对姜宣战心如焚；  
局势急转呈败象，才知元首非圣明。

前面说到德军最初一个月在苏联战场的胜利使得纳粹党徒欣喜若狂，一场以谋取私利为目的的政治角逐在纳粹上层展开，戈林等人的注意力已从战场转向了官场。可是，这些人高兴得太早了，俄国人至少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不堪一击，德军统帅部不得不承认，“巴巴罗萨计划”受挫，不仅仅是因为行动得太早，最根本的是低估了苏俄的力量。德军越是深入苏联的腹地，德军最高统帅部的忧心越重。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苏俄在已经损失数百万军人的情况下，还能投入如此之多的兵力予以德军从未遇到过的顽强有力的抵抗。德军最高统帅部在给希特勒的报告中说，“开战后，俄国方面按照他们自己的战略计划，集中了 12000 辆坦克和 8000 架军用飞机，这足以证明俄国人对受到进攻已有准备。”

然而，纳粹的上层人士始终不愿正视现实，他们对战争的结局已下定论，那就是俄国人在三个月之内必将被彻底击败。至于军方的忧虑，希特勒则认为那是德国军方历来的弱点。他对戈林说：“即使俄国人就像陆军所说的那样强大，那也是过去的事了，在遭受这样的打击之后，俄国人已经没有力量抵挡住我们进一步的打击了。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巩固在俄国的统治。”

在入侵苏联不足一个月的 7 月 16 日，希特勒就曾召开会议，研究在战争期间及战后如何巩固对占领区的统治的问题，戈林和各部部长都参加了会议。希特勒首先强调彻底消灭俄国的决心：“我们再也不离开这些领土，在乌拉尔以西再也不会会有任何军事大国，即使我们要战斗一百年也在所不惜。剩下的问题只是在四年计划（戈林负责）、党（鲍曼负责）和警察（希姆莱负责）各部门之间分配责任。”戈林兴奋异常，再次在会议中间站起来保证，空军将在未来的战争中尽最大的力量。他还对希特勒亲自授予战斗机王牌飞行员、戈林的战斗机部队司令维尔纳·默尔德尔斯骑士十字勋章表示感谢。接着，希特勒对瑞典人在苏德战争之前的行为进行了抨击，戈林作贼心虚，为了掩饰内心的不安，他在希特勒的话音刚落便跟着指责瑞典人“堕落”。

那一天，希特勒的心情好像格外地好，对戈林居然又恢复了从前亲密友好的态度。会议结束后，还特意留戈林单独呆了一会儿，询问他的身体和家人的情况。当话题转到“巴巴罗萨计划”时，希特勒很恳切地对戈林说：“你应该知道，我对这场战役非常担心，因为这是关系到德国命运的一次战役。假如在战争开始之前，我知道苏联军队的总体实力，特别是知道它有庞大的坦克部队，真不知道我是否还会做出同样的决定。但是，很清楚，俄国的问题必须解决，而现在正是着手解决问题的最好时机，等到明年可能就太晚了。”听到希特勒道出肺腑之言，戈林受宠若惊，大为感动，因为希特勒很久没有这样推心置腹地同他谈话了。在向希特勒告别之前，戈林满腔赤诚地立下誓言，他愿为元首的千秋大业效尽犬马之劳。

在 7 月 16 日的会议之后，戈林根据会议决定，建立了东方领土经济活动参谋部，全权负责被占领地区的经济事务。

实际上，从 7 月下旬开始，战争形势就发生了一些变化，德军从前方传回的战报已不像最初那佯鼓舞人心。为了防止形势继续逆转，希特勒命令戈

林指挥空军对莫斯科实施“恐怖袭击，以加速布尔什维克内部的分裂”。7月21日、22日两天，德国空军猛烈地轰炸了莫斯科，但并没有收到什么效果，苏联人没有一点退缩的表示，从莫斯科那里也看不出任何“崩溃”的征兆。戈林非常希望了解莫斯科方面的动向，为此专门同纳粹情报部门首脑卡纳里斯密谈了一次。卡纳里斯告诉戈林，“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这场战争不会如我们所预料的那样造成布尔什维克主义内部的崩溃，甚至连一点刺激作用都没有。”闻听此言，戈林前几天的亢奋情绪一扫而光。不知是巧合，还是有人故意安排，瑞典人达勒鲁斯在戈林同卡纳里斯会谈之后，突然又神秘地出现在卜琳庄园，戈林在密室里同他的这位老友单独谈了4个多小时，至于究竟谈了什么，对于其他人来说只能是个谜。第二天，达勒鲁斯匆匆地乘飞机走了。

7月31日上午，埃米从巴伐利亚打来电报，告诉戈林她将返回柏林同丈夫见面。戈林冒雨来到空军司令部，准备在埃米到来之前，将手头的文件处理完毕，然后同埃米一起回庄园度假。下午6点左右，就在戈林准备去车站接埃米的时候，他的副官报告说盖世太保头子海德里希求见。戈林不禁有些诧异，猜不出海德里希找他会有什么事，他平时一向不太过问盖世太保和党卫军的事情，深怕引起希姆莱的猜疑和不满。但他又很想把海德里希这位年轻气盛并且精明强干的党卫军办公厅主任拉拢过来，使他能为自己所用。现在，海德里希找上门来了，机会难得，戈林忙让副官传见。海德里希对帝国元帅毕恭毕敬，弄得戈林心里非常舒服。海德里希说，他来这里是想让戈林在一份文件上签字，这份文件是他以帝国元帅的名义亲自起草的，内容主要是授权海德里希，“全面解决德国人的势力范围内的犹太人问题”，“在组织上物质上作好一切必要的准备工作，……并提出一个包括有关措施的总体方案”。戈林接过文件匆匆看了一遍。只见他的名字已被打在了文件版头。戈林问海德里希为什么不找希姆莱签署这份文件，海德里希回答说，他认为帝国元帅更权威，海德里希的恭维恰到好处，戈林微笑地答应了他的请求，痛痛快快地在文件上签了名。海德里希走后，戈林立刻心情愉快地赶往车站接埃米。此时，他怎么也不会想到，刚刚签署的这份文件正是5年后他被判处绞刑的最重要的罪证之一。戈林很快将这件事忘到了脑后，直到在纽伦堡审判中法官出示证据，他才回忆起来。

接到埃米后，戈林陪她回卡琳庄园住了一段时间，接着又从卡琳庄园去巴伐利亚度假。在居留慕尼黑时，戈林再一次将目光投向了博物馆，并拿走了一些艺术品。8月中旬，戈林以参加空军的作战会议为名来到巴黎。其实，他对会议没有任何兴趣，这次来巴黎的直接原因是得知驻守在巴黎布瓦德布洛涅城堡的海军通信部队，在一名犹太富商的城堡里发现了一只保险柜，里面装有一批18、19世纪的珍贵的油画。戈林来到巴黎后，立刻派人将这批画作送到他下榻的饭店，然后在象征性地参加了一次会议之后，心满意足地返回了柏林。

在戈林休假期间，希特勒同陆军总司令部之间在战略问题上的分歧日益严重。希特勒一直主张德军在苏联战场上形成钳形攻势，一路指向列宁格勒，一路指向乌克兰和高加索。希特勒之所以坚持这样的战略方针，除了因为他对乌克兰的粮食和高加索的石油垂涎已久之外，同时他还认为攻占这两个地区，还可以诱歼坚守在基辅东面的苏军布琼尼集团军。而打下列宁格勒不仅可以在心理上给苏联人以致命的打击，而且能同芬兰军队会师。出于以上种

种考虑，希特勒下令，在没有达到上述目的之前。暂不进攻莫斯科。但是，以勃劳希契和哈尔德为首的德国陆军总司令部则力主立即进军莫斯科，理由是苏军主力正在向莫斯科集结，打下莫斯科，就可以使苏联失去最后一支有生力量。他们还指出，莫斯科是苏俄最重要的军火基地，也是苏俄交通的主要枢纽，莫斯科一旦被拿下，后方的苏军就很难被输送到前方。双方备持己见，互不相让，希特勒大骂陆军司令部的将军们“全是一些脑袋被过时的理论弄得陈腐不堪的人”。那边也不甘示弱、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同勃劳希契商议，如果元首再坚持他的意见。他们就一起辞职。

戈林回到柏林后，毫不犹豫地站到了希特勒一边，拼命攻击勃劳希契和哈尔德，声称他们干扰了元首的战略意图。8月20日，戈林在由他主持召开的军事会议上，指责勃劳希契“正在背叛元首，总是阳奉阴违，惯于在背后捣鬼”。如此激烈的言辞终于激怒了一向对戈林唯唯喏喏的勃劳希契，他站起来同戈林大吵了一通。结果戈林和勃劳希契均因心脏病发作，不得不在下午的会议上将他们各自的保健医生带来。

由于希特勒不肯让步，陆军被迫改变了进攻的方向，开始向基辅和列宁格勒进军。9月19日，南路集团军占领基辅。德国通讯社发布消息说，苏军大约有65万人被消灭。陆军方面也并不是毫无保留地向希特勒妥协，中路集团军两个月来一直按兵不动。在攻占基辅之后，希特勒同意了陆军司令部攻打莫斯科的要求。然而，时过境迁，为时已晚，俄国的秋雨季节马上就要来临，接着便是令德国人发指的冰天雪地的严冬。

戈林时常对战事心生厌倦，对陆军的胜利更是不屑一顾。9月初，他来到罗明顿，不顾雷雨和冰雹，每天出没于猎场，恣意作乐。跟随戈林来这里的空军副总参谋长瓦尔道在9日那天的日记里写道：“为了追逐猎物，我们每天要兜80英里的圈子……我们这种生活方式同部队是无法相比的。一整天，都下着瓢泼大雨，公路变成了沼泽。我们即将进入冬季战役，真正的考验将来到。”

瓦尔道并不完全理解戈林此刻的心情，开战以来，还发生了一件他一直不愿提及但又使他懊丧万分的事情。戈林的空军由于要应付西欧、北非、俄国和意大利战区的繁重的飞行任务，随着战事的日趋紧张，飞机的数量明显不足，空军司令部的官员们为此伤透了脑筋。而戈林的老友，他亲自任命的空军军械局局长——恩斯特·乌德特，却一直没有办法增加飞机产量。有一段时间，戈林多次催促乌德特拿出改变现状的办法，乌德特每次都拿着一大堆图表来向戈林叫苦，语无伦次地诉说材料和人力严重短缺，飞机的生产已经到了极限。头几次戈林相信了他，后来觉察到“我上当了”，再后来戈林发现，酒精中毒已使乌德特的精神和身体状况极度恶化，他几乎不能正常工作了。于是，在戈林的劝说下，乌德特将军住进了空军中心医院。

乌德特事件很快过去了，可这位空军军械局局长所造成的损失却不是一下子就能挽回的，空军装备短缺成了戈林的一块心病。戈林明白，他即便再巧妙地隐瞒事实，也难以骗过希特勒。因为他无法阻止各军团向最高统帅部发出派空军配合的请求，况且最高统帅部的那些将领们早就巴不得他在希特勒面前丢脸，他们肯定会添枝加叶地把事情的真相告诉希特勒。

进入8月份之后，军备不足的德国空军在各条战线上都放慢了行动。为了应付作战任务，他们只好最大限度地增加复飞架次，仅驻守苏联前线的第4航空队，一天就得飞出1600多架次，但仍然满足不了陆军方面的需要。在

这段时间里，英国皇家空军每天要对意大利北部的德军进行数次轰炸，最高统帅部的情况通报中说，空军作战不利，已经严重影响了驻意大利的德军的士气。而以马耳他为基地的英国空军，则使北非的隆美尔军团的供应线经常处于极大的威胁之下。隆美尔直接给希特勒发去电报，要求空军能够“意识到这是一场战争，而不是游戏”。10月2日，戈林和意大利空军参谋长在罗马明顿举行会议，商谈支援北非战场和保护意大利北部制空权的问题。会后，根据戈林的建议，希特勒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只好批准把第2航空队和整个空2军从苏联前线调往意大利。

进入10月份之后，德军在莫斯科外围的攻坚战中取得了重大战果，他们在其仆从国军队的援助下，于维亚兹马和布良斯克一举消灭苏军75个师。德军最高统帅部向希特勒报捷：“我们已经最终和毫不夸张地赢得了胜利！”这时，戈林也认为夺取莫斯科仅仅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因此赶紧命令空军参谋部绘制一幅包括莫斯科航空区在内的新地图。那顺内克在给前线部队的电报中说：“空军最多在莫斯科前线呆到11月6日……至多到那时，我想空军在莫斯科的任务就将基本完成。”

尽管战斗仍在继续，德国军官们却早早摆出一副胜券在握的架势，包括戈林在内的纳粹上层人士们更是恨不得立刻把自己应该在战争中得到的那份好处捞到手。然而，他们还是算计错了。由于气温急剧下降，德军遇到了难以克服的困难，就连在相对温暖一些的南乌克兰，冰雪也使得德国空军的飞机无法起飞。空军和陆军之间的矛盾尖锐起来，空军埋怨陆军行动缓慢，陆军则指责空军配合不利，戈林还不时在希特勒面前指出哈尔德和勃劳希契指挥失当之处。10月23日，纳粹谍报局头子卡纳里斯到最高统帅部汇报他的部门在德军夺取高加索油田时将采取的行动。当他在谈话中提到第二天要去看望戈林时，最高统帅部首脑、陆军元帅凯特尔毫不掩饰地大发雷霆，“帝国元帅，”他高声喊道：“真成了不在职的最高统帅部首脑！他总是在我的背后捣鬼。”

戈林大概终于知道了德国人不会轻而易举地在苏联战场取得胜利，因此，在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他开始奔走于各兵工厂，督促他们加紧生产。为了解决人力不足的问题，戈林还专门召开会议，研究将苏联俘虏用于战争工业的问题。正当戈林为堵上军械局局长留下的漏洞而奔忙时，11月17日中午，有人打电话告诉他，当天早晨乌德特自杀身亡。戈林的心头一阵惊颤，自从把乌德特送进医院之后，他几乎忘掉了这位老朋友。放下电话后，戈林马上赶到了空军医院。走进自杀者的房间，戈林一言不发地站在他的床前，看着他胡乱涂抹在墙上的临别“留言”：“铁石心肠的人，你抛弃了我！”在场的人可能都不知道这个“铁石心肠的人”是谁，戈林却明明白白，他忘不了他早年的绰号，而这个绰号被死者写在了墙上。戈林手指着墙上的字转身吩咐道：“立刻把这些东西抹掉！”随后阴沉着脸走出了房间。

第二天，空军部发布了这样一则公告：

“1941年11月17日，在试验新式武器时，空军军械局局长乌德特上将因严重事故致伤死亡，以身殉职……元首已下令举行国葬。”

戈林不知是为了维护老朋友的声誉，还是怕给自己惹出麻烦，编造了谎言。在安葬乌德特的那一天，戈林命令空军系统的所有建筑物都要下半旗致

哀。葬礼的规模很大，在柏林的党政要员云集空军部大礼堂。戈林是最后一个到场的，他脚踏棕红色皮靴，身穿灰色制服，制服上缀有金色飘穗，浑身上下，齐齐整整，在人群中显得很扎眼。在葬礼结束之前，主持人请戈林讲话。他作出悲不自胜状，用变了调的声音说：“对于他的死，我只能说我失去了一位最好的朋友。”

葬礼结束之后，同戈林一起回到空军司令部的米尔希对他说：“对乌德特的许多工作需要重新加以检查，否则将会对空军装备的生产产生极其不利的影 响。”戈林点头称是。他无需在米尔希面前掩盖乌德特的失误，因为他知道对于米尔希这样的行家来说，任何借口都是拙劣的，都会被看穿。戈林长叹了一口气，对米尔希说：“看来我是用错了人，乌德特一直在欺骗我。”接着从他那宽大的写字台的抽屉里拿出一叠厚厚的图表，扔到米尔希面前，恨恨他说：“你看看这些东西，乌德特长期以来就是用这些东西愚弄、欺骗了我，使我成了瞎子！”他又站起来敲打着这些图表大叫：“他就是用这些三色笔绘成的图表骗我。”米尔希默默地看着怒不可遏的戈林尽情表演，尽管他有许多话要说。显然，戈林长期以来对乌德特的放纵和庇护，已使德国军工业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在此之前，米尔希曾多次提醒戈林，要他注意空军军械局的情况，可戈林每次都回答说，他对乌德特的工作是满意的。戈林真要追究责任的话，那最终的责任者只能是他自己。

不久，希特勒任命米尔希为新的空军军械局局长。米尔希果然没有辜负元首的厚望，到 1944 年 4 月，德国飞机制造厂的产量。

比乌德特担任军械局长时增加了 14 倍。

乌德特死后不久，又一出悲剧在德国空军中上演，战斗机部队司令默尔德斯在驾机返回东线时，于布雷斯劳坠毁。为默尔德斯举行过葬礼之后，戈林委任加兰接替了死者的职位。12 月 1 日，戈林在加兰的陪同下，乘坐他的“亚洲号”专列去了巴黎。他想尽快离开充满肃杀之气的柏林，呼吸一下塞纳河畔的清新空气，再从那座令他无法忘怀的网球场大厅中搜寻一些中意的艺术品，让他那被一系列变故弄得发昏的大脑休息一下。

就在戈林出发去巴黎的那一天，在冰天雪地的苏联前线，包克元帅命令他的集团军向莫斯科发起总攻。气温降至零下 31 度，冰雪覆盖着大地，德军的行动受到了限制，装甲部队施展不开。古德里安将军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天寒地冻，无处避寒，身无棉衣，人员装备都遭受了严重损失，燃料也供应不上——所有这一切，都使我无法再履行司令官的职责……。”12 月 2 日，莫斯科的气温继续下降。古德里安指挥他的第二坦克集团军向莫斯科城南突进”可是，坦克车驾驶员冻得不能正常工作，坦克炮塔被冻住，炮弹卡住动不了，严寒使炸药只能发出嘶嘶的响声，与此同时，苏军的抵抗却越来越顽强，古德里安只好下令暂缓行动。到 12 月 5 日，德军全线停止进攻，并在部分地区出现后撤现象。坐镇大本营的希特勒如坐针毡，一天当中给包克发去数次电报，命令德军务必坚守阵地，为“新的攻势”作准备。

12 月 6 日，在苏联红军中路战线司令朱可夫将军的指挥下，由 100 多个师组成的苏军反攻部队发起了进攻。尽管为了扭转局势，希特勒曾亲自飞赴莫斯科前线督战，并撤换了包括古德里安在内的一大批前线指挥官，但还是无济于事。

戈林仍旧在巴黎消磨时光，对前线的局势漠不关心。他每天不是到卢浮宫参观，就是同一些艺术品商人打交道，抽空还多次到埃米在巴黎开设的一

家时装店参观，他在此期间所做的唯一一件公事就是和加兰一道视察第 26 战斗机大队，他们在那里检查了新式战斗机的性能。转眼之间，一个多星期过去了。

12 月 9 日晚上，戈林得到了日本军队进攻珍珠港的消息。他大吃一惊之后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派副官去把加兰找来。

副官出去后，戈林走到窗前，凝视着宁静的夜空，心情却久久不能平静。事态究竟将如何发展，尚不可预料，思前想后，戈林心乱如麻。他知道，希特勒早在年初，就曾指示里宾特洛甫，尽力说服日本进攻英国在亚洲的领地。因为希特勒认为，只要日本人在亚洲挑起事端，使美国在那个地区的利益受到威胁，美国人卷入欧洲战争的可能性就极小。即使罗斯福想要参战，美国国会中的孤立主义势力也不会同意在两线同时作战。这样，美国人就只好留在太平洋地区，同世界上最强大的日本海军作战，保卫自己的西海岸了。可是，戈林却不这样看。尽管在公开场合，他一再挖苦美国人“唯一擅长的就是制造汽车——而不是飞机”，其实是在给自己壮胆，他对美国的军工生产能力比谁都了解，知道大批制造飞机对于美国人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情。美国人一旦在亚洲占了上风，就会抽出身来同英国人一起对付德国。到那个时候，战争的结局就不那么乐观了。此外，还有另一种可能存在，那就是假如德国不向美国宣战，美国即使打败了日本，也并不公开介入欧洲战争。在戈林看来，这种可能对德国人最为有利，也比较有希望成为现实，想到这里，戈林不由得暗暗地祈祷，希望希特勒千万不要向美国宣战。

加兰急促的脚步声打断了戈林的沉思。戈林告诉加兰，“日本人已经向美国人宣战，日本海军袭击了珍珠港。我们马上回柏林。”停了一会儿，他拿起那根特制的元帅手杖轻轻地敲打着写字台，自言自语似他说：“这一下子，我们就得全体上阵了。”

第二天中午，戈林的专列临时停在莱茵兰车站，他同希特勒通了电话。希特勒在电话里说，他已决定向美国宣战，并已通知德国驻华盛顿的临时代办在明天下午 3 点半钟，向美国政府递交宣战宣言。戈林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终于发生了，而这样一件大事，希特勒事无竟没同他商量，竟把他这位帝国元帅蒙在了鼓里。戈林恼羞成怒，心急如焚，不管不顾地大声对希特勒嚷道：“根据三国条约，既然日本首先开战，我们就没有必要再向美国宣战，条约规定只有在日本受到美国人的侵略时，我们才有义务向美国宣战。”希特勒打断了戈林的话，说，“这种话里宾特洛甫也说过。但是，如果我们不向美国宣战，那么三国条约就等于失去了政治上的意义。况且，我们现在实际上同美国已处于战争状态，他们一直在大西洋对我们的海军实行打击，只不过是我们在克制——好了，你尽快回到大本营，这件事已经决定了，没有人能让我改变主意。”“啪”的一声，希特勒把电话放下了。戈林慢慢地放下电话，颓然跌坐到椅子上。

戈林怀着满腔愁绪回到了柏林。12 月 11 日上午。他主持召开国会会议，通过纳粹德国对美国宣战的宣言。在希特勒即兴发表充满煽动性的演说时，戈林面无表情坐在后面一排。恐惧感、失落感牢牢地控制着他，使他的心情坏极了，他觉得自己同台下那些不时向希特勒欢呼的头脑简单的国会议员没什么两样，都仅仅是元首的战争棋盘上的一个可以随意摆放的棋子。

国会会议结束后，希特勒的副官让戈林到国会大厦的一个房间里等希特勒，戈林以为希特勒会向他解释在向美国宣战之前没同他商议的原因，没想

到希特勒却只字不提这件事，只就各个战场的情况同戈林交换了意见。希特勒对戈林说，空军一定要在俄国和北非战场上继续发挥作用、并对前一阶段空军在这两个战场上的表现表示满意。戈林本来做好了聆听希特勒对空军在北非的作战情况的批评意见的准备，却意外地受到了表扬，不由得想元首真是越来越让人捉摸不透。话题一转入苏联战场，希特勒便变得歇斯底里起来，他不断地痛骂陆军的将军们无能，从包克一直骂到勃劳希契。戈林趁此机会公报私仇，说了他们许多坏话。希特勒大骂一通之后，心里痛快了一些。他对戈林说：“我不能再让这些将军毁了我们这场战争。从现在开始，我要亲自指挥军队——这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我已经告诉了勃劳希契和哈尔德，无论在任何形势和条件之下，都不许后撤。我真不明白，他们竟连这个道理都不懂，只要后撤，用不了几天，我们在莫斯科的部队就得全部垮下来。他们忘记了，我不是拿破仑，我不会做出那种千古憾事。”

“我同意您的看法，因为在莫斯科的后面，没有任何可使我军顺利后撤的防线，后撤的军队很可能几天之内就在严寒中垮掉。”戈林附和着元首。

希特勒接过戈林的话头说：“还有士气，他们忘记了，一旦在这种情况下后撤，我们的士气就要受到影响，就会使失败的情绪像瘟疫一样，波及其他战线，我决不允许在我们的部队中出现这种情况。”

回到卡琳庄园后，里希特霍芬将军来访，戈林急忙让他汇报一下前线的情况，里希特霍芬绘声绘色地把德军的悲惨境遇描述了一遍。他讲了在零下30多度的严寒中，衣着单薄的士兵如何坚守阵地，讲了坦克部队已陷于一种什么样的境地中。他正滔滔不绝地讲着，戈林不高兴地打断他的话说：“不要再讲了，我想我军在前线的情况不会糟到这种程度。你悲观地估计形势，大概是因为受到陆军那些无能的将军们的影响，你是空军在莫斯科前线的司令，会将这种情绪带到部队中去！”

里希特霍芬非常生气地站起来辩解：“我觉得我说的这些都是最真实的情况。如果您只想听好听的，那么您完全可以找别人来说，何况您也不应该只要求听好听的。”

戈林对里希特霍芬的态度似乎没太介意，他也站起身来，在地上转了两圈，然后慢吞吞地问道：“这么说，你认为现在我们在莫斯科的部队只好撤退了，既然你将前线的形势说成是这个样子。”

“不，恰恰相反。”里希特霍芬显然为自己刚才的举动感到不安，他尽力压低声音说：“我对您说的只是前线的真实情况，说这些并不等于就是说我们现在已被俄国人打败。前线的形势严峻，才说明了我们的士气是世界上第一流的。如果现在我们撤退的话，那就只好步拿破仑的后尘了。”说着说着，里希特霍芬又重新激动起来，他说：“既然陆军的兵力不够，就应该把空军多余的人员统统送到前线去。要告诉每一个士兵，要么战胜，要么战死。元首必须向前线的将士们呼吁，全军将士一定要不屈不挠，决不后退。”说完这番话，里希特霍芬平静下来，等着戈林的反应。

戈林大声叫道：“说得好，你不愧是我们空军的骄傲。我今天和元首谈的就是这个问题。我和元首的意见完全一致。我们不能从莫斯科退下来，撤退只能是陆军那些糊涂将军们的想法。”接着，他又亲切地拍着里希特霍芬的肩膀说：“明天你和我一起去元首那里，将你的看法再向元首讲一下。”顿了一下，他缓缓地说：“这是一场真正的战争，不久所有的人都会知道。”

看到戈林露出异常沉重的表情，里希特霍芬歉疚他说：“帝国元帅阁下，

我为自己刚才的鲁莽向您道歉。”

戈林宽厚地一笑：“不，我应该向你道歉，是我先发的火。”里希特霍芬深受感动，心情舒畅地离开了卡琳庄园。

第二天，戈林果然带里希特霍芬去见希特勒，将他们的意见向希特勒陈述了一遍。希特勒认真地向里希特霍芬询问了前线的情况和德军的士气，然后对戈林和里希霍芬说：“你们的话使我坚定了决不后撤的信心。”同日，希特勒正式向莫斯科前线的德军指挥部下达决不允许后撤的命令。

然而，莫斯科城下的德军实在无法再坚持下去了。尽管希特勒严令不许后撤一步，但朱可夫指挥下的苏联红军的猛烈进攻，使得德军每坚持一天都要付出极大的代价。盛怒之下，希特勒接受了勃劳希契的辞职。在同一天，希特勒宣布，他将亲自出任陆军总司令。戈林得知一向同他不和的勃劳希契辞职的消息，不仅没有幸灾乐祸，反而有一种兔死狐悲之感。戈林后来在和勒歇泽谈起这件事时说，“在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真是有些怜悯勃劳希契，尽管在此之前，我对陆军的行为不满……他是一个可怜的人。”

希特勒没同戈林商量便发布命令，指示德国空军在俄国的全部力量一起出动，摧毁莫斯科附近所有可能被俄国军队利用的民居和其他建筑物。对希特勒越过自己，直接向空军发布命令，戈林心生不满，但又敢怒不敢言。

戈林急于从没完没了。越来越棘手的战事中脱身，他想暂时离开东线。出发前，他本来说要回卡琳庄园，可在半路上改变了主意，提出先去贝希特斯加登，然后再转道去看埃米，这样就得绕出1000多英里。戈林顾不了许多，他只想走得远一些，快一些，而不想在柏林多呆一分钟。在去贝希特斯加登的途中，戈林问陪他出来的勒歇泽：“你说，我们经过千思万虑，对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都有所考虑，到头来怎么会得到这样的结果？！”勒歇泽不知如何作答是好。也许戈林心中已有了答案，那就是原因在于希特勒战略指挥的失误，可有谁敢这么说呢？现在，希特勒跳到了前台，所有的陆军和空军将领，包括他本人在内，都只能充当希特勒的传声筒了。想到这里，戈林不禁一声悲叹。

戈林人在千里之外，心却无法从元首身边离开，他一直关注着希特勒的态度。几天过去，他见希特勒这次没有怪罪他的意思，便放下心来，在圣诞节到来之前赶回了希特勒的大本营。

在1941年的最后一天，戈林向陆军方面力荐的汉斯·冯·施波内克中将违抗命令，擅自率领部下从克里米亚的刻赤半岛撤下。为了表明自己不徇私情，更为了效法希特勒从严治军，戈林主张严惩施波内克，没想到这引起了他手下的工作人员的义愤。在一次会议上，空军作战部主任霍夫曼·冯·瓦尔道不客气地批评他，“你不能老是高高在上，只管发号施令，等出了问题再让别人去作替罪羊。”后来，在希特勒的总部对施波内克进行了军事审判。瓦尔道在日记中写道：“3年来，我小心翼翼，克尽职守，长期忍受着精神奴役，几乎为工作牺牲了个人的一切，并毫无怨言。但今天想到我们这些人将对事态的发展负有最后责任而又无法影响它时，沉重的负担使我认识到，3年已经足够了。”可以说，戈林的“冷酷无情和不负责任，使瓦尔道坚定了离去的决心。

在逼人的寒气中，新的一年到来，可新的一年并没有给德国人带来好运气。

1942年1月份，莫斯科前线的德军的处境更加不妙，可以说已到了炭炭



可危的地步。1月2日，在同希特勒商谈如何挽回东线的败局时，戈林别有用心地说，严厉地制裁不称职和玩忽职守的陆军将领，是制止溃逃和巩固战线的唯一措施。他还奉承希特勒说，这是希特勒所做的“最伟大的事情之一”。

1月8日，接替包克担任第4集团军司令的克鲁格，不断地给希特勒打电话，在谈完前线情况后，他总是焦虑地说，如果再不后撤，莫斯科前线的德军阵地几天之内就可能被冲垮，到那时后果将不堪设想。当天晚上，希特勒终于同意德军撤退，同时又指出“必须是有组织地后撤，以便保持部队之间的联络”。到2月末，德军已退到离莫斯科二百英里的地区。从此，德军的力量开始走下坡路了，没有一个士兵再敢相信有朝一日他们会站在克林姆林宫脚下。德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被打破，“巴巴罗萨计划”变做一场迷梦，莫斯科战役成为第三帝国致命的转折点。

正是：战场风云多变幻，人间恶难如愿。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 第二十一章 困兽犹斗

新旧权贵玩权术，内外忧患交相困；

夏季攻势被瓦解，北非战场遭厄运。

话说德军在莫斯科城下大败后，一退再退，遂使希特勒攻占苏联首都的梦想成为泡影。同时，在克里米亚至库尔斯克以及列宁格勒一线，挨饿受冻的德军也遭到苏军猛烈反击，侵俄德军面临曹全线崩溃的危险。希特勒在他的大本营里，整日暴跳如雷，大本营中的每一个人都如履薄冰，提心吊胆。到1942年2月份，他几乎撤换了在苏指挥作战的所有陆军将领。令戈林感到欣慰的是，希特勒不仅没有像对待倒霉的陆军将领那样对待空军将领，反而一再褒奖里希特霍芬等人。

随着苏联战场情况的不断恶化，戈林逐渐感觉到，要想明哲保身，不惹麻烦，就得尽量避免参与具体的指挥工作。既然元首愿意事必躬亲，那么自己最好知趣地躲到一边去。由于抱着这样的想法，戈林对战争事务过问得越来越少，而热衷于一些琐事和战后问题的处理。

1942年1月末，希特勒派戈林出访意大利，目的是向墨索里尼表明德国在新的一年里继续战斗的决心。戈林很高兴，尽管他始终不愿同意大利人，尤其不愿同墨索里尼及他那个装腔作势的女婿——外长齐亚诺打交道，但这次毕竟是代表元首去安抚他的“小兄弟”墨索里尼的、大可抖抖帝国元帅的威风。而且，此行的任务极其简单，只要把希特勒的意思传达清楚就可以了。听完希特勒的指示，戈林带着大批随从，前呼后拥地上路了。

戈林的专列一进入罗马，便受到热烈欢迎。看着眼前的盛大场面，戈林再一次触景生情，想起当年他同卡琳在这个城市处处受冷遇的情形，哀叹卡琳无缘分享他今天这份荣耀。戈林的思绪被喧闹的鼓乐声打断，他从人群中一眼看到了墨索里尼，这位昔日傲慢的独裁者亲自到车站来了，意大利外交部长齐亚诺——戈林在罗马最不想见到的人就站在墨索里尼旁边。戈林亲热地同墨索里尼拥抱，而只同齐亚诺握了握手。齐亚诺后来回忆道：“戈林对我怀恨的原因其实很可笑，只是因为我们将一个钻石项饰送给了里宾特洛甫而没有送给他，从那以后他就对我采取一种冷漠的态度。”

在同墨索里尼会谈时，戈林先是直言不讳地承认，德国“正经历着一段艰苦的时期”，他将德军在俄国惨败的原因，完全归于他们“遇到了拿破仑时代以来俄国最寒冷的一个冬季”。随后，戈林活锋一转，给墨索里尼打气：“这种情况将不会继续，不管明年发生什么，元首都将加以制止并及时地克服冬天的困难。”提起北非，戈林立即毫不客气地指出，德军在北非遇到困难，同意大利军队的无能有着直接的关系，他以命令的口吻对墨索里尼说：“为了保证北非战场的胜利，意大利应该每月给隆美尔的非洲军团运送4万吨给养。”当墨索里尼提出由于英国空军的轰炸，北非的供应线很难畅通时，戈林大声叫道：“那么就用海军，如果害怕英国人的军舰和飞机，那么就用潜水艇好了，无论如何，意大利方面要保证这个数字。要知道，德国的非洲军团不仅仅是在为德国人战斗。”戈林这种居高临下、目中无人的作法，使参加会谈的意大利人都十分不快，齐亚诺更是恼火，他决意找机会出出戈林的丑。

2月4日，齐亚诺以墨索里尼的名义为戈林举行盛大的欢送宴会。在宴

会的进行中，戈林自始至终不谈一件正事，只对齐亚诺大谈他的戒指和宝石，齐亚诺表面上很有耐心地听着，其实心里气得不行。宴会结束后，齐亚诺送戈林去车站，见戈林穿上一件黑色的貂皮大衣，就随口夸道：“您的大衣看起来十分华贵。”戈林不无炫耀他说：“这是真正法国货。”齐亚诺接着说了一句：“在罗马也经常看到有人穿您这种样式的衣服，不过大多是那些高级应召女郎在看歌剧时穿它。”戈林的脸色顿时阴沉下来，齐亚诺却像没有看见一样，仍旧谈笑风声。

从意大利回来不久，戈林碰到一件让他愤恨不已的事情。2月8日早晨，大权在握的军备和军需部部长弗里茨·托特博士在飞机坠毁事件中遇难。当天中午希特勒召见前面提到过的建筑总监施佩尔，直截了当地宣布：“施佩尔先生，我委任你接任托特博士的全部职务。”希特勒强调“全部职务”，是因为托特生前除任军备和军需部部长之外，还是掌管全国筑路工程和河流、航道及所有电厂的最高长官。施佩尔工要离开，希特勒的副官通报：“帝国元帅到，并且希望立即同元首“谈话。”希特勒不耐烦地吩咐：“让他进来。”托特出事时，戈林还在离希特勒大本营100多公里的罗明顿，看来他是一刻都没有耽搁地赶来的。

戈林进来后，甚至来不及多寒暄几句，就急切地要求：“四年计划中托特博士的任务最好交给我，这样就可以避免我们过去由于分工交叉而产生的摩擦和困难。”

“我已任命了托特的继任人，施佩尔将接任托特博士的全部职务。”希特勒冷冷地把他的决定说了一遍，而根本不想买戈林的帐。

戈林怔住了。过了一会儿，他才回过神来，不高兴他说，“我的元首，您是否同意我不参加托特博士的葬礼？我同他一直存在分歧，……”戈林说的是真话。托特博士作为军备部长，只能通过直接向工业部门下达命令完成希特勒交给他的任务，戈林作为四年计划负责人，则控制着整个国家的战时经济，他经常限制托特的活动。就在托特死前两个星期的一次讨论战时经济问题的会议上，戈林还训斥了托特一顿，以致托特觉得自己不能再干下去了。不过，说归说，戈林后来还是顾全大局，出席了托特的国葬仪式。施佩尔在回忆录中追述过他当时的感觉：听了希特勒和戈林的谈话后，我明白了一件事，那就是不要指望戈林成为我的同盟者，但希特勒似乎准备支持我——假如我同帝国元帅之间产生矛盾的话。

败在尚属无名之辈的施佩尔手中，作为第三帝国第二号人物的戈林岂肯甘心？他要还对手以颜色。2月13日，米尔希出面邀请施佩尔参加讨论军备问题的会议，施佩尔不安地问，会议能否延期，因为他得先熟悉一下工作。米尔希则反问，全国工业部门的头面人物都已启程，难道新任部长想溜掉不成？施佩尔只好硬着头皮同意参加会议。而在前一天，戈林曾派人把施佩尔找去。他先亲切地谈到在施佩尔任建筑师时两人之间的友好关系，接着便趾高气扬他说：“军备部是为弥补陆军武器办公室的不足根据我的建议设立的机构，如果你要担任这个职务，首先必须保证军备部的工作服从四年计划，托特在任时就是这样做的。况且我个人认为你并不适于担任这个职务，有很多人都可以胜任这个职位，比如米尔希。”戈林还告诉施佩尔，托特就此问题同他订立过协议，现在他又为托特的继任者准备好了一份类似的协议，专门规定施佩尔不得由于为军队订货而干预四年计划。关于详细情况，施佩尔在同米尔希等人开会时就会知道。

前前后后一联系，施佩尔预感到，在米尔希主持召开的会议上，将有一场麻烦等着他。施佩尔决非等闲之辈，不可能束手就擒，坐以待毙。他径直跑去找希特勒，诉说了自己的遭遇和顾虑，希特勒立刻表示将给他撑腰：“如果有人对你搞什么名堂，或者你遇到麻烦，你便提议休会，把与会人员请到内阁会议室来，我来向他们说几句话。”在施佩尔告辞时，希特勒又把他叫住，叮嘱说：“你要同帝国元帅搞好关系，因为你的军火部长要于的出色，还得依赖他。”

军备会议开始后，施佩尔果然遇到了麻烦。在米尔希的诱导下，工业部门及海军、陆军的代表好像商量好了似的，纷纷提出，“必须有那么一个人，可以对所有的问题作出决定，能够协调各方面的关系。”也就是说必须实现军备生产的一元化领导。经济部长冯克见时机已到，立即站起来说：“亲爱的米尔希，既然您深受我们所尊敬的帝国元帅戈林的信任，还有谁能比您更适于承担这一任务呢？”冯克后来承认，开会前戈林手下的人确实怂恿过他提出这一建议。施佩尔见势不妙，赶快打出元首这张牌，说出元首请大家到内阁会议室去的意思，并说这次会议将于18日继续进行。米尔希只得宣布休会。在内阁会议室，希特勒谈了军备生产的重要性及其同戈林的部门的冲突，并且干脆声明：“此人（指戈林）不得在四年计划的范围内兼管军备。”戈林的一部分权力就这样被剥夺了。最后，希特勒郑重地介绍了施佩尔的情况，要求大家友好地对待他，支持他的工作。

受希特勒的影响，人们迅速改变了起初对施佩尔那种歧视的态度，包括戈林身边的人在内，施佩尔则有恃无恐，接连向戈林的权威发出挑战。2月18日，13日休会的军备工作会议继续进行，与会人员未经讨论便通过了施佩尔制订的组织计划，并授权施佩尔全权负责军备生产的一元化领导。施佩尔拿出事先准备好的一份声明，要求大家签字，尽管有人犹豫不决，但迫于元首的压力，最后还是签了字。第二天，施佩尔向希特勒汇报了会议情况，希特勒表示满意。

这时，戈林坐不住了，他再不能容忍施佩尔漠视他的存在，而如此为所欲为。施佩尔刚从希特勒那里回到住处，戈林便把他召到了卡琳庄园。可他并没有马上见施佩尔，让施佩尔在客厅里等了一个多小时，他才披着一件绿天鹅绒睡衣摇摇晃晃地从楼上走下来。彼此非常冷淡地问候了一句，戈林就在他那张巨大的办公桌后坐下，责问施佩尔为什么没有邀请他参加在内阁会议室举行的那次会议，接着，他又提起由施佩尔炮制，各部门代表签字的文件。戈林越说越气，索性站了起来，从房间的一头快步走到另一头，愤愤他说，他的全权代表都是没有骨头的胆小鬼，他们居然签了字，同意永远受施佩尔领导，这么大的事连问都没有问他。戈林的不满主要是冲着施佩尔的，但他又不能无所顾忌地直接把矛头对准他，这也说明戈林如日中天的日子已过。最后，戈林宣称，他不能接受这种一步一步地削弱他的权力的作法，他要去见希特勒，辞掉四年计划总监一职。他的对手施佩尔则认为，“当时，他要辞职并不会造成什么损失。戈林虽然开始时曾为四年计划的实施作过贡献，但到1942年时，人们普遍感到他变得十分懒散，毫无干劲，而且越来越反复无常，不切实际。”然而，施佩尔也明白，不管怎样，出于对政治影响的考虑，希特勒宁愿妥协也不会同意戈林辞职的，而妥协会使各种关系更加复杂。精明的施佩尔当即向戈林保证，新的部署决不会有损于他作为四年计划负责人的地位，他本人也将作为戈林的下属在四年计划的范围内开展工

作。施佩尔的话使戈林的虚荣心和权力欲得到满足，他眉开眼笑，却不知对方又设了一个圈套。

三天后，施佩尔再度拜见戈林，面交一份派他担任四年计划中军备生产的总全权代表的协议草案。戈林尽管抱怨施佩尔的权力太大，但踌躇了一下，还是同意了他的方案。3月1日，戈林正式签发了这份文件，并规定“在整个经济领域内给军备生产以战时应有的优先权”，这份文件所给予施佩尔的权力比2月18日通过的那份令戈林恼火的文件更大，戈林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过了几天，戈林似有醒悟，他对施佩尔说，意大利大使告诉他，外国有报纸评论，新部长在四年计划系统中的权力已超过了戈林，这种报道必将使他在工业部门的威信受到影响。能讨取希特勒欢心的施佩尔同样有办法把戈林哄得团团转，他建议召开一次有工业部门的头面人物参加的会议，他亲自在会上宣布自己是戈林的部下，戈林重又高兴起来。4月2日，又是在卡琳庄园，戈林同意了施佩尔和米尔希提出的在四年计划系统内设立一个中央计划局的建议。在新旧权贵的第一个回合的较量中，看似戈林占了上风，其实施佩尔完全达到了目的，而戈林则在不知不觉中被人牵着鼻子走。从那以后，戈林总是算计不过施佩尔，他的四年计划系统慢慢被架空。用施佩尔的话说就是：“此后，亏得戈林很懒散，我才得以不受阻碍地工作。我在希特勒那里很吃得开，戈林往往很妒忌，但在此后的两年中，他几乎从没有试图改变我的地位。”两年后，戈林不得不承任，他败在了老谋深算的施佩尔手里，这是后话。

戈林在1942年初所经历的那场权力角逐暂且说到这里，话题还是回到日趋激烈的战事上去。

就在德军在苏联战场上焦头烂额之时，英国人突然对德国人在法国的占领区进行了大规模轰炸。首当其冲的是巴黎，1942年3月初，大约数十架英国飞机在夜间轰炸了巴黎城区，800多名法国人死于非命。这一事件在占领区引起极大反响，英国人即将反攻西欧大陆的传言如风助火势迅速蔓延开来。希特勒被激怒了，他派人把戈林找来，冲着他大吼：“德国空军不能让英国飞机就这样自由地来去，对这件事你要重视起来，要让英国人再尝到苦头，我们要对伦敦进行报复，这是最重要的！现在我要求空军最大限度地给英国人以震惊和恐怖，而不仅仅是经济损失。”没等戈林问什么时候采取行动，希特勒便对他说：“至于轰炸伦敦的时间，要听候我的命令。”3月21日，希特勒打电话通知戈林暂缓轰炸伦敦，戈林满心疑惑，却又不敢问原因。他私下问那顺内克知不知道元首为什么改变了主意，耶顺内克沉吟了一下说：“我想元首不想招致对德国城市的攻击，您知道，我们现在还没有能力对西方实施毁灭性打击。”戈林忧上心头：“但愿英国人把行动限制在这种规模之内，否则恐怕我们又得把大批的飞机用于对付那些非军事目标了。”戈林没有如愿。3月27日，200多架英国飞机又乘着夜色袭击了法国的吕贝克，并用燃烧弹摧毁了该城市的中心地带，事态有所扩大。

第二天上午，戈林再次被希特勒召去。希特勒命令他的空军在最短的时间内，对除伦敦之外的英国城市实施恐怖性攻击。希特勒口沫横飞地对戈林说：“你要让每一个英国人都知道什么叫做恐怖的感觉，直到英国人放弃了这种‘恐怖爱好’为止。”戈林不敢怠慢，亲自安排了对英国的几个重要城市的轰炸。英国人也不示弱，又以4月初狂炸波罗的海海滨城市罗斯托克为回敬。对轰炸非军事目标，戈林不太情愿，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做这类事情

空军遭受的损失大，收到的效果却微乎其微。因此，戈林在汇报空袭英国的情况时，常常委婉地劝说希特勒放弃这种行动。可希特勒不仅坚决不同意，反而面有愠色地告诫戈林：“这是目前我们对付英国人的恐怖行为的最好的办法。”戈林不敢再说什么了，只得讪讪地走开。

1942年5月30日，戈林在卡琳庄园设宴招待米尔希等人。正当宾主喝得酣畅淋漓之时，戈林的一个副官走进来，附在戈林的耳边轻声说了几句话。戈林脸色大变，同客人打了一个招呼，便急匆匆地跟那个副官走了。客人们面面相觑，猜不出究竟出了什么事。不一会儿，人们听到戈林在隔壁接电话的声音。原来，电话是科隆的纳粹市长约瑟夫·格罗厄打来的，他向戈林喊道：“英国正在猛烈地空袭科隆，天空中到处都是英国人的飞机。”戈林粗声大气地训斥格罗厄，“那只是一次小规模攻击。却让你这样惊慌失措，我们的空防部队完全可以对付……什么，你竟敢这样对我说话，你说我在说谎？”说完这句话，他“砰”地一声放下了电话。电话铃重又响起，这回戈林的声音放低了，并一个劲称是，客人们马上想到这个电话一定是希特勒打来的。仔细一听，戈林正在小声申辩：“最多只有70架飞机参与攻击，是格罗厄故意危言耸听。”待戈林垂头丧气地回到客人中间，人们纷纷告辞。

第二天一大早，那顺内克来到卡琳庄园，向戈林报告，科隆的空防部队昨夜打下了40多架敌机。戈林闻讯大喜，连声说道，这是一个大胜利，要马上向元首报告。可是，就在这时，收音机里播出一则新闻：“丘吉尔在伦敦声称，英国皇家空军昨夜袭击了德国的科隆，1000多架轰炸机参与了这次行动……，德国人民对于这种野蛮的行为表示了极大的愤慨……。”戈林无心再听下去，急忙关上了收音机。戈林看看那顺内克，两人谁都没有说话，他们知道丘吉尔说的都是真的。戈林心情沉重，倒不是为受难的科隆老百姓悲哀，而是怕希特勒知道真相，此刻他想的就是如何向希特勒交待。对英国人规模如此之大的空中行动，德国空军居然没有拦截，这实在有些说不过去。后来希特勒果然冷冷地责问戈林：“你自己能相信只有七八十架英国飞机参与了这次轰炸吗？如果那样，科隆的防空部队的战果可就真算得上是辉煌的了。”戈林无言以对。戈林走后，希特勒对留下的那顺内克说：“我再也不会相信这种所谓的事实真相了。我倒是要看看，这次我能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对于戈林来说，真正的麻烦还不是英国皇家空军对德国城市的轰炸，而是如何解决北非和俄国两个主要战场上的空军作战配合及空运的问题。此外，归“四年计划”系统所管的油料、食品问题，也摆在了戈林的面前。航空汽油的短缺已使德国空军的训练和作战受到影响，装甲部队的用油也无法得到保证，这些都是令戈林心焦的问题。虽然，戈林的专家组在提供给他的资料中声称，俄国的石油储量大约为20亿吨，但至今未能占领主要油田，有谁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用上俄国的石油呢。在提供上述资料的同时，专家又向戈林报告，如果油田一旦在苏军撤退时遭到破坏，那么恢复它们就至少需要120套钻探设备。而戈林发现他并没有储备足够的钢铁来制造这些机器，他真后悔当初自己为什么要把手伸得那么长，把那么多权力揽在手中。最让戈林担心的是，希特勒对他的态度越来越严厉。在这一段时间里，他每次去见希特勒，都要打起精神，陪着小心，生怕出什么差错。在7月初希特勒主持的一次午宴上，一位不知内情的西班牙客人颇有感触地说，他看到戈林在午宴上所表现出的“对元首真诚的、无条件服从的忠心耿耿的态度，心里十分

感动”。

1942年6月以后，德军又在从列宁格勒、沃罗涅日到图卜鲁克的广大地区向苏联红军发起了夏季攻势。希特勒的意图十分明确，他要在夏天结束之前，将大部分兵力集中到南线，攻下高加索油田、顿涅茨克工业区和库班的小麦产区，然后拿下斯大林格勒，切断俄国主要的石油和粮食供应线。在即将行动之前，希特勒对第6集团军司令保卢斯说：“我如果拿不到迈科普和格罗兹尼的石油，那么我就必须结束战争。”戈林作为四年计划的负责人，当然明白夏季攻势的意义，他亲自督促空军各战斗部队司令官一定要不遗余力地完成每一次任务。由于戈林工作得卖劲，他的空军在苏联战场取得了几次令希特勒满意的战果，同时戈林再次下令对英国城市进行大规模轰炸。在北极圈内的北冰洋上，戈林的空军更是威风大震，使得开往北部的苏联运输船队遭受重大损失。有一个阶段，希特勒甚至感到他的战略目标就要实现了。

同希特勒一样，戈林也以为德国的最后胜利就在眼前，7月末，他再次去巴黎搜集艺术品。几天后，他回到希特勒的大本营，喜庆气氛扑面而来。

就在苏军在顿涅茨克盆地和顿河上游之间全线撤退的时候，希特勒又一次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他认为“俄国人完了”，因此不顾最高统帅部的一再劝告，在7月23日，正当夏季攻势进入高潮时，作出了兵分两路，同时拿下斯大林格勒和高加索油田的狂妄决定。不到几天，德军的两面出击便落得两面落空的结果。希特勒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它加速了第三帝国向灭亡之路的迈进。

戈林很快便发现形势有些不妙。7月底，从北非回来的最高统帅部的瓦尔特·瓦尔利蒙将军，向希特勒和戈林讲述了北非之行的见闻，特别强调隆美尔的非洲军团由于得不到有力的空中保护，现在已不仅仅面临着供应线被封锁的问题，以至每一个阵地每一天都要遭受英国空军的饱和轰炸，隆美尔的部队在敌人空军的重压之下作战。“你听说过这些情况了吗，戈林？”瓦尔利蒙将军的话使得希特勒激动起来，仇摇晃着手臂大叫，声音里带有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感觉，“在沙漠，英国人每天都在进行饱和轰炸！”戈林连急带吓，手心都是汗。

这边戈林正为北非忧心，那边国内的麻烦事又来了，英国空军连续不断的空袭和食品的短缺引起了公众的愤怒。为了解决食品短缺的问题，戈林专门召开了各占领区行政长官会议。在会上，他先把食品短缺的责任一股脑推到新占领区地方官的头上，他说：“尽管我们的部队已经占领了顿河和高加索之间这块肥沃的土地，这些地方号称是俄国的粮仓，可我们的人民却在挨饿。”为什么会这样呢？戈林将原因归结为地方官们的懒惰。而西欧正是收割季节，占领区同样没向德国提供粮食，这又是为什么呢？戈林指出，原因就在于那些地区的地方官“多愁善感，缺乏决断”。总之，责任人人有份，唯独把他自己排除在外，说着说着，戈林激动起来，疾呼：“先生们，不要指望占领区的居民会自动地拿出他们的一切。要记住，这些人都视我们为敌人，对我们恨之入骨，没有一个人真正和我们同心同德。……我们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可我们从这些胜利中得到了什么？”戈林命令与会官员：“我不管你们用什么方法，但是你们必须保证从各自管辖的地区中为德国拿来我们所需要的一切！”散会后，戈林对一道参加会议的米尔希说：

“我真不知道这种情况什么时候才能好转，真是厌烦透了。”

不管戈林多么厌烦，问题还是必须解决。一天，纳粹负责苏联南部地区

事务的行政官洛泽来访，戈林让他设法排除向德国本土运送物资的困难。洛泽办法没有想出，难题倒是提了一大堆，他告诉戈林在向前挺进的德军的后面，出现了大批游击队，他们已对德国在这些地区的控制形成威胁，正规军无法对付他们。戈林出语惊人：“我们也组织游击队，让我们的游击队来对付他们。”洛泽不明所以，戈林得意地解释：“我们把监狱中的罪犯统统放出来，编成一支特别部队，放到苏联游击队出没的地方——这些人是有办法对付游击队的。……你可以下一道特别的命令，允许他们在指定的作战区内放火、抢劫、杀人，就让这些人把俄国人的游击队的视线吸引过去。”他沉吟了一会儿又补充：“如果国内的犯人不够，就强行征召荷兰人，把他们编成两个反游击队的支队，让他们对付俄国人。”洛泽面有难色，欲言又止。戈林问道，“你认为我的想法不切合实际吗？”洛泽说起从前陆军曾作过征召荷兰人的尝试，最后没有成功，戈林听后有些生气：“这就需要你想办法！把他们骗到那里，撂在游击区里，不给他们枪支和给养，直到他们成功！要么豁出命去干，要么就完蛋。”洛泽仍旧担心：“这些游击队是以军事组织的形式出现的，装备同正规军一样，只用一般的方法恐怕不会收到效果。”戈林哈哈大笑：“你快成了一个伟大的小说家了，洛泽先生。”洛泽争辩：“这些都是警察和武装部队报告的。”戈林摆了摆手，说，“如果是陆军方面说的，那就更不可信了。假如在他们后边出现了几个拿老式步枪的游击队员，他们就会夸大说整整有几个师的游击队！”

戈林企盼着夏季攻势尽快取得胜利。然而，来自前线的消息说，在高加索战线无功而返的第4装甲军8月份在斯大林格勒外围地区停滞不前，仍然没有建树。戈林向希特勒出示了来自前线的侦察报告和照片，不断尖刻地批评陆军将领们：“这是一些真正的胆小鬼，为了掩盖自己的无能，他们故意把敌人说得很强大。”他还告诉希特勒，在第6军团司令保卢斯及其部下的头脑中存在着严重的失败主义情绪，其实在斯大林格勒前线根本就不存在“强大的敌人部队”。

在最高统帅部，希特勒破口大骂陆军，并且不允许哈尔德等人辩驳，哈尔德等人明知道戈林从中捣鬼，可又不知该怎样同希特勒说。

不久，戈林收到两份不同的情况分析报告。一份是他的首席情报官贝波·施密特提供的，施密特根据设在苏联的情报网提供的资料，得出苏联空军目前只有1000架左右战斗用飞机的结论；而那顺内克提交的报告则说，在苏联人的防线后面有二百个战斗机机场，有数千架飞机用于战争，耶顺内克并将空军侦察机带回来的照片交给了戈林。施密特坚持说，这些照片上的飞机除少数是真的外，其余大部分都是模拟品。他还劝戈林，由于这些照片的真实性尚需进一步核实，为稳妥起见，最好先不要把它们拿到大本营。耶顺内克则一口咬定那些侦察照片绝对真实可靠，并劝戈林要认真对待他那份报告。戈林最后认定耶顺内克杞人忧天，他交来的报告是不可信的。回去后，那顺内克忧心忡忡地对参谋部的军官说，“如果我们到12月份还没获胜，那就没有机会了。”

8月31日，戈林接到北非战场的战情报告，得知隆美尔在阿拉曼发动的进攻已被英军粉碎。至9月3日，隆美尔被迫转攻为守，等待增援。来自北非的消息好比雪上加霜，戈林感到日子更不好过了。

进入9月份之后，俄国战场的形势并没有出现大的改观。希特勒和最高统帅部的将军们为此焦虑不安，此时他们才真正意识到昨天隐约可见的胜利



之光，今天变成了一个不真实的幻影。9月7日，德国高加索方面军总司令李斯特向希特勒报告，他的军队再也无法前进一步了，因为高加索地区的崎岖山路使他的机械化部队步履维艰。希特勒勃然大怒，痛骂李斯特欺骗和背叛了他。李斯特不服气，拿着地图向希特勒解释，希特勒根本就不听。李斯特告退时，希特勒拒绝同他握手。第二天，李斯特被解职。戈林听说这件事之后，生怕自己呆在大本营也会遭到希特勒辱骂，当天便回到了柏林。几天后，戈林得到消息，哈尔德由于同元首在斯大林格勒战役问题上存在着严重分歧，被解除了陆军参谋总长的职务。

从接二连三被解职的将领们身上，戈林吸取了教训。为了免遭丢官的厄运，他打定主意无论如何都不能得罪元首。在面对面谈话时，他常常看着希特勒的脸色，揣摩他的心思，陪着小心，顺着他的话茬说。每次到元首的大本营参加局势讨论会，他都要先到自己的办公室呆几分钟。这时，他派驻希特勒处的联络官博登萨茨就会借故走开。戈林的同僚们猜测，博登萨茨是去用电话向戈林通报情况。戈林走进会场后，总能主动说出希特勒准备说服将军们接受的观点，希特勒则会顺势很得意地对人们说：“请看，诸位，帝国元帅的意见同我所说的完全一致。”

说心里话，即便不为迎合希特勒，这一阶段戈林对局势也很难发表有价值的独立见解，因为他已经有些日子无暇顾及苏联战场的事情了，一个急待解决的难题又把他缠注了，那就是如何处理空军的多余人员。在前一个时期，一些陆军将领指责戈林无视陆军兵源的枯竭，在空军中闲置人力，他们把状告到了希特勒那里。希特勒问戈林是否属实，戈林承认空军的地勤人员确实多了一点，不过他否认故意屯积人力，强调这都是为下一步扩充空军所作的储备。希特勒没有听信戈林的话，9月2日，他正式命令戈林从空军中调出20万人，补充到兵力日渐匮乏的陆军中去，这无疑于剜掉戈林的一块心头肉。戈林接到命令后一直闷闷不乐，迟迟不肯行动。直到希特勒再一次要求戈林尽快拿出方案，戈林才鼓起勇气，劝说希特勒保留他的兵力，作为一种补偿，他可以组建20个空军“野战师”协同陆军作战。戈林的想法最终得到了希特勒的同意，却在空军中引起了轩然大波，一些空军将领群起反对，可戈林坚持这样做，因为他已经没勇气再向希特勒提出进一步的要求了。空军将领们十分失望，平时他们的元帅一有机会便指责陆军将军们是一群无能之辈，但在关键时刻，却也不敢为了空军的利益同他们也同元首抗争。里希特霍芬事后向加兰等人发牢骚说：“让空军去当野战军，这是只有他（戈林）才能想出的主意。总有一天他会知道，这是一个多么坏的主意。”

进入1942年10月以后，对苏联战场的形势，除了希特勒本人之外，任何人都不敢再有乐观的估计，就连戈林也是这样。在斯大林格勒，尽管德国飞机每天都要投下上百万颗炸弹，但这个城市的军民同仇敌忾，顽强地保卫着自己的家园。整个10月份，德军同坚守斯大林格勒的苏联红军频繁展开激烈的巷战。这座城市早已成为一片废墟，可它却像一座巨大的兵营，不知埋伏着多少士兵。德军每次进攻，都破神奇地出现的苏军击退。本来，德军最高统帅部攻打斯大林格勒的目的是切断苏联的石油和粮食通道，而从战略的角度看，德军只要控制了斯大林格勒的近郊地区，就算达到了目的。可是，希特勒坚持要拿下斯大林格勒，他要在他和人民面前维护尊严。在最高统帅部中没有一个人敢向希特勒提出停止进攻斯大林格勒的建议，虽然他们都在暗自担心，如果在冬季来临之前攻不下斯大林格勒，德军就可能会再经历一

次去年冬天莫斯科城下的灾难。

与此同时，德国的城市自 10 月份开始，再次遭到敌机大规模轰炸，民众对德国空军的不满情绪日甚一日。为了安抚民心，戈林在 10 月初的一次柏林群众集会上。大言不惭地宣称：“过去我对你们说过，德国空军将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空军，现在我仍然可以这样说。我们的空军在俄国、北非取得的重大的胜利就是最好的证明。如果丘吉尔先生夸口他每夜要让 1000 架轰炸机到德国上空旅行，那么我就只能回答：他根本办不到。”在欢呼声中，戈林似乎真的相信了自己说出的大话，竟有些飘飘然起来。

会后，米尔希对戈林说，美国已启用 B—17 空中堡垒轰炸机群袭击德国的目标。这种轰炸机可以全天候飞行，且装甲极厚，空中自我保护能力极强，配有 11 门重机关炮，德国的战斗机很难同它们抗衡。没想到戈林根本就不愿听米尔希说这种话，当米尔希提出要制定对付 B—17 的方案时，戈林不耐烦地打断了他的话：“难道你也相信美国人所惯用的那种虚张声势的宣传吗？空军参谋部已向我报告过这种飞机的性能，根本就不担心。”

就在戈林同米尔希说那番话的一个星期后，德国空军击落了一架脱离飞行编队的 B—17 飞机。米尔希带着这架飞机的全套资料再次找到戈林，面带优越地对戈林说，从资料上看，这是一种性能非同一般的飞机，不能把 B—17 的威胁估计得太低。接着，米尔希又向戈林汇报了他手下的专家对美国一种型号更新的轰炸机——B—24 的分析，专家们已从 B—24 解放者轰炸机的照片上发现了类似涡轮增压器的装置，这就意味着这种飞机的飞行高度可达 3 万英尺。听完米尔希的话，戈林不满地说：“我真不知道我现在到底要听谁的，空军参谋部有一种说法，你对我又是另一种说法，每逢这种情况，我唯一的办法就是，谁的都不听，只相信自己的判断。”

德军 1942 年的第一个大灾难终于降临了。

10 月 23 日起，北非的英国第 8 集团军在蒙哥马利将军的指挥下，向阿拉曼一线的隆美尔军团发动了强大的攻势，德军在缺少坦克、汽油、后援部队，特别是空中保护的情况下，拼死抵抗着。在这场战役中，英国的沙漠空军完全掌握了制空权，猛烈轰炸隆美尔的士兵、装甲车、防御工事及所剩无几的军需物资，给地面部队以有力的战术支援。仅在 24 日一天，沙漠空军的飞机就出动了 1000 多架次，它们如入无人之境，无情地打击着德军的目标。隆美尔一次次用电报向希特勒告急，并要求在必要时，他将把部队撤至距阿拉曼 40 英里以外的富卡。

11 月 2 日，蒙哥马利的部队突破了隆美尔军团的南翼战线，使其面临着全军覆没的危险。当天，隆美尔又打电报给希特勒，向他报告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他将率领部队撤至富卡。希特勒立刻回电，不许隆美尔后撤一步。沙漠空军继续发挥着作用，同日趋衰微的德国空军相比，英国皇家空军正呈上升趋势。

希特勒急令戈林派空军援助北非。戈林把驻挪威的几个轰炸机中队调到了黎波里，又命令在斯大林格勒已被用至极限的里希特霍芬的第 4 航空队，抽调一部分飞机飞往希腊，保护隆美尔的运输线，他还让南线的凯塞林亲赴非洲指挥作战，以图挽回败局。后来发生的事情说明，这番调兵遣将并没有奏效。

在北非告急的同时，进攻高加索地区的德军全线撤退。眼看着令他们垂涎欲滴的油田将无法到手，一个罪恶的念头在希特勒和戈林的脑中产生了。

在同希特勒紧急磋商之后，戈林指示里希特霍芬立即派飞机破坏格罗兹尼的油田。几天后，戈林又下令炸毁巴库油田。在隆隆的爆炸声中，在熊熊的火焰中，油井一个个被炸掉，苏联人蒙受了巨大损失，戈林利用苏联石油资源的梦想也彻底破灭了。

11月4日，隆美尔发现如果再不从阿拉曼撤退，24小时之内地指挥的德意联军就会全军覆没。因此，隆美尔冒着被送上军事法庭的危险，决心率领部队后撤。在撤退之前，隆美尔在被炮火震得摇摇晃晃的指挥部里给希特勒发电，请求希特勒同意撤离。没等接到回电，隆美尔便下达了撤退的命令。在撤退的途中，英国空军围追堵截，一刻不停地摧残着丢盔卸甲的德军。

11月5日，德军最高统帅部接到报告，一支由美国护航舰队护卫着的运兵船队正从直布罗陀海峡向东开会，目标可能是北非某地。这份报告6日早晨便被送到了希特勒的办公桌上，希特勒却没多加理会。同时，一份来自苏联的情报分析报告也被希特勒放到了一边。在这份报告中，德国情报部门很肯定地说，苏联红军将在进攻斯大林格勒的德军的背后——顿河沿岸，发动大规模反攻。7日上午，英国驻直布罗陀的海军部队正同从大西洋驶来的运输船和军舰会合，之后开往地中海的消息，又传到了希特勒的大本营。对于这些情况，最高统帅部极为重视，但究竟应采取什么应对战术，还得由希特勒定夺。而希特勒反应冷淡，只简单地布置了一下，便启程去了慕尼黑。原来，8日慕尼黑将举行一年一度的纪念“啤酒馆政变”的集会，希特勒要在集会上发表演说。

戈林一反为出风头不顾一切的习性，没同希特勒去慕尼黑抛头露面，而是独自留在柏林的空军指挥部的作战室里。北非战况事关重大，而且局势危急，所以虽说已派凯塞林亲自指挥，戈林还是不敢放松片刻。他知道，英军在北非取胜同皇家空军的出色表现有着直接关系，德国人要挽回败局也要在空军身上下功夫，德国空军或许还有重显神威之日。就在希特勒踏上去慕尼黑的专列的时候，戈林接到凯塞林的电话，他报告说，英、美的舰队继续向东航行。戈林命令凯塞林不惜一切代价阻止敌人的舰队。

他严厉地说：“在敌人的船队进入我们的空军的有效攻击范围之前，必须做好一切攻击的准备。”戈林实在不愿作最坏的估计，他又像宽慰自己似地补充道：“我相信敌人试图在科西嘉岛、撒丁岛或者其他什么地方登陆。”

“帝国元帅阁下，我认为敌军将在非洲登陆，很可能是北非的一个港口。”凯塞林直言不讳。

戈林坚持说，“即使是北非，也不会是法属北非。如果把这一仗打好，非洲的形势就会大不一样，就会减轻阿拉曼失利的影响，……隆美尔的失败最多不过是同盟国取得的暂时性的和战术上的突破，……请你告诉每一个飞行员，我希望他们要尽最大的努力，作最大的牺牲，对英国人的舰队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攻击，以实际行动为德国空军增添光彩。”后面戈林还提到战术方面的问题，这在近期是不多见的，他说：“你要告诉每一个飞行中队，他们的攻击目标首先是航空母舰，要使它的飞机不能升降；其次是要打击运兵船，没有人员的装备则无关紧要。除了攻击护航队之外，不要采取其他作战行动。”他还嘱咐凯塞林，“这次重要行动，你一定要亲自指挥。”

放下电话后，戈林感到十分疲乏，时希特勒不满的情绪和不堪重负的感觉油然而生。在苏联和北非战场的紧要关头，他所崇敬的元首居然还有闲心去慕尼黑参加与战事无关的活动，这实在有些不可思议，他真想把过去别人

曾用来指责他不务正业的话，一股脑甩到希特勒的身上。虽然戈林还不能断定形势会向着哪个方向发展，但不祥的预感伴随着他，无法驱散。

戈林最怕看到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德国空军未能阻止英、美舰队的行动，11月8日，英、美部队在法属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海滩登陆。戈林接到盟军在北非登陆的电报后，立即飞往慕尼黑见希特勒。第二天，戈林陪同希特勒会见前来商讨北非问题的意大利外长齐亚诺。希特勒告诉齐亚诺，他已决定“全面占领法国，登上科西嘉岛，在突尼斯建立一个桥头堡，伺机重新控制北非”，并吹嘘说德军将在短时间内夺回对北非的控制权。戈林深知，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了，他阴阳怪气地对齐亚诺说：“入侵北非成功大概应算做同盟国在这次战争中的第一分。”对德军在北非的失利，戈林不但个人没有一点内疚感，而且不想让他的军队和国家负一点责任。他理直气壮地质问齐亚诺，德国的陆军和空军已经尽到了最大的努力，不知道领袖（指墨索里尼）对非洲的失利该怎么想？言外之意就是墨索里尼及他的军队、国家应对轴心国军队败退北非负全部责任。几天后，希特勒开始向北非空运精锐部队，当然，派去的部队不是增援隆美尔的，而是要抢在艾森豪威尔的部队赶到之前占领突尼斯。据统计，为拿下并守住突尼斯，希特勒先后投入的德、意士兵达25万人之多，到第二年春天，这些士兵连同他们的武器损失殆尽。

送走齐亚诺，戈林又回到了卡琳庄园。他已被接连出现的危机弄得疲惫不堪，支撑不下去了。在去卡琳庄园的路上，戈林暗自告诫自己，千万不可再管军事指挥方面的事情。

正是：回天乏术叹世运，大难临头方心灰，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 第二十二章 再受重创

临危受命无良策，斯城溃败成转折；  
颓势难挽欲逍遥，空运失利担罪责。

话说德军在北非战场失利之后，戈林重又闷闷不乐地躲回卡琳庄园，决意尽量不再过问军事上的事情，免得最后难以收场。他甚至打算就这样无所事事地在卡琳庄园呆下去，听凭元首操持一切。他知道自己尽管号称纳粹德国第二号人物，但所有行动都要听从元首的命令，稍有不慎，就可能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与其每天颤颤巍巍地在官场“走钢丝”，还不如在家落得个清闲自在。可以说，无常多变，情绪大起大落是戈林的性格特征之一，他有时亢奋得难以自持，有时又消沉得无以自拔，在每一个阶段他几乎都有着不同的心态。心灰意懒，渴望逍遥，大概是1942年秋天主宰着戈林的心绪。

就在帝国元帅闲居卡琳庄园时，斯大林格勒前线的25万德军却面临着灭顶之灾。11月19日黎明时分，一串串红色的信号弹划破了浓雾笼罩着的斯大林格勒上空，随后是一阵惊天动地的轰鸣声，苏联红军对进攻斯大林格勒的德军发起了全线反攻，这次反攻行动的代号为“天王星”。顷刻之间，德军第6军团的阵地便被炮火吞没，成为一片火海。苏军集中了几千辆坦克和70多万人的兵力，在西北和西南两个方向同时发动强大的攻势。反攻开始的几个小时后，苏军首先在斯大林格勒西北地区突破了罗马尼亚第3军团的防线。然后，又在斯大林格勒南侧集中13个军和上千辆坦克猛烈冲击德军第4装甲军团和罗马尼亚第4军团的防线。德至阵地危在旦夕。

其实，在苏军反攻之前，希特勒等人对情况并非一无所知，但他们不认为苏军的行动有什么了不起。在苏军进攻伊始，希特勒带着他的部下正在阿尔卑斯山享受纯净的山林空气。消息传来后，希特勒竟说，“我们的将军又在重犯错误。他们总是把敌人的力量想得太强。按照前线的报告，敌人的兵力资源已经严重不足。他们已被削弱，因为他们流的血太多。可惜没有人相信这些报告。另外，俄国的军官训练质量不高，那样的军官是没有能力组织进攻的。……无论从长远还是从短期来看，俄国人都不是不可战胜的。他们将精疲力尽，我们将投入新的兵力，局面马上就会改观。”此后两天，希特勒继续呆在他的山庄里。直到苏军进攻的第四天，希特勒才率大队人马回到东普鲁士。这一天，从南北两翼包抄的苏军已在离斯大林格勒40英里的地方会合。而戈林尽管对斯大林格勒的最新战况一清二楚，却仍然呆在卡琳庄园。

当晚，第6军团司令保卢斯将军在炮火中给大本营发来急电，证实他的军团已被苏军团团围注，请求大本营对下一步的行动作出指示。接替哈尔德的新任陆军参谋总长蔡茨勒接到电报后，立即去向希特勒报告。他对着斯大林格勒地区的地图，讲解第6军团此时所处的极其危险的处境，并对希特勒说，苏军的意图很明显，就是要从南北两面围困斯大林格勒的德军第6集团军，切断他们的退路。第6军团如果不及时撤退，就有可能陷入重围之中。但是，希特勒却认为蔡茨勒对形势的估计过于悲观，他不慌不忙地说，“我已下达从南面反攻的命令，这将很快解除斯大林格勒的困境。我们过去常有这种情况，到头来不总是转危为安，重新左右局势了吗？”当蔡茨勒再次试图劝说希特勒同意第6军团突围时，希特勒终于忍不住了，他粗暴地打断蔡茨勒的话，两眼通红，挥舞着手臂大吼道：“我决不从伏尔加后退一步！第

6 军团决不能从斯大林格勒撤走，他们一定要把斯大林格勒变成一个攻不破的堡垒！如有必要，保卢斯就要坚守一个冬天，等明年的春天再把第 6 军团接出来！”

希特勒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增援第 6 集团军的问题。在谈到如何解决斯大林前线的军需供应问题时，空军参谋长耶顺内克向希特勒保证，即使第 6 军团被包围，空军也可以利用运输机和轰炸机向斯大林格勒运送足够的物资。那顺内克的保证好像给希特勒注入了一针强心剂，希特勒顿时高兴起来。

会后，希特勒电告保卢斯将军，不要被暂时的困难吓倒，一定要坚持住，空运马上就要开始。他们的任务就是固守待援，等到同增援部队会合后再对斯大林格勒发起新的进攻。在蔡茨勒等前线将领看来，希特勒的命令简直如同白日说梦。保卢斯的部队随时都有被苏军歼灭的危险，用空运来维持这支庞大的队伍的物资供应，无疑是极不可靠的。此时第 6 军团最好的出路，就是向西突围，同正在斯大林格勒东北方的曼施坦因的第 4 装甲军团相配合，对包围第 6 军团的苏军形成夹击之势，然后冲出重围，退到顿河一线，建立起新的战线，等到严冬过后重振旗鼓，发动新的攻势。可是，当蔡茨勒代表陆军总司令部向希特勒提出他们的上述意见，却被希特勒严辞拒绝。

希特勒让他的副官卡德·克里斯蒂安上校给卡琳庄园的戈林打一个电话，让他立刻赶来见希特勒。不料戈林却不在他的卡琳庄园，他被请去主持一个关于如何增加石油产量的会议。戈林的机要秘书匆忙赶到会场，看到戈林正对与会的石油专家们大发雷霆，起因是在德国人占领的迈科普油田，由于每一眼油井都遭到彻底破坏，以至几个月过去，他们连一滴油都未能得到，戈林面红耳赤地大声地叫道：“简直是莫名其妙，从我们占领这个油田到现在几个月过去了，我们却仍然一无所获。你们这些专家难道想不出一办法，拿不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措施来吗？”在座的人都不说话。俄国人临撤走时，把迈科普油田的每一个井眼都用巨大的蘑菇状的钢球封死，而德国人还没有专门的钻探设备能将这钢球清除。尽管他们在戈林的逼迫下，想过各种各样的办法，但至今未有解决问题的良策。

戈林又想起了刚占领迈科普油田时，陆军方面想把他撇在一边，由他们自己进行开发的事情，愤恨地发泄道：“早在我们进入俄国之前，元首就说得非常清楚，一切经济机构包括前线部队的经济部门，都由我来掌管。在我的机构中，根本就没有那个稀奇古怪的什么东方组织（是指东方经济参谋部）。”接着，他指名道姓地把最高统帅部的格奥尔格·托马斯痛骂了一顿，指责他无视元首的命令，故意另搞一套：“他完全知道元首签署了这个文件，但是，却让事情变成这个样子……这些我们暂且不管，现在的问题是，假如直到明年春天还出不了油，我们该怎么办？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会议所要解决的问题。要是迈科普油田再出不了油的话，我们就只好从德国本土给我们驻守俄国的部队运油了。到那时，我们对这个油田的唯一的处置办法，就只能像俄国人一样，把它再次毁掉。”这时，有人告诉戈林，最高统帅部已派专人负责迈科普油田的开发事宜，戈林忙问那个人是谁，回答是一名叫霍姆堡的将军。戈林冷笑一声说：“那好，就让他早一天把油开采出来吧，假如出不了油的话，他必须向最高统帅部和陆军方面解释清楚。”

有人又说，霍姆堡的指挥部设在离迈科普有 200 英里的皮业季戈尔斯克，戈林听后不仅没有生气，反而笑了起来。他暗自在想，一旦明年迈科普油田还不能派上用场，那么，这个霍姆堡就是最好的替罪羊，想到这里，他

故作坚决地对与会人员说，“我不管是谁，反正明年必须让迈科普油田恢复生产，因为我们已经没有太多的时间了。”

戈林走出会场后，副官通知他希特勒让他立即赶回。刚回到空军司令部，希特勒又亲自打来电话，将为斯大林格勒受困部队空运物资的决定告诉了戈林。戈林向希特勒表示，他一定竭尽全力，做好这件事。放下电话后，戈林陷入沉思之中。在此之前，他还没有想到形势会糟糕到这种程度，更没想到那顺内克会给希特勒出那样一个使他为难的主意。思忖再三，戈林还是不知如何是好。他的心理负担很重，因为此举实在关系重大，如果空军的行动取得成功，不仅有希望扭转局势，而且有助于挽回他和他的空军日益下降的威望，好处是明摆着的。但是，如果行动失败，他戈林就会成为葬送斯大林格勒城下 20 多万德军官兵的罪人，就算他不是行动的始作俑者，希特勒和陆军方面也会设法把责任推给他。

过了一会儿，里希特霍芬打来电话，劝戈林无论如何要说服元首放弃空运的决定，他对戈林说：“这将毁掉我们，因为我们拿不出那么多运输机。按照保卢斯的要求，我们每天要给他运送 750 吨物资。即使运输机够用，这种风雪交加的天气，加上苏联飞机的阻截，我们也绝不可能保证把保卢斯需要的物资及时运到。而调用轰炸机，就必然使得一些必要的作战行动被取消……。”里希特霍芬这番很现实的分析，更使戈林拿不定主意。犹豫不决之中，戈林抓起电话找到米尔希，询问他这位担任过航空公司总裁的老友，空运方案是否可行。米尔希对戈林说，完成这一任务虽有一定的难度，但并不是不可能的。米尔希的后使戈林松了一口气，也有了信心和勇气。戈林让副官接通希特勒的电话，他在电话里对希特勒信誓旦旦，空军将“出色地完成任任务”。

第二天，他以一副临危受命的姿态，出现在希特勒的会议室里，出席为讨论如何给斯大林格勒前线的德军解围而专门召开的会议，关于当时的情形，施佩尔在他的回忆录中有这样的描写：“戈林满面春风，同在一出小歌剧中扮演得胜的帝国元帅的男高音演员一模一样。”参加会议的军官们就第 6 军团的出路问题吵成一团，蔡茨勒强调第 6 军团无论如何应该向斯大林格勒西面突围，其他陆军将领也倾向于这种意见。希特勒面色铁青，一再申明斯大林格勒的重要性，坚持不许第 6 军团撤出斯大林格勒。就在两种意见僵持不下时，希特勒用恳求的语调问戈林：“你认为以空运的方式增援斯大林格勒的方案可行吗？”戈林没让他的元首失望，他站了起来，“啪”地一声立正，神色庄重地说：“我的元首，我再一次向您保证，空军将完成对斯大林格勒的空运任务。”戈林的话音刚落，蔡茨勒便问道：“帝国元帅先生，您能提供具体的数字吗？”戈林满不在乎地回答：“进行必要的计算，这是空军的事情，我既然说了空军能够完成任务，那么就一定会完成任务。”希特勒显然对戈林的表现非常满意，他面带笑容，并显得有些兴奋地说，“这一下斯大林格勒能守住了，谁再谈论第 6 军团如何突围，那就是胡说八道。他们要想突围，就会丢掉所有的重武器，完全丧失战斗力。因此，第 6 军团必须留在斯大林格勒！”

会议结束后，戈林先同希特勒就空运问题单独进行会谈，接着又同那顺内克商讨了空运的具体细节，然后他便无牵无挂地去了巴黎。第二天上午，希特勒给正在斯大林格勒等待命令的保卢斯发去了决定 20 多万德军官兵命运的电报，电文称：“第 6 军团一定要坚守阵地，100 多架容克飞机的空运

行动马上就要开始。”希特勒没有想到，许下空运诺言的空军司令这个时候正在为得到他所喜爱的艺术品奔波呢！

3天后，戈林回到大本营。刚下火车不久，里希特霍芬打来电话，再次陈明利害。他提醒戈林，对斯大林格勒的空运从理论上讲说得过去，可现实一点说，德国空军现在确实没有力量完成那么大规模的空运。里希特霍芬详细地阐述了他的理由：“按照那顺内克的计算，如果每天给斯大林格勒运送750吨给养，大约需要5~6个中队的运输机，但躲在作战室里只会对着航空图划线的官员们似乎忘记了俄国目前的天气情况，忘记了俄国战斗机会对我们的运输机进行攻击等各种不利因素。空运这些物资，合乎实际的计算是至少需要12~15个中队的运输机，即630~795架容克52运输机，而我们的空军只剩下750架这种运输机，其中大部分又被派去为非洲的隆美尔军团运送物资。那么，帝国元帅先生，别的不说，我们现在到哪里去找飞机呢？”

放下电话，戈林一阵心烦意乱，他派副官把那顺内克找来。没等那顺内克落座，戈林就气冲冲地问道：“你对我说将保证空运物资的数量，现在你能把落实的情况对我说一下吗？”那顺内克见戈林面色铁青，不禁有些慌乱，他不得不承认：“我的计算出现了误差。我考虑如雨标准的250公斤空运箱运送物资，大约每天有五六个中队的运输机就可以完成运输任务。但是，这种空运箱实际上并不能装250公斤物资，……它的载重量要小得多，现在——”那顺内克不安地接着说：“您知道，我们的运输机大部分都用在北非航线，如果不增加运输机的数量，就不可能达到需求的运送数字。”

戈林尖刻地质问那顺内克：“那么，你准备让我在元首那里怎么说呢？是说我的参谋长由于计算错误，才使得我向元首保证完成空运任务，现在我们发现这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决定收回我的话吗？”那顺内克语无伦次地说：“您不能向元首说这些，收回承诺为时已晚，第6军团已破完全包围，元首已经下令，让保卢斯死守斯大林格勒，他只能依靠空运维持下去，等待解围。”

戈林一筹莫展，冥思苦想。他低头不停地摆弄着手上的宝石戒指，仿佛忘记了那顺内克的存在。那顺内克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去也不是，留也不是，不知所措地看着戈林，他拿不准戈林究竟会怎样对希特勒说，如果他据实向希特勒汇报，希特勒肯定要狠狠地处置他，至少要撤他的职，正当空气越来越凝重的时候，电话铃响了。戈林拿起电话放在耳边，突然站起来说：“是，是，我正与那顺内克商讨空运的具体细节，请放心……。”听到这里，那顺内克悬着的一颗心才放了下来，他知道戈林不会向希特勒说明真相。戈林放下电话，扭过头来死死地看着那顺内克，看得那顺内克心里一阵阵发毛。过了好一会儿，戈林冷冰冰地对那顺内克说：“现在我暂时不会向元首汇报这件事——但是，这并不是说我永远不说，这要看我们的空运计划实施的情况。从现在起，你必须尽一切努力完成空运任务，动员所有能够动用的飞机，我把我的通信机也交出来，作为运输机使用。你还可以去找米尔希，请他帮助你。”说到这里，戈林站了起来，语重心长地说：“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为第6军团的命运担忧，我们不能再重演去年在莫斯科城下上演的那出悲剧。”那顺内克不住地点头。他发现戈林的眼睛里居然闪动着忧郁的光，这是他在戈林手下工作这么长时间第一次看到的。戈林向那顺内克摆摆手，示意他可以走了。那顺内克如释重负地向戈林行了一个纳粹礼，转身走了出去。

在后来的几天里，蔡茨勒每天统计运送到第6军团的粮食和武器的数



量，结果发现运到的只是一小部分物资。戈林每每被希特勒叫去，总是以天气情况不好作借口为自己开脱，他还总忘不了说一句，待天气好转，他一定如数把物资送到前线。再往后，戈林惊喜地发现希特勒不再频繁提起向斯大林格勒空运物资这件事，而是整天忙于建立所谓的“北非新桥头堡”。不过，戈林也明白，希特勒并非真的把这件事忘了，说不定哪天又会催逼。因此，他在同元首一道关注北非事务之余，不断催促耶顺内克加紧落实空运计划。那顺内克向戈林诉苦说，运输机实在太少了。戈林不客气地告诉那顺内克，别指望元首会同意将用于增援北非的运输机调到俄国，没有人能使希特勒停止对北非的空运，在希特勒的眼里，北非同斯大林格勒同样重要，哪头都不能舍弃。更别指望陆军将领去做希特勒的工作，因为以蔡茨勒为首的陆军司令部的将军们本来就不同意靠空运帮助第6军团摆脱困境。

下面再看看德军在北非的境况。阿拉曼战役之后，隆美尔率残部逃到卜雷加港和阿盖拉地区，建立起一条新的战线。希特勒动用数百架运输机将大批的士兵和坦克运到突尼斯，并指示隆美尔以此为根据地准备发动新的进攻。但是，号称“沙漠之狐”的隆美尔，此时已经意识到最高统帅部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必将使他的军团重蹈覆辙。11月28日，隆美尔在没有预先向最高统帅部请示的情况下，突然飞抵希特勒的大本营。隆美尔的到来令希特勒震惊，在德军中还没有哪名将领敢这样胆大妄为，擅自闯入他的大本营。隆美尔向希特勒解释说，由于情况十万火急，他必须亲自来向元首汇报。接下来，隆美尔提出他的计划，即放弃利比亚，将他的部下撤到离突尼斯边境120英里的加贝斯隘口，在得到必要的休整和有利的增援后，再在那里发起反攻，希特勒坚决不同意隆美尔的意见，他对隆美尔说，德军只能在阿盖拉地区重新组织进攻，因为意大利人是不会同意放弃利比亚的。如果按照隆美尔的计划行事，一旦失利，就会导致一连串可怕的后果。隆美尔则争辩说，他没有足够的兵力和军备在阿盖拉地区发动新的进攻，在那个地区，意大利军队也没有同英美联军抗衡的实力。

希特勒早就对隆美尔憋着一肚子气，现在又见他固守己见，便忍不住发了脾气，发作了一阵子，希特勒让他手下的人把戈林找来，他要听听帝国元帅的意见。戈林当然不会支持隆美尔，他谈到要扭转北非战局，只靠德军是不行的，必须让意大利人向北非投入更多的人力和物力，希特勒对戈林的意见表示赞同：“……必须再给意大利人施加压力，让他们拿出行动，往非洲运送物资。”最后，希特勒派戈林和隆美尔一起去罗马同墨索里尼商谈此事。戈林满心不愿意，可又不能违拗元首的旨意，只好答应下来。

当天晚上，戈林和隆美尔乘坐他的“亚洲号”专列前往直意大利。一路上，戈林对不断给他找麻烦的隆美尔十分不友好。隆美尔也很知趣，在火车上没有再同戈林谈论北非的事情。第二天，车到慕尼黑，隆美尔的夫人上来，这位能说会道的夫人打破了他们两人之间的僵局，使气氛活跃起来，隆美尔乘机谈起他的计划。戈林起初不愿意听，但碍于隆美尔夫人的情面，只好耐着性子听下去。听着听着，戈林感到隆美尔的计划有很多合理之处，便向他详细地询问了计划的细节，并说要认真考虑一下。当“亚洲号”快要进入罗马车站时，戈林告诉隆美尔，他完全同意隆美尔的加贝斯计划，他将下令把20门新式88毫米高射炮拨给隆美尔的部队。

到达罗马后，戈林打电话通知米尔希，让他立即到罗马参加他们同墨索里尼的会谈。接着，他会见了坐镇意大利的凯塞林。戈林向凯塞林谈起隆美

尔的计划，凯塞林立即提出异议，他认为要是完全放弃利比亚的话，就会使盟国空军的活动半径达到突尼斯的港口，势必会影响到元首建立新的“桥头堡”的方案，戈林又觉得凯塞林说的非常在理。凯塞林走后，戈林把隆美尔叫来，开诚布公地说，他听从了凯塞林的意见，不再同意隆美尔放弃利比亚，隆美尔必须丢掉建立加贝斯防线的计划，隆美尔瞠目结舌，如坠冰窖，半天说不出话来。戈林似乎完全忘记了他在火车上对隆美尔的承诺，只顾大唱高调：“为了德国的最高利益，你必须这样做。”事后，隆美尔在谈起这件事时气愤地说：“我真不知道还有谁会这么快地改变主意，会这样变化多端，要知道，他是帝国元帅——一位地位仅次于元首的人，居然会如此不负责任……”

吃过晚饭，戈林同凯塞林、隆美尔一起来到墨索里尼在罗马郊外的别墅同他会谈。在长达3个小时的谈话中，戈林不断说大话，给墨索里尼打气。他对墨索里尼说：“我们第一次离战场这么近，我们的军队就像黑豹一样，一跃即到！我们可以随时向突尼斯运送部队和装备。”说到高兴处，戈林忘乎所以地夸下海口：“我将派一支精锐部队去突尼斯，这支部队将由第10装甲师、希特勒师、戈林师和德意志坦克师组成。”戈林扭动着他那肥胖的身躯，有些笨拙地作着手势对墨索里尼说：“我们必须把敌人赶回到奥兰，然后向摩洛哥进发，别无出路！”随后，戈林要求意大利必须保证在突尼斯建立“桥头堡”的德军的供应。墨索里尼没像过去那样讨价还价，而是很痛快地表示，意大利方面将尽全力。隆美尔和凯塞林分别向墨索里尼陈述了他们各自的看法，墨索里尼没有直接反对隆美尔的意见，但指出凯塞林的意见更切合北非的现实情况。听完墨索里尼的话，隆美尔几乎跳了起来，他对墨索里尼这种含糊其辞的政客式的表达方式怒火中烧。隆美尔刚要有所表示，突然看到戈林正用严厉的目光注视着他，只得强压怒气，耐着性子听墨索里尼唠唠叨叨，大谈德意之间牢不可破的友谊等连篇废话。

在第二天举行的德意双方将领联席会议上，戈林再一次吹嘘德国在北非即将开始的行动的无比重要，狂妄地叫嚣：“我们必将重新获得在北非和地中海地区行动的自由。”他再次宣称，德军决不会放弃利比亚。会议结束后，戈林一行出席意方安排的午宴。在宴会进行中，隆美尔又作了一次努力，劝说戈林同意他在加贝斯建立防线的计划，并提醒说他在火车上已有过同意的表示。戈林根本不想听隆美尔说下去，他恶声恶气地说：“我不记得我对你有过什么许诺，现在你必须服从命令！”戈林的声音很大，把参加午宴的人的目光都吸引了过来。隆美尔一声不响，转身离去。午宴结束后，米尔希从柏林赶到。他在戈林等人的住处，看到隆美尔流着眼泪向楼上走去。见到戈林后，米尔希问隆美尔怎么了，戈林只是不屑地哼了一声。

戈林一直在意大利呆到12月9日。在此期间，他和米尔希就意大利保证北非德军的供应问题同墨索里尼多次进行会谈。在得到墨索里尼的承诺后，戈林竟提出，他要亲自视察装运军需物资的那不勒斯港口，墨索里尼无法拒绝。于是，戈林神气活现地出现在码头。在那不勒斯的那几天里，戈林更是忙得不可开交。他煞有介事地同码头工人谈话，甚至把当地的法西斯头目叫来，委派他负责北非货船的装运。陪同戈林到那不勒斯的意大利官员，每天都把他的活动向齐亚诺汇报。戈林走后，齐亚诺不满地对墨索里尼说：“他居然倒像是我们的帝国元帅，而不是德国的。”

1942年12月11日，戈林来到希特勒的大本营，向希特勒汇报他同意大

利人会谈的情况。当然，他也没忘说几句隆美尔的坏话：“隆美尔的情绪现在很危险，他已经完全失去了勇气。”戈林告诉希特勒，墨索里尼曾在私下里对他说，希望他能转告元首，他们希望德国人结束俄国战争，为了避免在东线遭受更大的损失，希特勒应该同斯大林达成某种妥协，从而使轴心国的力量集中到北非、巴尔干和西欧地区。墨索里尼还说，他将派齐亚诺和意大利最高统帅部首脑乌戈·卡瓦莱罗访问德国，他们将当面向希特勒提及此事。

从意大利归来，戈林迟迟没有过问斯大林格勒前线空运的进展情况。在向希特勒汇报的第二天，戈林便专程去出席重建后的柏林国家歌剧院的首场演出。戈林功臣般地坐在最豪华的包厢里，饶有兴味地观赏瓦格纳的歌剧作品。这座歌剧院曾被敌机炸毁，1941年4月18日戈林下令重建。

一个星期后，齐亚诺和卡瓦莱罗来访，他们在希特勒的大本营正式提出结束俄国战争的建议。戈林和里宾特洛甫参加了会谈，两人都显得对意大利人的建议很感兴趣，特别是戈林，他不停地点头，作出很有同感的样子。希特勒听完齐亚诺的话，对他提出的建议不置可否，却没头没脑地列举了德国自开战以来听取得的一连串胜利。直到会谈快要结束，希特勒才对齐亚诺说：“我们在俄国所进行的战争是决不会停止的，德国人决不会向俄国妥协。请向领袖转达，我们向北非增派军队决不会使我们在俄国前线的力量受到影响，请他放心。”齐亚诺等人走后，希特勒训斥戈林和里宾特洛甫两人：“我不允许这种失败主义情绪在我们的核心集团里出现，明确告诉你们，德国的出路只有两条，一条是胜利——彻底的胜利，一条是毁灭。我们的失败说明我们为之骄傲的日耳曼民族并不优秀，而失败的民族的出路除了灭亡，还会有第二条出路吗？”戈林和里宾特洛甫惶恐不安地看着希特勒，一句话都不敢说。从此，再也没有有人在希特勒面前提起同俄国议和的问题。

希特勒誓不议和的决心重又唤起戈林对自己所负使命的担忧，他好像刚刚明白过来似的，原来，斯大林格勒众多官兵的命运就系在他的身上。想到这些，戈林的情绪立刻低落下来。

1942年末的一天，戈林在他的帐篷里对施佩尔说：“如果德国在这场战争以后还能保持1933年时的疆界，我们就够高兴的了……。”施佩尔后来回忆道：“他给人一种疲乏不堪的感觉，……我的印象是，尽管他同希特勒谈话时极力保持一种沉着镇静的姿态，但他还是看到了失败越来越近了。”

圣诞节来临之前，戈林迫不及待地回到了卡琳庄园。圣诞节和元旦，他都是同妻女单独度过的，而没有邀请任何客人，这是近年来从未有过的事情。在他的领地上，戈林乐不思蜀，身心俱为儿女情长所占据。清晨，他亲自驾车把他的小女儿埃达送到芭蕾舞学校学习，傍晚又去把她接回。晚上，他和埃米围坐在壁炉前闲谈。有时，他开车到附近打猎，或者听听音乐。在那几天里，他取消了好几次重要的会见，只管沉浸在天伦之乐当中，好像从此就要隐居山林一样。一天晚上，戈林对埃米说：“如有可能的话，我愿意永远这样生活，在你和埃达身边，我充满幸福和安适的感觉。”埃米听戈林这样说，知道他一定又遇到了什么不愉快的事情，便柔声安慰他。

好景不长，元旦刚过，大概是1月4日，米尔希就带着他的技术主任沃尔夫冈·福瓦尔德上校找上门来了，戈林当然不能把他拒之门外。米尔希带来一份关于盟国飞机产量的绝密文件，这份文件详细地报告了1942年英国、美国 and 加拿大及其他国家的飞机生产情况。戈林当看到文件中赫然写着盟国的飞机产量高达2300多架。而德国居然不到600架时，气得把文件扔到了他

的写字台上，厉声反问：“你难道也糊涂了吗，你真的相信这份文件上的数字是真的？我真不明白，这些莫名其妙的情报我们的情报机关是从哪里弄来的。”米尔希本来想同戈林商量一下提高德国飞机产量的对策，见他这样，只好急忙告辞。

第二天，戈林接到希特勒的电话，希特勒让他马上回大本营开会。戈林极不情愿地登上了他的专列，临行前他对埃米说，他很快就会回来。1月7日，戈林来到希特勒的大本营。他在大本营只呆了不到一天，参加完会议之后，便匆匆返回卡琳庄园。

1943年1月16日是戈林的50岁生日，他早就有心好好庆祝一下，但现在却没有那样的兴致了。埃米执意要为戈林操办，他才不得不起精神让工作人员做好庆祝的准备。在戈林回到卡琳庄园的第二天，希特勒的副官打来电话说，元首已经下令在全国34个范围内公开举办庆贺戈林的50大寿的活动。戈林深感意外，他绝对没有想到在此危机四伏的时刻，希特勒还会想起他的生日，更没想到希特勒会命令举办大规模的庆祝活动。戈林想，元首这样做，也许是为了显示他并没有忘记他们患难与共的日子和他们非同寻常的友谊。依戈林平时的性格，元首如此抬举他，给他这么一个大出风头的机会，他不知会兴奋、炫耀、铺排到什么地步，可是，不知为什么，这次接到电话后，他并没有感到有多么高兴，连他自己都觉得奇怪。

在生日即将到来的几天里，戈林收到了大批礼物，其中有意大利大使代表意大利政府向他颁发的金质一级罗马雄鹰勋章，墨索里尼还以个人的名义送给他一把金柄佩剑。一些工业和商业巨头也纷纷送来价格昂贵的礼物，有的甚至直接将数额巨大的支票送到戈林手里。一时间，卡琳庄园车水马龙，热闹非凡，埃米迎来送往，忙得不可开交。戈林却反应冷淡，仿佛已看透了这套虚情假意的把戏，不到万不得已时不出来应酬。埃米劝戈林答谢一下前来祝贺的人，经百般劝说，戈林总算命令开放一个歌剧院（由于敌机轰炸，柏林所有的剧院都已关闭），请所有给他送礼的人和卡琳庄园的工作人员观看歌剧。

戈林的预感真的灵验了，生日没到，烦心事却一件接一件地来了。1月13日，他接到希特勒办公室的一份文件，文件宣布，经元首批准成立了一个由鲍曼、拉姆斯、凯特尔组成的“三人委员会”，自委员会成立之日起，所有需元首签署的文件，都必须先经他们三个人审阅，目的是“避免文件因考虑不周而签发以及由此造成的文件内容互相矛盾的情况”。这个“三人委员会”显然是鲍曼、拉姆斯、凯特尔串通一气的产物，真正目的是在元首周围设置关卡，利用这道关卡削弱政敌的权势。戈林作为希特勒的接班人、纳粹德国的第二号人物，竟在全然不知的情况下被排除在外，他能不感到气恼、沮丧吗？戈林尤其不愿正视的是，这件事说明他在希特勒心目中的地位已经很可怜了。

1月15日，希特勒又签署了一项特别命令，授权米尔希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利用空军和民航机队加强对斯大林格勒的空运，而无须经过戈林同意。戈林得知这项命令，心中一片茫然。他不明白希特勒为什么对他如此绝情，接连作出对他不利的决定。实际上，希特勒的决定是在近乎绝望的关头作出的，斯大林格勒前线的士兵危在旦夕，而戈林的空运行动迟迟没有进展。尽管那顺内克遵照戈林的指示，全力提供各类运输机，但由于各运输机中队的指挥官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为飞机发动机保暖，而大部分机组人员又不懂标准

的冷起动机程序，致使大部分飞机处于瘫痪状态，这些情况戈林根本就不知道。米尔希在接到由他接管空运工作的命令的第一天，就让他的工作人员检查了运输工作的总体情况。当晚，米尔希接到报告，在前一阶段的空运中，空军大约损失了 200 多架运输机，包括被当作运输机使用的几十架轰炸机。用于斯大林格勒的运输机尚有 140 架容克 52 运输机、140 架亨克尔 111 运输机和 20 架 Fw200 运输机，但由于各种原因，仅有 15 架容克 52、41 架亨克尔 111 和 1 架 Fw200 尚能起飞。第二天，米尔希撤去几个玩忽职守的中队司令官，并亲自飞往斯大林格勒前线，让保卢斯连夜组织士兵修建多个临时机场，下令向斯大林格勒运送跑道照明设备，以保证空运可以昼夜进行。为补充运输机的不足，米尔希动用大批运输滑翔机，让工厂赶制空运箱，同时调集战斗机护航。在米尔希的指挥下，空运工作才算卓有成效地开展起来。

然而，空运已经不能挽救第 6 军团灭亡的命运。1 月 10 日早晨，苏军的 50000 门火炮狂轰德军阵地，自此斯大林格勒战役进入最后阶段。在苏联红军的奋力打击下，第 6 军团的阵地越缩越小，只剩下 15 英里长，9 英里宽的一块地方。至 1 月 24 日，阵地又被分割成两块，最后一个临时飞机跑道也失去了。第 6 军团弹尽粮绝，反击没有可能，逃生的希望微乎其微，他们已经陷入绝境。保卢斯去电请示：“继续抵抗下去已无意义，崩溃在所难免，部队请求允许投降，以挽救残部生命。”希特勒回电：“不许投降。”

第 6 军团必须死守阵地，直至最后一兵一卒，一枪一弹。你们的英勇对建立一条防线和拯救西方世界将是永志难忘的贡献。”

在第 6 军团走向崩溃的日子里，戈林一直呆在大本营，每天都让他的副官把斯大林格勒前线的战报及时送来。他开始真心为第 6 军团官兵的命运而担忧，并为他前一个时期的逍遥而愧疚，他企盼能够出现使第 6 军团绝路逢生的奇迹。当然，戈林最为担心的还是第 6 军团一旦被消灭，他作为德国空军的最高指挥官，就负有不可推脱的罪责，到那时他该如何向国人交待，如何向元首交待。希特勒的爱将——装甲兵将军汉斯·胡伯被米尔希从包围圈里救出后，咬牙切齿地对希特勒说，“为什么不杀一两个空军将军！在斯大林格勒，现在找不到一个空军将军，他们早就飞回了德国。”米尔希把胡伯的话告诉了戈林，戈林冷冷一笑：“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不管是谁，一到斯大林格勒前线就糊涂了。”米尔希听出戈林话里有话，其实他要说的是第 6 军团走到这一步的根源并不在于空运的失败，而在于令其死守的错误决策。戈林又对米尔希说：“你难道不清楚我们的空军已经作出了怎样的努力，到今天，我们已经向斯大林格勒空运了 8350 吨物资，平均每天 116 吨。在空中，我们已经损失了 400 多架运输机和宝贵的轰炸机！这是我们整整一个军的装备！”米尔希真不知该说什么，最初他是空运的主要支持者之一，又是空运的最直接的指挥者，要说责任，他可是推不掉的。

1 月 28 日，第 6 军团被分割在二小块阵地中，他们只能眼看着死亡之神一步逼近。这一天，戈林给保卢斯发了一份电报：“第 6 军团的英勇奋战将名垂青史，后世子孙将会骄傲地谈起你们的自我牺牲精神。”

1 月 30 日是纳粹党执政 10 周年纪念日，戈林在电台里慷慨陈词：“千百年后，德国人将怀着崇敬的心情谈起这次战役。他们会记得，德国取得最后的胜利固然有种种原因，但起决定作用的是这一仗……为了德国更大的光荣，我们的荣誉和我们的领袖要求我们这样做。”不知第 6 军团官兵听到这番话会作何感想，而保卢斯的电报则是实实在在的：“最后崩溃就在 24 个小

时之内。”第二天，来自斯大林格勒前线的电报写着：“俄国人已经到了我们地下室的门前，我们正在捣毁器材。”电文后面的“CL”符号赫然在目，这是表示本台停止发报的国际无线电码。此后，大本营收不到第6军团任何消息。2月2日中午，希特勒的译电员终于收到一份前线部队发来的电报，希特勒接过看了一眼，便默默地把它放在了写字台上，面部表情僵硬、阴冷得令人感到恐怖。蔡茨勒拿起电报，只见电文是：“……已对占压倒优势的敌人战斗至最后一个人，德国万岁！”下午2时40分，德国的一架侦察机从斯大林格勒上空飞过，传回的情报是“这座城市已无战争的迹象”。斯大林格勒战役终于以德军的失败而告终，保卢斯及其他16名德国将军连同9万多名士兵成为苏联红军的俘虏。

历史学家们把著名的阿拉曼战役和斯大林格勒战役视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的确，在炎热的南线和寒冷的东线，德军所遭受的打击都是致命的。

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后，在临时机场丢失之前因病回到柏林的第6军团的埃尔温·耶顺内克将军，一见到希特勒，便强烈要求惩办造成这一灾难的“罪人”。这位面色苍白、极度虚弱的将军，两眼喷出仇恨的怒火，大声对希特勒说：“一定要严办，要把他送上军事法庭，即使这个人就是帝国元帅！”没等那顺内克说完，希特勒就开始历数陆军司令部如何辜负了他的期望，保卢斯如何不听从他的命令。说到激动处，希特勒口沫横飞，太阳穴和脖子上的青筋裸露，盯着那顺内克：“那个人（指保卢斯）本来应该让部队团结一致，战斗到最后一刻，然后自己举枪自尽……”希特勒发现那顺内克已呆若木鸡，就拍了拍他的肩膀说，“我指的不是你！不要再追究谁应该负责的事情了，这件事由我一个人承担责任。”2月6日，当曼施坦因同希特勒谈起准应对斯大林格勒事件负责时，希特勒说：“对于我军在斯大林格勒的失败，我本可以归罪于戈林，但他是我指定的继承人，所以我不能那样做。”

此时，戈林则度日如年，他不知道希特勒将怎样处置他。直到听说希特勒并不准备把责任推到他的头上，他才长出一口气。2月10日，戈林胆颤心惊地来到希特勒的大本营，希特勒显得很大度地说，是他批准了斯大林格勒的空运计划，那仅仅是因为他期望围困是暂时的。戈林极想对希特勒说点什么，希特勒却将话题转到了戈林下令修建的东普鲁士州立剧院上，对这一建筑赞不绝口：“那才是真正的艺术，如今这样的艺术已经不多见啦。”戈林虽然对希特勒的举动感到意外，但不管怎么说，这种结局都是值得庆幸的，他毕竟度过了一个难关，而且这个难关可能是他近年来所遇到的最大的难关。当然，对希特勒的用意，戈林也并非一无所知，显然，希特勒没有大张旗鼓地追究责任，主要是为了淡化斯大林格勒的失败的影响，他不想让悲观厌战的情绪蔓延。

正是：盲人瞎马临深池，兵败山倒无转机。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 第二十三章 垂死挣扎

盟国飞机炸本土，戈林空军难招架；  
大厦将倾苦撑持，黔驴技穷枉挣扎。

话说匆匆同希特勒见过一面之后，戈林无声无息地回到他在上萨尔斯山的夏季别墅。他不想再听到有关战争的话题，也不想见任何人，更不愿想怎样对付盟国空军对德国本土的威胁。对战争的前景，戈林已不敢抱有幻想，在一次德国空军高级将领会议上，戈林说过，“我们在东方遭受了最严重的挫折，……我们失去了重要的食品供应地。不用说，敌人的胜利鼓舞了他们的士气。他们下一步可能干什么呢？……真正的危险是敌人可能转向布列塔尼和诺曼底。……在军备方面，美国人有特别大的潜在优势。……我们有这样一些盟友，一个是战斗得同德国一样漂亮的日本，可惜离我们太远，第二个盟友是意大利，它却不能起一点作用。……所有这些都说明形势是多么黯淡。……”

2月28日，施佩尔突然来到戈林的别墅。原来，在大战的间隙，施佩尔同戈培尔、米尔希等人结为盟友，加紧筹划加强国内战线的各项事宜。他们决定请戈林出任“德国国防委员会上席”，恢复戈林在战争初期的地位，利用戈林的权势和威望，夺回被鲍曼等人攫取的权力，施佩尔此行的任务就是说服戈林接受他们的计划。戈林的奇特装束使施佩尔大吃一惊，只见他身穿一件醒目的绣着大花的绿色睡衣，手上涂着指甲油，脸上抹着脂粉！在同施佩尔谈话时，戈林不时从口袋里掏出几粒宝石，津津有味地把玩着。虽然戈林同意了施佩尔提出的建议，但施佩尔还是有一种失望感，他感到戈林已接近堕落，很难担起重任。可是，同鲍曼等人相较量，除了资深的戈林，别人恐怕暂时还不具备那样的实力，施佩尔等人只得孤注一掷，寄希望于戈林重新振作起来。

第二天，施佩尔和戈培尔一起去见戈林。长谈之后，戈林的斗志被唤起。提到鲍曼，他愤怒地叫道：“他总是打小报告，向我施放暗箭，现在该解决了，就由我解决！”施佩尔评论道：“近几年里，我从未看到过戈林如此生气勃勃，大胆泼辣。”为了加深戈林对鲍曼等人的仇恨，施佩尔火上浇油地说，鲍曼的目的就是做希特勒的接班人，为此他在希特勒面前离间戈林以及我们大家，并利用一切机会诋毁帝国元帅。施佩尔的话说到了戈林的痛处，使他坚定了击败鲍曼等人的决心。

然而，还没等戈林出击，他就落到自顾不暇的地步。盟国对德国的大规模空袭，一直未遇到强有力的拦截，希特勒对戈林的空军的无能恨之入骨，施佩尔和戈培尔根本不敢在希特勒面前提及戈林。3月1日夜，盟国空军的飞机长驱直入，飞临柏林市区，致使2万多幢建筑物被毁，就连戈林的空军司令部大楼都未能幸免，约有700多名柏林居民死于这次空难。而戈林此时正在罗马休假。希特勒焦急地问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帝国元帅什么时候回来？”但没有一个人知道。过了几天，施佩尔和戈培尔见希特勒的情绪还算不错，便想鼓起勇气提出让戈林和国防委员会重新发挥作用的建议。话还没有开头，就听到希特勒批评戈林：“帝国元帅已经忘记了空中战争，我在绞尽脑汁想法制止敌人对我们的空袭，他倒安闲自在。”当天夜里，纽伦堡遭到空袭的消息传来。希特勒马上派人把戈林的副官找来，当着他的面大骂“帝

国元帅不称职”。第二天，敌机又轰炸了慕尼黑。希特勒气极败坏地叫道：“让戈林立即从罗马回来。”11日，戈林灰溜溜地回到希特勒的大本营。这时，他才明白元首对他气恼到什么程度，自己的处境有多么不妙。

戈林前几天的劲头儿不见了，他像是劝慰他的盟友，又像宽慰自己似地说：“不要过高估计他们，鲍曼和凯特尔不过是元首的秘书，他们能成什么气候，都是无名小卒罢了。”后来，同盟者之间发生内讧。比如，在原本准备向鲍曼等人发难的一次会议上，戈林却临时变卦，突然把矛头指向施佩尔和米尔希，米尔希把戈林的出尔反尔归结为吸吗啡上瘾的结果。施佩尔等人则一脚把戈林踢开，开始篡夺他手中的权力。至此，为整垮鲍曼三人集团而结成的联盟宣告破产。

眼看着施佩尔的势力一天天扩大，自己的地盘一天天缩小，戈林很不甘心。在他们的联盟解体后不久的一天，戈林特意邀请钢铁工业部门的领导人到他的别墅开会。可是，在作完长篇发言之后，他竟然当众伏在桌子上睡着了，出尽了洋相。戈林的同僚们普遍感到，此人不可能再有作为了。

英国皇家空军轰炸机不断袭击德国城镇，美国空军也经常参加进来。仅仅在几个月前，戈林还不相信美国人的飞机能对德国本土构成威胁。有一次，指挥战斗机部队的加兰将军向希特勒报告，他的部队在德国边境城市亚琛上空击落了几架为轰炸机护航的美国战斗机，并说，据他判断，美国战斗机只要配上加大的副油箱，就能侵入德国内地。希特勒把加兰的话转告了戈林后，戈林却认为加兰故意给他找麻烦。见到加兰，他马上厉声问道：“你为什么告诉元首美国战斗机将飞入德国境内？”加兰镇静自若，重申一遍自己的看法。戈林追问：“真是胡说八道！你怎么会有如此荒唐的看法？”加兰不肯退让，强调他们确实在亚琛上空击落了美国战斗机，他所说的一切都是事实。戈林惊呼：

“这不可能。”

“您可以派人亲临现场，看看我们打下的美国战斗机是不是在亚琛。”加兰不客气地说。

戈林非常自负地说：“我也曾是一名经验丰富的战斗机飞行员。我知道什么是可能的，同样也知道什么是不可能。美国人的战斗机肯定是在亚琛以西很远的地方被击中的。由于是在高空被击中的，所以它还滑翔出一段距离才落下。”最后，戈林非常滑稽地命令加兰：“我正式命令你说，美国战斗机没有飞入过亚琛。它们没有来过，你懂了吗？你已经接到了我的正式命令。”在这件事中，戈林独断专行和盲目自大的性格特征暴露无遗。时隔不久，美国人的飞机便无情地教训了戈林。

4、5月份，戈林先是呆在伯希特斯加登的别墅，后来又回到费尔登施泰因他儿时住过的那座城堡，始终没有认真考虑如何对敌人进行反击。他认为，德国空军的飞机数量和质量同盟国空军相比，都处于劣势，根本无法组织起有效的进攻。在一次研究空战问题的会议上，戈林大发牢骚：“我们的空军倒是求胜心切，愿意战斗，但是缺乏飞行员、战术参谋和飞机。他们简直成了消防队被到处乱用，又好像是陆军的勤杂工，随便被支到一个地方。”戈林的这番话是针对希特勒的一些作法而说的。希特勒现在不但把持着陆军，而且开始干预空军的指挥工作，他多次直接下令，把一个个空军中队调往俄国前线。一次，那顺内克向戈林报告元首又把几个战斗机中队调往俄国前线，戈林把气都撒在了他的这位空军参谋长身上，大叫大嚷：“你不能一味盲从，



而应该学会勇敢地面对元首。”

实际上，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戈林已经处于半隐退状态，很少参加希特勒在他的大本营召开的作战会议，希特勒则好像忘记了帝国元帅的存在。戈林在纽伦堡审讯中谈到他同希特勒的关系时说：“我对元首的影响最多到1941年底或者1942年初，在此之后，我对他已经谈不到有什么真正的影响了，后来几乎就消失了……。”这时，他自己已清楚地意识到，他的权力正逐渐被希特勒周围的那些得宠的政敌们所剥夺。施佩尔权倾一方，鲍曼如日中天，在希特勒心目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就连希姆莱也大有凌驾于戈林之上的趋势，他已是内政部长。这一切都使戈林愤恨不已，可他又无力改变现状，只好听任权力的杠杆迅速向于他不利的方向倾斜。

戈林的空军似乎从天上消失了，德国的一些重要城市几乎每天都要遭到毁灭性轰炸。开始，在受到各方面谴责时，戈林还出面解释，强调他的理由，到后来，则干脆不露面了。每次大规模轰炸过后，空军方面都应到希特勒的大本营汇报情况，过去通常是戈林亲自去，现在一般都派那顺内克去。那顺内克每次回来，都要被戈林盘问，他一旦发现那顺内克讲的话同他的意见不一致，就要痛骂那顺内克一顿，使得那顺内克去见戈林像要去受刑一样恐惧。

敌机的空袭日甚一日，仅7月25日至8月2日几天里，对汉堡一个城市就进行了五次大轰炸，戈林的空军除了有一次打下几架敌机外，其余几次几乎没有还手的份儿。当非议涌向空军时，耶顺内克再次成为戈林的出气筒。8月13日，美国轰炸机炸毁德国的梅塞施米特飞机制造厂。由于戈林躲在巴伐利亚，希特勒只得对耶顺内克又吼又叫，耶顺内克的自尊心大受伤害。

17日，美国空军轰炸大型滚珠轴承工厂的集中地——施魏因富特，而滚珠轴承是一种至关重要的军备物资。耶顺内克继续代戈林受过。他的精神负担越来越重，弦终于绷断了。18日夜，英国空军轰炸柏林。更为可怕的是对柏林的轰炸仅仅是英国皇家空军放出的烟幕弹，这次空袭的真正目标是正在实验生产A—4导弹的基地佩纳明德，基地成力一片废墟，700多名导弹专家葬身火海。第二天早晨，希特勒在电话里对耶顺内克说了许多难听的话。上午，耶顺内克开枪自杀。这位曾是戈林的最亲密的助手的空军上将留下一个简短的遗言：“在我死后，不许戈林参加我的葬礼。”当然，戈林还是参加了那顺内克的葬礼，并代表希特勒送了一个花圈。就像当年对待乌德特一样，参加完葬礼之后，戈林转身就大骂他死得活该。随后，京特·科滕接替了耶顺内克的职务。

8月底至9月初，英国空军对柏林的几次袭击受挫，英国人暂时停止了轰炸柏林的行动。

10日下午，希特勒、戈林同其他纳粹领导人一道发表广播讲话，宣告在三个月内，他们的帝国就会重新站起来，胜利很快就会到来。几天后，德国空降兵成功地救出被囚禁的意大利法西斯领导人墨索里尼，把他运回希特勒的大本营。戈林像是受到了鼓舞。稍稍有些活跃起来。当隆美尔的部队发现了意大利人藏匿的军需物资的消息传来，他第一个跳出，大骂意大利人“这些年来一直都在有意破坏”，并让隆美尔“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击意大利人”。

从1943年10月开始，驻守俄国的德军不断后撤。希特勒多次把戈林召去，严厉地告诫他，对于纳粹德国来说，最重要的还是西欧防务，德国决不能丢掉西欧，而制空权又是西欧防务的生命线。但是，那个时候，德国其实

已经失方了制空权，在为战斗机部队装备正在加紧生产的喷气式战斗机之前，夺回制空权等于天方夜谭。希特勒可不想听戈林诉苦。戈林后来在谈到这些情况时说：“……元首同我越来越疏远，每次我向他汇报，我都发觉他非常不耐烦，……经常在我还没有说完时就打断我的话，并且越来越多地介入空军事务。”提到他的空军在这一阶段的败绩，戈林显得很委屈，“作为空军司令，人民以为我有责任，也的确如此。但是，我当时又有什么办法……我们的战斗机在白天几乎不能出来作战。人们讥讽我们的空军说‘戈林的空军到了，空袭肯定结束了’。”说到这里，戈林紧皱眉头，提高音量：“这是我有生以来所遭受的最大的痛苦！”

10月4日，英国轰炸机再一次大规模地轰炸了法兰克福，加兰的战斗机部队居然没有进行阻击。空袭结束后，希特勒在电话里斥骂了戈林一顿。放下电话，戈林马上给加兰打去电话，责问他的部队为什么不出动迎战。加兰解释说，由于天气不好，飞机无法起飞。戈林恶狠狠地说：“先生，别忘了，德国公众并不关心你的飞机的损失。你要是到法兰克福随便找一个人问问，损失战斗机和死伤如此之多的德国公民哪个更严重，那个人一定会说你疯了，死了几千人，你还在这里谈你的飞机的损失。为了德国空军的声誉，不能再有第二个法兰克福了，你也许还受得了，但我受不了！”第二天，戈林又被希特勒叫去骂了两个小时。当希特勒问到他现在能拿出什么具体方案，解决德国空军的问题时，戈林向希特勒汇报了他正准备实施的“224号计划”。按照这个计划，德国的飞机制造厂将全力制造ME262喷气式飞机，然后用这种飞机装备德国空军。戈林把挽救德国空军的希望完全寄托在这种新型喷气式飞机上面。

戈林在被希特勒训斥后，不得不开始关心空军事务。他知道，逃避是不可能的，他只能同元首及纳粹德国同生死、共存亡。戈林在希特勒的威逼下，重返他的大本营。由于希特勒命令他即刻赶到，他只好放弃了乘坐专列的打算，提心吊胆地坐上一架福克—沃尔夫200型飞机。在飞行的途中，戈林似睡非睡，脑海中始终充斥着美国和英国的飞机对他的坐机轮番进行攻击的幻影。突然，他的眼前一亮，觉得自己找到了能够弥补德国战斗机数量的不足，有效地阻击侵入德国上空的敌机的办法。

飞机终于平安地在目的地降落，戈林走下飞机，不由得轻舒一口气。他来到大本营的会议室一看，加兰等空军将领早已等在那里。加兰向戈林简略地汇报了德国空军的近况，不外是装备和油料的短缺，使得德国空军不能升空作战。戈林打断了加兰的话，对在场的人说：“也许我们的飞机没有美国人和英国人的多，但是，我现在已经有了对付他们的办法，那就是每一次战斗都要采用这样的战术：‘攻击—攻击—再攻击’。”戈林见加兰等人没有听懂他的意思，就解释说：“根据计算，在美国人和英国人每次4个小时的空袭期间，我们的飞机可以起落3次进行攻击。这样一来，我们的一个中队就等于3个中队——这下就有美国人和英国人好看的了。”说完，戈林得意地大笑起来。看到加兰等人仍然沉默不语，戈林沉下脸说：“我再强调一遍，一定要3次！”

10月8日，两批数量均在几百架的美国轰炸机机群，在同样数量的战斗机的掩护下，袭击了德国东部和北部的重要战略目标。

德国几乎将在中欧地区的战斗机全部出动，虽然击毁28架轰炸机，却没能阻止敌机击中目标。位于东普鲁士的马林堡的福克—沃尔夫飞机组装厂的

绝大部分厂房，遭到毁灭性打击。戈林接到报告后，赌咒发誓一定要让美国人尝一尝他的新战术的厉害。不久，有了一次这样的机会。

10月14日中午，戈林召集飞机制造商开会，有人提出ME264轰炸机的研制方案。经过激烈争论，专家们确认这个方案不仅缺乏可行性，而且会影响ME262的试产进程。戈林哀叹道，“我们的飞机要是能在美国扔下几颗炸弹，让他们也尝尝实行灯火管制的滋味就好了！”正在这时，戈林接到大约300架美国轰炸机飞往施魏因富特，再次袭击那里的滚珠轴承厂的报告，他决定采用他的新战术指挥空战。听从戈林的指令，参战飞机全部在德国南部的机场起落。第一批升空的德国战斗机首先打破了美国飞机的阵形，当美国飞机撤退时，第二批德国战斗机又紧紧地咬了上去。第一批德国战斗机抽空降落加油，装填弹药，接着再次起飞。已被第二批德国战斗机打得落花流水的美国轰炸机群好不容易脱离战场，不料又遭到第三批德国战斗机的攻击。加兰战后声称，他的部队共击落121架美国轰炸机，而他只损失了14架飞机。当时，希特勒正在他的大本营同施佩尔等人讨论军备问题，他的副官满脸喜色地通报：“帝国元帅要同您通话，他要报告一个特大喜讯。”希特勒听完电话，喜不自胜地对在座的人说：“敌人在袭击施魏因富特时被打垮，我们的防空部队大获全胜。”说“大获全胜”实在有些言过其实，其实，敌人的轰炸机在阵形被打乱的情况下，还是扔下了炸弹，并击中了目标。不过，在德国空军处于劣势的时候，这次空战所取得的战果已实属不易。施魏因富特空战是戈林引以为自豪的战事之一。

戈林没有得意几天，他的战术就不灵了。美国人和英国人似乎已对这种新战术了如指掌，并有了相应的应变措施。每次空袭前，英美空军都出动一定架次的飞机，或佯攻，或骚扰、迷惑敌人。使德国空军最为头疼的是，他们常常先派德国雷达所无法发现的蚊式飞机，在攻击目标以外的地区，大量抛撒铅箔，发射照明弹，引诱德国飞机徒劳地起落，使得飞行员疲于奔命，油料被白白浪费。而当真正的轰炸机群出现时，德国空军反而没有能力应战了。10月22日深夜，英国皇家空军成功地完成了对长塞尔城的德国飞机制造厂的轰炸。虽然这天夜里，戈林一直呆在空军指挥部的战斗机指挥中心，但他面对英国人的战术束手无策，眼看着飞机制造厂在从天而降的弹雨中成为一片废墟。

第二天上午，戈林像是一个输得一文不名的赌徒一样，两眼通红，歇斯底里。他把空军基地的战斗机飞行员统统集中到一起，冷嘲热讽：“你们曾说过敌人胆敢靠近，就让他们‘饱餐一顿’，现在敌人来过了，可什么也没吃到，我们的人民日日夜夜生活在敌机轰炸的恐怖中。如果说在黑暗中我们的战斗机无法准确地击落敌机还有情有可原，那么在白天，特别是在晴空万里的日子，我们的战斗机居然捕捉不到目标，则无论如何不能得到原谅了。难怪人们写信说，我可能只招募残疾人负责空中防御。”最后，他挥舞着拳头大叫“要在德国空军中铲除懦夫”。

了解内情的人都会说，戈林冤枉了那些战斗机飞行员，德国空军的失利决不仅仅是士气的问题，而主要是因为他们的飞机同敌机的实力对比相差得太悬殊。事后，戈林第一次对他手下的人承认，德国空军在飞机的数量上不可能再占优势，当务之急是对飞机性能的改善，或者说在新型飞机的研制上多下功夫。可是，愿望终归是愿望。无论是戈林寄予厚望的ME262型战斗机，还是ME163型截击机或JU287新型轰炸机，离批量生产都还差得很远。在向

希特勒汇报时，戈林鼓足了勇气保证，如果战争能够坚持到把这些飞机装备到部队，那么德国就将重新夺回制空权。戈林和希特勒心里都明白，这种保证完全是自欺欺人！11月初的一天，米尔希提醒戈林，“必须考虑待到明年春天，当美国人有了远程战斗机护航再来轰炸时，我们该怎么办的问题。”戈林无计可施，只能高喊：“即便德国的每一座城市都被夷为平地，在城市出现之前就已存在的德意志民族也照样能生存下去！”接着，戈林下令成立突击部队，它的任务就是使用重装甲战斗机，以密集阵形进行水平进攻，以近距离作战方式击败敌机。戈林想让突击队员充当敢死队，以生命为代价为德国空军赢回失去的荣誉。

11月22日，英国皇家空军重又恢复对柏林的空袭。晚上7点半钟左右，大批轰炸机飞临柏林上空。爆炸声不绝于耳，建筑物一座座倒下，戈林的“研究所”也被炮弹击中。第二天早晨，戈林赶忙把米尔希、科滕等人召到卡琳庄园，紧急磋商加快喷气式飞机生产的问题。4天后，为了平息希特勒的怒气，戈林特意为他安排了一次最新武器装备和飞机样机展示活动。那天晚上，英国飞机再次袭击柏林。柏林邮电总局被炸毁，阿尔克特坦克工厂则被大火吞没。直到第二天早晨，城区里仍然到处可见火光。

希特勒命令戈林制定报复英国人的计划。戈林准备采取代号为“摩羯座”的行动，对伦敦的防空设施进行饱和轰炸，对大不列颠重要的工业区和港口实施大规模空袭。

12月6日，戈林以监督“摩羯座”的执行为名，只身前往巴黎。“摩羯座”行动一再推迟，戈林个人的收获却不算小。圣诞节前夕，他带着此行的“战利品”——为他所钟爱的艺术品，回到了卡琳庄园。

在失败的煎熬中，戈林送走了对于他个人及其第三帝国来说都是不堪回首的1943年，年初斯大林格勒战役的惨败使得德军一蹶不振，后面墨索里尼的倒台使得德国纳粹更加孤立无援，盟国军队在意大利南部登陆大大削弱了德国人的势力，而盟国飞机对德国本土的轰炸更是德国人所难以承受的毁灭性打击。德国空军在各条战线的表现都不尽人意，戈林和他的空军几乎成了众矢之的。

在艰难的处境中，戈林迎来了他的51岁生日。他的同僚们本来猜度戈林在这个时候不会大操大办，生日宴会的请柬却不期而至。在卡琳庄园的豪华的寿筵上，高朋满座，热闹非凡。在物资奇缺的德国，戈林摆出的排场足以令各路宾客惊叹不已。有关部门和人员照例送来了贵重的礼物，其中不乏国宝级的艺术品，仅驻意大利的德国空军部队就送来16只装满艺术品的板条箱。戈林的生日，已成为他每年一度聚敛财产的大好时机，连施佩尔、米希尔等人都不能逃脱被搜刮的厄运。据施佩尔回忆，他当上普鲁士州议员后，每年快到戈林生日时，都会收到一张单据，写明州议会扣除他的一部分进项，用来购买送给戈林的生日礼物。米尔希告诉施佩尔，为给戈林送生日礼物，航空部也曾扣过他的薪金。也许戈林已想到他的王国即将彻底覆灭，所以他无论如何也不愿放过任何一个满足私欲的机会。

1944年的生日庆典确实是戈林最后一次为自己隆重地庆贺生日，也可以说是他最后一次享受人生的奢华，是他生命的最后一线风光。当宴会进行到高潮，有人在祝酒时吹捧戈林“是最伟大的德国人之一”。这话要是放在过去说，肯定会使戈林飘飘然，今天却使戈林浑身不自在，甚至听出了一种讽刺的意味。

本来准备在年前实施的“摩羯座”行动拖到戈林生日后，还是不见动静。直到 1944 年 1 月 21 日，英国空军向柏林投下两千多吨炸弹后，戈林才下决心下达采取“摩羯座”行动的命令。事后，戈林告诉希特勒，那天夜里三四百架飞机袭击了伦敦，而来自伦敦方面的消息却说，最多只有 30 架德国飞机进入了伦敦上空。希特勒怒气冲冲地让戈林查明情况，戈林慌忙躲回了卡琳庄园。

日益频繁的大规模空袭，使德国的军事工业损失惨重，而柏林等城市更是面目全非。空战失利使得戈林的空军威望扫地，戈林在他的元首以及德国民众面前已经抬不起头了。虽然他不肯认输，拼命在加强空中防御方面下功夫，但一切努力终是杯水车薪，根本无济于事。

2 月 24 日，焦头烂额的戈林登上他的专列。他决定丢下战争，袖身到费尔登施泰因堡休养一阵子。可就在帝国元帅远离战争的这段日子里，他手中所剩无几的权力又一次遭到政敌们的剥夺。看来，戈林走向穷途末路，已成不可更改的事实。

正是：百足之虫有僵时，无可奈何大势去。欲知戈林的最后命运，且看下章分解。

## 第二十四章 末日来临

全线败退帝国亡，失宠元首政敌怨；

僭主越位被罢黜，穷途末路赴黄泉。

战争进入 1944 年之后，纳粹德国的败势越发明显。来自东线的苏联红军逼近东普鲁士，而英美开辟第二战场在这一年已经成为日益迫近的最大危险。不甘认输的戈林把挽救局势的希望寄托于成功地击败英美军队在西欧的登陆行动上面，他认为德国空军虽然不能形成有效的防空系统，但拼全力把敌人消灭在滩头阵地则还是可以做到的。

这一年春天，戈林和他的空军的命运曾有过短暂的转机。3 月 30 日深夜，英国皇家空军派出 800 多架轰炸机袭击纽伦堡，德国雷达捕捉到了目标，并精确地确定了它们的位置。200 多架德国战斗机攻入敌人的轰炸机群，摧毁 100 多架敌机。德国空军取得了他们在这次战争中最大的一次空中防御胜利，这一胜利使得英国皇家空军在 6 个月内组织不起有效的夜间袭击。戈林正在得意之中，又有喜讯传来，德国飞机制造工厂在 3 月份共生产出 1670 架战斗机，并修复 530 架战斗机。空中防御的胜利和飞机产量的大幅度增长好像给戈林打上了一针强心剂，他的野心重又复苏，顿时下定大干一场的决心。

3 月下旬，听说希特勒去了上萨尔斯堡，戈林也紧跟着搬入他在那里的别墅。现在，他就住在元首的身边，这为他讨好元首，重新唤起元首对他的好感提供了便利条件。恰好，这一时期戈林的劲敌施佩尔因病住院，戈林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削弱他的势力，夺回被他篡夺的那部分权力。

戈林了解到，施佩尔同希特勒的关系已不像前一段那么密切了，在修建地下设施的问题上，他们两人分歧颇大。几个月来，为使军工厂免遭敌机轰炸，希特勒一再要求施佩尔抓紧修建地下设施，以尽快把军工部门转入地下。施佩尔则认为，希特勒的想法不切实际。尽管在希特勒的催促下，他已开始行动，但进展缓慢。希特勒对施佩尔的作法非常恼火，对他的态度大不如从前。戈林开始行动了，他先带施佩尔的两个助手多施和绍尔到希特勒那里去说对施佩尔不利的话，然后他对希特勒说，只有托特组织能够胜任修建大型地下设施的任务，而多施曾是托特组织的一个头目。4 月中旬的一天，希特勒突然召见多施，授权他负责地下工程。当多施提出他将在 11 月份以前完成六处地下工程，希特勒对施佩尔消极怠工的不满又多了几分。两天后，希特勒对戈林说，他想建造一座多层地下工厂，这个工厂昼夜不停地工作，每月造出 500 架 ME262 型飞机。戈林马上答道：“这都让施佩尔耽误了，我们早该有了……”希特勒让戈林以后管起这类事，而不要让施佩尔插手。戈林以为他的目的达到了，甚至给施佩尔打去电话，暗示他重病在身，应该离职。

戈林还是低估了施佩尔的谋略。施佩尔很快放弃了他曾有过的辞职隐退的想法，并以高过戈林一筹的手腕，说服希特勒推翻了他前些日子作出的决定，在施佩尔起草的确认多施仍旧归他领导，“在施佩尔的领导下负责建造地下设施”的文件上签了字。希特勒诚恳地表示了对他的信任，施佩尔在元首心目中的地位恢复如初。可是，施佩尔并没罢手，他在给戈林的信中以嘲弄的口吻写道：“建议任命多施作为我的代表负责四年计划中的建筑任务，……依您对多施先生的信任，我想您肯定会同意的。”戈林是哑巴吃黄

连，有苦说不出，只得捏着鼻子同意了他的要求。在这场权力斗争中，戈林一败涂地。

真可谓祸不单行，正当戈林被施佩尔整得狼狈不堪的时候，空前的灾难降临到德国空军的头上。5月12日，美国第8航空队出动935架轰炸机轰炸德国中部和东部的燃料工厂，一些炼油厂被炸毁。这次空袭使得德国的燃料日产量下降了1千多吨，德国空军的生命线濒临险境，可以说这是德国空军真正走向末日的开始。希特勒认识到形势的严峻，亲自召集燃料工业界代表商量应急办法。难脱干系的戈林不知是怕希特勒归罪于他，还是真的有点儿麻木了，反倒轻描淡写，劝大家不要太悲观。就在通过各方面的努力，燃料产量迅速回升时，5月28日，美国第8航空队第二次袭击德国燃料工厂，破坏程度超过了上次。空袭过后，希特勒的一些谈话使人感到他对戈林厌恶至极，戈林的威信降至最低点。

借此机会，施佩尔再次施展诡计报复戈林，提出由他的军备部接管空军军备生产。希特勒接受了施佩尔的建议，并非常坚定地说，“空军的军备工作必须归到你的部里，这是毋庸置疑的。我立即召见帝国元帅，把我的意思告诉他，你同他研究工作移交的具体问题。”戈林得知希特勒的妥排后，大惊失色，在施佩尔面前伤心地抱怨：“不久前，元首还嫌你管得太多，要把建筑部门从你那里划出去，后来他又取消了原来的决定。”发过牢骚之后，戈林软了下来，顺从他说：“……既然元首要这样，我当然愿意把空军军备生产交给你。”最后，戈林亲自签发了把空军军备生产归入军备部的命令。

1944年6月6日，盟军在法国海岸诺曼底登陆，开辟了第二战场。希特勒等人并没有惊慌失措，因为他们对此早有预料，戈林甚至有一种重振雄风的良机终于到来的兴奋感。接到报告后，希特勒竟以得意的语调对戈林等齐聚于他的大本营的纳粹领导人说：

“这是我意料之中的事，今天他们果然来了——就是这里——，”他敲敲地图，“那么，这里就是他们的滑铁卢！”戈林等人点头称是，齐称元首“英明”。在此之前，陆军的主要将领们一直认为盟军所选择的进攻西欧的登陆地点会在加莱附近，那里是英吉利海峡最窄的一段，盟军也确实一直在那里频繁活动。希特勒却凭着他那不可思议的直觉判定诺曼底一带是“最危险的地区”，并下令加强这一地区的防御。

离开希特勒的大本营，戈林简直有些按捺不住，为之准备了近一年的机会终于来了，他恨不能马上让他的空军出击。然而，戈林没有想到，一份可疑的情报使希特勒受到干扰，最高统帅部对在诺曼底登陆是否是盟军的真正意图产生怀疑，因此迟迟没有部署反击行动。在盟军登陆的当天，大约只有80架德国战斗机可以参战，然而实际上这些飞机绝大部分都没能如期到达指定的机场。败局由此铸定。拖到7日晚，希特勒才命令戈林将在德国的800架飞机调往法国。与盟军出动的1万多架次的飞机相比，德国空军的力量几乎等于零。直到8日，在诺曼底上空才出现零星的德国飞机，起不了太大的作用。盟军稳稳地站住了脚跟，希特勒将盟军消灭在滩头阵地的叫嚣，变成了可笑的呓语。纳粹经营多年的所谓“大西洋防线”竟如此不堪一击，不能不令希特勒心惊肉跳。

盟军登陆成功后，希特勒命令陆军不惜一切代价把他们消灭在陆地，但遭到以伦斯德和隆美尔为首的陆军将领的强烈反对。6月17日，在苏瓦松的一个坚固的地下掩体中，希特勒同伦斯德、隆美尔等人讨论了如何展开反击

的问题，隆美尔直言相告，对于德军来说现在最好的策略就是放弃寸土不让、驱敌下海的目标，让德军主力撤至盟军的海上炮火射程之外，保存实力，伺机反击。希特勒坚持不同意隆美尔等人的意见。6月20日，更为可怕的消息传来，俄国军队在东线发动总攻，德国中央集团军在几天内便被打垮。7月4日，俄军越过1939年时的德波边境线，向东普鲁士挺进。希特勒下令集中德国本土所有的战略预备队，开往东普鲁士阻挡俄军，这样一来，在西线的德军已经不可能再得到有力的支援了。

在此期间，戈林遵照希特勒的命令，向伦敦及英国其他主要城市发射了V—1飞弹，使伦敦和英国南部的一些城镇淹没在火海之中。让戈林感到欣慰的是，在那段日子里，英国空军的轰炸都集中在发射V—1导弹的基地上，德国城市几乎没有遭到空袭。6月21日，戈林在接到大批号称“空中堡垒”的美国B—17轰炸机降落在苏联的波尔塔瓦机场的情报后，命令空4军出动飞机连夜奔袭，结果炸毁了40多架B—17轰炸机、15架野马战斗机以及90多架苏军飞机，而德国飞机全部完好无损地飞回基地。戈林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有所改善。不过，他很清楚，这些已无助于扭转败局。

德国城市上空的平静很快便过去了。7月份，英美空军对德国各主要城市的轰炸重新开始。此时，在诺曼底虽然隆美尔的部队还在拼死阻止英美联军扩大战果，希特勒仍然狂呼要把“入侵者”赶下海去，但是，包括戈林在内的大部分德国高级将领都深知这是不可能的，盟军占领西欧仅仅是时间问题。自从盟军在诺曼底登陆，戈林就忙于设法把他在巴黎的艺术品运回德国。到7月中旬，戈林已以紧急发运的形式从巴黎运回40箱艺术品。随后，戈林回到了卡琳庄园。

7月20日清晨，戈林来到希特勒的大本营。上午，他正在听第6航空队参谋长克勒斯上校汇报，希特勒的副官贝洛上校打来电话说，刚才元首在他的会议室里遭到炸弹袭击。戈林忙问元首现在怎么样，贝洛告诉他，元首没有受到丝毫伤害，空军将领博登萨茨和科滕却被炸伤，其中科滕伤势较重。戈林立刻赶到希特勒那里，发现希特勒怔怔地站在会议室里，似乎还没从惊吓中回过神来，连他走进都没有一点儿反应。戈林上前报告了一声，希特勒才好像被从梦中惊醒一样，仔细地看了戈林一眼，恨恨地说：

“他们是炸不死我的。”戈林拙嘴笨舌地劝慰了几句，希特勒就打断了他的话，让戈林同他一起去火车站为墨索里尼送行。路上，希特勒对戈林说，他要消灭制造暗杀事件的阴谋集团。第二天，调查工作开始。不久，真相很快便被查清。原来，暗杀事件是以前陆军参谋长贝克将军为首的一些陆军将领策划的，安放炸弹的人是陆军办公厅主任奥尔布里希将军的参谋长施道芬堡，他趁希特勒召开会议之机，把装有特制炸弹的皮包放到希特勒前方的会议桌下。只是由于一个偶然的原因，皮包被参加会议的人移到距希特勒较远的地方，希特勒才得以死里逃生。所有参加密谋的陆军将领几乎都被处死。

暗杀事件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的清洗活动，许多同此事没有任何牵连的人被逮捕。主管此事的希姆莱怀疑空军中有人参与此事，但戈林打了保票：“我的空军不会有一人同此事有关！”希姆莱本人甚至怀疑戈林事先知道暗杀阴谋，因为戈林的研究是德国最大的间谍机构，暗杀集团准备了那么长时间，他却没听到一点风声，实在令人不解。也许是希特勒不相信戈林会对他下毒手，对戈林的秘密调查不了了之。

希特勒大难不死，新任空军参谋长科滕却因伤情过重不治而死。空军参



谋部的工作暂时由科滕的副手科勒将军负责，不久，戈林任命德国飞行训练学院院长克勒伯中将为空军参谋长。

尽管戈林躲过了遭清洗的厄运，但他的名字被写入了盖世太保的黑名单。戈林隐隐感到了什么，却又无法表白，毕竟没有人公开对他怎样。希特勒故意冷落他，甚至当众训斥他，已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在暗杀事件发生的当天晚上，为平息各种“谣言”，希特勒在电台发表讲话。他讲完话，紧接着就让海军大将邓尼茨讲话，下面才轮到戈林。在这方面十分敏感的戈林，当即意识到这是一个信号，一个将把他从纳粹德国领导核心清除出去的信号。随后，希特勒授权戈培尔全权负责战争事务，这对同戈培尔素有积怨的戈林来说，不能不说又是一个沉重的打击。8月初，盟军突破德军西线的防御线。就在这时，戈林的工作人员对外宣布帝国元帅因身染重病，需要休养一段时间。在养病期间，戈林吩咐他手下的人除了希特勒的电话之外，其他人的电话一律不接。可是，希特勒让他失望了，他没打来一个问候的电话，好像忘记了戈林。戈林的政敌们看出他已彻底失宠，因此开始打击他的一些密友，调查忠实于他的空军将领。戈林明知道他的密友和爱将是因为他而受难，却无力保护他们。

盟军在西线的攻势越来越猛，法国的失陷已成定局。正在休养的戈林已不把局势放在心上，而只为他剩在巴黎的艺术品担心。3月11日，新任空军参谋长克勒伯第一次参加由希特勒主持的会议。希特勒冷冷地问克勒伯：“要多长时间戈林的病才能好？”克勒伯不知希特勒用意何在，只好说不太清楚。会后，克勒伯把希特勒的话告诉了戈林，戈林就再也无法专心“养病”了。8月24日，他重新出现在希特勒的大本营。见面时，希特勒连一句问候的话都没说，就劈头盖脸责骂起来，说空军起不到任何作用，空军的那些人一直用虚假的数字欺骗他。戈林明白，希特勒所说的“那些人”自然也包括他在内。接着，希特勒批评空军的地勤和通讯部队在敌人进攻时只知道逃跑，从不同陆军一道作战。对希特勒的恶语相加，戈林似乎已习以为常，他一声不吭地站在一旁。

8月30日，法国维希政府向盟军投降。这就意味着戈林空军在法国境内的所有设施都将落入盟军之手。真是墙倒众人推，希特勒的大本营里到处都是指责德国空军的声音。希特勒在鲍曼等人面前，激烈地抨击戈林，把这些年空军的失败，统统归罪于戈林的无能和逃避，并说，必要时他将解散空军。这些话传到了戈林那里，克勒伯义愤填膺地说，这是一次政治迫害，是鲍曼等人精心策划的阴谋。戈林听完之后，哈哈大笑起来。克勒伯莫名其妙，以为帝国元帅由于受的刺激太多，神经不正常了。戈林笑过之后，才怅然地说：“我的空军早已经被解散了，怎么又说要解散？”

戈林决意再挣扎一次，让希特勒对他刮目相看。从9月上旬开始，戈林便准备亲自策划一次大规模空战行动。9月17日，当盟军的数百架轰炸机在大批战斗机的掩护之下，将对阿纳姆地区的军火工厂进行轰炸时，戈林指挥德国空军升空拦截，双方展开了一场空中激战。第二天盟军出动了上千架飞机，戈林再次指挥德国空军出击。两天里，戈林空军击落数百架英美飞机。

19日晚，戈林胸有成竹地去向希特勒报功。他本以为这次空战即便不能使希特勒完全改变对空军的看法，至少也可以让希特勒知道他戈林现在还是能够胜任空军总司令一职的。不料，听完戈林的汇报，希特勒却说，这次空战根本就算不上什么胜利，实际上是一次大失败，击落敌机的数字是空军部

虚报的。戈林除了震惊和绝望，不知怎么做怎么说好。最后，希特勒对他说，他应该解散空军参谋部及其所属学校，因为这些机构已经没有存在下去的意义了；同时还应解除克勒伯的职务，因为他“是一个失败主义者和不可信任的人”。

戈林满面愁容地回到他的办公室，克勒伯一看便知他肯定又在希特勒那里受到了侮辱。于是，他告诉戈林：“现在你总该相信我了吧，现在大本营所有的不满都是冲着你一个人来的。”戈林的私人助理弗里茨·格纳特突然插话：“帝国元帅阁下，要想让阿道夫·希特勒从这个世界上消失是很容易的，不一定要铲除他，只要秘密把他关起来，然后举行一个国葬，希特勒就‘死’了。”戈林看了格纳特一眼便低下头，装作没有听见他的话，继续同克勒伯谈论空军参谋部的事情。当天晚上，克勒伯接到党卫军有关部门的通知，让他以后不要再到大本营去了。

第二天一大早克勒伯就向戈林报告了这件事。戈林打肿脸充胖子，很仗义地向克勒伯表示，他将向希特勒解释一切可能出现的误会。克勒伯心里明白，戈林即使敢去解释也是徒劳的。过了几天，戈林再一次就空军参谋部的问题向希特勒请示。这回他一去就明白了，希特勒不但想撤掉克勒伯，就连他本人的位置恐怕也保不住了。因为在希特勒那里，他看到了第6航空队司令官冯·格莱姆。戈林对格莱姆出现在元首的办公室里颇感诧异，希特勒没等戈林反应过来，就抢先说出他准备下令由格莱姆代理空军总司令。戈林简直像被一记闷棍打昏了，半天没有说出话来。当希特勒问戈林还有什么意见时，戈林勉强挤出一丝笑容对格莱姆表示祝贺和欢迎。

回去后，戈林把希特勒准备任命格莱姆为空军代总司令的消息告诉了克勒伯。克勒伯分析，这一切都是不断有人在元首面前低毁所致。戈林自信地说：“格莱姆是一个奸细，但他不会在这里呆下去的，我仍然是空军总司令，格莱姆还得回到他的航空队去。”他劝克勒伯先不要离任，一切都等过一段时间再说，戈林扬起头宣布：“我暂时不会离开大本营，我倒要看看鲍曼和希姆莱他们到底还能作出些什么事。”他还告诉克勒伯，他不怕鲍曼，“从来都不把他放在眼里”。戈林没对克勒伯说，实际上他早已计划好了，一旦希特勒死去，他就立即逮捕鲍曼。鲍曼手中没有一兵一卒，更没什么支持者，只要失去希特勒的庇护，他就将成为众矢之的，解决他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同鲍曼相比，希姆莱倒是一个危险的敌人。戈林既担忧又不甘心地说：“希姆莱和鲍曼不一样，他是一个很狡猾的人，他控制着全部警察，我必须慢慢地动摇他的根基。”

自从希特勒告诉戈林格莱姆即将接任空军总司令之后，戈林一反过去处处袒护空军的作法，接连下令在空军及空军所属的地面部队中严肃军纪。在一次会议上，他比较隐讳地告诉空军将领们，以后处决临阵脱逃的士兵，不必事先请示。戈林不再像以前那样总是借故不参加军事会议，而是有会必到，时时处处显示他在为战争而忙碌。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希特勒没再提对格莱姆的任命。10月16日，苏联的白俄罗斯方面军攻入东普鲁士。赫尔曼·戈林师作为德军的主力部队，参加了对苏军的反击。至10月22日，德军全线反击成功，迫使苏军的攻势停了下来。赫尔曼·戈林师在这次战役中的出色表现有口皆碑，戈林的脸上终于有了笑容。

戈林的日子还是没好过多少。

11月2日，希特勒再一次强迫戈林立即撤掉克勒伯。戈林无力抗争，只

得照办。接下来，希特勒又让戈林任命科勒为空军参谋长。在一直对戈林忠心耿耿的克勒伯离开空军司令部之前，戈林同他长谈了一次。克勒伯直率地劝告戈林，以后千万不要把自己对哪个上层人物的想法随便讲出来，希特勒周围的那些人现在已经结成一条阵线，共同对付戈林。他还劝戈林尽量多接近希特勒，为有朝一日东山再起打下基础。戈林摇摇头说：“元首在许多事情上都不同我商量，从任命里宾特洛甫担任外长那件事起，有好多重大政治会议都把我排除在外。现在又出来一个格莱姆，居然想让他担任空军司令。”说到这里，戈林重重地叹了一口气，然后默默地同克勒伯握别。

不久，戈林发现，不仅鲍曼本人，就连鲍曼的爪牙现在也敢不把他放在眼里。有一段时间，他和他的空军中的一些事情总能迅速传到希特勒那里，戈林为此又多受了几次希特勒的气。有人向戈林举报，通风报信的人是鲍曼的爪牙——空军司令部的训导官克洛辛斯基及他的亲信们。克洛辛斯基经常把戈林和空军的一些事情添油加醋地告诉鲍曼，鲍曼再以各种方式向希特勒汇报。戈林虽然非常气愤，但又不敢轻易处理鲍曼的人。谁知不知天高地厚的克洛辛斯基，有一次竟当面教训戈林：“帝国元帅阁下，您不应该把自己封闭在卡琳庄园里，而应该到下面的部队里去看看，整顿一下军纪，撤换那些不称职的军官，比如布劳茨、勒歇泽等人。”没等克洛辛斯基说完，戈林就勃然大怒，大声吼道：“你算什么东西，也敢来教训我？我告诉你，你尽管去汇报，我为什么不撤掉他们？因为我需要每天晚上有人陪我喝一瓶法国白兰地，难道我会找你这种人来喝酒吗？”克洛辛斯基狼狈地退出了戈林的办公室。

克洛辛斯基把戈林说的话一股脑地向他的主子学了一遍，当然少不了传到希特勒的耳朵里。可不知为什么，希特勒这次却没兴师问罪。尤其令戈林感到意外的是，希特勒在此之后打电话让他重新组建空军。接到希特勒的电话后，戈林高兴得手舞足蹈，忍不住得意地对勒歇泽等人说，“元首还是信任我的，尽管他有时听信那些小人的话。”11月10日，戈林在柏林的空军参谋学院召开会议，他对参加会议的空军主要将领们讲，这次会议的宗旨是让大家畅所欲言，献计献策，以便制定出一个新的空军作战计划。并希望长期不和的轰炸机部队和战斗机部队携起手来，重新树立“空军在德国人民中间的威信”。但是，这次会议不仅没有解决任何问题，而且由于战斗机部队和轰炸机部队的将领们互相指责，闹得不欢而散，原有的矛盾进一步加深了。

戈林索性同他的几个亲信一起制订新的作战计划。戈林把新的作战计划命名为“零点赫尔曼行动”，其主要内容是出动空军的绝大部分飞机，对盟军在西欧的各个主要机场进行大规模袭击。然而，戈林的计划还没等实施，便被希特勒的计划打断了。

12月12日，希特勒在陆军司令部召开作战会议，参加会议的人员为德军在西线的主要将领。在会上，希特勒提出了一个新的作战计划：将在最近几天之内对西线的英美联军发动一场反攻，夺回战争主动权，从根本上扭转局势。具体目标是切断美军第1集团军与第3集团军的联系，深入荷兰，重新占领安特卫普，从而夺得美军最重要的供应基地，迫使英美联军沿比利时和荷兰边境撤退，一举消除西线的危机。然后，再回过头来全力对付已突至波兰和东普鲁士的苏军。攻击的突破口选在了阿登山口。为了实施这个计划，希特勒把德国可抽调出来的预备部队全部开到西线，大约有28个师，此外还配备了34个师作为预备队。希特勒命令戈林把空军的绝大部分用于这次战

役。

接到命令后，戈林格外卖力地干了起来。戈林准备动用所有可以起飞的飞机，并向希特勒夸口说，他已调集了 3000 架飞机供这次行动使用，将保证德军在这次行动中掌握战场上的制空权。戈林为空军的行动取名为“伦德施泰特攻势”。

12 月 16 日，德军的攻势开始。盟军总部没有想到德军还有能力组织起如此规模的进攻，在猝不及防的情况下仓促应战，损失惨重。由于接连几天阴云密布，盟国空军无法出动，戈林的空军确实取得了局部的制空权。暂时的胜利冲昏了戈林的头脑，他赶紧跑到希特勒的大本营邀功请赏。希特勒对空军的行动表示满意，对戈林也显出很久不曾有过的亲热。接连几天，戈林一次不拉地参加有关军事会议，因为他觉得再也用不着避开希特勒和陆军的指挥官们了。然而，云开雾散，天空转晴之后，德国空军立刻失去了优势，再往后干脆踪影全无。随着德国空军在天空的消失，戈林再次从希特勒的大本营中消失。他回到卡琳庄园过圣诞节去了。

不管遇到什么挫折，戈林始终没有忘记他的“零点赫尔曼计划”。圣诞节一过，他便着手作准备工作。在此之前，战斗机部队司令官加兰由于同戈林的意见不一致，并且经常冒犯戈林，戈林已下令解除他的职务。

1945 年 1 月 5 日上午 9 时 15 分，“零点赫尔曼行动”开始实施。德国空军大约出动了 2000 多架飞机，集中袭击盟军在西线的 9 个机场。戈林紧张地等在空军司令部的地下掩体里，下午，战报陆续传到这里。击伤击毁 500 多架盟军的作战飞机的战果，使得戈林兴奋不已。但是，第二天，德国飞机损失的数目也报了上来，空军损失各类飞机 227 架。这些飞机大部分是被盟军的高炮部队打下来的，但其中也有一些是被德军自己的高炮击落的。希特勒得知这一情况后，把戈林和科勒找去训斥了一顿，并告诉他们今后再也不许部署这种行动。希特勒对他们说：“我希望空战是在德国的上空进行，你要让那些天天渴望复仇的德国人看看，德国的飞机是怎样为他们复仇的。”戈林和科勒面面相觑，说不出一句话来。

希特勒亲自策划的阿登山口的攻势在 1 月中旬停了下来。到 1945 年 1 月 16 日，德军被迫退守他们在 1944 年 12 月 16 日时的防线。在这次行动中，德军伤亡 12 万人，损失 1600 架飞机、600 辆坦克及 6000 辆汽车，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次战役的失败，把德军推上了绝路。德军连最后的预备力量都被动用，造成了不仅西线已无可可用之兵，同时东线再也无法得到预期的支援的结局。在阿登战役后期，希特勒对戈林的冷漠和蔑视日甚一日。德军陆军元帅隆德施泰特后来回忆说：“在许多次军事会议上，元首让我坐下，却经常让帝国元帅站着。”

喷气式战斗机的使用，曾使戈林的空军有过短暂的转机。虽然投入战斗的喷气式飞机的数量非常有限，但这种飞机的卓越性能已初见端倪。在每次有喷气式战斗机参加的空战中，盟军都遭受很大的损失。盟军还没有一种飞机能与德国这种喷气式战斗机相匹敌，盟军总部对这一点很清楚。美国空军司令部于 1 月 12 日下令，规定盟军空军下一阶段的首要攻击目标是德国的喷气式飞机及其制造工厂。美军空军上将斯帕茨在给盟军最高统帅艾森豪威尔的报告中说：“如果纳粹德国将战争拖过夏天，依照目前德国喷气式飞机制造工厂的生产速度，他们就可以拥有足够的喷气式飞机。到那时德国就有可能夺取在本土乃至整个西欧的制空权。”大批的喷气式战斗机和新式的潜

艇投入战场，德国就会起死回生，重新取得胜利。

假如纳粹德国能把战争拖至 1945 年夏季，局势也许会有改观，但问题是形势已不允许他们有这种幻想。1 月初，苏军在东普鲁士和波兰发起猛烈的进攻，德军防线全线崩溃。1 月 17 日，华沙被苏军占领，半个东普鲁士也落入苏军之手。可以说，东线已经完全垮掉。一天晚上，戈林走进埃米的卧室，对埃米说：“亲爱的，我们已经失败了，只是人们还没有明白，实际上，我们已经没有可能阻止俄国的进攻军队了。”

1 月 27 日，朱可夫元帅率领苏军部队占领了东普鲁士，并于同一天跨过奥德河进入德国本土，一直推进到距柏林只有 100 多英里的地方。希特勒的指挥部已由大本营迁至柏林的总理府。德军陆军总参谋长古德里安找到外长里宾特洛甫，请求他设法同英美取得联系，商洽谈判事宜，以便中止西线战事，把部队全部调到东线阻止苏军的进攻。当天晚上，希特勒把古德里安臭骂了一顿，并说他这样做就是犯了“叛国罪”。1 月 29 日，希特勒在他的总理府中召开会议，专门讨论同西方“议和”的问题。希特勒问戈林：“你认为英国人会对俄国人这一切进展感到高兴吗？”戈林站起来答道：“英国人当然不希望我们会挡住他们，而让布尔什维克占领整个德国，当初英国人就没有想到我们会像疯子一样拼命地阻挡他们。”也许是“疯子”这个字眼刺痛了希特勒，他似乎想发作，但又把怒火压了下去。戈林没有看出希特勒的脸色不对，还在自顾自地说下去，“现在西方的军队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反而俄国人却步步紧逼，已经打到我们的家里来了。我认为，在现在的形势下我们没有必要同英国人和美国人进行和谈，因为他们一向都对俄国人怀有戒心。如果形势继续发展下去，几天之内我们就会收到英国人的电报。”听完戈林后面的话，希特勒惊喜起来，原来戈林的想法同他不谋而合。在会议结束之前，希特勒肯定了戈林的发言。这样，第三帝国的领导集团就把最后的希望放在盟国同他们议和上面了。

在这一段时间里，戈林又遇到了两件麻烦事。第一件事同被他撤职的原空军战斗机部队司令加兰有关。在加兰被解职后，盖世太保开始搜集证明加兰有对帝国不忠等问题的材料。加兰得知这一消息后，几次扬言要自杀。施佩尔和米尔希都出于对戈林的不满而对加兰深表同情，他们通过希特勒的副官冯·贝洛使盖世太保停止了对加兰的调查。然后，米尔希找到戈林，劝戈林妥善解决加兰的事情。戈林不理不睬的态度激怒了米尔希，他大骂戈林不仁不义，并威胁说，他要到希特勒那里揭露戈林的一些问题，声称“你的那些事只要元首知道百分之一，就足以让你上军事法庭”。戈林乱了方寸，语无伦次地答应再给加兰一次机会，并讨好地对米尔希说，他完全是看在米尔希的面子才这样做的。米尔希却毫不领情，拂袖而去。戈林第二天就把加兰召到卡琳庄园，授权他组建一支完全由新型喷气式战斗机装备的航空队。

第二件事则是他的家事。戈林的弟弟阿尔伯特·戈林一直对纳粹的反犹政策不满，并多次在私下里帮助过犹太人。就在前些天，阿尔伯特·戈林给移居的里雅斯特的维也纳犹太人提供了一大笔资金。盖世太保得知这件事后，将阿尔伯特·戈林逮捕。戈林派人拿着他的信去求情，才将他的弟弟保了出来。在卡琳庄园，戈林怒不可遏地指着阿尔贝特的鼻子叫道：“你想给犹太人钱，那是你自己的事，但你得小心些，你知道你这样做将给我带来多少麻烦。告诉你，这绝对是我最后一次帮你的忙！”

形势不断恶化，苏军已经直逼柏林城下。2 月 3 日，美军的 900 架轰炸

机又对柏林进行了一次大轰炸。希特勒躲在总理府的地下掩体中，大声问道：“戈林到哪里去了，为什么天空没有一架德国的战斗机？”作战部长克里斯蒂安告诉希特勒：“帝国元帅到奥德河的前线去了，所有的飞机也都调到那里反击俄国人的进攻。”希特勒冷冷地说：“那不过是一次荒唐的远足而已。”希特勒身边的人对戈林的反感和敌视越来越公开化，戈林时常受到奚落和诋毁。有一次，戈林刚从希特勒那里走开，已经以纳粹德国第二号人物自居的戈培尔就指着他的背影说：“我的元首，我建议从现在开始，就把那些身上洒满香水，徒有其表的花花公子赶出最高统帅部。”希特勒稍一犹豫，说出了心里话：“我并非是不想撤换他，只是空军直到现在也没有合适的人选。”

听着奥德河畔的炮声，戈林深知大势已去。曾让纳粹上层人物寄以厚望的V—1、V—2火箭，由于绝大部分发射场被盟军占领，无法发挥作用。喷气式战斗机由于所用的特殊汽油短缺和机场被破坏，实际上已不能升空作战，加兰因此被迫辞职。而海军司令邓尼茨所说的那种新式潜艇，至今才有两艘下水。戈林此时唯一的希望就是希特勒授权于他，由他出面同西方议和。不过，他也知道，议和的建议必须在一个最为适当的时候提出，否则很有可能被希特勒斥为叛变行为。戈林在一次同希特勒单独谈话时，试探着提议同英美营造一种“新的气氛”。希特勒当然明白戈林所谓的“新气氛”的含义，故而直截了当地说，“我从不同敌人讨价还价。你不要总想这些，对于你来说，最重要的是考虑如何在空军中营造一种‘新的气氛’。”戈林灰溜溜地走了。回到卡琳庄园后，戈林把自己关在书房里紧张地思考下一步所应采取的行动。既然劝希特勒同西方议和的路走不通，就只有他自己想办法了。一种天降大任的神圣感油然而生，戈林坚信，拯救德国人民，拯救德国军队的历史重任已经落到了他的肩上，只要他站出来代表德国同盟军谈判，盟军就会停止进攻。

为了确保自己的万贯家财不受损失，戈林下令把卡琳庄园所有的艺术品统统分批运到德国南部，他早已在那里为放置这些无比珍贵的艺术品作好了安排。然后，他把妻子埃米及女儿埃达送到了上萨尔斯堡。他却几乎每天都呆在卡琳庄园里，他实在不愿意离去，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是他看着长大的，只有在这里他才能全身心放松，感受到一种温情。戈林依旧很少在希特勒的总理府露面，现在他不仅害怕面对希特勒那阴冷的目光，更怕遭鲍曼等人暗算。

形势不允许戈林等下去了。盟军不仅丝毫没有同德国议和的意思，反而加强了对德国城市的轰炸。2月13日，盟军对德累斯顿进行了毁灭性的轰炸，这座美丽的历史名城几乎化为灰烬，大约有5万多居民丧生。紧接着又发生了德国空军一架载有20亿伪钞的“B—17”轰炸机（几个德国间谍偷来的）在起飞时爆炸的事件，纳粹扰乱法国经济的阴谋彻底破产。这起事件使戈林本来已低得可怜的威信又下降了一大截，纳粹上层废黜戈林的呼声再起。

对妻女的思念以及对转移出去的艺术品的牵挂，使得戈林茶饭不思，坐卧不安。3月18日，戈林终于忍不住了，对希特勒托词说，他要到伯希特斯加登去视察高炮部队。其实，他是要去探望他的妻子和女儿，然后再去看一下他的艺术品的安放情况。他本以为希特勒要阻止他，不料希特勒很痛快地答应了，戈林当天便踏上了南下的专列。戈林走后，希特勒无奈地对戈培尔说：“要是戈林干得好，使我们的空军全部装备上喷气式飞机该有多好，可他却又坐上火车到南方去看他的夫人去了。”

从南方回来后，戈林更加热衷于促成同盟国的谈判。可是，希特勒已明令戈林不许利用其广泛的社会和外交关系同盟国作任何政治性接触，同时还让戈林必须参加每天下午4时举行的军事会议。在每次会议上，戈林都得忍气吞声地听着希特勒以及那些对他不满的人对空军及他个人的攻击。在一次会议结束后，戈林对空军参谋长科勒说：“你说，这个人是不是疯狂到了极点，他竟然下令把被俘的盟军飞行员统统交给盖世太保处死！”沉默了一会儿，他又叹道：“我已经无法忍受下去了，难道今天的一切都是空军造成的吗？”科勒对可怜巴巴的帝国元帅的处境，表示了他的同情。

迫于希特勒的压力，戈林于4月初策划了代号为“狼人”的空战行动。行动的内容是，由几百名志愿人员驾驶战斗机组成一个敢死队，撞毁前来轰炸柏林的盟军飞机。4月4日，敢死队第一次出动，可是，大部分“狼人”在同敌机相撞之前，便被击落。科勒劝希特勒下令停止这种得不偿失的行动，希特勒没有同意。4月16日，苏军对奥德河防线的德军发起总攻，希特勒下令起用“狼人”破坏奥德河上所有的桥梁。那天，戈林正在卡琳庄园指挥一千多名空军士兵，为他打点行装和就地掩埋无法带走的艺术品。

4月19日午夜，戈林来到希特勒的总理府，他准备在希特勒的生日来临时第一个向他表示祝贺，讨取他的欢心后提出自己的要求。当时钟指向4月20日零点时，戈林走进了希特勒的房间，笨拙地说了一通“衷心的祝贺”之类的话。希特勒机械地向戈林点了点头，显然长时间的隔阂已使他们两人在单独相处时都有一种别扭的感觉。过了片刻，戈林结结巴巴地提出：“亲爱的元首，我能不能到柏林以外的地方为您效劳，比如伯希特斯加登？”希特勒好像没有注意戈林在说什么，却冲着门口点了点头。戈林以为希特勒同意了他的请求，急忙告辞。但是，他刚刚赶回卡琳庄园，却又接到希特勒的电话，希特勒在电话里对戈林说，他希望戈林中午去参加每天一次的例行军事会议。戈林绝望地想，希特勒也许已打定主意让他留在柏林同所有的人一道同归于尽。躺在床上，戈林久久无法入睡，天还没亮就起来了。他迈着沉重的脚步，独自一人穿过卡琳庄园外的松林，来到卡琳的墓前。在晨风中，松林发出阵阵呜咽声，与远处传来的炮声交织在一起，仿佛合成了一支催人泪下的哀乐。戈林走到卡琳的花岗岩筑成的陵墓前，缓缓跪下，把头抵在了墓碑上。良久，他才站起来，环视一圈之后，转身离去。这是戈林最后一次来到卡琳的墓地。

一大早，戈林便带着他的私人医生赶往柏林。中午，在希特勒的地下掩体的会议室里，戈林出现在众人面前，人们惊讶地看到，戈林的装束完全不同于以往，草黄色布军服取代了笔挺的毛料制服，宽宽的金边肩章换成了普通的布肩章，只是他的金质帝国元帅鹰徽还别在上面。

会议开始后，纳粹头目们纷纷劝希特勒放弃在柏林展开巷战的想法，转移到上萨尔斯堡去。戈林强调说，只有一条穿越巴伐利亚的南北公路还没被敌人控制，这最后一条逃生之路时刻有被切断的危险。希特勒激动地质问：“假如我现在就撤到安全地带，我又怎能指挥部队为保卫柏林而战呢？”最后，在人们的劝说下，希特勒同意把最高统帅部分为南方和北方司令部两个部分。与会人员向希特勒敬过纳粹礼后，匆匆离去。当人走得差不多时，戈林悄悄走到希特勒的身边，哆嗦着嘴唇问道：“我的元首，因有紧急事务，我必须立即赶到上萨尔斯堡去，您不会介意我在今夜离开柏林吧？”希特勒正在低头看地图，连头也不抬地对戈林说：“你愿意上哪儿就去哪儿吧！”

向希特勒告别后，戈林慢慢地走了出去。当时他不曾想到，这次告别竟成了他同希特勒的永诀。出门后，戈林的心里有点难受，他为自己在帝国危难之中不能同元首患难与共而不安。但不安很快便过去了，他心中有一个声音反复说，不是他戈林不愿意留在柏林，而是元首不需要他，元首身边的那些人容不下他。他终于为自己的行为找到了借口，而不再受良心的谴责了。

在回卡琳庄园的路上，戈林倚靠在轿车沙发的靠背上，闭目养神，纷乱的思绪却使他怎么也平静不下来。最近几天发生的事情像放电影一样，一幕幕地在他的脑海中闪现。突然，镜头定格在那天他同希姆莱谈话的情景。戈林同希姆莱在总理府的一个房间里相遇，希姆莱把他拉到一边，神情诡谲地说，昨天，瑞典的贝纳多特伯爵拜访过他，“我相信他一定是美国方面派来同我谈判的代表”。戈林早就知道希姆莱一直企望在希特勒之后成为德国的合法代表，也知道他正在寻求代表德国同英美谈判的途径，于是，戈林反唇相讥：“我不相信这一点——请别生气，我不认为他们会觉得你是一个合适的谈判伙伴。”希姆莱狡黠地笑了笑说，“帝国元帅阁下，很遗憾我不能同意您的话，我可以拿出令您信服的证据，此外，在国外，人们认为我是唯一可以维持国内秩序的人。”戈林转身要走，希姆莱又问道：“万一元首出现意外，您成为元首的继承人，会不会让我担任总理。”戈林恶声恶气地回答：“我不知道您是否忘记了，按照第三帝国的宪法，这个职务似乎已经同元首的职能合并。”希姆莱穷追不舍，居然问出：“那么，再假如发生了其他意想不到的事情，比如您由于被清除而无法接任元首，我能得到这个职位吗？”戈林听到“清除”这两个字，不禁怒火中烧，随后一想希姆莱不会在意他发不发火，便强抑着对希姆莱的憎恶，软中带硬地说：“我不知道有什么事情能阻止我接替元首的职务，这一切只有走着瞧了。”在往外走的时候，他感到希姆莱那双毒蛇般的眼睛正盯着他的背影，不由得脊背一阵阵地发凉。汽车一阵颠簸，把他的思绪又拉回到现实中。他拉开了汽车的窗帘，看着外边没有一丝光亮的田野，猛然觉得有一种神秘的力量正拉着他向一个无底的黑洞沉去，巨大的恐惧感压得他透不过气来。

凌晨2时，一队由装甲车和卡车组成的大型车队从卡琳庄园浩浩荡荡地开出，戈林换乘了一辆大型防弹轿车。透过防弹玻璃，眺望着被火光染红了柏林城，戈林心里一阵狂跳。他的激动和惊悸不知是因为终于逃离了柏林这个即将落入敌人手中的城市，还是因为他即将开始实施一个将震惊整个德国的计划——在到达上萨尔斯山之后，抢在希姆莱前面，同美国方面取得联系，通过谈判结束战争，然后再出面收拾第三帝国的残局。

4月21日上午11时左右，戈林的车队到达了他在上萨尔斯山的豪华的山间别墅。戈林看到了令他思念不已的妻女，还看到了他的姐姐保拉和一大群外甥、外甥女，是埃米派人把他们从被苏军占领的奥地利接来的，他沉浸在同亲人团聚的喜悦和幸福之中。同家人寒暄了一阵之后，戈林进了卧室倒头大睡。柏林的一切，现在对于他来说，都已成为遥远的过去。他要养精蓄锐，为下一阶段的拼搏作好准备。

一觉醒来，戈林显得精力充沛。此刻他心中盘算的全是如何尽快同美国人接上头，以第三帝国的代表——最具权威性的代表的名义同艾森豪威尔谈判。他尽管心里十分焦急，可又不敢轻举妄动，他还想听一听柏林的动静。

就在这个时候，留在柏林的空军参谋长科勒，接到了希特勒的联络官克里斯蒂安打来的一个电话。克里斯蒂安告诉科勒，“元首此刻正在焚毁文件，



并准备以身殉职。元首已经垮了。”放下电话，科勒马上冒着炮火去见总参谋长约德尔，想弄清事情的真相，没想到约德尔也不明所以。最后，约德尔讲了他前几天去见希特勒的情形。当他和凯特尔见到希特勒时，希特勒忽然谈起同英美谈判的问题，并对他们说：“至于谈判，戈林能比我搞得更好一些。戈林精于此道，善于同各类人打交道……。”约德尔猜测：“也许元首早已安排戈林同英国人、美国人谈判了。”科勒也认为极有这种可能，并说他立即到上萨尔斯堡向戈林汇报此事。4月23日凌晨3点，科勒乘坐一架战斗机飞到上萨尔斯堡，把他所知道的消息告诉了戈林。

一直在等候柏林消息的戈林在此关头变得异常谨慎起来。他对科勒说，这件事还是小心为好，因为这很有可能是鲍曼设下的一个陷阱。经过一番思索，戈林决定还是先给在柏林的希特勒发一个电报。他想，如果元首还活着，就会给他一个明确的答复；如果接不到元首的电报，就说明元首已经死了或已经失去行动的自由，那么他就要采取行动，接替元首的职务或代表元首视事。根据希特勒1941年6月29日签署的文件，这样做是合法的。

戈林口授了一份电报：

我的元首

鉴于您已决定留守柏林，请问您是否同意我根据您1941年6月29日的命令，马上接管帝国的全部领导权，代表您在国内充分地采取行动？如果今晚10时还没有听到您的回音，我将认为您已失去行动自由，并且认为执行您的命令的条件已经具备。我将为国家和人民的最高利益采取行动。您知道在此危急时刻，我对您的感情，已非语言所能表达。愿上帝保佑您，使您克服一切困难迅速来此。

您的忠诚的

赫尔曼·戈林

接着，戈林又给里宾特洛甫发了一份电报，电文为：

我已电请元首于4月22时以前给我指示。如果届时证明元首已经失去处理帝国事务的行动的自由，那么他于1941年6月29日签署的命令就将生效，我将根据这一命令接任他的全部职务。如果到1945年4月23日24时，您还未收到从元首或从我这里发出的其他指示，您就立即飞抵我处。

戈林没有想到，他的两份电报在第三帝国的最后关头为他和希特勒的关系，也为他自己的政治生命划了一个句号。戈林的第一份电报一到，鲍曼便知道清除戈林的机会来了。他跑去对希特勒说：“帝国元帅发来一个电报，在我看来，这是给元首的一个最后通牒，实际上这是一种窃取元首的最高权力的叛逆行为。”希特勒匆匆看完电文，没说什么。鲍曼正为没能激怒希特勒而懊丧，戈林的第二份电报被送来了，鲍曼一看，兴奋得大叫：“戈林在搞政变！他已通知政府成员，他将于今夜24点接任您的职务。”希特勒终于发作了，他在地上走来走去，大骂戈林：“我早就知道戈林完蛋了。他腐败，吸毒，他把空军搞垮了，……”骂过之后，希特勒冷漠地说：“好吧，就让戈林去谈判，如果战争失败，谁去都没关系。”在场的人除了鲍曼之外，听了希特勒的话都感到震惊。

鲍曼不失时机地催促希特勒立刻下令废黜戈林。希特勒思忖了一会儿，便口授了一份命令，鲍曼亲手记了下来：“……我禁止您采取电文中所说的任何措施。”大约半个小时后，鲍曼送来戈林的回电，电文称戈林因心脏病复发，决定辞去一切职务。鲍曼又以希特勒的名义给戈林发去一份电报，宣称戈林犯有叛国罪，理应被判处死刑，姑念其长期效劳于党国，免其一死。鲍曼在发这份电报的同时，又私自给上萨尔斯堡的党卫军发了一份电报，让他们立刻以叛国罪逮捕戈林。4月29日，希特勒在其政治遗嘱中，重申免去戈林职务的决定。

4月29日晚9时左右，一队党卫军冲进戈林的寓所。守卫部队事先接到了鲍曼以元首名义发来的电报，故按兵不动，听凭党卫军逮捕帝国元帅。戈林先是同他的家人一道被党卫军就地监禁，随后又被转移至离上萨尔斯堡40多英里的毛特恩多夫城堡。后来，他被党卫军转交给一支空军部队。再往后，戈林便落入美国人手里，直到走上纽伦堡军事法庭。

1946年10月15日夜，戈林在纽伦堡的监舍中服毒自杀。

正是：多行不义必自毙，千古罪人恶名遗。

